

目 录

· 专题论文 ·

- 历史演变的模式：中国的国家与社会(1839—1949)
..... 魏斐德(1)
崔志海译
- 太平军的远方同盟军：1853—1855年上海与广州的叛军
及其同缔约国的相互作用的比较研究..... 黄宇和(9)
周育民译
- 孙文的地方自治制度论 横山 英(28)
刘世龙译
- 东西方对立的孙逸仙观 白吉尔(40)
葛夫平译
- 国民党的性质(上) 齐锡生(57)
徐有威 曾忠梅译 徐有威校
- 田中义一内阁的对华政策与张作霖被刺事件
..... 大江志乃夫(86)
林卫平译 肖 苏校
- 日中战争的爆发和近卫文麿的“国际正义”论
——走向建立东亚新秩序的进程..... 庄司润一郎(112)
林卫平译 肖 苏校
- 介绍俄罗斯学者的两篇论文..... 薛衔天(135)
- 1941—1942年中国的国家体制和苏中关系问题
..... P. A. 米罗维茨卡娅(138)
杜 华译 李玉贞校

- 30-40年代远东的苏中经济关系 Г. H. 罗曼诺娃(145)
于东林译
- 近代华北的土地经营与商业运行的特征 小林一美(163)
孙晓青 孙青译 张士义校
- 苏军在远东的战斗行动 罗申(185)
李金秋译
- 传教士与官吏——19世纪末中国教育改革先驱 ... 阮桂雅(212)
黄庆华译

· 人物介绍 ·

- 日军战俘学校——大同学园园长汪大捷先生的足迹
..... 桐生润三(235)
金海兰译

· 书刊评介 ·

- 纠偏创新、启迪思路——评介冯兆基著《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
..... 郭大风(239)
- 史景迁著《近代中国探索》 斯蒂芬·B.波尔特(259)
杜继东译
- 迈克尔·Y. L. 卢克著《中国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形成中的
一种意识形态(1920—1928)》 格雷戈尔·本顿(261)
杜继东译
- 叶文心著《中华民国的文化与政治(1919—1937)》
..... 阿里夫·德里克(264)
杜继东译
- 托马斯·G. 罗斯基著《战前中国经济的发展》
..... 罗伯特·Y. 恩格(267)
杜继东译
- 托马斯·G. 罗斯基著《战前中国经济的发展》 古炎民(270)
杜继东译

- 凯文·P. 莱恩著《主权与现状:中国的香港政策的历史根源》
 彼得·韦斯利一史密斯(272)
 杜继东译
- 凯文·P. 莱恩著《主权与现状:中国的香港政策的历史根源》
 诺曼·迈因纳斯(274)
 杜继东译
- 近代改革者伍廷芳..... 万 燕编译(276)
- 从波茨坦到冷战:三巨头外交(1945—1947) ... 万 燕编译(278)

· 学术动态 ·

- 1992 年日本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宫田道昭(280)
 张永江译 王士花校
- 日本中国近现代妇女史研究状况..... 石川照子(290)
 李 宏 陈曼娜译
- 外国在华机关公团名汇(十一)..... 黄光域辑(297)

历史演变模式： 中国的国家与社会(1839—1949)

魏斐德*

我将要探讨的四种模式是：19世纪地方主义在东方专制主义条件下的发展及其向现代军阀主义的演变；同治时期儒学统治地位的恢复及其在国民党时期的再次出现；从晚清到20世纪50年代初地方精英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在这整个时期里国家权力对社会进程的渗透的不断加强。这四种模式与中国社会控制制度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可通过20世纪警察部队的形成得到验证。

地方主义·军阀主义·专制主义

这四种模式都将1839—1842年鸦片战争之后的这段时期作为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的开端。这一时期的农民起义和地方军事主义与一个世纪后的中国的相似之处，于20世纪30年代首先引起乔治·泰勒(George Taylor)的注意，当时他正在撰写关于华北军事冲突的著作；他论述清朝对太平军的反应的史书，后来在20世纪50、60年代对华盛顿大学的历史学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的“东方的专制主义”

* 本文为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魏斐德于1991年1月11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所作的学术演讲稿，在翻译过程中作了删节。——译者

观点在泰勒的整个架构的背后隐约可见。乡绅只是国家的产物，尽管他们对君王提出的道德上的批评确实使他们起到某种制衡作用。然而，从本质上说，他们仍是君主制的附属品：他们的命运受科举考试的支配，他们的生活来源主要是靠作为士大夫的收入，而不是靠地租或采邑等更为独立的经济收入。

这种本质上停滞不变的历史因鸦片战争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而改变。太平天国对闭关自守、讲究夷夏之辨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它促使旧体制开始瓦解。象曾国藩这样的“团练大臣”获准建立地方军队，而且对在通常情况下不许染指的地方财政来源也能加以控制。他们的幕僚继承了这些特权，成为一批独立的军事将领，并在 20 世纪初构成北洋军阀的核心。

因此，这种史学论点的中心大体是，清王朝为应付太平军的挑战，在 19 世纪 60 年代不得不兴建地方军队。而地方主义又导致军阀的出现，这便是清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当然，中国传统的乡绅也随着君主制的瓦解开始走向没落。

儒学的复兴

地方主义、军阀主义、专制主义模式远不如芮玛丽 (Mary Wright) 的儒学的继续复兴架构具有启发性，这一架构是从她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在哈佛费正清著名的专家讨论会上学到的“冲击—反应”结构发展而来的。芮玛丽的架构的出发点也是鸦片战争和太平军叛乱。她认为，象曾国藩这样的自强运动领导者，因受文化忠诚思想的影响要维持清王朝的统治。诚然，他们在地方上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官僚机构，但他们的儒家保守主义最终使他们效忠于现存的国家组织。

将政体与文化等同起来会造成两种后果。第一种后果是将满汉君主制存在的理由与从总体上捍卫传统联系起来，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当帝国崩溃时，传统的儒家文化也就随之衰落。

政体与文化认同的第二种后果是，辛亥革命后，当传统文化因其与正在灭亡的旧制度的联系而遭到致命打击、前景黯淡时，保守的政治文化仍然比较顽强。芮玛丽在著述中认为，曾国藩思想中的这种“顽强的儒家思想”同样存在于蒋介石的政治哲学中。芮玛丽把蒋介石在“剿共”期间对付暴动的策略以及1934年新生活运动的原理与曾国藩的影响联系起来。因此，芮玛丽把国民党的保守主义看作是同治中兴思想的再现，并认为这完全是一个时代错误。芮玛丽在晚年越来越认为，整个中国近代史就是始于世纪之交的极为重要的革命浪潮。

在《革命中的中国》一书中，芮玛丽对中国官方史学著作中流行的关于孙中山对辛亥革命起了“国父”的关键作用的观点提出疑问。芮玛丽认为文化大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20世纪初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她列举了当时中国出现的一些新生力量：妇女、青年、近代军队、工人，等等。这些力量而不是孙中山那样的海外华人宣传家——他们只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些致力于发动政变的力量——才是革命的真正动力。芮玛丽著作的另一个新观点——“乡绅革命”，当时远不如她对反对对孙中山的偶像崇拜所持的怀疑那样引人注目。“乡绅革命”的观点在张朋园对立宪运动所作的重要研究中得到有力的支持，这一观点对后来学者的影响要比她的反孙论或“新力量”论更为持久。

地方精英

德托奎维尔(De Tocqueville)把社会革命与在地方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精英和近代国家之间的各种竞争形式联系起来，在过去25年里这一直是美国历史社会学的一个重大再发现。在中国史领域里运用这个观点进行阐释的最有影响的学者是孔斐力(Philip A. Kuhn)，他的“军事化论点”成为晚清史研究中引用最多的一种结构上的分析方法。通过对太平天国时期历史的仔细考察，孔斐力

不仅指出地方精英从叛军手里夺回了乡村,而且他还认为叛军和满清王朝双方都同时经历了一场社会军事化过程。此外,他还论证这种超国家的军事力量的扩大是国家与地方精英激烈竞争的一种表现,它们的竞争不仅为了现存的资源,而且还为了由人口统计需要和来自外国的竞争所产生的新的政治资源。

孔斐力还将地方精英的垄断与鸦片战争后在经世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开明的自利思想联系起来。正如孔斐力所指出的,士绅乡治或“地方自治”的观念使人想起17世纪的一个理想,即用开明的儒家士绅的“封建”的利害关系制约“郡县”国家的专制权力,这些儒家士绅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在19世纪末改革运动期间及其后出现的地方自治运动,至少可分为三种不同的形态。

乡绅自治形态

第一种形态是温和的、积极的地方自治政府,它由一群敏感的、致力于建立他们自己合法的公共政治职责范围的地方领导人发起。这就是伊懋可(Mark Elvin)在阐述本世纪初上海附近的地方精英的行政管理制度时所指的“乡绅民主制”。近年来,这种现象被兰金(Rankin)、罗(Rowe)和曼(Mann)看作是精英行动主义的一种引人注目的近代形态。精英行动主义伴随着一种新的自愿的公共服务领域的产生而出现,它甚至可以被看作是朱尔根·哈伯马斯(Jurgen Habermas)所谓的18世纪后欧洲社会中的“公共领域”。

地方自治的第二种形态要消极得多,与某些美国历史学家所认为的在19世纪末中国出现的市民社会相比,它更接近于东方专制主义的独裁特征。村松佑次(Muramatsu Yuji)对江南的厘税的研究表明,太平天国后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居民所承担的公共赋税和私人地租的界限日趋减弱,以致地主能够运用国家警察力量来逮捕抗租的佃农,强化他们的地租征收制度。深受村松著作影响的

詹姆斯·波拉切克(James Polachek)对苏州的研究证明,国家与社会精英统治之间的极度缺乏界限削弱了国家权力,并且增加了社会革命的可能性。

地方自治的第三种形态是,地方精英扮演反对政府的革命运动的组织者的角色。辛亥革命期间的地方立宪派领袖、城市改革者如谭延闿,后来在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者的统一战线中支持由毛泽东领导的青年激进分子。可是随着统一的民族主义让位给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城市精英内部的统一战线就开始分裂了。

传统国家的权力

明代开国者理想中的地方政府形态是一种自我管理的机制,由地方粮长无偿负责收税并履行其它一些重要职能。既然朝廷指望自给的征税者,那么控制机制也就不会太正规。

清王朝继承了朱元璋的关于最低限度插手地方管理的策略。为了取得中国东部的经济资源,清代头两个皇帝作出了极大的努力。这些努力大部分获得了成功,在中国前近代各朝中,乾隆时代的清朝国家在财政、军事和政治上都是十分强大的。然而,税收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私人垄断扰乱了水利系统,在18世纪50、60年代几乎阻塞了国家用于收取贡赋和进行贸易的水路。而18世纪70—90年代人口的增长给国家的政治资源带来各种重负,这在前面讨论孔斐力的军事化理论时已经提到。光绪末年,在1898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后,国家权力的积弱具体表现为光绪皇帝在试图越过地方官员直接管理帝国民众方面所遭受的挫折。政府方面的动机是想使上下融为一体,以便加强自己的统治,但地方精英却认为这意味着承认他们有权参与被广泛分享的政治统治。

因此,对于20世纪初期陷入冲突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看法:一是国家希望加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直接联系;二是地方精英渴望能更多地插手地方政府的事务。

近代国家与社会控制

20世纪中国国家权力加强的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近代警察制度的发展。袁世凯是华北地区新型欧式警察部队的主要创建者。在保定和天津采用近代警察制,既是为了安定人心,也是为督抚提供一种越过地方乡治势力的工具,而这些地方乡治势力直至那时仍控制着当地的民兵和乡勇。在北京,警察制度改革是根据日本1871年明治警察制度改革的精神进行的,并且有一批日本警事专家受聘在华担任教官。

在这些专家中,最著名的是川岛浪速(Kawashima Naniwa),他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担任中国警务学堂的总监,该学堂采用日本警察局的方法训练中国巡警人员。1902年,川岛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它成为日后警察制度改革方案的蓝本。他在其中还将军队和警察比作国家政治统治的两翼,这个比喻近年来变得十分流行。在备忘录中,川岛提议建立一支由中央控制的国家警察部队,它隶属警事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并由皇室成员担任首脑。

中国这个新的警察制度以欧洲大陆中央集权的警察制度为模式。1905年10月8日成立巡警部;1907年取消绿营军后,巡警部被合并到民政部。在民政部里,所有警察事务都归警政司管辖。将近20年后,警政司成了国民党内政部里蒋介石的秘密警察的机要管理核心。

国民党的警察制度改革

尽管日本模式和欧洲范例似乎已给中央集权制的前途提供了保障,但如果在这之前军队没有统一,仍很难把警察控制模式强加给中国。然而,直到30年代大陆法系专家对中国新的国家警察制

度的影响受到美国警官的挑战为止，欧洲的警察制度一直是中国效法的主要模式。例如，1930年，国民党内政部邀请伯克利加利福尼亚警署的A. S. 伍兹(Woods)警长来华担任顾问。

伍兹被请来帮助改组南京市警察机构，是因为作为世界上优秀的警察机构之一，伯克利警署声誉日隆，而这又应归功于其领导人奥古斯特·沃尔默(August Vollmer)。沃尔默同时也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执教，是伯克利的第一位犯罪学教授。沃尔默在任职期间培养了两位中国学生：鄧裕坤和于修浩(Yu Xiuhao, 音)他们后来均成了蒋介石的主要警察顾问。鄧裕坤于1932年在伯克利的犯罪学培训班毕业后回国，他私下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关于改革中国警察制度的计划。1933年3月，鄧被调到警察厅长陈焯将军手下任安全处“特别秘书”。鄧在任职期间引进了一批美国警务设施，包括无线电巡逻车、测谎器、指纹取样机、警犬，等等。未到一年，他又应邀担任浙江警官学校警察培训处主任。

浙江警官学校由朱家骅在北伐后建立，是新的国民党政权培训干部的第一批学校之一。作为国立教育机构的浙江警官学校也负责庐山的治安，那时庐山已成为国民党“剿共”的训练基地。特别干部大队则由蒋介石的秘密军事机构头子戴笠建立，为“军统”储备力量。浙江警官学校也是戴笠的军统人员的秘密培训中心。这些军统人员被蒋介石选作特别干部，用以接管地方警察力量，并将其纳入秘密警察系统。

1935年，当蒋介石宣布将浙江警官学校与江苏警官学校*合并成立中央警官学校时，戴笠手下的人已被安插在一些要害的政治培训部门。而一些特别秘密培训部门也已用来培养军统人员，这些人员中有的被编入蒋的私人卫队，有的成为情报人员，有的则充当秘密警察。培训他们时采用的课本是共产党叛徒提供的苏联“契卡”和政治保安部训练手册的中译本。

* 误，应为北平高级警官学校。——译者

包括陈立夫的“中统”在内的国民党的秘密组织，相当于共产党特务部和特务委员会属下的共产党地下活动组织。共产党特务部和特务委员会于1931年“红队”领导人顾顺章叛变之后成立。

1935年，蒋介石决定成立中央警官学校，这主要出于对全国警察制度更为深远的考虑，即将警察系统与控制地方的其它系统结合起来，使之与军队一起作为其政权的两大支柱。蒋介石对1937年毕业的中央警官学校学生说：“我国有两支主要的力量：军队和警察。一个保卫国家，一个维持治安，它们如同飞机的两翼。但是，由于现代警察任务的复杂性，也由于警察是唯一与公众经常接触的公职人员，因此，在我们的社会里，警察就显得更加重要。”*

蒋介石计划让中国所有的警察头目都到中央警官学校接受培训，但这一计划因日本侵华而流产。不过，秘密警察组织仍在继续扩大，这一方面是由于获取情报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戴笠与美国海军代表达成协议，决定成立中美合作所。由中美合作所提供来自联邦调查局和海军情报机构的教导员，帮助培训高级军统人员；由正规的陆、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军官训练戴笠的5万名“忠义救国军”。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时，蒋介石的军统局约有10万名特务，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情报机构和秘密警察组织之一。

节译自《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1991年，第11期。

崔志海译

（责任编辑：丁毅）

* 未查到原文，此处为意译。——译者

太平军的远方同盟军：1853—1855 年 上海与广州的叛军及其同缔约国的 相互作用的比较研究*

黄宇和

1853 年 3 月 20 日，太平军攻克了南京。9 天以后，太平王入城，宣布它为天国的首都。这极大地鼓舞了沿海地区的对政府不满的人们。秘密会社纷纷拿起武器反对它们的政府，并在上海和广州这两个商业中心成功地发动了两次较大的叛乱。^① 在上海，叛军于 1853 年 9 月 7 日占领县城，直至 1855 年 2 月 17 日。在广州，叛军从 1854 年 10 月 13 日到 1855 年 3 月 7 日围困该城达 5 个月之久。可见，在太平军直接与缔约国接触之前（外国公使偶然访问除外），上海与广州的叛军每天必须与外国人打交道。因此，我不得不系统地阐明他们对洋人的态度。确实，这两座城市存在着当地叛军、缔约国、清政府和多少还包括太平军这 4 个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它们远比历史学家们到目前为止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1860

* 这篇论文是在剑桥丘吉尔学院的志趣相投的环境中写成的。我希望在此表达我对给予我友好和慷慨的帮助的该学院院长和研究人员的谢意。

① 应该指出：开放港口厦门的反叛者也占领了该城市，但这次叛乱远不如上海和广州的影响大。

年,当列强与太平军广泛地接触时,它们准确地知道该怎样做;而当时忠王李秀成正率兵攻打上海,他对他的洋兄弟却一无所知,或者说想法天真幼稚。

众所周知,1860年,缔约国放弃了早就宣布的在太平军反叛期间保持中立的政策,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所以,一般认为,此前列强曾忠实地遵守中立。然而,从来自有关当事人的响亮的抗议中可以看到,早在1854年列强在上海和广州就已给清军以非官方的物质上的支持。

中国历史学家一直谴责这一时期在中立伪装下的外国干涉,但这些谴责常常缺乏系统的证明。确实,笼统地指责帝国主义侵略往往会使问题过于简单化,并且会使之忽略对生死关头的利害关系的微妙作用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外国外交官远不是头脑简单的帝国主义者,而是熟练地利用局势来谋求自身利益的实用主义者。所谓“中立”一词,仅仅对那些教条主义者才会有那么点意义。

二

西方的资料表明,上海的叛军是秘密会社三合会成员——来自广东、福建两省的下层民众。^① 主要分为7个帮,而不是两个。^② 最有势力的一支的首领刘丽川被推为总首领。^③ 他是广州人,1845年在香港加入三合会,1849年来上海建立他自己的小刀会。^④

“下层民众”在西方资料中的意思是未受教育的劳动人民。但这些资料未能说明他们反叛的原因。一位中国著者将他们描写为

① 怡和书信文件集(Matheson Papers)B2/23, A. 鲍思孚致D. 查顿(A. Perceval to D. Jardine), 1854年9月7日。

②③ 方诗铭:《上海小刀会起义》(上海,1965年),第25页。

④ 同上书,第23页。

由于沿海贸易衰败而造成的被迫背井离乡的失业水手。^① 这种衰败是由清政府的沉重赋税和外国船只的侵入造成的。^② 关于沉重的赋税,著者引证了当时的记载;^③ 但关于外国船只,著者只引用了间接的材料,并不令人满意。书中简单地引用了一个外国人的话:他1843年在上海看到的无数沙船到1848年已经不见了;据他统计,取而代之的外国大船共有26艘。^④ 但是,从事国际贸易的船只不应与那些从事沿海贸易的沙船相混淆。著者未能明确指出的是,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已在竞争中成功地击败了从事沿海贸易的当地航运业。^⑤ 失业的水手会集在两个主要的通商口岸——上海和广州,加入那里的秘密团体(如果他们在这之前还不是其成员的话),并且最终走上反叛的道路。

刘丽川在占领上海县城当天对一些前来采访的外国人说,他听从太平王的命令,并与太平王建立了直接的联系。^⑥ 显然,这仅是一个声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太平军与上海叛军组成的小刀会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刘丽川在那天发布的告示中提出了“反清复明”^⑦——典型的三合会口号。数日之内,上海周围的城镇相继发生叛乱。^⑧ 不到一个月,刘上书太平王称臣并改用太平天国历法。^⑨ 这封信一式两份送往南京,一份通过陆路,一份通过水路。经由水路的那份被清军截获,而经由陆路的那份是否最后被送到目

① 同上书,第17—18页。

② 同上书,第18页。

③ 姚际唐:《避氛后集》,载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上海,1959年),第867页。

④ 方诗铭前引书,第18页。

⑤ 详见费正清(J. K. Fairbank):《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哈佛大学出版社,1953年),第311—346页。

⑥ 《字林星期周刊》(North China Herald),第163期(1853年9月10日)第22页。

⑦ 刘丽川告示,载《汇编》,第4页。

⑧ 方诗铭前引书,第41—43页。

⑨ 刘丽川致天王,载《汇编》,第11—12页。

的地尚不得知。一位西方学者认为已经送到了,但这个说法并未被接受。^①稍后,一位中国史学家在文章中写道,太平军立即建造了600艘船准备进军上海,并任命原在广州一带的三合会的一位首领、著名将领罗大纲负责这次军事行动。^②但由于清军有效地控制了南京与上海之间的水路,这两支部队始终未能汇合。

清政府确实花了极大气力从夹在南京和上海两地的叛军中间的清军中抽调了一支部队,由江苏巡抚许乃钊统率前往上海。这次调动还有财政上的原因。上海县城的陷落意味着海关的崩溃,这使清政府在最关键时候丧失了一项重要财源。虽然清军很快收复了被上海及其附近其他叛军攻占的城镇,^③但上海仍在叛军手中。政府可以全面包围这座城市,但只有北面的法租界除外。那里,外国商人与叛军的生意十分兴隆,商人向他们提供了粮食、军火以及其他所需物品。^④叛军由于控制了城内的银库,所以能高价购买。实际上,叛军最初并未计划攻打县城,但城内银库藏有400万银两的情报使他们改变了主意。^⑤外国商人除大发战争财之外,还可从帮助叛军中获得其他利益。只要叛军仍然占领县城,海关就无法征税,外国商船就可以不向清政府缴纳分文而离开口岸。“要小刀会,不要关税”是当时普遍的呼声。^⑥

然而,缔约国的领事们有义务按照条约的规定确保他们本国的商人在商船被允许离港前缴纳适当数目的税金。英国领事阿礼国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1853年9月9日,即叛乱爆发两天以后,

① 费正清前引书,第420页。

② 方诗铭前引书,第47页。

③ 同上书,第51页。

④ 怡和书信文件集 B2/23, A. 鲍思孚致 D. 查顿,1854年1月22日。当地的中国人也向叛军出售粮食和日用品,但当政府军加紧包围之后,外国人就成了主要的供应者。

⑤ 方诗铭前引书,第36页。

⑥ 柯勒拉得恩勋爵书信文件集(Clarendon Papers),手稿 C19“中国”,包令致柯勒拉得恩勋爵(Bowring to Clarendon),1854年7月10日于上海。

他与美国领事分别向其本国侨民发出联合通知：“鉴于中国政府已不存在，本领事向本国商民征收本应向中国政府缴纳的全部关税期票。”^① 只要不付现金，商人们就感到高兴。最后，英国商人终于说服了他们的政府宣布这些期票作废，而美国商人只缴纳了欠款的 1/3。以后，英国公使包令及其美国伙伴麦莲曾以这些期票为手段，劝诱中国政府同意在上海设立外国海关税务司。^②

这并不表明包令与麦莲对上海的局势感到满意；他们只不过是利用这一局势来建立一套对于扩展贸易至关重要的可靠的关税征收制度。外国税务司实际上侵害了中国政府的主权，但 19 世纪商业大国的代表们并未因此而招致麻烦。确实，他们越是有效地影响和控制他们与之贸易的国家，他们就越有利。与之相关的另一重要事情是这些国家的和平与稳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使外国的外交官能建立可靠的海关的机遇，同样鼓舞了外国商人为牟取暂时的利益而去破坏正当的贸易。结果，外交官们不得不密切注视本国商人和中国的叛军，并不时采取相应的行动，而不考虑他们曾经宣布的中立政策。

另一方面，清政府和叛军领袖双方自然都想趁机利用这种中立。在南京陷落之前，江苏巡抚曾请求后来成为英国公使的文翰给予军事上的援助。^③ 叛军占领上海以后他也曾试图争取列强的同情。包令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对柯勒拉得恩勋爵说：“据报告”，叛军“提出，如果我们站在他们一边，他们将皈依基督”。^④ 这份报告的可靠性是不容置疑的。在太平军的早期历史上，当太平军的所有人似乎都成为基督徒后，传教士们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上

① 费正清前引书，第 418 页。

② 同上书，第 438—460 页。

③ 外交部档案 230/75，杨文定致文翰爵士 (Yang Wen-ting to Bonham)，1853 年 3 月 26 日。

④ 柯勒拉得恩勋爵书信文件集，手稿 C19“中国”，包令致柯勒拉得恩勋爵，1854 年 5 月 22 日于香港。

海叛军可能正利用这种热情。看来传教士在鼓励叛军这样去想，正如包令对柯勒拉得恩所说，他担心这份报告反过来会促使传教士变本加厉“鼓励”叛军。“我担心这种所谓的宗教因素会给我带来一些麻烦。我们将很难同那些希望暴动者获胜以便得以进行欺诈的商人和具有同样意图以使他们在表面上(着重号系作者所加)皈依基督的传教士打交道。”^①但包令所担心的局面终于没有出现。在叛军队伍中并没有发生集体洗礼的事情。这表明，这份报告并不是叛军中7个帮派的一致决定。

事实上，叛军领导人内部的分歧远比中西历史学家迄今为此所知道的要尖锐得多。包令在1854年6月从上海发出的一份报告中写道：“首领之一已沉湎于酒色；另一个开了小差；最后的(也是最勇敢的)一位首领，我已有机会——我希望上帝保佑我能——[与他]建立某种联系。”^②包令脑子里想的是如何说服叛军撤离县城。^③包令全然不是最早提出这个主意的人，6个月以前当清政府答应划出一块土地供天主教传教士使用以后，法国人就对此作出过努力。^④但叛军并没有听信他们。包令大胆地接着干下去。他认为，如果他能说服清政府让叛军安全撤离县城，他就更有可能获得成功。在商讨这个计划时，江苏巡抚许乃钊对此颇感兴趣。他的答复虽然措词傲慢，但其热情却是显而易见的。他赞同包令的“把叛军逐出上海”的建议，并希望英国人指出将他们赶到哪里去；同时他又要求不能轻易放过杀害朝廷命官的两个叛军首领。^⑤

信的结尾可以看作是巡抚心迹的表露，或者是他的真实意图的一种掩饰。在一般情况下，叛军的逃遁会使他招致严重的责罚。他很可能同时策划一次伏击，以修正他对安全撤离的承诺。至于叛

① 同上页注④。

②③ 同上，1854年6月19日于上海。

④ 怡和书信文件集 B2/23, A. 鲍思孚致 D. 查顿，1854年1月22、25日。

⑤ 外交部档案 682/1987/34, 许致包令及赐德龄(Hsü to Bowring & Stirling), 1854年6月22日于上海。

军,他们被围困已近9个月之久,如果说他们不原撤离县城那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包令不遗余力地“不止通过一个途径,以求达成为清政府所能接受的与叛军的适当协议”。^①事情的结果令他失望。“由于内部存在分歧,由于希望摆脱困境,由于他们的煽动者以及租界里其他人的煽动,以及对他们一旦放弃这个重要阵地就只能向太平王妥协的担心,在提案正式交付议决时,往往一个个被推翻了。”^②即使他们打算撤离,也只有一个地方能去,那就是太平天国的都城南京,而且他们认为那里最安全。^③如果巡抚坚信他的计谋,这样一个条件无须更改,但他似乎并不能正视万一失败而发生的更为严重的后果,从而拒绝了这一条件。后来他为此懊悔不已。不久,他即因劳师糜饷、日久无功、与朝廷始终疑忌的外国人的交涉一无所获而被北京革职了。如果叛军同意撤离,这次冒险或许会使他重获圣眷。^④

对县城的长期围困正在使叛军付出代价。当他们首次占领这座城市时,他们纪律严明,士气高涨,得到了人们的交口称誉。^⑤围困后出现了疲沓现象。目睹当时情形的包令评论说,即使在战斗中,除了要真的流血之外,其情形与演戏差不多。每次战斗都要提前一、二天宣布。叛军挥舞旗帜出城,清军也以同样方式迎战。然后互相辱骂、开火,接着全面溃逃。掉队的士兵被抓住则枭首示众。每当开饭时间,双方就退回到原来的出发地点。在距离战场不到50码的地方,农民们安然地兜售农副产品。^⑥自然,也有不少开小差的,“城内兵员总数逐日减少”。但是,也有一些来自海上的援军,“我们的快速运鸦片帆船和其他沿海航船源源不断地从南方运来

①② 外交部档案 17/214,包令致柯勒拉得恩勋爵,1854年6月6日于上海。

③ 怡和书信文件集 B2/23,A. 鲍思孚致 D. 查顿,1854年6月27日。

④ 《清实录》,咸丰朝,第133卷,第5—7页,1854年7月7日上谕;同上,第134卷,第1—3页,1854年7月15日。

⑤ 怡和书信文件集 B2/23,A. 鲍思孚致 D. 查顿,1853年9月14日。

⑥ 柯勒拉得恩勋爵书信文件集,手稿 C19“中国”,包令致柯勒拉得恩勋爵,1854年7月4日于上海。

这些掳掠者。一个美国人从香港一次就带来了 70—80 人”。^①

包令常常把叛军称作强盗、流氓，他的看法自有他的道理，因为在他于 1854 年中期到达上海时，叛军士气低落、纪律败坏。他在一封给柯勒拉得恩勋爵的私人信件中说：“两、三天以前，一个可怜的女人经协商获准出城，叛军索款 50 美元，而她只能把筹到的 40 美元给他们送来。他们因此砍去她的腿，说她只赎回身子的 4/5，并把她扔出了城门。有些人被他们活活地放在火上烤。”^②

就连叛军首领看来也陷于绝望。“主帅刘[刘丽川]如此嗜食鸦片，实在难以振作。”^③他的部将陈阿林以前是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助理弗兰克·帕里西的马夫，^④他常常接待包令的信使，每次都塞给他们香槟酒。这种慷慨大方还施于其他外国人，以致他们习以为常地到他那里去“干杯”。

显然，钱在陈阿林那里并不成问题。他的兄弟在两星期以前的一次出击中牺牲，为了赎回兄弟的头颅，他能够向清军支付 2000 元赎金。^⑤他一直披着华丽的外套，还有“一大群妻妾”。他还有一队由 12 名离舰的欧洲人和美国人组成的保镖。1854 年 8 月 1 日，其中两人发生争吵，导致一场恶斗，一个苏格兰人被杀死。调查表明，凶手此前也犯有杀人罪。陈阿林在这样一批人的保护下自然不会感到安全，凶手被处以绞刑。^⑥关于劝说叛军主动撤离的努力失败的原因，包令考虑的结果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正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桌上山珍海味、美餐佳肴；屋内绫罗绸缎、妻妾成群；嗜烟如命；挥霍无度。这种种物质引诱与他们过去的的生活以及我们向他们显示的并不确定的未来相比较，足以说明他们为何不原离开他们目前的安乐窝。”^⑦

劝服失败后，包令开始考虑采取行动支持政府军，因为这些都

^{①②③} 同上页注⑥。

^{④⑤} 同上，1854 年 8 月 4 日于上海。

^⑥ 同上，1854 年 7 月 4 日于上海。

^⑦ 外交部档案 177/214，包令致柯勒拉得恩勋爵，1854 年 7 月 6 日。

将违反中立政策。他的政策得到了美国人的尽心协助。美国人更为同情上海的清朝当局。1854年9月县城陷落时，他们实际上拯救了上海关道*吴健彰。^①吴道台是美国驻沪副领事金能亨所管理的旗昌洋行的当然合伙人。^②一位当代史学家曾这样描述这个年代：在这个年代里，“官僚变成了商人，帝国主义分子支持叛军，领事们玩忽职守，中立国从贩运军火中牟利”。^③在买方与卖方的商品与良心的交易中，包令与他的美国和法国对手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建立外国海关税务司的认可。作为回报，如前所述，他们答应承兑期票，并且还允许中国政府建立一道界墙，将叛军占据的县城与法租界隔离开来。他们进一步承诺在工程进行期间派遣他们的军队负责警卫。^④

但并非3个公使都能够实现他们的诺言。1854年12月23日，新任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写信给包令和海军上将赐德龄。他在信中说，法国和美国忠实地履行了他们的协定，已为正在建造的旨在切断偷运入城的供应的界墙提供了保护。但皇家海军不见踪影，界墙被叛军捣毁了一半。^⑤至于包令的苦衷，新任巡抚还一无所知。海军上将赐德龄甚至未曾通知包令便步美国舰队司令培利的后尘，率领舰队去“打开”日本的门户了。^⑥

但不多时，保护界墙的重要性降居第二位。把一块地划归天主教传教士使用的要求是否仍然有效，我们现在还不清楚。然而无论如何，法军上将决定向叛军挑衅，并于1855年1月6日率领250名海军陆战队员轰击县城。这次进攻失败了，法军付出了代价：死

* 误，应为苏松太道。——译者

① 费正清前引书，第408页。

② 同上书，第431—432页。

③ 同上书，第428页。

④⑤ 外交部档案682/1987/73，吉尔杭阿致包令及赐德龄，1854年12月23日。

⑥ G. S. 格雷厄姆(G. S. Graham)：《中国停泊地》(The China Station)(牛津，1978年)，第291—292页。

15人、伤33人。^①

政府军和他们的外国伙伴转而依靠将切断城内供应的界墙。一个月以后，界墙完工了，而随之送来关于饥荒的报告。^② 1855年2月16日晚，当政府军正在庆祝除夕时，叛军悄悄地离开了县城。当时一些目睹此情景的外国人怀疑此举得到了中国当局的默许。^③ 目前发现的材料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怀疑，看来包令终于成功地斡旋于双方之间，刘丽川、林阿鸣似乎答应以交出谢安邦、潘小镜为条件。此后发生的事是：叛军首领利用这个协议作为达到撤离县城目的的手段，而政府军则乘机在途中布置伏击。^④ 次日，城外爆发了战斗，叛军几乎被全歼。^⑤

中国皇帝用生丝奖赏了英国、美国的官员和法国在上海的军队，法国军队还得到了一万银两的额外赏赐。没得到赏赐的只有残暴的英国人。^⑥

三

1854年8月当包令还在上海的时候，他就得知广州处于当地叛军的攻击之下。^⑦ 不过，这种威胁暂时还仅仅来自陆地。在城南滨水区生活和经商的外国人并没有受到特别的惊扰。1854年12月2日，当一支叛军船队出现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尽管此时陆

① 《字林星期周刊》，第232期(1855年1月6日)第90页。

② 同上，第236期(1855年2月3日)第108页。

③ 怡和书信文件集 B2/23, A. 麦坎德鲁致 D. 查顿 (MacAndrew to D. Jardine), 1855年2月21日。

④ 外交部档案 682/1988/66, 吉尔杭阿与吴健彰寄给[包令]的私人信件(1855年2月15日)。

⑤ 毛祥麟：《三略汇编》，载《汇编》，第820页。

⑥ 怡和书信文件集 B2/23 A. 鲍思孚致 D. 查顿，1855年4月7日。

⑦ 柯勒拉得恩勋爵书信文件集，手稿 C19“中国”，包令致柯勒拉得恩勋爵，1854年8月4日于上海。

地上的叛军被击退，但外国商会仍然非常惊恐。^①

叛军船队在江河上出没已有一些时候了。1854年9月以后据报告，广州附近水在面上有各种土匪、暴徒出没，其数量相当多，以至“没有一艘帆船或沙船能安全地通过；乘坐一般武装舰船由黄埔到广州更是相当危险的冒险”。^② 由于广州继续被叛军三面包围，政府军被困在城内，“从虎门炮台到广州的江面近来毫无防卫，因此，属于邻近村庄和叛军的海盗（着重号系作者所加）船只大批出没”。^③ 是月底，装载货物与茶叶的船只不得不用轮船由广州拖到黄埔，“不然就会遭到劫掠或勒索”。^④

8月，当包令首先听到叛军攻打广州的消息时，他回到了香港。^⑤ 但不到一个月又去上海了，因为他发现那里的英国商人并没有受到迫近的威胁。^⑥ 在他在上海逗留期间，英国驻广州领事罗伯逊代理港英商务监督的事务。一得知广州江面匪徒猖獗，包令和他的美国伙伴麦莲便指示他们各自的领事发出通告，说如果英国和美国的船只遭到骚扰，将进行报复。^⑦

怀疑本国政府的保护能力的中国商人转而求助于他们的外国朋友。中国商人“租用我国商人的库房来放置财物，借用他们在香港的房屋以安置家眷，并在广州一旦遭到破坏时，随时准备撤离并到外国商馆避难”。^⑧

然而，广州江面上的抢劫正方兴未艾。至1854年10月底，进而由虎门炮台扩大到“香港岛”，由殖民地到广州的航线上“中国船

① 黄宇和：《两广总督叶名琛（1852—1858）》（剑桥，1976年），第106页。

② 外交部档案 17/215，包令致柯勒拉得恩勋爵，1854年9月5日；附件，麦华陀爵士致包令（Medhurst to Bowring），1854年9月2日。

③④ 外交部档案 17/216，罗伯逊致哈蒙德（Robertson to Hammond），1854年9月27日于香港。

⑤ 外交部档案 17/215，包令致柯勒拉得恩勋爵，1854年8月21日于香港。

⑥ 外交部档案 17/216，包令致柯勒拉得恩勋爵，1854年9月9日于香港。

⑦ 外交部档案 17/216，罗伯逊致哈蒙德，1854年9月27日于香港。

⑧ 同上，1854年10月10日。

只已无法通行”，^① 就连外国船只也受到攻击和劫掠。罗伯逊领事曾强烈希望中国绅商阶层移居香港能使香港发生很大变化，并使贸易获得新的立足点。他被海盗阻挡移民进入香港所激怒，以至于请求面见海军上将赐德龄。^② 他终于说服了赐德龄和叶总督派遣战舰共歼虎门炮台附近高栏地区的盗匪。^③ “在去香港途中被抢走6万元和全部家眷”的一位中国富商提供了两艘租用的轻便轮船。“一些资金雄厚和很有影响的广州商人”也写信给海军上将赐德龄，表示“捐献5000元供他支配。如果需要，还可以捐献更多，以满足歼灭这些盗匪所需的任何开销”。美国人租用的“皇后”号战舰也参加了这次行动。^④ 三国政府难得享受这种亲密关系的乐趣。

盗匪自然无法与这三角同盟匹敌。一些船只被击毁了，^⑤ 但更多的战船当时逆水而上，在布楞宁水道那里与其他海盗合伙，极大地壮大了他们的队伍，而罗伯逊领事对此却几乎一无所知。^⑥ 1854年12月初包令由上海回到香港时，正赶上广州副领事埃尔姆斯利发出紧急呼吁：“鉴于目前一支庞大的盗匪（着重号系作者所加）船队正威胁着该城市，因此谨请海军上将阁下派遣认为足以保卫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军队前往广州。”他在报告中进一步指出，他刚从战场回来，在那里，200条帆船与只有60艘战船的政府军水师交战，他认为，这些战船将“在下一次涨潮时被俘获”，而这座城市将“在这支强大军队的进攻面前只能进行无力的抵抗”。^⑦

在将信件转交柯勒拉得恩勋爵时，包令写道：“如果叛军（着重号系作者所加）占领省城，我担心结果将是一幅烧杀抢掠的惨象。”^⑧ 罗伯逊和埃尔姆斯利两人称之为盗匪的军队，现在包令称

① 同上页注⑥，1854年10月28日。

② (⑤) 外交部档案17/217，罗伯逊致哈蒙德，1854年11月10日于香港。

③ 外交部档案17/218，包令致柯勒拉得恩勋爵，1854年12月11日于香港。

④ 同上页注⑥，1854年12月8日于香港；附件，埃尔姆斯利致包令(Elmslie to Bowring)，1854年12月2日于广州。

⑤ 同上，1854年12月8日于香港。

之为叛军。在法律意义上,这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英国政府在镇压盗匪时会乐意与中国政府合作,但在镇压叛军时却不会这样做。当然,可能会用辩论证明:只要他们照旧在江河上抢劫来往船只,那他们依然是盗匪。但一旦他们表现出任何进攻当地政府所在地的企图,他们就将成为叛军。不管怎样,包令还是把埃尔姆斯利的呼吁转给了海军上将赐德龄,上将“立即派遣‘梭子鱼’号”前往广州。^① 这时,在广州待命的英舰“科穆斯”号已进入全面战备状态,该舰舰长费洛斯随即前往战斗地点,他甚至登上一艘清军战船观察双方战事。此举立即遭到了叛军首领陈显良抗议。^②

情况更趋复杂。广州商人和叶总督本人相继致函包令,恳求他对下面的事作出酬答:一个月以前,当包令还在上海时,罗伯逊领事寻求并得到了中国人在镇压虎门炮台一带的盗匪方面的合作。^③ 叶的信似乎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作用,包令私下告诉柯勒拉得恩勋爵:“清朝当局向我提供援助的事实已广为传播,叛军(还不知道这一请求可能产生什么后果)正在为该采取什么对策而踌躇,因此没有乘胜前进。很可能这是这位钦差大臣的函件的主要目的。”^④

1854年12月4日,美国公使麦莲从澳门写信给包令,说他想访问广州。^⑤ 但他没有去拜访总督衙门,而是去了香港。^⑥ 在那里,麦莲、包令与赐德龄本着“目的和合作完全一致”的精神讨论了存

① 同上,1854年12月8日于香港。

② 同上;附件,罗伯逊致包令,1854年12月5日于广州。

③ 同上;附件,广州商人致包令(无日期);同上,1854年12月11日于香港;附件,叶名琛致包令,1854年12月7日。

④ 柯勒拉得恩勋爵书信文件集,手稿 C19“中国”,包令致柯勒拉德恩勋爵,1854年12月12日于香港。

⑤ 外交部档案 17/218,包令致柯勒拉得恩勋爵,1854年12月8日于香港;附件,包令致罗伯逊,1854年12月5日于香港。

⑥ 柯勒拉得恩勋爵书信文件集,手稿 C19“中国”,包令致柯勒拉得恩勋爵,1854年12月11日于香港。

亡攸关的问题。^① 遗憾的是,法国公使那边没有“一兵一舰可供调遣”,他认为采纳经另外两个缔约国赞同的措施是不适当的。但他还是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观点,即“与他的英、美同事们完全一致”。^② 此后,麦莲乘邮轮前往欧洲,包令和赐德龄则乘军舰前往广州。其间,三国驻广州领事奉命发布宣布中立的联合声明。^③

1854年12月14日,包令抵达广州。他收到了叛军首领陈显良给他的信,写信日期是1854年10月1日,但直到1854年12月10日才送到英国领事馆。1854年12月23日,包令又收到了两封信,写信日期分别为1854年12月6日和16日。^④ 在第一封信中,陈显良邀请包令出席他在布楞宁水道的新造的大营里举行的招待会。第二封似乎是在得到叶名琛请求英国合作的消息以后立即发出的。看来在1854年12月7日叶名琛写信给包令以前,这个消息已经众所周知了,根据之一是陈显良在信中写道:“属有讹言,清兵请贵大国船只与我师对垒,素悉公使大人与我国人民属相和好,料断无此事,不深信。”^⑤ 在第三封信中,他恳求包令“务祈严饬各大国火船兵船退经别处,勿阻我师来往之路”。^⑥

包令对这三封信的反应是:他给罗伯逊领事写了一张简短的便条,指示他通知叛军首领,称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英国军舰的行动;他要求与广州的水上通讯联络必须畅通无阻;叛军的海盗行径将招致怨恨和镇压。^⑦

事实上,在发出上述指示之前,包令已令罗伯逊接受这位叛军首领的邀请,去新造大营拜访他。这次访问日期是1854年12月18日。陈显良和他的副主帅都出去指挥对澳门炮台的进攻了。但他的4个心腹会见了欧洲人。其中两人“戴着红色的头巾和围着腰

①②③ 外交部档案 1/218,包令致柯勒拉得恩勋爵,1854年12月11日于香港。

④ 同上,1854年12月23日于广州及其附件。

⑤ 同上,附件,陈显良致包令,1854年12月6日。

⑥ 同上,附件,陈显良致包令,1854年12月16日。

⑦ 同本页注①;附件,包令致罗伯逊,1854年12月20日于广州。

带,其他穿戴则同劳动者和水手一样”。第三位是师爷,他从前并没有当过师爷,却能说一口漂亮的当地官话。第四位也是师爷,因为他曾为一个商行的商人工作过,能说广东式的英语。他们对其首领陈显良的描述是:“从前是河南近郊的一个小店主,由于彬彬有礼、无私的爱国精神而得到了全体将士的一致拥戴。”眼下他正与陈光隆并肩作战。陈光隆指挥二、三百艘战船。他们的目标是前面提到的三合会的典型口号“反清复明”。他们否认与太平军有任何关系,这一点不足为奇,但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也否认与三合会有任何联系。他们声称,他们的主要军需“几乎全都来自当地民众的自愿捐献”,他们断定人民“是向着他们的”。他们还说,“他们并不特别希望少数外国人在他们那里效力,这些外国人并不是请来的。但也考虑到他们或许能出面进行交涉,如果局势需要的话。”^① 在广州,英国和美国的外交官员与海军当局之间就必须采取措施保卫外国商馆的问题举行了几次会议。包令还想乘此机会撵走“在外国人居住区前面的船只及其他令人讨厌的人”,并清除“航道上的栅栏及其它障碍物,以保证航道畅通无阻”。^② 看来叶名琛欢迎纯粹的防御手段,但拒绝了包令的额外要求。他在信的结尾这样写道:“两国和睦,彼此共鉴,愚窃以为双方致力于此可也。”^③ 包令满怀“怨愤与失望”离开了广州。^④

即使到了香港,他还是不得安宁,因为他不断地收到“叛军首领的照会”。其中有些照会以“以明朝的名义”,另一些以太平王的名义,还有一些则以“‘将临真主’的名义”。^⑤ 由于他的返港,

① 外交部档案 17/223,包令致柯勒拉得恩勋爵,1855年1月4日;附件,罗伯逊致包令,1854年12月9日。

② 外交部档案 17/213,包令致柯勒拉得恩勋爵,1854年12月25日于广州。

③ 外交部档案 17/213,附件,叶名琛致包令,1854年12月26日。此附件似未归入任何分项急件之中。

④ 同上,包令致叶名琛,1854年12月27日。

⑤ 外交部档案 17/223,包令致柯勒拉得恩勋爵,1855年1月9日于香港。

叛军取得了几次水战的胜利。^① 他们的语言也变得“更加夸张和更加傲慢”。^② 到1855年1月15日，叛军已处于“用切断一切供应的办法以威胁（广州）省城”的有利地位，^③ 这就导致与外国商人的利益发生直接冲突。大英轮船公司捷足先登，用轮船牵引“中国的船只和货物到广州，这些货物自然是军需弹药”，生意十分兴隆。^④ 于是，叛军发出了封锁广州的告示。^⑤

香港代理检察总长认为，从国际法的观点来看，暴动者没有任何权利制定一项只能由主权政府颁布的封锁令，而一项尽管是由一个为数众多的和强有力的独立单位发布的封锁令，对外国人来说仍然是无效的。^⑥ 至于包令，他认为，除了违禁品——清政府不会认为供应给他们的军需弹药是违禁品——英国人有权从事一切种类商品的贸易，这是条约赋予的权力，他要求所有中国臣民尊重这一权利。^⑦ 外交部曾经认为，“英国船只根据中国人的要求护送沙船经过各个炮台，并使它们不受盗匪的攻击，是合适的、可以允许的”。^⑧ 香港代理检察总长进一步判定，“拖运与护航没有什么区别”，认为“两者作为英国臣民在华贸易的方式都是合法的”。^⑨ 只有英国海军上将提出异议，称“除非我接到命令，否则我一定拒绝将英国军舰受雇于支援或保护中国船只，不论用来牵引英国商船或其他船只，或者用于一项事实上的禁令，我不管这项禁令是否由暴动者还是帝国的长官们在中国的领土和司法权范围之内制定的”。^⑩ 但这并没有阻止包令通知大英轮船公司继续他

① 同上，1855年1月4日及其附件。

② 同上，1855年1月9日。

③ 同上，1855年1月15日。

④⑤ 同上，附件，赐德龄致包令，1855年1月12日。

⑥ 同上，1855年1月15日；附件，布瑞吉致包令，1855年1月14日于香港。

⑦ 同上，1855年1月15日；附件，包令致赐德龄，1854年1月15日于香港。

⑧ 同上，急件48；附件，外交部致文翰，1848年9月19日。

⑨ 同上，急件48；附件，布瑞吉致包令，1855年1月21日。

⑩ 外交部档案17/227，包令致柯勒拉得恩勋爵，1855年2月1日于香港；附件，赐德龄致包令，1855年1月20日。

们的生意，^① 他同时写信给海军上将赐德龄：对于后者的意见的“后果，我拒绝承担任何责任”。^②

陈显良别无选择。1855年2月10日，他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大英帝国、大美利坚、大法兰西三国的所有货物在省尽行搬迁，若到新年（1855年2月17日）后，所有船只不得装载往来”。^③但他不能象以前那样强制执行他的最后通牒了，因为他刚刚“遣散他所雇佣的广西人”，而且大约有300艘“广西船离开了总船队”。^④陈显良最初曾答应，如果这些人被杀、船被毁坏，都将给予赔偿。但目前须支付的伤亡赔偿费就达1.3万银两之多，看来他无能为力了。这些得不到赔偿的人们便以不分青红皂白的劫掠来求得补偿相威胁，对此，作为首领的他自然要承担责任。因此，他公开发出通告解散他们，以图推卸责任。当时的一位目击者曾写道：“目前，在这里邻近的地方，有上千个无法无天的人转而从事抢劫、凶杀，没有丝毫顾忌。”^⑤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一方面，“乡村民众对暴动的抢劫者的抵抗看来将更趋频繁，并且比以前更加坚决了”；^⑥另一方面，“这些所谓的起义军几乎没有一天不阻挠悬挂有英国国旗的轮船和小汽船航行，其中有许多遭到了他们的掳掠”。^⑦1855年2月28日，包令认为，长此以往，冲突将难以避免。^⑧

但这种情况只持续了一个星期。1855年3月7日，一位目击者说：“在布楞宁水道，叛军遭到了清军的致命打击，战船损失殆尽，仓储辎重以及溃兵均被缴获、俘虏，新造的大营被攻占。”^⑨

① 同上，1855年2月3日；附件，伍德盖特致沃克，1855年2月3日。

② 同上，1855年2月3日；附件，包令致赐德龄，1855年2月2日。

③ 外交部档案17/226，包令致柯勒拉得恩勋爵，1855年2月14日于香港，附件，陈显良告示，1855年2月10日。

④ ⑤ ⑥ 同上；附件，1855年2月12日备忘录。

⑦ ⑧ 外交部档案17/228，包令致柯勒拉得恩勋爵，1855年2月28日。

⑨ 同上，1855年3月9日；附件，罗伯逊致包令，1855年3月8日。

四

这篇论文无意针对上海和广州地区整个反抗运动，而仅限于那些可以用来作有意义的比较的部分。这两次起义与秘密会党，特别是三合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上海的许多三合会众显然来自广州。还有，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要求归附太平军。他们“强烈地仇恨鞑虏，誓灭满清”，^①这在当时的记载中是一致的。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确实是太平军的同盟军，他们把清军夹挤在沪宁和沪粤之间。没有这两个口岸的起义，太平军所受到的来自华北和华南的清军的夹击要严重得多。

上海的叛军首领是一些马夫、厨师、苦力和外国人所雇佣的仆人，而他们的广州伙伴则曾经在广州的商业区做过小店主、职员、译员、仆人和工人。上海的叛乱阶层主要是失业的水手，而广州的叛民则主要是当地的船民。费正清教授将这一时期东西方的交会概括为“冲击与反应”。从政府的高度来看这可能是正确的，但对这一部分劳动民众进行再考察时，问题恐怕就是“冲击与反抗”了。

这些具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反叛破坏了商业贸易所赖以顺利进行的和平与秩序。因此，尽管缔约国宣布了中立政策，但对反叛必然允满敌意。缔约国切断他们本国商人对被围困的上海叛军的物资供应；而在广州，它们又决心确保他们本国商人源源不断地由水路向被围困的清军供应物资——这一切证明了这一点。

无须说明，外国公使肯定会要求他们的行动不受清政府的约束。在上海达成的一项交易就是建立外国海关税务司——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完全处于外国人控制之下的政府机构。在广州，包令也想混水摸鱼，但显然被钦差大臣瞒骗过去了。

根据大量记载，上海叛军起初纪律严明、士气高涨，他们的蜕

^① 外交部档案 17/226，包令致柯勒拉得恩勋爵，1855年1月9日于香港。

变始于围困。广州叛军汗头看来也是纪律严明，并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但是5个月的持续战斗，加之外国船只和军舰的阻挠，在付出金钱、生命、士气以及名望的昂贵代价之后，他们也蜕变了。他们的蜕变给象包令这样的外国外交官提供了机会以便根据人道主义来灵活地解释这个中立政策，尽管这种解释是“马后炮”。

包令在评论上海叛军的失败时写道：“上海的陷落与我们利益攸关。这帮恶棍在城内的行径使他们的同情者感到羞愧。他们为他们的同谋者所利用，这些同谋者向他们提供军需品，购买这帮强盗的产品，并用各种方式把他们当作工具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然后不屑一顾地抛弃他们，让其听凭命运的摆布”。^①

对于广州叛军，他评论道：“现在已无人怀疑，当地暴动的主要目的是洗劫广州，这些打着爱国幌子的盗匪（着重号系作者所加）几乎都怀着抢劫这个唯一的目的。”^②包令在这里居然也使用“盗匪”字眼，而这个字眼恰恰是早先他的领事用来称呼叛军的。

包令在思考上海和广州两地的反叛之后总结道：“在与他们的任何交往中，我们发现，他们除了单纯的仇满之外，没有政府或者任何政府的概念，没有有秩序的行政组织的总体规划以及其他契约。”^③这里，包令似乎提出，如果叛军能够建立一个不象清朝那样腐败的和有助于进行贸易的正常的政府机构，他的中立将会倒向另一边。

译自《澳大利亚东方学会建立25周年论文集》，1982年。

周育民译

（责任编辑：丁如筠）

^{①②③} 柯勒拉得恩勋爵书信文件集，手稿 C19“中国”，包令致柯勒拉得恩勋爵，1855年3月16日。

孙文的地方自治制度论

横山 英

引 言

从中国同盟会成立到改组为国民党,特别是1916年(民国5年)的护法运动开始以后,孙文在其讲话、著述、政纲中不断地强调了地方自治的重要性。地方自治论成为三民主义尤其是民权主义的构成要素。本文通过对孙文的地方自治制度论的宗旨和特征的考察,加深对三民主义的理解。

一 “约法之治”的提倡

孙文最初是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的“军政府宣言”中提出地方自治制度论的。在为实现中国同盟会的“四纲”即三民主义而设定的“三序”之中,介于“军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之间的“约法之治”即是地方自治的建设时期。孙文写道:“每一县既解军法之后,军政府以地方自治权归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选举。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军政府与地方议会及人民各循之守之。”孙文在此虽然只作了简单的原则性表述,但这段话却展示了他直到1924年在《建国大纲》里仍然坚持的地方自治制度论的原型,这就是:第一,他重视地方自治,并将之设置于完成建国以前所必经的三期中的第二期(即从“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之时代”到“军政府解除权柄,宪法上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代”为止所必

不可少的过渡期)的革命的战术观点;第二,他的以县作为自治制的单位,且认可团体自治和居民自治的观点。

对于何以要将“约法之治”设定为实施“四纲”的“次序”中的第二期,孙文在十多年后《建国方略》的“孙文学说”中反省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有如下说明:由于“我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性已深,牢不可破”,故而“欲由革命一跃而几于共和宪政之治者,其道何由?此予所以创一过渡时期为之补救也。在此时期,行约法之治,以训导人民,实行地方自治。惜当时同志不明其故,不行予所主张,而只采予约法之名,以定临时宪法,以为共和之治可不由其道而一跃可几。当时众人之所期者实为妄想”。^① 1923年,孙文在《中国革命史》中也将未经过“训政时期”(即“约法之治”)、“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看作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并列举了所造成的三大弊害。^②众所周知,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梁启超等变法论者将民权、民智、民力作为君主立宪制施行的前提和准备而加以倡导,其根据便是认为国民缺乏民权意识和自治能力。孙文同样也是基于这种认识,提出为达到共和立宪而必须设立过渡期,以期培养国民的民权意识和自治能力。对这种国民现状的认识,孙文直到改组国民党时也不曾改变,故在《建国大纲》里设定了“训政时期”。

二 地方自治的两种形态

孙文在民国建立之初的5年间,对地方自治并未予以特别关注。辛亥革命后在《国民党规约》(1921年)及《中华革命党总章》(1914年)里,仅有“发展地方自治”数语。

到1916年夏袁世凯死后,恢复临时约法体制,孙文于7月在

^① 《建国方略》,载《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08页。

^② 《中国革命史》,载《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6-67页。

上海、杭州、宁波等地欢迎他归国的会上讲演，强调建国的基础在于地方自治，提倡新的地方自治制度论。8月，他在浙江省议会的讲演中论述：

地方自治，乃建设国家之基础。民国建设后，政治尚未完善，政治之所以不完善，实地方自治未发达。若地方自治既完备，国家即可巩固，……而法、美两国能日臻强盛，要以注意地方自治为根本。^①

孙文何以从这一时期起开始重视地方自治呢？其动机当是由于袁世凯专制的强化。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文流亡日本，以待机再起。1914年6月，孙文慨叹袁世凯厉行专制使祖国面临“亡国灭种之危机”；第二年情况更加恶化，袁世凯竟由专制而复辟帝制。严重的时局使孙文痛感“民国”即共和立宪制的基础何其脆弱，如何寻求建国的基础，如何强化、扩大这一基础，又由谁来担当此任等民国重建的根本方策，亟需重新设计。孙文在1918年所著“孙文学说”中有大要如下的阐述：“中国四万万之人民，由远祖初生以来，素为专制君主之奴隶”，而今，“革命成功而破坏专制之结果”，使四万万人民“皆当为主人矣”。“此为我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变局，吾民破天荒之创举也。是故民国之主人者，实等于初生之婴儿耳，革命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既产之矣，则当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训政时期者，为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而后还之政也。”^②于是，“婴儿”的保养、教育便应在地方自治中进行。

这样一来，地方自治的问题特别是训政期的地方自治，在建国论的结构中便作为决定建国成败的“方略”而被放大成特写了。而

① 《在浙江省议会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45页。

② 《建国方略》，载《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11页。

作为创设新型地方自治制度这一基本构想的有力素材,就是采用了直接民主主义的美国城市制度。

1916年7月,孙文向在沪两院议员等发表讲演,^①引用“民为邦本”的古语,认为民国“不自政府造起,而自人民造起”,“必筑地盘于人民之身上”,即必须“以地方自治为建国基础”,“地方自治者,国之石础也。础不坚,则国不固”,从建设民国的基础在于人民这一建国理念来强调地方自治的重要性,还对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直接民主主义制度作了图解和释介。^②孙文提出在中国也必须采用这一“最新之地方自治制度”,同时阐述了为采用这一新制度而实行作为其预备阶段的地方自治的必要性。孙文将地方自治制度构想为阶段性渐进的两种地方自治形态,即他所说的采用“直接民权”制的完成阶段,以及为达到这一阶段而筹建各种基本条件的准备阶段。这两种地方自治形态,在“孙文学说”中前者相当于宪政时期,后者则相当于训政时期的地方自治形态,直到《建国大纲》为止都未曾修正过。

大概孙文在二次革命后滞留日本时知道了美国的直接民主主义城市制度,认为这一地方自治制度是实现“民为邦本”这一古典理念的最新、最好的自治制度,并纳入其建国理论中。而且考虑到中国的国情——民权不发达、民智未开这一现状,认为需要一个准

① 《在沪举办茶话会上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27页。

② 这个图解同《建设》杂志第1卷第2号(1919年)所载林云陔在《欧美市制概论》中介绍美国的市长制时所例举的1913年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城市制度的图解相同,只是对图中的释语有所修正,例如,孙文图中的县长、县议会在林云陔的图中分别是市长、市议会议员。此外,《建设》杂志连载过由廖仲恺以《全民政治》为题译成中文的1912年版迪洛斯·F. 威尔科克斯(Delos F. Wilcox)所著《全民政府或者是作为民主手段的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免权》(Government by all the People, or the Initiative, the Referendum and the Recall as Instrument of Democracy)一书,其中也介绍过瑞士的直接民主主义。由此可知,孙文等中华革命党领导人深切关注过直接民主主义,并致力于启蒙。再者,1921年由王正廷、李剑农等人起草、在赵恒惕控制下制定的湖南省宪法中,认可了公民直接罢免议员和直接提出法案的权利(参见笹川裕史:《1920年代前期的湖南省政民主化运动》,收入横山英编《中国的近代化和地方政治》一书,劲草书房,1985年)。

备阶段,将这一阶段推定为以前作为地方自治建设时期而设定的训政期。其原因无它,而是由于孙文援引了1913年施行的克利夫兰市的城市行政,从而设想了目的、性质、内容各异的两种地方自治形态。

包容了这种地方自治制度论的新建国论,在“孙文学说”第6章中已有提示,即孙文继承了以前中国同盟会“军政府宣言”所说的“三序”,换言之,就是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他把这种三期区分法,加上民国前就提倡的“五权宪法”,还有二次革命后所摄取的上述采用直接民主主义的地方自治制度论——他所谓的直接民权,通过这三个要素的组合而建构了新的《建国方略》。在《建国方略》中,将上述地方自治制度的两种形态置于重要地位。

三 训政时期的地方自治制度

根据“孙文学说”,在原则上为3年的军政时期,县自治局应将“满清之专制”、“官僚之腐败”、“风俗之恶习”、“鸦片之流毒”、“风水之迷信”、“厘卡之阻碍”等积弊予以扫除,使过半数的县民了解三民主义,归顺民国,将人口清查、户籍厘定、警察、卫生、教育、道路等各种基础性行政事务按照约法所定之低限程度而充分办就,这样就可以通过县民选举而选出县长及县议会议员,组成行政机关及立法机关,按照约法而建立完全的自治团体。“革命政府之对于此自治团体,只能照约法所规定而行其训政之权”,从而进入训政时期。

前已指出,孙文将地方自治设定为“约法之治”、“训政时期”的内容,其动机是由于痛感民权意识、自治能力的缺乏,从而企求在这样的国民素质现状之上予以提高,但由此构想的地方自治实态却不是政治教育手段那样的权宜之计。

训政期的地方自治有两个任务:一是县行政的责任;二是建设中央政府的功

1916年7月,孙文在上海的讲演^①中谈到,政治的基本目标是保障国民“生活之根本”的衣食住及发展交通;而“国之石础”的地方自治,其基本任务即是实行以县为单位的所谓“衣食住行”这政治的四大主旨。孙文在其《地方自治实行法》(1920年)一文中,提出了应由县自治体施行的行政事务的方案。他认为,这一时期的地方自治“当以实行民权、民主两主义为目的”,因而“地方自治团体不止为一政治组织,亦并为一经济组织”。据此观点,孙文将户口调查、自治机关(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设立、地价的确定、道路的修筑、荒地的开垦、教育设施(学校、图书馆、会堂等)的建设,作为地方自治应首先实施的六大行政事务;认为地方自治体为保障“衣食住行”,应使县内剩余粮食公有,使制衣、住宅建设及运输公营,从而确保民生安定;在这些基本建设完成后,进一步将自治体业务扩展为建立农业、工业、商业、金融、保险等方面的合作社,或开设县外贸易及运输的机构,实行专卖制。在此文发表前的1916年8月,孙文在宁波各界欢迎会的讲演中,^②又谈到地方自治是社会进步的基础,认为实施地方自治制度有振兴实业、讲究水利、整顿市政之效。在推行宪政的基础事务之外,孙文还特别期待县自治体振兴、发展实业,通过产业社会化即公营或合作化经营而实现县级的民生主义这一目标。

由上述可知,通过革命而打破“官僚”、“武人”、“政客”的统治,经过军政期后在革命政府的“训政”之下以“革命手段建设”起来的县自治体,在训政期得以脱胎换骨地向着近代自治体转化。这样实现的地方自治,在政治制度上由于未能达到“直接民权”制的实权,不能说是完美的,但实现了以民权主义为基础的制度;另一方面,为谋求经济领域大规模的社会化,在大力限制私人活动时保障民生的安定,实现民生主义的目标。这种地方自治,由其本质言之,属

① 《在沪尚贤堂茶话会上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22页。

② 《在宁波各界欢迎会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50页。

于资产阶级近代地方自治的范畴；但是，从上述特质来看，可以称之为“三民主义”的地方自治。孙文提到，先知先觉者应成为伊尹、周公，指导地方自治的建设，谋求民生的安定，^①但训政时期地方自治构想的成败，则取决于构成自治前提的革命势力的胜利和担任训政的先知先觉者的革命性及现实力量。

“不止为一政治组织，亦并为一经济组织”的县自治体，在各自的地域内致力于本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安定，同时也由此而在革命的中央政府的建设上发挥重要作用。首先，在革命过程中得以解放的县，其自治体应成为“解放区”，起着支持革命军制胜全国的“根据地”的作用。其次，待到革命军平定全国的阶段，县自治体不但要作为地方自治体而担当支持新建立的革命政权的任务，而且负有建设中央政府的重要责任。根据“孙文学说”，这就是在革命军平定全国6年后从各县自治体选出一名代表组成国民大会。这个国民大会是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有权选出总统、立法院议员，设立五权分立制的中央政府机构，制定宪法和修订宪法，并且有权对中央政府行使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

这样，训政期的县自治体在革命过程中及建立革命的中央政府之上担负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此意义上，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正是“建国的基础”。

四 宪政时期的地方自治制度

革命军在全国制胜之后6年，经过上述步骤进入宪政时期。这时，建设完成，革命成功，县自治体作为国民大会组织的基础可以说是“治国之石础”。另一方面，在县自治体内实施“直接民权”，县民对县政除有选举权外，还有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以期在县政这一级上实现美国克利夫兰市政制度那样的直接民主主义。

^① 《在沪举办茶话会上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29页。

孙文在许多论著、讲演中倡导达成直接民权，“欲达到真正民权目的，应实行四种直接民权，即（一）选举权，（二）复决权，（三）创制权，（四）罢免权”。^① 正是因为有此直接民权，“始可谓之行民治”。^② 在采用五权宪法之上，“更采直接民权之制，以现主权在民之实，如是余之民权主义，遂圆满而无憾”。^③ 孙文确信，正是直接民权制、地方自治制以及以地方自治为“石础”的“治国”制度才是最好、最新的制度。他认为，直接民权制的实现是民权主义的顶点和完成形态，“吾人今既易专制而成代议政体，然何可故步自封，始终落于人后。……俾更进而底于直接民权之域”。^④ 其理由在于，正是直接民权才是实现“民为邦本”理念的制度。在《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六讲中，孙文有如下阐述：

关于民权一方面的方法，世界上有了一些什么最新式的发明呢？第一个是选举权。现在世界上所谓先进的民权国家，普遍的只实行这一个民权。……这种民权，是间接民权。间接民权就是代议政体，用代议士去管理政府，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够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够实行这四个民权。人民能够实行四个民权，才叫做全民政治。全民政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前讲过了的，用四万万人来作皇帝。四万万人民怎么样才可以作皇帝呢？就是要这四个民权来管理国家的大事。……有了四个民权，便可以直接管理国家的政治。这四个民权，又叫做政权，就是管理政府的权。……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那才算是一个完全的民权

① 《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77页。

② 《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6页。

③ 《中国革命史》，载《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1页。

④ 《在沪尚贤堂茶话会上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23页。

政治机关。^①

五 关于“分县自治”

清末的咨议局，民国初年开设的省议会，1920年代初期高涨起来且在江苏、湖南两省着手实施的联省自治运动，均是以省为地方自治的基本单位（虽然清末的咨议局并未包括在清朝官方“地方自治”的概念内）。孙文则与之相异，自中国同盟会“军政府宣言”以来就一贯主张“分县自治”，即实行以县为基本单位的地方自治制度。^②在《中国革命史》末尾，孙文主张“化兵为工”的现行政策；同时认为“非行以县为自治单位之策，不能奠民国于苞桑”，强调了“分县自治”的重要性。“分县自治”成为孙文地方自治制度论的主干之一。为什么孙文坚持以县为基本自治单位呢？他曾解释说，这是因为“国人对于本县，在历史习惯上，有亲昵之感觉”，^③县是形成乡土意识的行政区域。而在《中国革命史》中，孙文还列举了四个理由：第一，由于“中央及省仍保其官治状态”，若不以县为自治单位则无以打破专制旧习；第二，由于“事之最切于人民者，莫如一县以内之事”，故应首先进行县治训练；第三，作为选举准备工作的人口清查、户籍厘定等，宜以县为单位进行；第四，人民参与国政，宜以县为基础。^④这些理由虽不能说是“分县自治”的充足理由，但对于将推翻专制作为最

① 《三民主义》，载《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49—352页。

② 但在1921年5月5日《就任大总统职宣言》中，为解决中央与地方长期存在的纠纷问题，孙文认为“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法，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离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人民。至于重要经济事业，则由中央积极担任。……对于外交，由中央负责”。（《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31页）这大概是孙文考虑到当时高涨的联省自治风潮（参见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正中书院，1983年）而提出的现实性统一方案。

③ 《在沪尚贤堂茶话会上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23页。

④ 《中国革命史》，载《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7页。

重要目标来追求的孙文来说，面对清末民初的现实，第一个理由一定分量更重。1916年7月在上海的讲演中，孙文言及当时为建立统一政府而就究竟是采取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这一问题展开的争论，并批评道：“言地方分权而以省为单位者，仍不啻集权于一省也。”^①孙文鉴于督抚、都督、督军、省长之制基于以省为行政单位而实行省政专制的事实，认为为排除“官治”，确立“民治”，必须把地方自治区设定为县。但是，1916年以后，孙文则在考虑另一个没有特地指出过的重要理由，这就是和直接民权的主张相关连的，可以说是孙文的地方自治制度论的核心内容，即孙文所说的由国民掌握行使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这四种权利的政治制度。而这才可称之为“真正的民治”。但是，这一制度却“不宜以广漠之省境施行之”。^②大概可以说，对于考虑到上述第三、第四个理由的孙文的地方自治构想来说，这一理由才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

1922年，孙文在为上海新闻报30周年纪念而发表的文章中，将“分县自治”、“全民政治”、“五权分立”、“国民大会”作为实行“民治”的“方略”而提出，认为“其实行之次第，则莫先于分县自治。盖无分县自治，则人民无所凭藉，所谓全民政治，必无由实现。无全民政治，则虽有五权分立、国民大会，亦终未由举主权在民之实也。以是之故，吾夙定革命方略，以为建设之事，当始于一县，县与县联，以成一国，如此，则建设之基础，在于人民，非官僚所得而窃，非军阀所得而夺”。^③

孙文曾经指出：“今假定民权以县为单位，吾国今不止二千县，如蒙、藏亦能渐进，则至少可为三千县。三千县之民权，犹三千块之石础，础坚则五十层之崇楼不难建立。……竭五年、十年之力，为民

①② 同上页注③。

③ 《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载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第35-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

国筑此三千之石础。”^① 对于这“石础”的数量问题,要想在地域广阔的中国建立有机的统一国家,则不可忽视作为行政单位的省。在1922年的论著中,孙文强调:“积十一年来之乱离与痛苦之教训,当知中华民国之建设,必当以人民为基础;而欲以人民为基础,必当先行分县自治”,强调了分县自治的重要性。接着他又指出:“省制既存,而为省长者,当一方受中央政府之委托,以处理省内国家行政事务;一方则为各县自治之监督者,乃为得之”,^② 认为作为行政单位的省虽不一定废止,但却不可赋予其自治性质。

结 语

以上介绍了孙文的地方自治制度论的中心内容和特征。这一理论的基本理念是什么呢?孙文在1921年的讲演《五权宪法》中,说明美国总统林肯的名言“民有、民治、民享”是与三民主义相通的,即民有相当于民族主义,民治相当于民权主义,民享相当于民生主义;认为无“民治”则无“民享”,无“民享”则无“民有”。1923年,孙文在广州出席全国青年联合会时又解释同一意旨说,无“民治”则不能称之为“民国”,真正的“民治”即是民权主义,将地方自治交与人民才是完全的民治。孙文将民权主义置于三民主义的核心地位^③ 以建设民国,认为民权主义在制度上只有以上述两种地方自治制度为基础才能实现。1921年的讲演《五权宪法》里有幅“治国机关”图,将孙文理想的民权主义作为行政制度予以标示。从中可以看出,孙文的建国理念就是通过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而保障广泛的民权,以县自治制为基础而建立国家机构,最大限度地使主权在民的原理制度化,并据此而建设民国。

① 《在沪举办茶话会上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29页。

② 同上页注③。

③ 张磊:《论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以上所述孙文的地方自治制度论,在当时军阀割据、政局险恶、战祸不断的政治状况下,同那种“致力于追求和现实的政治力学相适应的政治效果”的现实路线正好相反,是过于理想主义的产物。五四运动后在湖南、浙江等省的省政民主化运动进程中,^①继之在国民革命的发展中,集结各种革命力量的地方政权构想(例如,湖南省的县民会议、省民会议)^②得以推行,但孙文的地方自治制度论对于这种地方自治运动的现实却不能顺应。其原因在于孙文的地方自治制度论本来就不是从地域社会实情的分析中产生的,而是参考外国制度而建构的;加之偏重于从制度上立论,而对于如何从运作上来集结当地居民的力量以主动建成地方自治,却付之阙如。

但是,地方自治的理念在混沌不靖的政治状况下,揭橥了民国建国的基本理念(“民为邦本”),力图在最大限度地保障国民参与政治的基础上实现国民的整合,这对我们研讨由于历史原因而人权意识不发达的社会状况,研讨在民族问题上占较大比重的近代中国的政治状况,可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译自孙文研究会编《孙中山研究日中国际学术讨论会报告集》(日本法律文化社,1988年11月)。

刘世龙译

(责任编辑:丁如筠)

^① 笹川裕史前引论文;金子肇:《1920年代前期各省法团势力和北京政权》(收入横山英编前引书);笠原十九司:《江浙战争和上海自治运动》(收入野泽丰编《国民革命史研究》一书,青木书店,1974年)。

^② 笹川裕史:《国民革命时期湖南省各级人民会议构想》,载《史学研究》,第168号,1985年8月。

东西方对立的孙逸仙观

白吉尔*

1979年10月,天安门广场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肖像旁边的毛泽东肖像被孙逸仙像取代了。这一调换宣告了一个新时代——改革开放时代的开始。邓小平能为其四个现代化政策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保护神呢?孙逸仙(1866—1925)不是他那个时代根据西方模式设计并在西方帮助下实现的现代化的积极捍卫者吗?于是,中国史学家对中华民国(1912年)的缔造者孙逸仙的生平、思想及活动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以便从历史上为邓小平政权及其政策找到一种新的合法依据。

共产党政权早就使我们习惯了这种从现实需要出发,或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重新编写历史的做法。在中国,因为这种政治家的历史观与这样一种传统连在一起,即人们对过去的记忆和解释总是与意识形态的政府活动紧密相连,所以这种政治家的历史观就更需要用强制力量使人接受。其实,在中国古代,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保存和编纂官方文献资料,确立有关各种事件的正确说法,其目的就在于加强王朝正统,向官员提供先例汇编。这样做主要是出于道德和说教的考虑,并不是为了使某个时代或某个人物复原,而是要利用某些事件或某些行为说明和加强儒家正统,不属于这一范围的就被淘汰。个人史研究也未能摆脱这种方法,历史人物的性格、感情及其他各个方面均被搁置一边,只有那些被认为是值得注

* 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社会科学高等学院导师。

意的模范的社会行为才可以列入儒家道德范畴,主要包括家庭和政府机构两方面。个人的历史作用——他的悲壮的或传奇的一面因此被全然忽视。

在这方面,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表明自己是中华帝国的继承者。双方都将孙逸仙当作一种象征,把他看成是革命运动的化身、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现,将三民主义固定在孙晚年即1924年的表述上,从而淡化了孙的犹豫、矛盾和局限。

尽管共产党对蒋介石在台湾建立的政权抱有敌意,但1949年后他们并没有明显地改变国民党在20年代末所确立的有关孙逸仙生平和作用的说法。至多他们只是想把这种看法与马克思主义观点结合起来,将孙逸仙看作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而毛泽东及其伙伴们则继续孙未完成的这场革命,实现并超越了原来的目标,建立了新民主主义政权(1949—1952),并自1953年起开始执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路线。

共产党新正统论与国民党正统论之间的差别不如这两种正统论之间的相似和他们利用历史为政治服务的相同做法来得重要。^① 双方都想争夺孙逸仙的遗产,以便使诞生于革命中的政权得到承认。在台湾,对“国父”抱有真诚的崇拜;在以马列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的北京,则通过对“革命先行者”的敬仰显示其与过去的连续性。

当1979年中国当局号召重新开展对孙逸仙的研究时,它并不想鼓励随意恢复历史的客观性,而是想对孙逸仙学说进行改造以适合新的改革政策的需要。如果在研究过程中不得不触及孙逸仙的思想和活动的各个方面,乃至那些被隐蔽的部分时,仍要与过去的选择性、政治性原则相符。因此,中国的孙逸仙研究尽管有实际成果,尤其是大量资料出版,但却很少引起西方历史学家的注意,

^① 参见谢文孙(Winston Hsieh):《中国辛亥革命研究述评》(Chinese Historiography on the Revolution of 1911),斯坦福:胡佛研究所出版社,1975年。

也没有使他们对孙的人格产生好感。

多数欧美史学家在另一种以事实为依据的历史观指导下，一直不断地对孙的人格及作用提出疑问，强调其个性的弱点、思想的矛盾和作为革命领袖的失败。为了戳穿关于孙的神话，欧美史学家还借助专题论著及其无可指摘的准确性来攻击它，使他们的注重因果关系的科学方法与其中国同行的总的看法形成了鲜明对照。

因此，孙逸仙研究成了两种史学研究方法相互对立的主要领域，成了中西方史学家互不理解的主要根源之一。孙逸仙研究因为编造神话和企图戳穿神话而被引入歧途。面对中国史学家所创造的完美的神话，西方历史学家则埋头于实证考究，以便为破除对孙逸仙的个人崇拜提供证据。对话看来没有希望，西方史学界最终放弃了对孙逸仙的研究，近 1/4 世纪以来，除了韦慕廷的研究之外，^①没有出版过一本基本读物。1979 年以来在中国掀起的孙逸仙研究热并没有在西方引起反响。西方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由拒绝接受对孙逸仙的崇拜逐渐变成否认它所引伸出来的一切观点，如西方对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志士的影响，中国沿海在民族觉醒中的作用，等等。虽然孙逸仙在中国史学中无所不在，但在西方史学中几乎完全被忽略。

结束这种反常现象的时代难道还没有来临？在千篇一律的中国官方史学与意见分歧的西方专题论著之间难道我们找不到一种不带感情色彩的分析，以便对孙逸仙的一生及其作用作出全面的评价？进行这项工作困难的，因为它意味着要运用大量的材料；同时也是冒险的，因为它可能招致各方的批评；但它又是必要的，因为要了解 20 世纪初的中国历史就不能满足于对孙的褒贬，而需要对孙逸仙的作用和地位作更深刻的分析和更合理的评估。

^① 韦慕廷(Martin C. Wilbur):《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76 年。

偶像崇拜：从国民党的正统论到 共产党的新正统论

国民党的独裁制度和 1949 年后继承它的共产党的极权制度一样，都利用孙逸仙，把孙逸仙看成是革命的化身，是民族解放、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的象征。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将孙逸仙塑造成一位传统的民族英雄：爱国的、有远见的、进步的和勇敢的。历史提供了制造这个神话所需的材料。史实被用来为意识形态服务，用列宁的话来说，当它们（史实）对当局构成不利时，它们就被掩盖起来了。

正统论的基本观点在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1927—1937）就已确立。孙逸仙本人所写的几篇传记文章^①和他的崇拜者与追随者——他的日本顾问宫崎寅藏^②、他青少年时代的朋友陈少白^③以及早期革命组织中的活动分子冯自由^④、邹鲁^⑤等人所写的有关回忆录，为神话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根据这些叙述，孙逸仙似乎是一个天生的革命家。从 1894 年兴中会成立起他就已经下定决心驱逐满人、推翻封建帝制。他们根本没有提到他的改良主义尝试，以及他与已经欧化的香港华人，如律师兼医生的何启等人的紧密联系，何主张以英国为模式并在英国的帮助下逐渐改变中国。他们还隐瞒了孙逸仙 1894 年上书高级官员李鸿章一事，李是当时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领导者，孙向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并表示愿意效力。接着，通过他组建或领导的一系列组织——从同盟会（1905—1912）到国

① 如孙逸仙的《伦敦被难记》，布里斯特耳，1897 年初版（1969 年伦敦再版），载《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49—86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

② 宫崎寅藏：《33 年之梦》，东京，1902 年。

③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上海，1929—1930 年。

④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海，1928 年。

⑤ 邹鲁编《中国国民党史稿》，上海，1929 年。

民党(成立于1912年),孙逸仙似乎成了中国革命运动唯一的领袖。他与在日的中国留学生、流亡知识分子之间进行的困难协商被遗漏了;他与秘密会社首领之间达成的艰难妥协被忽视了(这些秘密会社于1905年在日本合并成立了同盟会);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思想利害的冲突也被掩盖了。官方史学企图制造和强加给人一种有关中国革命的统一的历史观。1911年10月在武昌爆发的革命只能是孙逸仙一个人的功劳,尽管他当时远在千里之外(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尽管当时同盟会因为内部分裂和1911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使其骨干分子遭受沉重打击而完全瓦解,尽管武昌起义的主要发起者是新军军官^①和一些怀有个人目的的地方权贵。革命的最初成功——没有外国干涉、成立中华民国(1912年1月1日)、推翻清王朝和封建帝制——都归功于孙逸仙一个人的首创和决定。但随之而来的失败,特别是1913年袁世凯军事独裁的建立,则归咎于孙的伙伴们的动摇不定。

这种自我吹嘘的作法,以及想成为革命先行者和革命运动唯一领袖的念头,不仅反映了孙逸仙一向自命不凡,而且也符合这样一种政治考虑,即它关系到重新恢复在袁世凯上台后严重动摇了的权威和合法性问题。1913年,袁世凯在取得军事独裁胜利后镇压了最后几支革命军,流放了它们的首领,并赢得了舆论界(当然是绅商控制的舆论界)的同情和理解。孙逸仙由于自身的事业和革命的事业遭到挫折,决心努力在这两方面重整旗鼓。

在1925年孙逸仙去世和1927年国民党统治确立后,神化孙逸仙的过程以一种新的声势继续下去。国民党利用这个神话作为宣传工具,与共产党争夺中国革命的遗产,也就是孙逸仙的遗产。孙逸仙在1923—1925年执行的国共合作和接近苏联的政策,的确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要求提供了某种可靠性,共产党人希望借助这

^① 开始于帝国晚期的军事现代化计划培养了一批新军精锐部队,这些新军的军官们是由外国教官培训的,有的还被送到日本或欧洲深造。

位先驱者的声望来壮大自己。因此，国民党力图证实，中国革命史就是孙逸仙领导的国民党党史；同样，中国革命思想也可以概括为孙逸仙创立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民生主义）思想。孙在1924年即他去世的前一年，在一系列公开会议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学说。官方传记作者所描述的正是孙这时表述的思想。其实，孙的三民主义思想是逐步形成的，其中设想过许多方案，且不停地改变其思考的主题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但官方的传记作者却把他的思想说成是一成不变的，摆脱了彷徨和矛盾，象教义一样清晰、冷静。根据这一“教义”，他们再来考察他在1924年以前的思想。

经过这样删减的历史读物只会使中国革命思想史显得非常贫乏。1906年在日本东京举办的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大论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孙逸仙领导的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与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的机关刊物《新民丛报》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共和派与君主立宪派旗鼓相当，论战内容非常广泛。应该承认，梁启超的“温和”有时比孙逸仙要激进得多（如关于西方帝国主义问题）。也应该承认，在这次由章炳麟、梁启超等思想家的论战才能、国学根基、敏锐的思想和优美的文笔居主导地位的论战中，孙本人所起的作用是比较有限的。

在南京政府时期确定了有关孙逸仙的粗线条的神话在不断发展，它甚至由于对历史的新的歪曲而变得更加丰富。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爱国热情驱使国民党领导人掩盖孙与其日本友人和顾问长期保持的密切关系。在1949年蒋介石政府逃到台湾以后，有关孙的这种神话甚至成了他们恢复其统治合法性的主要工具之一。孙逸仙画像和语录比比皆是，引起了50、60年代在台湾的所有外国旅客的注意。修正后的三民主义成了台湾年轻一代的道德教科书。

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在史学领域孙逸仙研究刚开始扩大。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庇护下，官方的编年史家编辑出版了大量

资料丛书。^①虽然正统论的捍卫者在前言、介绍或注释中极力进行干扰,但这些资料汇编还是加深了人们对孙逸仙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历史背景的复杂性、思想政治潮流的自主性和历史人物的个性。为了历史专业工作者,也只为了他们,正统论开始有所松动。

与此同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了新正统论。在那里,孙逸仙作为“革命先行者”进入先哲行列,其地位要低于马、恩、列、毛。关于孙的神话在这里的主要作用是:他们将马列主义指导下的1949年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孙逸仙所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和19世纪末开始走上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历史连在一起。共产党因此不得不接受其敌人对孙逸仙的许多看法。但共产党特别强调孙逸仙在领导革命运动和创立革命学说方面所起的独特作用——至少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以及他在辛亥革命中为推翻清王朝、结束封建帝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在共产党新正统论看来,孙逸仙的首要地位似乎不是由于他自身的努力和个人的奋斗,而是由于他是新兴社会力量即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1913年共和国的夭折并没有显示孙逸仙的伙伴们和信徒的动摇,而是说明经济革命没有完成,它不足以使新兴社会力量显示自己的威力,从而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

这两种正统论之间还有其它一些差别,如国民党的正统论对孙逸仙的反帝情绪保持缄默,而共产党的新正统论则突出孙逸仙的反帝思想。国民党的正统论坚持认为,即使在1923—1925年孙逸仙与中共和苏联合作期间,他仍希望保持其党派和学说的独立性。与此相反,共产党则强调孙逸仙对国共合作所抱的信心,指出他不仅在战略上而且在思想上接受苏联顾问向他提出的有关社会主义模式的建议。对共产党历史学家来说,与其说喜欢三民主义,

^① 如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台北,1953年起;《革命人物志》,共61卷,台北,1969年起。

不如说更喜欢孙晚年(1924年)所提出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除了这些内容不同之外,令人惊讶的是两党在手法上的一致:他们都利用历史知识为其意识形态和政权服务。在北京方面,那种对文献资料进行有意识的系统的选择,然后汇编出版的做法,大大损害了全面、客观的分析与评论。^①而在海峡的另一边,比这一边更过分,将资料汇编与简单的理论性、说教性的文章相提并论,使西方意义上的历史研究成为空白。

这种源自传统的历史对政治的从属,是为了更加便于满足现代独裁或极权制度的需要。苏联的孙逸仙研究虽然与这种传统没有关系,但同样遵循中国史学的政治性原则。苏联收藏的有关孙逸仙的丰富档案,主要是关于他与苏联、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合作时期的档案,只有极少部分开放。^②而这极少部分史学家能接触到的资料,主要还是用于阐明中国革命与俄国的关系,以及孙逸仙及其伙伴们对社会主义老大哥欠下的人情债。

1976年毛泽东的去世和1978年邓小平的上台,使中共政制发生剧变,但并未动摇历史的根基。当前中国出现的孙逸仙研究热只不过是借利用有关孙逸仙的神话为现实的改革政策服务,此外别无解释。

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孙逸仙与“蓝色中国”

自1979年起,由于上级的指示和推动,中国出现了孙逸仙研究热。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者们、大学历史系的教师们和地方孙逸仙研究协会,都开始埋头研究孙逸仙。在1949—1961年期间中国发表的有关孙逸仙的论著达15种(1962—1978年只有2种);而从

^① 如柴德赓等编《辛亥革命》,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② 苏联史学家如齐赫文斯基(S. Tikhvinsky)等人就使用过这些档案,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引用,但从未注明确切出处。

1979—1984年增加了32种,^①其间(1981—1986年)人们还编辑出版了新的孙逸仙全集计11卷。^②同时还多次举行有关孙逸仙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如1979年在广州举行的孙逸仙和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1985年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孙逸仙逝世60周年学术讨论会;1986年在广州和翠亨村(孙的故乡)举行的纪念孙逸仙诞生120周年学术讨论会。此外,还有其它有关的学术讨论会(如1981年分别在北京、广州、武汉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这些讨论会上,参加者对孙逸仙的活动和思想展开了热烈的争论。

向这些学术讨论会提交了几百篇论文,其中多数是中国学者的论文,大部分已经发表。^③与往常一样,史学研究的加强还表现在论文集的出版上,其中有些反映了一种可贵的工作热情,如两卷本的《孙中山研究论文集(1949—1984)》,收集了一百多篇论文,它们发表在不同的、通常很难得到的杂志上。^④大量的研究和丰富的资料是否真能更新我们的知识,导致新观念、新观点的出现呢?它是否真能使教条退到一边以使历史真相大白,并最终突破禁区、允许自由评论呢?对于这些简单的问题,回答只能是含糊的。因为即使一部分教条被抛弃,其结果也不是科学态度的恢复,而是以新教条代替旧教条。在推翻或更多的是修改旧结论所引起的思想观念的混乱中,自由的大门是敞开的。对固有思想的批评通常会远远超过改革派所需要的程度,他们只满足于将传统理论稍作改动,以符合现代风格和时代要求。这种应时史学因而会产生一些反常的影响,影响最大的是那些能够帮助改革政策的领域。要理解今天中国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应为孙中山研究学会。——译者)编《回顾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9—43页。

② 《孙中山全集》,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1986年。

③ 如《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④ 《孙中山研究论文集(1949—1984)》,2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的孙逸仙研究方向是怎样被确定的,就必须先理解改革政策本身,理解它的主题、它的目标以及它所遇到的阻碍。

在四个现代化政策中,发展经济、改变中国长期落后的状况占有绝对优先的地位。社会主义目标(如社会公正、机会均等)则被推迟到现代化目标实现之后,而且取决于现代化的实现。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派采取一种与1949年以来一直推行的经济政策完全决裂的策略。新中国成立以后执行的经济政策是以苏联为模式的,后来按毛派旨意稍有改变。而新的经济政策则采取理论脱离实践的做法,这被认为是共产党制度本质所固有的。它开始时保证国营企业优先,继而又鼓励由市场规律调节的集体和个体企业。最后,“自力更生”口号所表达的自给自足的思想也让位给了开放和与国外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政策,从这一政策中得到好处的是广东、福建等南方沿海省份。经济策略的改变引起了价值观念的转变和历史评价标准的混乱,这在1988年播放的电视系列片《河殇》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河殇》是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周围的改革派创作的,它猛烈攻击“黄色中国”,指责她在长城的保护下,将官僚主义和农业传统长期延续下来;另一方面则极力赞美“蓝色中国”,称赞她是开放的、世界主义的、具有开拓精神和富有创造力的。

如此彻底的决裂只会招来剧烈的反对。许多人责骂资本主义复辟和西方与日本帝国主义返回中国,谴责在经济特区重建外国租界,背叛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上述宣传严重威胁着改革者。即使他们的雄辩口才和对同胞固有的实用主义的利用能使拥护现代化的人结成联盟,反击那些谴责他们放弃社会主义的人的话,但他们也有可能在那些指责他们缺乏爱国精神、讨好外国人的人面前无力为自己辩解。把孙逸仙说成是模范的民族主义者和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致力于现代化的人,为邓小平及其同伴提供了历史依据。这位伟大的先驱者的声望一定会使他们免遭“讨好外国人”的谴责,一定能证明开放政

策的正确。而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对孙逸仙的颂扬一定会与台湾国民党当局取得一致,从而推动与他们的合作,并为台湾最终回归祖国作准备。中国的统一不是正好说明爱国主义的实现吗?不是正堵住那些胆怯的民族主义者的嘴巴吗?

当前中国的孙逸仙研究方向正是根据改革战略的迫切需要而确定的。与50、60年代不同,研究重点不再放在国共合作问题上,而是放在孙逸仙早期的革命生涯上,突出他在唤起民族觉醒、创建近代民主制度(政党、共和制)、制订“实业计划”等方面的作用。

鉴于中国开放政策背景复杂,在此有必要谈一下中国以西方为模式并在西方帮助下发展经济的方案。中国历史学家,诸如金冲及、戴逸、林家有等特别强调这一点,即只有向世界经济开放,如孙逸仙所提倡的,才能确保中国经济的发展。他们援引孙在辛亥革命后不久提出的兴建铁路计划——用6亿美元的国际投资修筑10万英里的铁路。他们尤其重视孙在一战结束后所写的《实业计划》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孙呼吁西方列强帮助中国,在和平合作、互相尊重主权的原则下,通过资金与技术转让共同开发中国。看来,中国历史学家是在重复圣西门式的空想主义和孙逸仙的乐观主义,以为列强都会有兴趣促成现代化的实现,因为它不仅有益于中国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

政治气候的变化给史学带来了某些积极的影响。从此以后,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孙逸仙与外国的关系这一复杂的问题。人们开始敢于谈论孙与日本人的友谊和他的大亚洲主义。人们可以毫无保留地提及中国共产党与孙及其周围的国民党主要领导人(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合作。历史因恢复本来面目而变得丰富多彩。

承认孙逸仙是开放口岸的爱国者和世界主义的改革者,实际上等于以一种更普通的方式暗示南方沿海城市对中国政局造成的越来越大的压力。继北京、湖南、四川的空想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的时代之后,开始了南方,尤其是广东的企业家和冒险家的时代。

众所周知，孙逸仙出生于一个原籍广东的华侨家庭，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大型的、较高层次的学术讨论会都是在广东省举行的，或者由它发起，或者有它的密切配合。

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要探讨四个现代化政策，也不是为了评估参照孙逸仙的现代化政策的作用。不过，对于历史的嘲弄——它最终将孙的幽灵转过来反对那些原来想驱除这个幽灵的人，人们会忍俊不禁。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那些分裂分子和他们的顾问一样，准备利用历史，想仿效孙逸仙在海外华侨中进行宣传和组织革命活动，以便为他们逃往国外辩解，他们希望在那里继续奋斗。^①

这些政治历史的大演习不会使台湾人无动于衷，因为他们是这些演习的主要目标之一。1985年在高雄举行的纪念孙逸仙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重申了这一点，即孙逸仙将中国革命传统移交给了他唯一的合法继承人蒋介石。此外，孙从前的主要合作者日本也加强了对他的研究，1983年成立了孙文研究会，并于1984年在神户建立了孙逸仙纪念馆。^②香港也组织了各种讨论会。但是，欧洲和美国并没有被这种孙逸仙研究热所感染，除极个别例外。

西方与寻求“真相”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编写中国历史的是那些具有亲身经历的传教士、外交官和新闻记者。他们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开始研究中国，成了中国学家，但他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他

^① 参见《镜报》(Der Spiegel)杂志对分裂分子、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的采访录，载《远东经济评论》，1990年8月2日，第21—22页。

^② 日本的孙逸仙研究状况见山口一郎(Yamaguchi Ichirō)：《日本人的孙文观——孙文研究的特色与课题》，载《回顾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第618—632页。

们的研究主要是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和她的过去,所以他们对中国史学的依赖性很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专职的大学教员逐渐取代原来的侨民和专家,他们对中国文化背景的了解通常不如他们的前辈,但他们更多地受科学的研究精神的激励。他们可以与西方史的研究者相匹敌,并在同样的研究院接受正规训练,擅长于评论分析和专题研究。虽然他们也常常依赖中国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那些资料丛刊和论文集),但他们抛弃了中国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局限。当80年代初西方史学家终于可以自由交流时,他们只能看到彼此的分歧,鸿沟最深的大约莫过于孙逸仙研究了。

西方学术界对孙逸仙的态度可用一个词来表达:不感兴趣。除了1979年戈特弗里—卡尔·金德曼(Gottfriede-Karl Kindermann)在萨尔茨堡大学组织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以外,^①西方没有举行过一次响应中国的孙逸仙研究热的学术活动。诚然,一部分欧美学者参加了在广东、北京和武汉举行的孙逸仙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但其中多数人是海外华侨,他们感到自己有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殊责任以利于中国的开放;还有一些是研究孙逸仙已达15年或20年的学者,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此后重新确定了研究兴趣。

西方学术界对孙逸仙之所以不感兴趣,其原因在于有关孙的神话早已被戳穿。中国史学所创造的关于孙逸仙的英雄主义神话经不起系统的评论和分析,西方历史学家利用大量档案(外交部和殖民部档案)和有关孙逸仙的国际活动的西方文献对这种神话进

^① 提交这次讨论会的论文被收录在金德曼(Karl Kindermann)编的《东西方综述》(East-West Synthesis),第1卷《孙逸仙——中国革命国家的缔造者和象征》(Sun Yat-sen, Founder and Symbol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Nation-Building),慕尼黑,1982年。1990年在芝加哥召开的一次学术讨论会有部分美国学者参加,它是由台湾一些机构组织和赞助的,反映了中国的基本研究动态,参见《中国时代周刊》(中文),1991年1月5—11日(第306期),第64—65页。

行了有力的抨击。有两本书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本是史扶邻的，于1968年问世，内容包括孙逸仙的革命生涯的开始直至1905年同盟会建立；^①另一本是韦慕廷的，它于1976年出版，但吸收了以前关于孙逸仙的全部研究成果。^② 第一本揭示了一些不利于青年孙逸仙的情况：出身于农民家庭、在海外接受教育、信奉基督教和渴望投身政治活动，等等。在被知识精英和他们的小团体抛弃以后，孙转向生活在当时中国社会边缘的人，如通商口岸的买办和秘密会社。史扶邻揭示了孙开始时在改良与革命之间的徘徊和矛盾，以及他试图从传统的反满口号的模子里铸造出现代的革命方案。青年孙逸仙所表现出来的魔术师的技巧和他的自命不凡，说明他还不足以成为革命领袖，除了在一批忠实的伙伴和外国友人眼里以外。在其他人的看来，孙在1903—1904年以前不过是个默默无闻的广东冒险家。

孙逸仙的政治前途直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才开始显露出来。但即使在同盟会，也应考虑到其他领导人如黄兴的权威，^③ 他们的声望和他一样大，甚至超过他，以及其他更杰出的思想家如章炳麟的影响。孙并不是辛亥革命的主要发动者，充其量只是辛亥革命的主要受益者……况且他也不知道怎样保卫1912年成立的共和国和他的总统职位，几个月之后便把新政权交给了独裁者袁世凯。他的民主主义热情能使他与外国列强及其代表（合法的或不合法的）达成最暧昧的交易。正如韦慕廷所说，当1923年孙逸仙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商量缔结亲苏同盟时，孙并没有放弃与英国或美国合作的希望。于是，在英雄人物的背后隐约可见一个屡遭挫折、好说大话、还不成熟的政治家；一个思想不断变化以适应形势需要

① 史扶邻(Harold Z. Schiffrin):《孙逸仙与中国革命的起源》(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8年。

② 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

③ 薛君度(Hsüeh Chun-tu):《黄兴与中国革命》(Huang Hs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7年。

的社会主义者；一个两种文化交汇所产生的不幸的混合体，他对两种文化都不能领会、融合。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孙逸仙的品格，实际上是一种个人的魅力——这种魅力说明了孙逸仙为什么能广交朋友并博得朋友的忌嫉，以及他的真诚的爱国主义精神，尽管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前后有所变化。

西方历史学家的专题论著有力地戳穿了关于孙逸仙的神话，但这还不够，还有空白需要填补：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全面、系统的孙逸仙传记对孙的革命活动及其思想影响进行重新评估。^①如果说大部分西方学者不再承认孙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袖或首要的领导者，那么也没有谁再敢公然否认他的重要性。这种对实证主义的无望的归附被某些人看作是“历史贬值的一种表现”，^②西方的孙逸仙研究似乎陷入了死胡同。不过，近年来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即18、19世纪的中国社会史，这也许能加深对孙逸仙的研究。

在对孙逸仙个人进行分析之后，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所象征的意义在于西方影响对近代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和在那里产生的一种既是世界主义又是民族主义的新文化所起的作用。这种新文化孕育了现代化计划和革命理想，以及西方在由开放口岸和新价值观念的携带者——华侨社会所构成的中国沿海开发官僚主义和专制主义的中国内地农村的战略中所起的作用。与上述观点相反，兰金(Mary B. Rankin)、罗威廉等美国历史学家和法国历史学家魏丕信(Pierre-Étienne Will)则强调传统的力量，反对“停滞的中国”的观点；坚持认为19世纪中期出现的生产和分配制度的合理化、社会团体的多样化、政治决策和责任的分散性等内在因素具

① 史扶邻：《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者》(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波士顿/多伦多，1980年。

② 这一观点是约翰·菲茨杰拉德(John Fitzgerald)在1986年10月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孙中山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出来的，参见黄宇和(J. Y. Wong)编《孙中山：他的国际思想与国际联系》(Sun Yat-sen, His International Ideas and International Connections)，布罗汇，1987年。

有决定作用；认为社会经济的演变导致地方绅商为自身的利益而动员组织的“公司”的出现，而公司的出现反过来又为地方绅商由慈善家变成政治家和从地方到中央提供了条件。罗威廉认为应该从中国内部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去寻找辛亥革命的直接根源。^①

这就排除了孙逸仙所代表的沿海中国的作用，至少降低了它的重要性。年轻一代的西方历史学家通过对新材料的分析并受新的思维方法的启示，对前辈学者的观点提出挑战，这是很正常的。他们不同意所谓的在通商口岸（费正清称之为“混合社会”）中西交汇所产生的创造力和渗透力，或谢诺等人所说的工人阶级或企业家的大城市上海的作用。^②

自相矛盾的是，这些史学家一方面极力主张中国的历史发展动力应归于中国自身，另一方面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极力维护的孙逸仙观持相反的看法。不管人们是用合作还是用帝国主义一反帝国主义来评价 1842—1949 年的中西关系，西方在中国的出现是人们不能不考虑到的一个历史事实。对于对孙逸仙的个人崇拜现象，我们既不能采取简单地毁坏英雄形象的态度，也不能断然否认这一神话所象征的一切。我们应该从今天已经揭示的部分真相出发，再现这位非凡人物的奋斗道路，尽管他也经历过徘徊与曲折；并通过它说明别的奋斗者的遭遇。这对我们了解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中国历史是非常必要的，对于促进中西方历史学家的交流也是必不可少的。部分中国史学家认为，对孙逸仙的批评只是针对他个人而言，并没有对神话本身提出疑问。因此，应该把争论扩大到更广的范围，即现代化与革命的问题上来。为了驳斥中国史

① 罗威廉(William Rowe):《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Hankow, vol. I,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84 年, 第 13 页。

② 谢诺(Jean Chesneaux):《中国工人运动 1919—1927》(Le Mouvement ouvrier chinois de 1919 à 1927), 巴黎/海牙:穆顿公司, 1962 年;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L'âge d'or de la bourgeoisie chinoise), 巴黎:弗拉马里翁公司, 1986 年。

学家的神话,不能用也被神化了的的中国近代史,而是要用建立在对复杂、多变的现实作尽可能客观评估的基础上的历史。为了保持文化交流,重要的是要使中西方学者有共同的研究领域,以便比较他们的认识方法。至今仍是双方互不理解的主要原因的孙逸仙研究,或许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史的首要研究领域之一。

译自《中国研究》,第11卷,第1期,1992年春(L'effet Sun Yat-sen——Quand Orient et Occident se tournent le dos, in “Etudes chinoises”, vol. XI, No. 1, printemps 1992)

葛夫平译

(责任编辑:丁如筠)

国民党的性质(上)

齐锡生

假使国民党的军事形势趋于恶化以及政府倡导的平等主义在走下坡,那么国民党领袖们防止党全面崩溃的唯一办法似乎就是加强党,使之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工具。假如拥有一批有能力的且富有献身精神的干部,那么可以想象,国民党领袖们就能改变中国国内的政治进程,即将穷兵黩武的方针变为强调意识形态和组织的方针。通过动员和宣传,该党可以继续孤立那些拥有传统的军事势力的人,并且最终使军事势力和国内的政治进程相分离。然而历史最终表明,国民党没能做到这一点。不过,它失败的原因仍有待充分地探究。

本章的主要目的是从党的基层组织和党的领导层这二个分离的阶层来探索从南京时期到战争年代该党深奥的结构和行为的变化;同时也对战前国民党赖以生存的各个阶层的总体特征略加论述,以便鲜明地显示战时该党发生的变化,并且试图解释这些变化发生的原因及其对国民党的影响。

战前的基层组织

实际上,国民党直到1924年决定广泛吸收各阶层人士入党后才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政党。从1924到1927年,吸收新党员约计17500人。^①这种高速发展的代价便是共产党员得以渗透到

^① 陈希豪:《过去三十五年中之中国国民党》(上海,1929年)第145—146页。

国民党内，同时党也产生了一种不平衡的膨胀，致使党的许多基层组织为地方势力所控制。^① 随着党的势力进入长江下游地区，党的吸收党员政策更强调党员的数量，而这是以损害其质量作为代价的。^②

然而，从社会学观点来看，1927年清党之后，国民党又获得了一个新的同一性。从南京时期起，党已经逐渐成为以城市为基础的政治运动，主要在东南沿海省份树立自己的地位。它较多地是从教育程度较高的现代阶层（政府职员、商界或学生）而不是其余阶层中吸收党员，^③ 在整个30年代，党始终保持着这些特性。^④

战前，在党的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文职党员从未超过600000人。^⑤ 事实上，文职党员的人数总是少于军人党员的人数，有时甚至差额相当大。

通过对国民党全体党员的统计便可知道，党员人数占全国人口的1/300。^⑥ 这表明国民党更倾向于军事化而非文职化，而且从来没有达到如西方某些现代政党那样的发展势头。这种现象严重地阻碍党发挥孙中山所确定的执行政治指导计划的作用。这种实情仅仅表明党实际上是一个面向精英，而不是面向民众的政治组织。为什么这个党不象当时的极权主义或独裁主义政党，如苏联共产党或意大利法西斯党那样蓬勃发展呢？

答案不言而喻是复杂的，但是下述因素似乎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党的领导层在将党从昔日以广东为基础改为以长江为

①② 陈公博：《陈公博先生文集》（香港，1929年）第89、301页。

③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国民党年鉴（1929年）》（南京，1930年）各处可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统计（1930年）》（南京，1930年）。

④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国民党年鉴（1934年）》（南京，1935年）第2编，第11页。

⑤ 朱家骅：《党务实施上的问题》（重庆，1940年）第21—24页。

⑥ 参见朱家骅上引书，第11页；有关国民党转变成精英政党的讨论，可参见D. 巴雷特（David P. Barrett）：《国民党内精英统治的加强（1928—1929）》（The Consolidation of Elitism in the Kuomintang, 1928-1929）（1970年，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基础这一过程中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孙中山去世后，党的集体领导问题没有解决，胡汉民、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持续的长期争斗使得党多年来没有明确的指导方向。^① 清党之后，党的组织和活动依然混乱不堪；^② 即使在 30 年代，党也从未真正执行过集中的和连贯的吸收党员政策。

第二，出于发动内战以消灭对手的需要，以及所控制区域的不稳定性，蒋介石便以牺牲文职党员为代价，而明确地在军队里优先建立党组织。军事形势的变化无疑妨碍党在有效控制地区或地方党机关方面所作的努力，以致基层组织完全被忽视。尤其重要的是，党内的分裂倾向严重地影响了党在民众中的威望。1927 年清党和打击党内左翼势力以后，在这两个事件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地方精英的影响大大加强了。因此，党不得不与这些地方精英讨价还价和达成妥协，但党根本不可能控制他们。^③ 这样一来，一些把入党作为实现革命目标的动力的人们对党的兴趣下降了。在南京军方控制以外的许多地区，党的势力实际上大大地削弱了。例如，1926 年在广西有党员 128394 人，然而到 1934 年只剩下 5671 人；在广西的 94 个县中只有 29 个县建立了县党部。^④

第三，似乎在蒋介石的早期生涯中，党妨碍了他的政策的实施，因而他对党持有严重的保留态度，甚至在他取得了对党的控制

① 程天固：《程天固回忆录》（香港，1978 年）第 212—214 页。

② 刘绍唐：《民国大事日志》，第 1 卷，第 389、414 页。

③ 有关国民党地方机关情况的报告，参见朱家骅：《党务实施上的问题》，第 13—15 页；陈公博上引书，第 288—299 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国民党年鉴（1934 年）》，第 3 编，第 239—241 页；田宏懋：《国民党中国的政府和政治》（*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2 年）第 32 页；至于最近集中研究国民党内右派与左派在对待地方精英的态度上的冲突的，有盖斯白（Bradley K. Geisert）的《权力和社会：中国江苏省的国民党与地方精英（1924—1937）》（*Power and Society: The Kuomintang and Local Elites in Kiangsu Province China, 1924—1937*）（1979 年，弗吉尼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④ 黛安娜·拉里（Dana Lary）：《地方和国家：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桂系（1925—1937）》（*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1937*）（马萨诸塞州 坎布里奇，1974 年）第 178—179 页。

后依然如此。可能是由于蒋介石早期的职责仅限于军事方面，而党的其他领袖则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因而早在1926年他就表明了对党的保留态度。当时他提出党控制政府的原则，认为不应赋予全体党员以政治或行政特权，他抱怨党员对政府持反对态度。尽管蒋介石在原则上从未退而承认政府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但他坚持党的基层组织必须听命于政府官员，并于之合作。^①

甚至后来当蒋介石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以后，他仍然坚持党控制国家并不意味着党员应该控制国家这一主张。对他来说，这只意味着党的意识形态应该被用来指导国家，他严厉批评那些总认为自己在行政上应发挥积极作用的追逐私利的和不革命的党员。^②

同他对军事组织和许多尚武美德的坦率的称赞形成对照，蒋介石在整个南京时期对党务的关注是断断续续的，并且表现为对党的尖锐的批评。多年来，党员的许多“缺点”似乎格外激怒了蒋介石。首先，他指责党员纪律性不强、不愿吃苦耐劳、腐化堕落、裙带风盛行、一心想当官、毫无责任心、不服从命令、轻率地干涉军政的日常工作。^③其次，蒋把党的根本弱点归结为那些经常争吵的党员缺乏团结精神。^④蒋介石既不喜欢那些思想落后的党员，也不喜欢那些主张国民党只应同工人阶级联盟的有激进观点的党员。^⑤对蒋来说，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同志友谊和忠诚使党员团结一致。^⑥最后，蒋介石指责大多数党员仅仅“空挂着一块招牌，没有做

① 蒋介石1926年8月14日的演说：《党员的责任和地位与组织纪律之重要》，载《蒋总统集》（台北，1960年）第1卷，第475—478页。

② 蒋介石1928年7月18日的演说：《中国建设之途径》，载《蒋总统集》，第1卷，第515页。

③ 蒋介石1926年8月14日的演说，载《蒋总统集》，第1卷，第475—478页；蒋介石1929年2月7日的演说，载《蒋总统集》，第1卷，第533页。

④⑤ 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29年3月5日），载《蒋总统集》，第1卷，第536—537页。

⑥ 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31年11月12日），载《蒋总统集》，第1卷，第574—576页。

实际工作”。^①

结果,在蒋介石的权势不断上升的岁月里,他宁愿党政关系保持在地方水平上,旨在保护官僚机构不受党的干涉,并减弱党的基层组织在民众中“讲空话”的作用。他只希望他们用个人行动去说服民众服从政府的指令。而胡汉民则坚持认为,党高于军政的原则符合孙中山的训导思想。1931年4月当胡汉民被软禁后,这种观点实际上便消声匿迹了。此后,蒋介石统治下的政治趋向是:吸收大批北洋官僚野心家担任南京政府的要职;党政分离;党的重要性日益下降;在地方上,军方凌驾于党政之上并占据支配地位。^②

在整个南京时期,党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是持续不断的,它们经常深受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之苦。早在1928年,陈公博就已发出警告:有两个孪生恶魔威胁着党的生命:一个是堕落浮华,它导致纪律在根本上松弛以及党与政府和民众疏远;另一个是保守趋向,它仅仅依靠命令和高压而不是领导和训导来推行政策。^③

在30年代,党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官僚机构,党员也已官僚化而忙于日常文书工作,和民众真正关心的东西早已没有了联系。共产党被清除后,国民党实际上已不再致力于发展一切民众运动,特别是在工人和农民当中。^④ 在组织控制、动员各方面的工农协会

① 蒋介石于1929年9月14日对中央政治学校学生的演说,载《蒋总统集》,第1卷,第558页。

② P. 卡文迪什(Patrick Cavendish):《国民党的“新中国”》(The “New China” of the Kuomintang),载J. 格雷(Jack Gray)主编《现代中国对政治结构的探求》(Modern China's Search for a Political Form)(伦敦,1969年)第161—163页;有关其个案研究,参见蔡武雄:《江苏省的党政关系(1927—1932)》(Party-Government Relations in Kiangsu Province, 1927-1932),载《远东研究中心文选》(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第1卷(1975—1976)(芝加哥大学远东研究中心,1976年)第85—118页。

③ 陈公博前引书,第238—239页。

④ 陈公博前引书,第13—14页;A. 德里克(Arif Dirlik):《民众运动和国民党左派》(Mass Movements and the Left Kuomintang),载《近代中国》,第1卷,第1期(1975年1月)第46—47页;R. 贝德斯基(Robert E. Bedeski):《国民党思想体系中的训政和国民革命(1928—1931)》(The Tutelary State and National Revolution in Kuomintang Ideology, 1928-1931),载《中国季刊》,第46期(1971年4—6月)第319—320页;邵元冲:《玄圃遗书》(台北,1954年)第60、72—73页。

方面,国民党无法有效地同中共竞争,这便是国民党不再从事民众运动的主要原因。在中共的影响下,这些民众组织在许多地方已发展成为广泛的行政势力,并直接威胁着现政府。由于军阀、国民党内保守派领袖和长江下游上流社会的不断抗议,国民党最终决心一举清除这种“无法无天”的现象。^①

同样,党的下设机构也有明显的官僚主义倾向,党自身已堕落成为一个遮遮掩掩的、报复心强的、偏狭的和反对生产的政治力量。由于放弃了民众基础,由于无法为党找到一种建设性的作用,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同样也无法发挥将基层的意见和不满上达给国家领导层的桥梁作用。国民党的全体党员由于得不到来自上面的充分的鼓舞和引导,他们无法起催化剂的作用,即无法促成自由的宪政统治,以及基于城市和农村民众支持的那种革命的、平等主义的、民粹主义的运动。^② 国民党越来越走向保守、独裁和国家主义,越来越依靠文职或军人官僚以攫取财富和权力,并将此作为党的传统目标。^③

因此,总的来说,在战前十年,国民党已不是一个面向民众、基于民众支持的政党,而是逐渐具有一个精英政党的特征。它的权力基础从广东转到了长江三角洲地区,而且它在西南和北方地区也暂时获得利益。然而,实际上,该党在那些地区也仅仅是被默认,从

① 戴季陶:《青年之路》,载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续编)(台北,1968年)第2卷,第491—492、502—505页;有关国民党内领导层对民众运动和其他政策的意见分歧所引起的冲突的研究,参见J. 奥利尼克(John K. Olenik):《国民党左翼的激进主义:邓演达和中国第三党运动的起源(1924—1931)》(Left Wing Radicalism in the Kuomintang: Teng Yen-ta and the Genesis of the Third Party Movement in China, 1924—1931)(1973年,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② P. 卡文迪什前引文,第184—186页。

③ 有关国民党自强运动的争论,参见贾祖麟(Jerome B. Grieder):《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20和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革命》(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Democracy: The Chinese Intelligentsia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1920s and 1930s),载J. 克劳利(James B. Crowley)主编《现代东亚译丛》(Modern East Asia: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纽约,1970年)第224—228页;有关对国民党南京时期的比较仁慈的评价,参见R. 贝德斯基前引书,第320—330页。

未得到地方当局的热情支持。党也没有利用时间高效率地和民众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工作关系；在多数情况下，它甚至还没有开展与训政相关的工作。

上述事实表明，被党的领袖所忽视的基层组织从未在革命烈火中得到过锻炼，其组织和活动非常脆弱。只要国民党的军事势力牢牢控制长江下游地区，党的中心就能依靠党员的忠诚，并用一些有限的方法推进政府的政策。但是，党的基层组织从未站在剧烈的意识形态或组织斗争的第一线去进行社会经济革命，以便获得相应的经验。换句话说，即使在南京时期最好的形势下，党的基层组织也从未获得任何有意识的推行训政工作的经验。作为革命的先锋队的凭证，如果不是根本不存在的话，那也是很值得怀疑的。

战时的基层组织

战争对党最具破坏性的影响是，它使党丧失了长江下游地区的权力基础，导致结构和人事方面的变化——滥用在战前就有缺陷的党的机构的处事技能，使党处于崩溃的边缘。

在战争头两年，军事崩溃使得整个党组织在长江下游几近解体，并使党的基层组织严重衰竭。当党完全恢复并在1939年进行战时第一次党员调查时，注册人数不到战前的1/3。^①1939年以后吸收新党员使党恢复了活力，到1949年12月31日国内党员已上升到2555279人。^②然而，在这些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数字背后隐藏着党员成分统计上许多决定性的变动。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国民党年鉴(1940年)》(重庆,1941年)各处可见。

② 国民党中央统计局：《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纪要(1944年)》(重庆,1944年)，表3，第3页；《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纪要(1945年)》，第7页。

变动之一便是战前党员的地理分布模式被打破。^① 随着战争的发展,这种倾向愈加明显(参见表9)。1929年江苏党员占全国党员总数的10.25%,广东占27.43%;^② 到1945年江苏已落后于其他18个省份(包括人口稀少的新疆),仅占全国党员总数的0.77%,广东则下降到8.23%。与此相反,1929年四川党员仅占0.31%,而到1945年已跃至10.13%。在战前国民党牢牢控制的省份中,只有江西省依然处在国民党的阵营里,其他各省都摆脱了党的控制。^③

党的地理分布重心的转移伴随着其社会特征的变化。表10罗列了1942—1944年入党的新党员的一些特点,揭示出几个有趣的问题。

第一,政府职员占每年入党人数的25%—30%。^④ 在其他因素中,党在内地的发展主要应归结于党吸收大多数政府职员入党这一决策。因此,党不是派遣合格的党员去做政府工作,而是通过保守的办法,即不加甄别或很少甄别便吸收全国省级和地方政府中所有现职官僚入党。与其说党在政府机关中充当了领导核心,不如说老派官僚不仅保持了他们对地方官僚政治的控制,而且侵蚀、败坏了党。实施这一新政策的时机也甚为不当(抗战爆发前夜才实施),它破坏了党和政府的结构,从而在一夜之间产生了一大批党内官僚,这显然对内地和西南各省现存的权力结构十分有利。

第二,党员中农民党员的比例占第二位,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因为党从来没有真正吸收过农民入党。对党员的教育程度的统计表明,他们的教育程度远远高于农民。这使人确信,那些自称农

① 国民党中央统计局:《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纪要(1941年)》(重庆,1941年)表6,第6页。

② 田宏懋前引书,第30页。

③ 国民党中央统计局:《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纪要(1945年)》(重庆,1945年)表1、2,第1—2页。

④ 如果把政府各类部门的职员都包括在内,那么他们占党员人数的45%以上。参见朱家骅:《党的组织与领导》(重庆,1942年)第31—32页。

民的人实际上是一些乡村精英(地主和乡绅),而不是农民。

第三,尽管“工人”和“商人”所占比例和战前几乎一样,但我们仍要考虑到内地省份截然不同的经济背景。沿海省份的工人倾向于在现代和相对较大规模的工厂中做工(这些工厂的资金来自外国,并和外国人做生意),而内地工人倾向于在传统的乡镇企业里做工(在那里这是唯一的存在形式)。同样,在战前,沿海商人倾向于从事银行业、金融业或工业(同样也经常与外国资本发生联系),内地商人则倾向于当个小零售商和与当地的小规模资本发生联系,并经营国内的工业品和农产品。因此,这两种不同时期的经济生活的复杂性促使我们用数字来解释其不同的社会含义。

第四,从事党务工作的人数变化得非常少,约为1%。这反映

表 9 党员省份所属 (1941--1945)

省 份	1941	1945
江苏	1.23%	0.77%
浙江	10.56%	9.54%
安徽	7.11%	7.28%
江西	5.75%	4.60%
湖北	6.06%	9.26%
湖南	9.92%	7.08%
四川	10.58%	10.13%
西康	0.41%	0.73%
河北	1.21%	0.67%
山东	0.56%	0.94%
山西	2.23%	2.20%
河南	5.65%	4.58%
陕西	5.35%	5.24%
甘肃	1.86%	2.97%
宁夏	0.24%	0.52%
青海	0.58%	1.00%
福建	6.27%	8.88%
广东	10.54%	8.23%
广西	5.85%	5.93%

省 份	1941	1945
云南	1.67%	2.53%
贵州	5.30%	4.30%
绥远、热河、察哈尔	0.43%	0.54%
满洲	—	1.11%
新疆	—	0.97%
总 计	100.00%	100.00%

资料来源：国民党中央统计局：《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纪要（1941年）》（重庆，1941年）第6页；《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纪要（1945年）》（重庆，1945年）表1、2，第1—2页。

说明：1941年党员总人数为1037525人；1945年为2957687人，包括军队中的党员和海外党员。

表 10 吸收党员情况（1942—1944）

年 龄	1942年	1943年	1944年
20以下	6.6%	5.2%	5.7%
20—29	48.5%	49.2%	42.9%
30—39	30.4%	30.9%	31.3%
40—49	11.4%	11.3%	14.7%
50—59	2.4%	2.7%	4.3%
60—69	0.3%	0.4%	0.6%
70以上	0.02%	0.02%	0.04%
不详			0.5%
教育程度	1942年	1943年	1944年
大学	2.7%	4.3%	3.3%
军校	0.8%	1.0%	0.9%
特种训练	7.0%	7.9%	3.3%
中学	26.8%	33.3%	24.4%

年 龄	1942 年	1943 年	1944 年
小学	30.0%	28.4%	30.2%
家庭教育	21.6%	16.3%	24.2%
文盲	0.7%	0.5%	1.6%
其他	10.4%	8.3%	12.0%
职业情况	1942 年	1943 年	1944 年
农民	29.1%	22.2%	39.3%
工人	6.4%	8.7%	7.6%
商人	10.9%	9.7%	9.8%
党务	0.3%	0.4%	0.2%
政府职员	29.0%	30.8%	20.5%
自由职业	11.5%	14.9%	10.9%
公益事业	1.1%	1.6%	0.8%
无职业(学生)	9.5%	8.7%	7.2%
失业	0.5%	0.5%	0.9%
不详	1.7%	1.5%	2.6%
总 计	257622	268639	633825

资料来源：有关教育程度，参见国民党中央统计局：《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纪要(1944年)》(重庆,1944年)表7、8,第7—8页；《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纪要(1945年)》(重庆,1945年)表7—9,第7—9页。有关职业情况，参见：《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纪要(1944年)》(重庆,1944年)表9,第9页；《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纪要(1945年)》(重庆,1945年)表7—9,第7—9页。

说明：“自由职业者”在中国特指律师、记者、医生、研究人员和艺术家等。

出战时党的活动质量下降和范围缩小,因为1944年从事党务工作

的人数为 25000 人,而在 1936 年则有 36000 人。

第五,尽管 1937 年以亲党员在年龄上的变化甚微,然而在教育程度上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奇怪的是,同 10 年前的 1933 年相比,40 年代的许多党员都受过传统的家庭教育,这意味着 40 年代的党员同他们的前辈相比更趋向于传统,与旧秩序有着更密切的联系。而且,中学文化程度的比例基本相同(约为 30%),小学文化程度的比例则明显增加,40 年代文盲比例显著下降。此外,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也显著下降,并且几乎没有人留过学。

因此,就我们所知,40 年代新党员的质量与同期党的领导层的质量刚好相反,因为战前党的基层组织都毁于日本人之手,而党的领导层则成功地撤到了内地,并设法抓住他们在中央党部统治集团中的职务不放。1934 年,在中央党部有一定决策权的领导人(这里特指那些职位高于总干事或职能部门的主要官员)中 75% 都来自 6 个省,其中江苏和浙江共占 42%。在战争爆发后的 6 年中,来自同样 6 个省的官员仍然控制了中央党部几乎 70% 的职能部门,而当时这些省的党员仅占全国党员总数的 35%,在领导层中 34% 是江浙人。^①

除了党员的地理分布不平衡外,1941 年中央党部的党员个人教育程度表明,64% 为大学文化程度,25.3% 受过中等教育,4.5% 在军事院校学习过,3.6% 受过其他教育,2.5% 教育背景不详。^②在南京时期,来自这些省份的党的领袖与其基层组织之间至少存在一定程度的通融和一致性,因为他们是同乡,处在相同的文化和心理倾向之中,且大都生活在相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之下。

这种情况和战时基层组织的情况不一致,因为正如表 10 教育程度一栏所表明的,战争爆发后新党员的教育程度有所下降。在

^① 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中央党部职员录(1934 年)》(南京,1934 年);《中央党部职员录(1934 年)》(重庆,1934 年)。

^② 国民党中央统计局:《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纪要(1941 年)》表 68,第 68 页。

30年代,国民党的教育情况形成了一个纺锥形:中间部分是受过中学教育的成员;两头很少但很重要,他们或者受过较高的教育,或者是文盲。至40年代,纺锥的两头都平缓下来,变成了圆盘形,大多数党员只受过中等教育,或相当于中等教育;其余部分则很少。^①战时党员教育程度的下降仅仅是增大了党员与领导层之间在思想上的距离而已。

而且,国民党大量吸收党员的结果是,来自内地的许多党员其实早在军阀时代就已受雇于过去的地方统治当局,或者是在国民党于30年代末来到内地时早已是得到当地军事势力撑腰的维护传统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秩序的骨干分子。总的说来,那些曾经使东部一些省份骚动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力量对内地的影响很小。例如,战时新党员主要来自小城镇,而那里传统的影响依然很强大。由于他们业已长期参与维护占优势的社会政治秩序,故而入党的唯一原因就是保住他们的职业并从中获益,他们决不是受党的意识形态或纲领的鼓舞而入党的。内地的现代教育机构的极其有限的发展并没有产生象中国东部地区那种关心知识分子或意识形态问题的人们。

所以,当人们谈论战时的国民党时,就必须牢记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集团在社会与地理背景、教育程度、思想导向以及个人的气质等方面所存在的显著差异。事实上,我们可以把国民党看成是由两个相当不一致的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具有更多的世界主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领导层;另一部分则被世俗所束缚的、狭隘的基层组织。这些基层组织人员的头脑被维持社会政治现状的意识所占据,对外界基本上不感兴趣。战时的压力不仅加剧了这种不一致性,而且在党内还产生了严重的组织问题。当这样一个领导层处在一个对外界深怀疑虑的人群之中,当这个领导层不时还遇到因日本入侵而带来的困难情况下,它就会失去同基层组织在思想感情上和

^① 国民党中央统计局:《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纪要(1944年)》,第7—8页。

抱负方面的联系,而且也不可能发展同普通民众的关系。这两部分之间的交流变得日趋困难。领导层与基层组织的这种脱离不仅导致领袖之间的“围城心里”的发展,而且使得党员之间弥散着广泛的冷漠。

鉴于党自身的统计资料表明绝大多数党员都参加了基层组织和工作团体(这一般指县级或更低一级的组织),那么,党组织的弱点最佳指示物便可在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中去寻找。

1938年,蒋介石给党的工作规定了三项主要任务:第一,组织训练党员,培养党员的纪律性;第二,监督和帮助政府实施国家的政策;第三,通过宣传和动员去领导、帮助和引导民众。^① 蒋介石进一步指出,党的工作重点必须是县一级,县党部应为整个县提供政治领导和社会凝聚力。所有事情都应同县党部联系,都应置于县党部的领导之下。^②

这些任务中,党政关系无疑是最重要的。很显然,下层的党政联合是非常脆弱的。1940年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陈方生(Ch'en Fang-hsien,音)提出了一个综合改革建议,他指出党面临的最大的危机是党对政府丧失了领导权。按照陈方生的意见,部分问题是由于市、县或县级以下党组织人员不足,以致他们在履行各种职责时不能始终如一地监督政府。但是更为根本的问题是,政府官员直率地表明对党的领导的不满并加以抵制。不论是个人或者是在政策问题上,县政府通常不征求县党部的意见。正如陈方生所观察到的:

即使党部提出最轻微的批评,县政府也会视之为对政府的干涉。如果党部提出建议,那么肯定会被县政府忽视;如果县党部向中央党部提出上诉性报告,后者通常是避免作出判断,或者将它视为党政官员之间微不足道的

①②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如何做好县的党务工作》(1938年)第3、24页。

争吵,甚至指责县党部制造了不必要的麻烦。中央党部处理这类事情最通情的办法就是不予理睬。这就是导致党的基层组织广泛的士气低落、党的工作没有实效的主要原因。^①

其他一些知名的党的领袖也对党在县政府的软弱无能提出了同样的批评和抱怨。^②

党的领导层无法派遣其可信赖的追随者去内地充实广大的政府机构,由此产生了两个后果:在某些情况下,被派往地方工作的忠实党员发现他们备受孤立,被排斥在地方政治结构之外;然而在多数情况下,地方统治精英被大批吸收入党的策略导致党自身的特性和结构显露出具有地方结构和人事的特征。不管怎么说,党实际上成了一个空架子。地方领袖们完全无视党的存在,或把它变成他们的传统利益服务的傀儡。^③

毫不奇怪,党也没有深入到民众中去领导或真正参与民众组织。因为对外来干部来说,要想深入到内地的社会结构底层,就会遇到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而只有那些土生土长的干部才能在国家领导层和民众之间发挥桥梁作用。1940年底设立了社会部,C. C. 系领袖之一的谷正纲控制了该部。普遍认为,该部试图把党的影响和组织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④但是,正如党自身的统计所表明的,国民党试图操纵中国社会里的自发组织所换来的只是凄凉的失败。^⑤1941年,国民党建立的基层组织还不到国内非主要民间社团的6%。在重要的内地省份,如四川、云南和贵州,党

① 陈方生:《改进党务工作议程》(重庆,1940年)第1—8页。

②③ 张继:《改革党政建议书》(重庆,1941年)第1—2页。据认为,1941年有一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张继的领导之下。

④ 美国驻华大使高思(Gauss)给国务卿的报告,第712号,1942年11月5日,893.00/14903,《美国外交文件集:中国卷(1942)》(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2, China)(华盛顿,1956年)第252—253页。

⑤ 国民党中央统计局:《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纪要(1941年)》各处可见。

甚至连社会结构的表面也没有触及到。

以四川为例，当地的秘密组织哥老会的势力和影响显然远远超过国民党。不仅四川的政界、军界和商界首脑都是哥老会成员，而且据报道成都人口的半数与该组织有一定的联系。实际上，许多哥老会的代理人已打入党的秘密警察组织中，党和政府的许多活动只有在取得当地哥老会首领首肯的前提下才能进行。^①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

没有自我革新能力的国民党

如果不是更早，那至少也是 1942 年，蒋介石本人已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设法提高县一级党务工作者的素质，以此作为加强党的力量的一种方法。在 1942 年 11 月 23 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上，蒋介石把党的力量下降归咎于党的书记能力很差，以及党的活动经费不足。此后，选举更加合格的党员以负责县党部的工作成了当务之急。为了加强党对政府的领导，蒋介石进一步提出了一条新规定，即让县党部书记兼任县长。^② 但是，这种解决方法不切实际，因为它混淆了症状和病因。不管是中央党部还是中央政府都无法成功地让众多的县党部书记兼任县长。原因很简单，因为县长的任命权在很大程度上操纵在当地或地区的军政首脑手中。

国民党自我强化的企图在其他几个方面也以失败告终。例如，为了支撑党的基层组织，该党希望在所有的行政区——乡和镇中建立党部，在“保”中建立党小组。^③ 但到了 1944 年，在政府名义上

① 范宣德(Vincent)给国务卿的报告：《在中国的负荷》(The Charge in China)第 1063 号，1943 年 4 月 18 日，893.00/15003，《美国外交文件集：中国卷(1943)》(华盛顿，1957 年)第 221—222 页。

② 蒋介石 1942 年 11 月 23 日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上的演说，载《改进党务成绩之途径与方针》(1943 年)。

③ 朱家骅：《党的组织与领导》，第 33—35 页。

控制的 230000 个乡和镇中只有 60953 个建立了党部。^① 党的所有基层机关,即基层小组中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即便我们出于照顾国民党的面子引用它自己公布的数字,1944 年农村 50 万个以上的“保”中也只有 167314 个党小组。^②

国民党无力扩大组织的主要原因在于,尽管党的政策是不加甄别地吸收新党员,但事实上这一政策在吸引申请者方面长期以来遇到巨大困难。即使在 1940—1941 年为了和“新县制”相配合,党发起一场群众性的入党运动,然而新党员人数实际上也不到指标的 30%。^③ 对党缺乏自发的热情往往导致吸收党员时采取强迫手段的弊病,而这不可避免地使得更多的人转而反对国民党,其威望因而下降。^④

人们拒绝参加国民党并不仅仅因为它没有提供飞黄腾达的前途(因为所有的有权势者都已入党,他们在官僚机构中的要职是不可动摇的),而且因为党靠其微薄的经费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30 年代,党的活动经费约占中央政府财政预算的 2%—5%。^⑤ 抗战时期,经费自然更加紧缺,^⑥ 而这点少得可怜的经费更是在损害下级机关利益的情况下一律归党的上级机关支配。更为严重的是,在乡镇及其下级机关,所有人都是无薪的,党的一切活动都是靠党费维持,而 1940 年每月党费只有两毛钱,靠这点钱来维持党务的任何活动,那简直是荒谬之极。^⑦ 经费匮乏常使县和县以下党的机关被

① 国民党中央统计局:《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纪要(1941年)》,表 2,第 2 页;《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纪要(1944年)》各处可见。

② 《各省市路党部组织科(股)长会议纪要》,第 64—65 页;国民党中央统计局:《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纪要(1944年)》,第 1 页。

③④ 《各省市路党部组织科(股)长会议纪要》,第 55—56 页。

⑤ 田宏懋前引书,第 83 页。

⑥ 抗战期间,国民党的经济负担减少至少于国民财政预算的 1%,而恰恰那时党员人数增加了,活动范围扩大了。参见财政部:《中国财政年鉴(1948年)》(南京,1948年)第 3 编,第 98—101 页。

⑦ 陈方生:《改进党务工作议程》,第 1—8 页;《党政训练班党务工作人员谈话会议记录》(1939年)“1939年 2 月 18 日会议备忘录。”

迫长期完全中止工作。^①就战争造成的总体性贫困而言,经费短缺强烈地抑制了人们参加基层党组织工作的意愿,而那些已被分配去做这类工作的人更是急切地想离开。^②

缺乏能胜任的干部是国民党长期以来面临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清党以后,民众和学校中党的工作的中止造成了10多年来新的年轻干部的严重短缺。在南京时期,经济、政府、军队和交通等部门广泛开展的活动把党内相当多的人才吸引了过来。^③例如,最初建立中央政治学校的直接目的就是培养高质量的党务干部。然而事实上它变成了一所公开的行政学校,许多毕业生竭力挤进官僚部门而不是党的机关。^④

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在中央、省和地方各级组织中仓促拟定了许多训练计划。但在战时环境下,其它许多更为紧迫的需求使党务干部培训工作黯然失色。1937—1941年,从事党务工作的干部仅占国家培训计划中受训人员的6.5%,占地方培训计划中受训人员的2.1%。^⑤如此微小的数字再次反映出一种现象,即和上层党务工作相比,地方党务工作没有受到重视。对党务工作者培训的忽视现象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⑥

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不可避免地使基层组织产生了非常严重的道德和纪律方面的问题。从历史上看,国民党决不是一个以严格

① 国民党中央统计局:《党政情报》(1945—1946年),见1945年3月9日条。

② 陈方生:《改进党务工作议程》,第1—8页;国民党中央统计局:《党政情报》,见1945年3月9日条。

③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朱部长最近对于党务工作同志之指示》(重庆,1942年)第2—3页。

④ 郑旺(Wang Cheng,音):《国民党:道德败坏的社会学研究》(The Kuomintang: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Demoralization)(1953年,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30—36页。

⑤ 国民党中央统计局:《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纪要(1941年)》,表41,第41页。

⑥ 党政训练组:《党政训练班第四年训练实录》(1942年)第1—14页;《崇阳训练团团刊》,第115期(1942年2月25日)第2—3页。1944年全国及地方两级接受培训的党务工作者占当年接受培训总人数的比例分别为5.6%和4%,参见国民党中央统计局:《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纪要(1944年)》,表56、60,第54、58页。

的纪律著称的政党,但对共产党分子或其同情者则例外。30年代,历次反蒋浪潮的领袖人物都被“永远开除”出党,可一旦他们和蒋介石的分歧消失,他们的党籍便会被恢复。这种情况是对该党的纪律政策和执行纪律的机构的正义和公正的愚弄,并且充分地表明所谓纪律不过是蒋介石个人控制的核心小集团的裁决这一事实。

在战争开始后的头四年里,纪律仍然很松懈。1937至1941年,尽管有大批党员表现出不称职、懦弱、腐败,甚至叛变,但只有1827起受到指控的违纪案件引起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注意,其中不到1/3案件的处理结果是永远开除党籍,其它案件的处理则仅仅以给予严重警告或留党察看的处分而告终。^①

显然,中央监察委员会是完全不起作用的。^②为加强纪律,国民党建立了“党员监察网”。这种做法表明党要与过去放任自流的态度彻底决裂,它还清楚地反映出日益恶化的党纪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③据了解,1940年10月,监视系统就已打算使该党的中统局长期在暗中进行的活动得以定形和补足。尽管监视系统大吹大擂,但它的实际成员很值得怀疑。不管怎样,结果是一个散乱的、拥有44000多名工作人员的监视系统在1944年就使541个违纪党员受到严厉的惩罚。^④这一记录最终证明,在战争年代,一个党员只要不公开投降日寇或投奔共产党,他便有理由逃脱任何罪责。战时党的纪律形同虚设。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了解到,民众对国民党的蔑视显然是理所当然的。即使那些对党的政治理想仍然保持忠诚的人也会鄙

① 国民党中央统计局:《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纪要(1941年)》,表65,第65页。

② 有关对此机构的评价,参见P. 莱因巴格(Paul M. A. Linebarger):《蒋介石之中国》(The China of Chiang Kai-shek)(波士顿,1943年)第131页。

③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朱部长最近对于党务工作同志之指示(1942年)》,第5页;国民党党员监察委员会:《党员监察网》(重庆,1941年)第1—16页。

④ 国民党中央统计局:《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纪要(1945年)》,表91,第89页;有关1945年的情况,参见国民党中央统计局:《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纪要(1945年)》,表61,第61页。

视党部在地方上的所作所为。^① 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在 1944 年承认,党显然已无力在基层党员中唤起任何热情,那怕是参加党小组的活动。他对这种冷漠忧心忡忡,但却公开表示无力扭转这种局面。^②

总之,南京时期的军事化趋势阻碍了党的机构的发展,但它至少设法履行有限度的统治职责;然而战争爆发后,在上述地理、结构和人口等变化的新的张力的作用下,党的机构完全失灵了。1938 年 3 月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以后,蒋介石更加严厉和频繁地批评国民党。他在战时有关党务的演讲中,多次把党的缺点归结为纪律松弛、道德败坏、组织上无能和党的机关官僚化,所有这些都败坏了党的声誉。^③ 该党秘书长和组织部长都重申了蒋介石的批评。国民党中组部部长朱家骅在 1942 年底曾说,许多县党部的风纪和工作作风让人受不了,他“简直不愿进他们的办公室”。^④

到 1944 年 5 月为止,民众对国民党的愤恨达到了高潮,原本就不驯顺的国民党执委会委员在一次会议上尖刻地发泄对组织部和党的领袖的绝望情绪。^⑤ 有些批评指责党的某些领袖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因为他们从来不象共产党那样发起一场整风运动。党在组织上的最显著标志是它被分割成为两部分。使党膨胀的基层组织从党外的地方组织中获得权力和支持,它们反过来把它们主要的忠诚献给这些地方组织。从东部沿海地区迁来的国民党领袖继续保持他们名义上的统治,但无法采取新的组织手段去维护他们对基层组织的控制。党简直不可收拾了。回顾过去,在长达 8 年的战争年代,国民党没有实行任何有意义的建党计划的原因有

①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朱部长最近对于党务工作同志之指示》,第 10—11 页。

② 《中央各机关小组会议讨论会吴秘书长讲话记录》(重庆,1944 年)1944 年 8 月 18 日。

③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朱部长最近对于党务工作同志之指示》,第 16 页。

④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朱部长最近对于党务工作同志之指示》,第 10—11 页。

⑤ 黄旭初:《广西与中央廿余年来悲欢离合忆述》,载《春秋》,第 135 期(1963 年 2 月 16 日)第 9—13 页。

两个。最为直接的原因是该党匆匆地获得了绝对的权力，致使组织瘫痪、精神匮乏。

但还可能有一个更基本的原因，即蒋介石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党在革命中的作用的認識。假如蒋在战前支持政府和军队，反对国民党的做法，那他在制订加强党的新方案时就会遇到严重困难；即使现在他想这样做，情况也是一样。同样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当他十分坦率地表示对党的缺点的轻视时，他不会因党的权力衰退而惊慌失措。尽管战争带来巨大的压力，但对中国革命的观点似乎一成不变，这可在他的于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中找到证据。该书包含了蒋对国民党的革命目标不变的观点的最权威论述。该书的大部分篇幅对处在外国帝国主义者压迫下的中国所蒙受的屈辱作了充满激情的描述，声称要发扬民族献身精神，废除不平等条约，并把这视为民族革命的最高目标。蒋认为，以军阀主义为表现形式的中国国内的封建主义问题已经解决，因而无须在社会经济领域内进行内部革命。更确切地说，他断言国家的革命热情现在必须全部投入到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未竟的事业中去，并且号召民众用自己的“联合”、“团结”、“公共精神”、“守法”等实际行动帮助实现“中国之命运”。^①

因此，按照蒋介石的理论，完全没有必要进行内部的社会经济革命，只要国民党的领袖们实际上能控制住重庆的政府机关，党的衰弱问题似乎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人们认为，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主要通过军事手段以及外交技巧来实现。

假如国民党领导层有这样一种观点，那么它敢于听任基层组织不仅不去起政治训导作用，而且其成员还沦为—群腐败分子和压迫者这一事实就不足为奇了。

^① 《中国之命运》的第7章尤为重要，见《蒋总统集》，第1卷，第164—165页。

战前的派别活动——一些方法论问题

黎安友教授在对民初政治生活的研究中,给派系下了这样的定义:它是一个“在被保护人关系的基础上动员起来参加政治活动,并由一些阶层而不是许多阶层的个人组成”的结构。^①他进一步认为:

所有这些结构(派系)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首领(或副首领)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模式是个人对个人,而不是个人对全体。从结构上看,派系是由一个或几个中心点连接而成,它在个人互换关系基础上得到补充和协调。我将这种关系称作被保护关系。^②

或许国民党最常受到的指责之一便是它对领袖之间的派系纷争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在一些评论者眼中,国民党仅仅是派系的集合体。然而,尽管党内存在众所周知的派系和频繁的派别活动,但近30年来对派别活动的研究进展甚微,原因有二:

首先,在国民党内,“派系”这个词在意识形态上的涵义是贬义的。^③众所周知,陈氏兄弟坚决否认那种认为他们是C.C.派首领的说法,而坚持说C.C.系从未存在过。^④派系的追随者不愿坦然承认其派系归属,这使各派系的首领们更加保持缄默。和泰然自若

①② 黎安友(Andrew Nathan):《北京的政治活动:派别活动和宪政的失败(1918-1923)》(Peking Politics, 1918-1923, 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伯克利,1976年)第32页。

③ 20年代,国民党曾推广过一句口号:“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这种坚不可摧的纪律和统一成了一种神话,但阻碍了国民党领袖们对宗派活动作诚实和客观的论述。

④ 董霖教授曾是国民党的资深党员,1968年在他和陈立夫的一次谈话中,陈立夫断然否认C.C.派的存在。参见董霖:《革命的中国:个人经历(1926-1949)》(Revolutionary China: A Personal Account, 1926-1949)(纽约,1973年)第132-134页。

地承认忠诚于派系的北洋前辈不同，国民党政客们十分谨慎，尽量不暴露自己的派系身份，而且他们从来都不愿指责他人有派系联系。

其次，30年代的派系变得更为复杂，它们的成员的地域、社会、教育和职业背景都不一样。而且随着派系政治渗透到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卷入派别活动的人数急剧增加，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派系变得更加复杂了。北洋时期，派系的政治活动在军队、内阁和国会中是看得见的。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派系的政治活动扩展到了学校、商界、政府基层、各种社会活动、银行和工业部门。这些因素使我们难以给南京时期的派系政治活动模式作出精确的解释。只有等我们收集到有关国家、省、地方各级政治活动家的大量传记材料之后才能进行这方面的工作。这里我想在通过对派系的正确观察，提供有关国民党政治活动的某些方面的初步调查。我此时的唯一希望是提供一个约略的接近真实的东西。

在论述国民党的政治活动时，必须区别两类派系。一类是指以地域为基础的政治军事集团，诸如冯玉祥、阎锡山或龙云等，他们的许多其他活动已在本书的第1至第4章中加以论述了。虽然这些人名义上是党的领袖，但他们对党的工作缺乏坚韧性。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们对蒋介石表示怀疑，他们就会在党外拉帮结派。我们想将这种派系排除在“党内派系”范畴之外。

我们将把第二类派系包括在内，这类派系主要在党内进行活动。它们在党员中寻求支持，在被认为是党的范围内活动，并且竞相控制党的组织和群众。其中最著名的是C.C.系、力行社、政学系、西山会议派和改组派。在南京时期，这些派系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由于我们的主要注意力放在20世纪40年代派系的政治活动上，故对20世纪30年代在派系中居高位的人只能作粗略的介绍。

力行社

于1932年4月成立的力行社的准确的正式名称是三民主义力行社，通常以“蓝衣社”著称。最初的多数组织者都是蒋介石从黄埔军校毕业生中精选出来的。^① 一般人认为广为人知的复兴社成立于1934年7月。实际上，复兴社是一个没有独立形式或成员的外围组织，上至国家下至地方的名义上属于复兴社的活动，实际上是力行社或革命青年同志会的干部操纵的。

力行社基本上在3个领域内最有影响：由贺衷寒控制的军队中的军队政工系统；康泽统领的别动队；戴笠掌管的军统。在这三者中，按照组织上的复杂性、人员规模和活动特点，军统最不发达。军队政工系统是通过灌输或者渗透和监督来争取地方军事集团的忠诚；别动队的职责则是运用准军事手段在比邻共产党根据地的地区进行煽动和动员民众的活动。

虽然力行社的十分突出的军事性质必然使它把活动严格地限制在与军事有关的领域内，但这种性质不久就促使它成功地向新的范围扩展。1933年底以前，它已经侵入文艺界，并通过把军事训练列入学校正式课程的方法在某些教育机构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笼罩着极其神秘色彩的力行社的活动使我们难以估计它在战前的势力，但是，日本政府的一份秘密报告指出，力行社的人数在1935年底已达到14000人。^②

^① 王国勋：“追思刘健群并释“蓝衣社””，载《现代文学》，第20卷，第3期（1972年9月）第17—22页。

^② 田宏懋前引书，第57页。

C. C. 系

一般人认为 C. C. 系成立于 1927 年夏,那时蒋介石需要更为忠诚的追随者来取代共产党在党和政府中占据的要职。1928 年,陈果夫控制了中央组织部,这使他获得了广泛的可以为所欲为的权力。他利用重新登记党员的机会来清除隐藏的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从而使他在许多省党部的追随者迅速增加。这同样也导致党内秘密警察组织——中统局的形成。

C. C. 系在很短时间就抢先打入了党员干部训练领域,并很快进入了公共教育、出版、财政金融、商业和工业界。^① 衡量其发展的标准之一是它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成员人数的增加。据报道,到 1935 年为止,180 个中央执行委员中有 50 个是 C. C. 系成员,占总数的 27%。另据估计,战前,C. C. 系成员最多时达 10000 人。从地域上看,C. C. 系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和江西等省最为活跃。^②

改 组 派

虽然在北伐战争前及北伐过程中,汪精卫在很多问题上都与蒋介石存在分歧,但是促使他组织一个属于自己的正式派系的原动力却是清共后蒋介石权势的急速上升。1928 年春,中国国民党

① 唐人:《十年内战》(香港,1964 年)第 60—61 页。

② 有关 C. C. 系在战前的活动的论述,参见田宏懋前引书,第 47—52 页;易劳逸(L. Eastman):《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Control, 1927—1937)(马萨诸塞州 坎布里奇,1974 年)第 83—84、305 页;易劳逸:《30 年代的国民党》(The Kuomintang in the 1930s),载 C. 费思(Charlotte Furth)主编《变化的限度:民国保守主义的抉择论集》(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马萨诸塞州 坎布里奇,1976 年)第 196—200 页。

改组同志会在上海的建立标志着汪精卫政治集团的开始形成。

不久以后据报道,改组派的人数已达 10000 人。^① 对该派系领袖的花名册的粗略考查表明,它不是一个以地域为基础的集团,因为其领袖来自全国各地。它也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职能集团,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国民党内地位较高,但都没有担任具体工作。改组派迅速扩大的原因在于,它向国民党内所有持不同政见者提供一个发泄对蒋介石的不满的、在一个广受尊敬的人,即汪本人领导下的现成的组织手段。

但是,改组派内部也存在着重大分歧,这不可避免地妨碍了派系的团结。^② 1929 年,汪精卫最终承认了武装反蒋的必要,于是他同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一起召集了所谓扩大会议。但是,由于汪精卫的军事同盟很快就被迫放弃其计划,武装颠覆蒋介石的企图没有得逞。1931 年“东北事变”后汪消除了彼此的分歧,在国民政府中紧密地联合起来。但 1935 年汪精卫在一次暗杀阴谋中受伤,从而长期离开了政坛。最后,1936 年 5 月胡汉民的突然逝世进一步激发蒋介石继续和汪精卫联合。因此,当 1936—1937 年中国临近战争时,群龙无首的改组派也就开始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丧失其力量了。

政学系和西山会议派

早在国民党上台以前,政学系就已是一个无定形的集团。^③ 该集团在 1926 年就与蒋介石建立了联系,那时蒋介石需要有经验的官僚充实政府。政学系的成员中有知识分子、军官、银行家和金融家,他们主要倾全力于官僚政治,特别是经济事务。结果,他们的活动集中在大城市。在整个南京时期,该集团满足于在等级制的行政

①② 江上清:《政海秘闻》(香港,1966 年)第 68—84 页。

③ 有关这一派系的起源和发展的论述,参见田宏懋前引书,第 65—71 页。

部门谋得狭小的势力范围。其著名领袖张群、杨永泰、黄郛是蒋介石的私人顾问，基本上充任战略家和政客。^①黄郛甚至不是一个国民党党员。无论在职能部门还是在地方，这些领袖都无意建立其正式组织。结果，政学系便被视为蒋介石三位一体的个人权力的核心小集团之一。

在所有派系中，西山会议派规模最小，政治结构最为脆弱。尽管它的某些领袖如林森、邵元冲、叶楚伦后来都在政府中担任要职，但他们的权势是以反共、个人的名声以及在党内的地位为基础的。他们从未发展过任何正式组织，也没有在其毫不妥协的反共立场以外形成任何与众不同的政纲。因此，尽管他们继续被称为西山会议派，但并没有给蒋介石带来威胁，这可被视为他们于30年代在党政部门正式担任要职的原因。一旦国民党接受了他们的思想路线，他们通常便置身于党内纠纷之外。

从广义上讲，30年代党内最激烈的斗争发生在反蒋派和拥蒋派之间。在这类竞争中，反蒋势力再三表明他们缺乏组织策略和军事才能。事实上，即使在30年代，武力显然是党内斗争的最后仲裁者。随着蒋介石一次次的军事胜利，党内的拥蒋者获得了更多的机会来扩张其地域和活动范围。一般讲来，战场上的胜利使以黄埔系为主的力行社得以向新的被征服地区发展。但是，力行社没有人力去处理征服者所面临的全部问题，而C.C.系正好趁机开展正常的党务活动，政学系至少也分享了内部管理的一部分权力。蒋介石的力量主要在于，他个人的核心小集团是由这三种功能不同的成分构成的统一体。即使三者之间不时存在着磨擦（如C.C.系反对杨永泰），但蒋介石仍常能控制住它们，并防止其中

^① 包华德(Howard L. Boorman)等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纽约,1970年)“黄郛”、“张群”、“杨永泰”词条;雷啸岑:《杨永泰龙蛇之路》,载《中外杂志》,第9卷,第3期(1971年3月)第19—23页。

任何一方超过另一方。虽然在某些剿匪区域内黄埔系占有优势，^①但多数情况下这些派系之间存在着一种均衡状态，并且只有蒋介石才能指挥所有这三个派系。

相比之下，蒋介石的对手或是一些保留了很多军阀时代特性的传统的军阀，或是在党内根基薄弱的政治派系。后者缺乏军事力量，而前者则缺乏组织经验。只有这两个派系力量的联合才能对蒋介石构成名副其实的威胁。但在1928至1937年间，这两个派系不是单枪匹马地向蒋介石发起挑战，就是在少数联合反蒋的事件中不怎么协调，以致它们对拥蒋的派系从未构成过威胁。

然而，这种斗争方式也对拥蒋派系产生了一些细微的影响。拥蒋派系基本上变得过分依赖这种模式，即黄埔系的军队首先战胜对手，然后国民党开进早已平定的地区建立党部，并把党务工作引入官僚机构、学校和商界中去。军事保证成了开展党的活动的绝对必要的先决条件。和孙中山把党作为革命运动的先锋的最初想法相反，事实上国民党在其军队开进敌占区以前并不想冒险在那里进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战斗。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便逐步形成了一种完全依赖军事优势来克服其所有障碍的心理。国民党的领袖们不是坚持密切联系民众或用思想和纲领来唤起民众的方法，而是习惯于仅用高度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方法来指导工作。结果，无论在敌占区，还是在政府名义上管辖的地区，当军队保护者不可能长期提供舒适的环境时，这种心理就极度地妨碍了战时党务工作的开展。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营垒内部确实存在许多派系。除少数例外，一般是由特殊的人际关系形成的。拥蒋派系没有明确的政纲或社会经济纲领。派系是作为保护和增进领袖的个人利益的集

^① 蒋介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处理剿匪省份政治工作报告》（1933年12月27日）（1934年版）

体安全盟约而形成的。蒋介石在权力争斗中用以对付其对手的这些派系不会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派系生活本质上就是腐败的。对那些渴望参加这种游戏的国民党领袖而言，他们不是从政策选择而是从权利得失的角度去处理党派关系。他们对权力变动的细微差别极其敏感，他们对“胜利”或者“失败”的专注迫使他们将权力作为政治进程的终极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更大的道德和哲学问题的关注日益丧失，而这些问题必定会使一个革命政党不断获得其存在和生机的力量源泉。因此，即使在战前拥蒋派系得以避免自相残杀，但毫无疑问，正是它们的存在严重地侵蚀了党的道德力量和革命信仰。对党而言，它长期面临的危险只有在战时才变得更为清晰。按照给地域扩张或官僚政治膨胀学说所下的定义，一旦权力不再是垂手可得，派系就会迷失方向，以致在政治进程中彻底堕落和瘫痪。

译自齐锡生(Hsi-sheng Ch'i):《战时的国民党中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1937—1945)》(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1945), 密歇根大学出版社, 1982年, 第5章。

徐有威 曾忠梅译 徐有威校

(责任编辑:丁如筠)

田中义一内阁的对华政策 与张作霖被刺事件

大江志乃夫

编者按：1928年张作霖被刺事件是日本军国主义以武力将东三省从中国肢解出去的一次尝试和预演。日本大江志乃夫的《炸死张作霖——昭和天皇的统帅》专著以翔实的史料论述了田中义一内阁上台、召开东方会议制定“满蒙分离政策”、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为推行国策悍然炸死张作霖的史实，特别是详细揭示了日本统治集团内部三种政治力量——元老、田中内阁和军部围绕处理张案的意见分歧与争斗激烈的内幕。它告诉人们：实行“统帅权独立”的天皇制是日本军国主义肆意侵华又掩盖罪行的根源所在。本译文择该专著主要部分译出，其中许多新史料对研究20世纪20年代中日关系史具有参考价值。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被争取中国统一的国民党北伐军追赶，从北京逃回老根据地满洲（今中国东北），他所乘的特别列车被炸毁，不久后死亡。这是当时被称为“满洲某重大事件”的张作霖被刺事件。

发生炸毁列车事件的地点是奉天东侧北宁铁路通过南满铁路

陆桥下交叉点的地方*。

当时的日本内阁是政友会总裁、预备役陆军大将田中义一内阁，田中兼任外务大臣，陆军大臣是白川义则。田中为整个大正时期陆军的实力人物，接替山县有朋、桂太郎、寺内正毅，是长州阀的陆军大将出身的首相。但是，具有决定性的一个不同点是，山县、桂、寺内都是以现役陆军大将出任首相职位的，而处于政党内阁时代转为政治家的田中则退出陆军现役，作为政党总裁组成了内阁。

东方会议

1927年3月，中国的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时，发生了袭击列强领事馆的事件。对此，英美军舰炮轰南京城，对革命军司令蒋介石施加军事压力。当时若槻礼次郎内阁的外相币原喜重郎立即向驻华公使发出训令，通过外交谈判解决该事件。因此，在野党政友会与保守的枢密院强烈地批评币原对中国的“软弱外交”。币原之所以发此训令，是因为他已看准国民革命军内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对立，日本进行了幕后工作使国民革命军分裂，将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拉到日本方面。

屈服于列强的蒋介石，于4月在上海发动了反共政变。于是，自孙中山起通过国共合作来完成国民革命的方针被抛弃。此后，标榜反共路线的国民党军在取得以英、美为核心的列强支持下获得成功。通过北伐完成中国统一的进程开始了。在此时刻，若槻内阁制订“紧急救令案”，谋求对付袭击日本的金融危机。但该案被枢密院否决，若槻内阁宣告总辞职。枢密院倒阁的真实理由，据说是对若槻内阁的对华政策不满。

* 该地为沈阳郊外皇姑屯三洞桥的铁路交叉点。南满铁路在陆桥上方，北宁铁路在陆桥下方。该交叉点被称为“皇姑屯老道口”。在我国，张作霖被刺通称“皇姑屯事件”。——译者

继任的田中政友会内阁在对华外交上转而采取积极的方针。1927年(昭和二年)5月,蒋介石的北伐军向山东省进军,日本政府以保护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为由发表出兵山东的声明,派遣正处于换防期而被派往满洲的师团去青岛,接着又命这支部队开进济南。这是“第一次出兵山东”。由于北伐军在徐州会战中败北,8月田中内阁发表撤兵声明,撤出日军。北伐中止,蒋介石承担责任而下野。

田中首相并不反对国共分裂后的国民党实行除满蒙之外的中国统一,似乎认为通过张作霖的个人关系来保持和扩大日本在满蒙的权益是得策的。但是,出兵山东则被认为是出于日本阻止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的意图而进行的。所谓满蒙,是指东三省和内蒙的热河地区(不包括整个内蒙)。

这期间,日本政府召开了研究对华政策的重要会议。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的首脑、骨干,以及驻外的关东军司令官、驻华公使、总领事等参加,这就是以后所说的东方会议。会议从6月27日开到7月7日,在最后一天田中(兼外相)作了《对华政策纲领》的训示,会议的实际组织者、满蒙政策强硬论者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作了《关于训示中重点的说明》后便宣告闭幕。

可以称作会议的总结的《训示》有下列三个要点:

第一,在中国成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是困难的。在这一前提下,该《纲领》阐明“目前同各地方的稳健政权适当接洽”的方针,为以后分离华北工作开辟了道路。

第二,确定了“一旦在中国出现侵犯帝国权益及日侨生命财产的情况,根据必要,可断然作出自卫措施,以维护之”的方针,阐明在动乱之际不采取撤退日侨的措施,日本将积极出兵,进行武力干涉。

第三,决定了下述方针:“由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地

区在国防上及国民的生存上对日本利害攸关”，因此，东三省有力人士如能尊重日本的权益，谋求政局稳定，日本应予以支持。“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区的特殊地位、权益有遭受损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将予以抗击。而且，作为国外人士安居、发展的地方，应决心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防卫措施。”

按照第三项方针的这种规定，“满蒙分离政策”就若隐若现地浮现出来了。随着北伐的推进，只要动乱波及满蒙，就绝对予以阻止。只要保护日本权益的政权继续保持政权稳定，就不采用武力。如果日本权益受到侵害，或者政局不稳，日本就实行武力占领。在东方会议上，首相兼外相的田中与自认为是事实上的外相的政务次官森恪在满蒙政策上存在着方针上的分歧。^{*}可以认为，这一分歧是用微妙的方式显示出来的。

1928年2月，蒋介石复职。国民党军队重新开始北伐。4月，又一次威胁到山东。此前下野的蒋介石曾到日本访问，会见了田中首相，指出日本对张作霖的援助是中国排日运动产生的一个原因。蒋同时表达了国民党愿意考虑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的见解。田中内阁于4月19日再次决定出兵山东，命令驻熊本的第6师团出动。田中首相本来以为将派遣军留驻青岛的“示威出兵”就可以达到出兵目的，但是，登陆青岛的第6师团长福田彦助擅自将军队进驻济南。参谋本部追认了这一措施。

5月1日，北伐军未同北军发生武装冲突便开进了济南。在济南出现了日军与北伐军直接对峙的危险状态。最初发生小规模

* 田中义一与森恪在将“满蒙”从中国肢解出去这一大方针上是一致的，只是做法上有所不同；田中拟以收买和控制张作霖的“内科方案”攫取东北，而森恪则主张“外科方案”，打算趁东北治安混乱之际实行武力占领。——译者

武装冲突。关于冲突的开端，日军和北伐军各自举出不同的事实。”从当地不断向陆军中央部送来夸大的报告。”*收到福田师团长电报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长荒木贞夫(中将)、航空本部总务部长小矶国昭(少将)等人来到田中首相私邸，强调“国军的威信”，说服田中必须对中国内战进行武装干涉。5月8日，内阁会议决定派遣原驻守名古屋的第3师团赴山东。

但是，是日早晨，济南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据传是步兵第13联队未奉师团命令就擅自决定出动从而同中国军队发生武装冲突的，或者说日军的特务机关成员在两军之间开枪，挑起了武装冲突。据第6师团的战史《熊兵团战史》(满洲事变以前编)记录，步兵第13联队为炸毁无影山火药库而开始炮击，这是大规模采用武力的开始。第二天即9日，福田师团长下达了总攻击济南城的命令。济南国民革命军受到很大损失而撤退。蒋介石命令绕过济南，继续进行北伐。

关东军的谋略

4月，林久治郎接替持“满蒙积极论”的吉田茂就任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在出发前得到田中首相的同意，从白川陆相处获得反对军部干涉外交的约定。此前，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向陆军中央部提出意见，说无论是越过山海关向关外撤退的张作霖的奉军，还是追击它的北伐军，(日军)均将用武力解除他们的武装。林总领事向外务省反映，关于东三省外交谈判的正式对手是张作霖，应采取让张作霖早日返回满洲的方针。

* 武装冲突是在日军预谋上发生的。5月3日，一名徒手中国士兵途经日军擅自圈划的“警戒区”时遭日军击毙。同时，北伐军宣传员在南魏家庄张贴“打倒张宗昌”之类标语时，日军悍然干预。争执中，日军蜂拥而至，对沿途遇到的中国人，不论是军人还是平民，立即开枪射击。中国第40军一部被迫还击。——译者

** 在济南战火燃起后，有13名日本人死亡。日驻济南武官酒井隆向东京谎报：“济南有300多名日本侨民惨遭杀害。”——译者

5月16日,内阁会议通过《关于满州地方维持治安的措施方案》。第二天即17日,由首相兼外相的田中上奏天皇;将英、美、法、意四国大使召到外务省向他们递交了声明,并且作了详细的说明。18日又用备忘录形式向张作霖和南京政府发出通告。按照林总领事的意见,由芳泽谦吉公使出面劝张作霖撤回满洲。田中首相也反对陆军要张作霖下野的主张。

通告的内容是:“目前战乱将波及京津地区。当战乱涉及满洲时,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将采取适当而有效之措施。唯对交战者,自当力持中立的态度。至于帝国政府之方针,与以往并无任何区别,因此一旦采取措施时,本政府予以断言将在时间和方法上作出周密的安排,以使交战双方不致发生任何不公平之结果。”南京政府认为,这个通告表明日本政府没有在济南阻止北伐的意图,因此与日本约定,在完成确保京津(北京、天津)地区、统一关内任务之后将不向关外追击。张作霖则对通告不满,他期待日本给予武力援助,以便能留在关内。但由于芳泽公使的说服,他允诺返回奉天。

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收到18日备忘录后,着手准备采取武力解除奉军武装;派遣关东军到锦州,并将司令部迁往奉天。外务省认为,此举意味着关东军将出兵到日本主权以外的地区,因而表示反对。19日,参谋总长铃木庄六指示关东军,在接到命令之前不要向南满铁路附属地以外出动。陆军刑法第37条规定:“司令官对职权之外的事宜,除不得已情况外,擅自调动军队进退均被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禁锢。”(擅权之罪)

关东军司令官村冈请求参谋本部重新考虑,铃木总参谋长说服了田中首相,向关东军发出电报,称预计在21日下达(出兵)命令。村冈司令官命关东军主动在奉天集结,将关东军司令部迁到奉天,等待出动命令下达。但是,外务省对这一措施有异议,所发去的训电称:在北伐军不向关外追击的情况下,没有必要解除对方的武装。外务省的训电符合田中首相的意图,参谋本部也知道,但作战

部长荒木等人向外务省施加强烈的压力,要他们同意向满铁附属地以外出兵。

奉旨传达命令是天皇以大元帅的资格发出的军事命令,由参谋总长帷幄上奏*而得到天皇的批准。奉旨向陆军司令官等军队指挥官传达的命令,本来无须内阁会议事前认可,但是,向日本主权地区以外的政略出兵,乃属内阁掌管的外交问题,而且其所需临时军费不经内阁会议决定便不能支出。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是军事命令,如无首相兼外相的田中的事先同意也不可能得到天皇的批准。

5月31日,张作霖撤离北京只是时间问题了,焦急的关东军再一次向陆军中央部请求下达指示。当日夜里,陆军省军务局长阿部信行(中将)同外务省亚洲局长有田八郎访问了田中首相,请他决断。田中首相作出延期出兵的裁决。听到此结论的作战部长大为恼火,说:“现在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作为作战部可不负责任了。”

断然决定炸死张作霖

林冈司令官对迟迟不下达出兵命令感到焦急,他同斋藤(恒)参谋长、河本(大作)高级参谋打招呼,就同日本的华北驻屯军(又称天津军)联系,计划暗杀张作霖。但是,得知该计划的河本高级参谋说服了村冈司令官,理由是:如果刺杀张作霖不可能成为武力占领满洲的开端,那就毫无意义,从而使村冈采纳了河本自己设计的暗杀计划。河本的目标是:通过搞掉张作霖使东三省的权力分散在中小地方军阀手上,然后搅乱满洲的治安,给关东军造成出兵的良机。河本的计划是:不能在关内刺杀张作霖;为了证明满洲治

* 帷幄上奏是指凡属参谋总长管辖范围的事务无须通过内阁,可直接上奏天皇。——译者

安混乱——连最高统治者在他所控制的根据地也会遭到杀害，必须让张在其根据地奉天遇刺。

6月4日晨，张作霖乘坐的专列途经北宁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点的南满铁路陆桥下时被安置的炸药炸毁。张作霖身负重伤，不久后便死去。放置炸药者是日本从朝鲜临时派来的工兵队。指挥现场爆炸的是负责当地守备的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他还将从事爆炸工作的犯人伪装成国民党的工作人员。这样的伪装毫无作用。

在野党民政党的6个众议员恰巧在这天早晨乘坐开往长春的南满铁路列车通过现场。其中一人即松村谦三在自传《三代回忆录》中写道：“据说铁路不通，得在奉天下车。听说今晨铁桥被炸，张作霖被炸死。当时只见前方黑烟弥漫。我们一行先去看爆炸现场，随即奔赴总领事馆驻地。林总领事激动地说：‘可了不得！这是陆军的人干的。’”林是松村在早稻田大学时的同学，关系密切。

松村等人同中国官员一起进行了现场调查，获得了详细的情报后回国。根据松村自传，爆炸时喷发出来的火药粘在南满铁路的陆桥上，这是中国军队所没有的日本军用的高级黄色火药。所谓“南方的志士”的尸体其实是鸦片中毒患者，这是一目了然的。他所携带的暗杀宗旨书，一眼便可看出是日本人写的日本式汉文。还有关键性的证据，这就是炸药和连结起爆电门的电线忘记拿走，而这根电线是从离陆桥稍远的日军铁路监视所里拉出来的。这都是无法制造借口的证据。

松村一行回国后立即向民政党总裁滨口雄幸作了汇报。滨口认为事件重大得令人吃惊，他说：“这是超党派的事关国家的大问题，希望一切交给总裁处理，要慎重对待。”有关事件的真相很快就直接传到田中内阁的在野党的耳中，不久便以“满洲某重大事件”之名成为政治斗争的火种。

在河本看来，张作霖被炸死之事是在日本主权下的南满铁路附属地内发生的，张的部下会率军队立即赶赴现场，因此，可以侵犯主权为借口制造武装冲突。这是他的计划，所以不用考虑消灭证

据。河本的第二步行动谋略是在各地扔炸弹进行骚扰、挑畔。但是与预料相反，奉天省长*抑制了奉军的行动。准备在奉军开始行动时见机行事的日军部队，由于河本未将计划通知到而由参谋解散了。因此，河本发动武装冲突的计划没有成功。

对河本暗杀张作霖的事实并不知晓的陆军中央部，以这一事件为理由，请求给关东军以出兵的权限。通过白川(义则)陆相于6月7日向内阁会议提出，但为尚不知道事件真相的田中首相所拒绝。结果，关东军的谋略事件没有发展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仅以张作霖被炸死事件而终结。

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知道张作霖是被日军谋杀的。他继其父就任东三省保安司令。7月，向国民政府发出和平通电，南北妥协迅速取得进展。同年12月，东三省并入国民政府。

调查事件的真相与田中首相

张作霖被炸死事件因为是以关东军的河本大佐为核心的少数人所实行的阴谋计划，故连陆军中央部也很难知道其真相。6月26日起，陆军中央部召回河本大佐进行一周的调查，但河本否认参与此事件。本来希望搞掉张作霖的陆军中央部不强加追究，相信了河本的解释。陆军向田中首相汇报，称关东军同该事件无关。

河本到东京时，迎接他的是作战部长荒木、航空本部总务部长小矶和作战课长小畑敏四郎三人。小矶在回忆录《葛山鸿爪》里写道：“这一事件发生后，我得知这几年来与我关系很好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将到东京来，心想可从他那里打听到有关事件的一点真相。为迎接他的到来，我到东京车站去了。在站台等候列车到来时，见到了参谋本部的荒木贞夫中将和小畑敏四郎大佐。从寒暄中知道他们也是来接河本大佐的。河本大佐按照预定时间下车，

* 奉天省长是刘尚青。——译者

因为在车站不能站着说话，便一起到麴町平河町实亭。吃过饭后，河本把一切事情都告诉了我们。”

河本对前来调查的陆军中央部始终隐瞒真相，但对出兵山东、关东军出兵附属地外给予积极支持的堪称陆军中央部同志的上司荒木、小矶以及盟友小畑则说出了实情。当然，三人同时去接河本，是由于他们事先已被告知河本抵达东京车站的时间。这意味着河本本人选择这三个人作为他吐露真相的对象。

向田中首相第一次汇报事件为关东军的谋略者，是照看张作霖次子张学铭的预备役中将贵志弥次郎。日俄战争后田中为全面修改“军队内务书”而从参谋本部作战部部员调任步兵第三联队队长时，贵志应其请求，特由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员调任第三联队的实验大队长。他们之间有这样一层关系。贵志在事件后立即赶赴奉天，考察事件现场。结果从炸药的性质和数量确认这不是穿便衣的少数工作人员所能携带的东西，而且从爆破时接通电路的电线痕迹判断这肯定同日本军人有关，贵志遂将情况向田中首相作了汇报。

林久治郎在其遗稿《满洲事变和驻奉天总领事》中写道：“虽然疑窦难消，但除此之外并未发现任何其它证据，遂决定我方今后的一切消息均以陆军司令部发表的事实为准。至于那两个可疑的中国人被击毙，也统一口径为4日凌晨发生的事情。”但此后他又写道：“10日晨，我的老朋友贵志（弥太郎）中将从日本来到奉天，下车后即来访问我。”松村谦三从林总领事处得到的情报同贵志回国后向田中首相汇报的内容是一致的。站在日本外交官立场上的林为了保持日本的体面而不便直言，但可以认为，他已向松村和贵志尽可能提供他所知道的情报。

第二个报告来自同谋略事件有关的日本在华浪人*，他是河

* 此人叫安达隆盛，曾在致东京的工藤铁太郎的信中谈及河本的谋略。工藤将该信函交铁道大臣小川平吉看过。——译者

本谋略第二阶段——投掷炸弹试图骚扰的实行者。他通过熟人向铁道大臣小川平吉反映情况，再由小川报告田中首相。这是所谓的间接情报，其可信程度较低。

8月5日举行张作霖的葬礼，田中首相派林权助男爵参加。林权助作为一名外交官，曾历任驻清朝公使、驻华公使、关东厅长官等，是中国问题专家，尤其同北方军阀关系密切。他当过驻英大使，眼下正等待分配工作。林权助特使在归国报告中提供了大量情报，致使田中首相产生了是日本军人行凶的怀疑。为了调查事件真相，田中首相命林总领事回国。

宪兵司令官的调查

9月7日，田中首相会见林总领事，向他提出小川铁道大臣传来的情报，质问林是否知道这一事实。林在遗著中说：“并不知道。关于此事虽有所闻，但不足为凭。据警察当局的报告及其它方面的情报，当时被击毙的两个便衣队员实际上是乞丐，可能是浪人用钱收买而加以利用的。此外，5日晨，在总领事馆的碰头会上，守备中队长（东宫铁男）所述情节也不无可疑之处。除此以外未发现任何足以证明爆炸是关东军的人干的证据。”

田中首相对林总领事说：“这是一次国际性的重大事件。如果是日本人所为，就一定要查明真相，严肃处理，以取信于世界。希望能马上进行调查。”林总领事拒绝了调查命令。田中首相遂命令陆军省军务局长、外务省亚洲局长、关东厅警务局长等共同进行调查，同时还让白川陆相派宪兵司令官峰幸松（少将）赴奉天进行调查。宪兵司令官不是根据职权进行司法搜查，而是行政性调查。峰幸松长期担任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与河本就任关东军参谋交替而从关东军调出，他因有此经历而对当地情况很熟悉。

9月8日，峰幸松访问正在东京的林总领事，要求对调查给予协助。关于协助的内容，林总领事在遗著中写道：“此案极为重大，

如果草率处理,即无以维持信誉;倘若彻底调查并严加惩处,则将损害驻外部队的威信,在军队内部引起很大的反对。田中首相要给犯人以严厉的惩处,以便维持我国长远的国际信誉,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实行起来却需要非常坚定的决心。而且在调查过程中,即使由宪兵来执行任务,也要充分估计到会遇到一定的困难。”林总领事估计,要想弄清楚事件的真相,就会遭到军部的反对,上策是对事件真相采取和稀泥的态度。据推测,他因此没有向田中首相详细提供正确的情报。

林总领事约定在奉天再次会见峰宪兵司令官,但当林返回驻地时,峰司令官已结束在奉天的调查,踏上回国的路程。林总领事写道:“从当时奉天的形势来看,我怀疑他能否充分地完成任务。但从后来了解到的情况看,他毕竟不愧为这方面的老手,尽管从关东军方面没有得到任何证据。听说他终于从事毕返回朝鲜的工兵队那里打开了调查的缺口。据说在满铁交叉点的陆桥上安装的是250公斤的黄色炸药,这与爆炸当天奉天兵工厂派出的外籍工程师所作的鉴定大致相同。”

《田中义一传记》所概述的峰司令官的调查结果稍有出入:“在奉天收集情报以后,讯问了河本大佐、东宫大尉等人,他们确认,一旦爆炸和拔刀队的斩杀失败,将立刻实行独立守备队的急袭计划。归途中绕道汉城,向龙山工兵队某中尉作了调查,出乎意料的是他痛快地坦白了。于是返回东京。”

峰司令官回到东京时,恰巧陆军正在盛冈附近演习。田中首相随天皇呆在盛冈,因此通过白川陆相提出报告书。田中在盛冈住所收到报告书的时间是10月8日。陆军首脑全部在盛冈。田中前往参谋总长铃木(庄六)的住所,先同他协商,继而邀请前陆相宇垣一成和他(在陆军士官学校)的同期同学——前参谋总长、现任枢密院顾问官的河合操到住所共同磋商,慌里慌张地接连进行活动。

外务省等组成的“(张作霖被刺事件)调查特别委员会”于10月23日进行第二次审议。关东厅事务官大场在会上的汇报也基本

上证实河本等人的罪行。陆军省军务局长杉山元(少将)要求等待陆军方面的调查报告,企图拖延作出结论。

西园寺元老的判断

西园寺公望公爵是昭和时代唯一健在的元老。^{*}在报纸报道事件的当天,据说西园寺曾说:“真奇怪,好象日本陆军那些人是罪魁祸首,当然对外不能这样讲。”他对此表示担心。

(据西园寺的政治秘书原田熊雄写的《西园寺公和政局》记述)“此后过了一些时间,田中首相悄悄来到公爵的家里。”田中在一定程度上知道了真相之后向西园寺报告了事实。西园寺就所应采取的方针和向天皇汇报的时机提出了两点劝告。

西园寺认为,作为首相所应采取的方针是:“万一弄清楚是日本军人所为,就要断然加以处置,以维持我军的纲纪。无论是从日本陆军的信誉,还是从国家的声誉出发,都必须严肃处理。纵然对中国的感情暂时会因此而恶化,但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国际信誉,才能使日本陆军恢复过去的信用。日本陆军也明白,对于破坏纲纪的人必须严肃处理。就是说在中国、满洲,陆军干了信誉扫地的事。如今形势变了,在严肃的军纪之下不能再这样干了。从长远看,会给中国留下非常好的印象。就国内而言,一方面田中总理来自军部,可以控制军部;另一方面,又有政友会这个强大的政党的支持,可以采取断然措施。从田中个人来说,这样做不正是对严肃国军纲纪带来非常好的影响吗?无论如何也要采取断然措施!而且调查结果证明确是日本军人所为,转瞬之间即予处罚。”

尽管这一方针未能奏效,但事实上田中的方针最终被采纳了。

^{*} 西园寺公望从明治以来曾多次组阁。1912年大正天皇继承皇位后,对西园寺颁布敕语,称:“卿多年奉事先帝,亲受圣旨,将来亦须多加辅佐国政。应善于体察朕意,着手襄赞于朕。”从此,西园寺作为明治天皇的遗臣成为最后咨政的元老。实际上他是天皇的最高政治顾问。——译者

因此可以认为是按照西园寺的劝告行事的。

西园寺关于时机的劝告是在天皇即位大典*之前,他说:“一定要尽早上奏陛下。”田中没有听从这一劝告。

田中将事件“调查的内容”向天皇上奏是在即位大典以及随之而来的一连串活动终了之后,即在12月24日下午2时(《东京朝日新闻》,1928年12月26日)。在这期间,田中苦于等待,迷于决断,这是事实。事件发生时,日本所承认的中国政府是北京政府,而不是南京政府。张作霖在被炸死之前是北京政府的大元帅,为一国的元首。他是在放弃大元帅的地位回归满洲的途中被杀害的,尽管如此,他仍旧是控制整个满洲的事实上的掌握主权的人。日本陆军杀害这样的人物,其国际影响十分严重。

对于这样的事件,田中首相不在内阁会议上协商,而仅同白川陆相、冈田启介海相商议,他说:“张作霖遇刺事件,很遗憾,好象是帝国军人所为,目前正在加紧调查。如果是事实,应该依法严惩。详情待调查结束后由陆军大臣上奏。”(见《田中义一传记》)向天皇上奏需要相当的勇气和决断,不可否认,田中背后有西园寺元老强有力的推动。

栗原宪太郎所著《东京审判论》(大月书店,1989年7月)从东京审判时的有关资料中发现了新史料《内奏抄件(绝密)》的全文。可以判断,《内奏抄件》是12月24日田中首相上奏的内容。上面明确记载:“这是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大佐独自的主意,在他的计划下利用少数人干的。”

根据这个新史料,12月24日上奏的内容特别指明犯人是河本大佐。

* 天皇即位大典是1923年11月10日。田中在盛典上听取有关张作霖被刺事件的调查报告的时间为10月8日。——译者

围绕张作霖被刺事件的幕后活动

根据《田中义一传记》所述,在第56届议会召开的1928年(昭和三年)12月24日下午,田中首相上奏天皇,称:“张作霖被炸死事件似与帝国军人有关,目前正在抓紧调查之中。如果属实,定将依法严惩。详情俟调查结果后由陆军大臣上奏陛下。”

次日(25日),田中在私邸召集邮政大臣久原房之助、农林大臣山本悌次郎、铁路大臣小川平吉、文部大臣胜田主计等人,就对华政策在议会应采取的对策进行慎重的讨论。据说,在野党民政党根据自己调查的事实将采取“为了国家的威信,明确责任所在”的方针。首相在与4位大臣协商中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报道称:相当强有力的意向是以调查结果为依据。如有必要,将召开军法会议,说明真相,以便消除列强的怀疑”。(《东京朝日新闻》,1928年12月26日)

尽管西园寺元老提出忠告,但田中首相行动得太晚了。在政界的深层圈子里,围绕这一事件的暗斗已经开始。

一个名叫松本刚吉者从自由民权时期起担任警察的秘密侦探,开始迈出了其人生的第一步,以后逐步在官界崭露头角,不久便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在政界也扩大了交际圈。随后为山县有朋元老、继而为西园寺所器重而成为政界情报员,甚至在田中内阁时就任贵族院议员而成为出头露面的特异人物(1929年4月逝世)。松本将政界内幕情报写成《松本刚吉日记》遗留下来,其中记述了张作霖被炸死事件。

松本刚吉于12月13日访问了枢密院副议长平沼骐一郎,从平沼那里听到了一些情况:

枢密院顾问官伊东巳代治已掌握事件的正确情报,企图要求首相宣布真相、交付军法会议审讯。南满铁道公

司总裁山本条太郎是主张公开的最强硬派。海军大臣冈田启介也赞成公开。白川“陆军大臣是个十足的老好人，也可以说是几分低能，完全是田中首相的傀儡。他命宪兵进行调查，并把事情详尽地向首相汇报。但当首相表示要公开宣布时又突然慌张起来，主张不要公开宣布，表现出颇为忧虑的神情。情况就是这样”。据说，对于公开宣布，在参谋本部从参谋总长开始有许多人表示反对。又据说，首相曾说元帅闲院宫亲王赞成宣布，而陆军大臣却说亲王并不赞成。

松本听了平沼的谈话之后，同意平沼的想法，开始暗中活动。西园寺到底还是没有向松本讲出自己的心里话，松本推测西园寺已将赞成公开宣布的意见告诉了首相。平沼会晤了司法大臣原嘉道，取得原反对公开宣布的确认，并要求松本去说服久原邮政大臣。松本见到久原和山本满铁总裁，说事件在不了了之中过去是最好的办法。他尤其注意听取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和冈田启介的意见。

以上是截至12月24日止松本刚吉的活动。

由此明显看出，陆军以参谋本部为中心决定采取坚决将事件的真相隐瞒下去的态度，白川陆相因此陷入窘境；在枢密院，平沼正着手对主张“公开宣布真相”的伊东巳代治采取孤立态度，西园寺元老与枢密院副议长平沼骥一郎之间的意见对立明朗化；对内阁内部，孤立田中首相的工作也在急速地进行。

12月28日，松本见到上原(勇作)元帅，听到了他的意见。上原说，他的方针是将事件交付军法会议处置。这个方针是元帅会议决定的。上原的交付军法会议处置的意见的含义，同田中首相的依照陆军刑法将案犯交军法会议审判(公开审判)给以严惩的主张完全相反，即由军法会议悄悄地审问而不予起诉，按照现在的程序，就是只做到让检察机关听取情况的程度。

后来,1929年6月30日的《东京日日新闻》在有关田中内阁终于总辞职的经过报道中说:上原元帅“推动军部采取强硬的态度反对田中首相,将该事件的严重性转告萨摩派*首领、内大臣牧野伸显。该派正是能迫使田中首相、白川陆相陷入困境的力量。这终于推动了内大臣”。“牧野内大臣担心时局的发展,首先让侍从铃木贯太郎与西园寺公爵互通信息。满洲某重大事件在宫中成为不容乐观的麻烦事。”^①如果这一报道所传属实,上原孤立田中的政治活动已经扩大到宫廷内部。

“满洲某重大事件”和在野党

第56届议会面临一大堆重大问题,例如:根据紧急敕令颁布的经过修正的《维持治安法》的事后追认问题、出兵山东的处理问题等。田中首相于1929年1月22日在议会会晤民政党总裁滨口以及新党俱乐部的床次竹二郎时表示:鉴于“满洲某重大事件”事关国际关系,殷切希望当此之际不要使之成为议会里的问题,即使被质问,作为政府只能回答目前正在调查中,要求予以谅解。床次了解了田中首相的意图,民政党也没有在议会进行披露真相的质问演说。

1月22日下午,民政党的永井柳太郎就事件提出质问:“在满洲发生的张氏事件,是由于我国守备队放弃应有责任所致。我们要追究这个责任。”(《东京朝日新闻》,1929年1月23日)对事件仅提及有关的警备责任。民政党的中野正刚在预算委员会全体会议

* 萨摩派系指原萨摩藩(今鹿儿岛)出身的政治家、官僚、军人集团,他们是明治政府的核心势力之一,又称“萨摩阀”,与“长州阀”之间有着诸多政治矛盾。牧野伸显是该派的核心人物。——译者

① 据《牧野伸显日记》记载,牧野内大臣确曾介入倒田中内阁的活动。牧野认为,田中从主张严惩刺张事件凶手改为同意仅给“行政处分”是“根本变挂,真正岂有此理”。(1928年3月28日日记)在田中再次上奏之前,他曾访问西园寺元老,主张在田中谎奏时鼓动天皇追究田中首相的责任。(1928年6月25日日记)

上连续三天就政府只追究事件现场的警备责任提出质问说：“把责任都归之于司令官，难道首相就没有责任？这是什么事！”“不揭发事实真相就结束质问。”（《都新闻》，1929年1月30日）

在贵族院，石塚英藏于12月29日在全体会议上要求公开宣布调查结果，说：“这一事件至今已过去了8个多月，政府说仍在调查中，我认为实在太缓慢了。但愿把迄今为止的调查结果公开宣布。您对处分的大体意见是什么？若您认为有必要，那特别请政府主动要求召开秘密会议加以说明。这种做法亦无不可。”要求公开宣布调查结果。田中首相只说在调查之中而拒绝回答，但对石塚的再一次质问表示：“对石塚君第二次殷切的发言，我也有同感。绝非想将其不了了之。相反是想将它调查清楚，过些日子你们就会明白，今天正在进行慎重的调查。”

《东京朝日新闻》（1929年1月31日）概括地报道了议会各方面对处理事件的有关主张。政府方面的见解是：关于警备问题是涉及统帅的责任问题。责任在用兵的负责人——关东军司令官身上，陆军大臣没有责任。至于政治上的责任是否要由陆军大臣来承担，不弄清楚真相就不能具体确定。政府的立场就是这样。陆军方面的立场是：由于中国方面的要求，承认中国士兵、警察可以进入南满铁路附属地内，但这不等于日本方面放弃行政权、警察权，对此没有理由承担责任。在查明真相之后，如警备方面有责任，到时就处理责任者是了。现在处于调查阶段，不应讨论责任问题。

民政党的主张是：应采取今后仍要追究南满铁路附属地内的警备责任的方针。根据议会内的气氛，还要采取强硬态度，要求召开秘密会议。新党俱乐部的态度是：警备方面的责任当然要由日本政府承担。但它在法律上、政治上的责任到底是什么？要立刻说明调查的真相。

1月31日，民政党的山道襄一起立质问。山道是事件发生当天早晨同松村谦三等人一起莅临现场的众议院议员之一。质问的焦点放在警备问题上。为此，提出议案：“政府必须公布迄今为止对

某重大事件的一切调查结果,以解除中外的疑惑。”但是,该决议案因只有少数人赞成而被否决。

《宇垣日记》对该议案被否决的情况是这样写的:“当民政党提出有关某重大事件的议案时,思想跟不上的有18人,这表现出党的控制不严,真是大出其王!他们无所作为的程度也可从中看出。”(2月3日)接着又写道:“昨晨安达先生来访,对过去的不周表示歉意,并苦苦央求,等等。感到他有煽动之意。(中略)江木先生前几天来访时我也感到他有同样的动机。”(2月10日)曾任宪政会内阁陆军大臣的宇垣一成,据说同民政党有力人士过从甚密,他通过安达谦藏和江木翼等人在民政党内部进行工作,以使其质问不超出陆军方针的框架。很可能,民政党提出议案这策略本身是军事参议官宇垣同安达、江木等人共谋的计划。

在野党在议会上提出的方针是追究事件的警备方面的责任,迫使陆军大臣辞职,实现打倒田中内阁的目的。在议会上提出的内容局限于警备方面的责任,这是符合陆军的方针的。对此,田中首相坚持只作“正在调查真相之中”的回答,这是因为陆军强烈反对公布调查结果。陆军想回避陆军大臣辞职、田中内阁垮台的事态出现,不想给在野党留下内阁内部不统一的印象。正如田中首相在贵族院答辩时所表明的那样,内阁正在探讨公布事件的真相的可能性。但是,时间的流逝对田中首相不利而对陆军有利。

田中首相日趋孤立

根据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遗著,他是3月25日到东京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区为出席师团长会议也到了东京。据《西园寺公与政局》一书记载,26日上午各师团长陈奏军情。下午2时左右,在陪同天皇进餐之后,白川陆相上奏有关事件的情报。(原田熊雄请内大臣牧野询问宇垣一成大将有关上奏的内容)内大臣与宇垣联系了,听说宇垣的回答是:“看来陆军大臣似乎在各师团长报

告军情之前已将调查情况向陛下汇报了。”结果，西园寺和田中首相相对这次上奏的内容一无所知。

28日上午，林总领事晋见田中首相。本来林总领事就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同陆军斗争是没有取胜的可能的。对于此次晋见的感想，他是这样记载的：“去年归国时，首相曾向我言明一定要交军法议处，并且传闻已将一些人关押起来。今天又说给以行政处分，实在令人费解。但联想到这几个月间国内的政治风云以及首相的心情和处境，着实感到这是无可奈何的。”对田中的变挂付诸苦笑，予以同情。

事件的主谋河本大作大佐于5月14日从关东军高级参谋调任第9师团副。5月19日，作为陆军中坚参谋的新派系“一夕会”^{*}组成，并开始活动。当时他们所推崇的将军中的陆军大学校长荒木贞夫与冈村宁次等接触频繁，进行策划。此外，还有在弘前的第8师团长真崎甚三郎。

真崎于5月21日从弘前上书上原元帅：“对该事件的当事人的处分问题有何变化？……传说大臣对某人说了令人实在无法不加理会的话。果然如此，那么正在逐步走上正轨的陆军的声望将要大大恶化。对于毒杀人而切其爪腹的事情必须慎重处理。我想您知道，如果应该处分，就要堂堂正正地进行。事关国家、国军的如此重大问题，如不正当解决，阁僚也要间接负责。我想依靠阁下的力量是可以防止颓废的。这决非我个人的意见。我向上苍发誓，这确实是中坚人士的一致意见。您只要询问荒木等人，便可知晓。”“一夕会”的“中坚人士的一致意见”就这样通过真崎向上原反映了。

其后复杂的经过在《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一书中作了以下简洁的归纳：“5月22日，西园寺也向田中表明其殷切期待，希望

* “一夕会”是由日本陆军中年轻军官组织的标榜“国家革新”的秘密团体。骨干有小畑敏四郎、永田铁山、冈村宁次、铃木贞一、石原莞尔等人。早在1921年就有“一夕会”、“研究会”的组织。1925—1929年间，经过酝酿这两个组织合并为“一夕会”。河本大作是该组织成员。——译者

他顶住来自陆军的压力，严惩河本。但是，24日的军事参议官会议强调(事件)与国军无关。结果，白川陆相派陆军次官面见首相，建议照陆军方面要求的那样予以解决。没有主见的白川被夹在首相和陆军之间愈加动弹不得。贵族院的一条实孝和军队出身的大井成元、井上清纯等人，以及民政党系统的江木翼等人，以第56届议会田中首相的口头约定为后盾，为迫使政府发表(见解)聚集在一起。枢密院平沼系统的人也到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增加定员。(中略)6月11日，贵族院的一条实孝等人会见了田中首相，田中说责任在陆军。第二天即12日，铃木参谋总长、武藤教育总监两人同白川陆相会谈，要求白川采取反对田中的态度。”

6月27日下午2时，白川陆相访问了内阁书记官长鸠山一郎等人，“就发表文稿方案以及处罚责任者问题完成了最后的研究”。但是，下午4时田中在首相官邸召见白川陆相，反对对责任者仅给予行政处分的意见，要求将“水町独立守备队司令官以及河本关东军高级参谋以下的人交付军法会议断罪”。“因为上原元帅以下军部首脑事先发出警告：为了不使帝国陆军的威信受到损害，对责任者的惩罚范围要小，处分要轻”，白川陆相便不予回答就返回陆相官邸，与次官阿部信行、人事局长川岛义一、军务局长杉山元等人进行磋商。结果，“事态发展到导致白川陆相辞职的地步”。(《国民新闻》，1929年6月28日)

陆相采取辞职的行动，是第二届西园寺内阁时上原陆相辞职以倒阁的再现。当时策划上原陆相单独辞职的是当时担任军务局长的田中义一。田中自己一手制造的先例现在反过来迫使他本人陷入绝境。田中首相对陆军这一举动不得不作出让步。尽管田中是政友会总裁(那是政友会为取得政权而从陆军找来的总裁)，他在党内的基础是很弱的，他缺乏与陆军搏斗的基于巩固执政党的团结的影响力。

据报道：“关于满洲某重大事件，是以陆军方面的调查为基础，由内阁负责整理，现在终于整理好，于28日由内阁商议，29日就

可以公开宣布了。”又说：“白川陆相与田中首相在处罚责任者的程度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因此或许有小变动也未可知。”这表明田中首相直到最后也不想对陆军全面屈服。（《东京日日新闻》，1929年6月28日）

天皇不信任田中内阁

白川陆相于6月28日参加从上午10时开始的内阁会议，报告将同田中首相一起进宫上奏某重大事件。在取得阁僚的谅解之后，于11时进宫，被吩咐在“御座所”（天皇起居间。——译者）觐见、上奏详情并回答天皇的垂询。正午在御前退下。复参加内阁会议，汇报上奏经过，求得谅解。（中略）下午2时，田中就此问题再次同侍从长铃木进行重要会晤。2时30分访问西园寺公，报告会晤经过，争取谅解，因为事关重大，有关情况的报道非常引人瞩目。（《东京朝日新闻》，1929年6月29日）

关于这期间天皇的言行，据《田中义一传记》记载，上午，当白川陆相把对事件责任者给予行政处分的议决上奏天皇时，天皇仅提醒：“今后要记取教训。”关于首相的上奏，据传情况是这样：“首相于下午1时30分进宫，象陆相上午的陈奏那样，说不得不进行处置。天皇说：‘首相所云不是同上次说的有矛盾吗？’觐见历时数分钟后恐惧地退下，同侍从长恳谈，说事到如今不得不再次觐见，将不得已的经过加以陈奏。侍从长答：‘你这样强烈地请求觐见，我可以出面联系，但若是关于某重大事件，恐怕天皇陛下不会再听了。’”

《西园寺公和政局》一书没有记载天皇对白川陆相的上奏的反应。据说，天皇对田中总理说：“同你最初所说的不是不同吗？”话毕进入内宫，对铃木侍从长说：“田中总理的话我完全不明白，我不愿再听了。”侍从长上任不久，对情况还不熟悉，他把陛下的原话告诉了总理，田中听后流着眼泪，惶恐失色，立即决意辞职。

田中内阁的冈田启介海相一贯支持田中的严惩论，他在回忆录中对此作了记述。他的记述证实，28日上午内阁会议中止，田中首相进宫上奏，内阁会议重新开会，首相再次进宫，会见铃木侍从长。

陛下在听田中宣读奏折时，脸色突然变了，不管他是否已念完，就说：“这不是同以前的话相矛盾吗？”

田中惶恐地说：“关于这件事可以作些说明。”生气的陛下说：“没有听说明的必要。”话毕就进入内宫。田中颓丧地出来，在内阁会议上说了这件事。当时有人说：“对于辅佐陛下的一国宰相这样轻率处理行吗？……”最后向陛下进谏。（这是铁道大臣小川平吉的话。——作者）田中受到政友会同僚的鼓励，坚决想向天皇说明，于是请求再次觐见。那时的侍从长是铃木贯太郎，铃木同情地说：“我可以联系，但我担心这可能徒劳。”田中因此不得不认为已经失去陛下的信任，遂下决心辞职。他沮丧地退出来了。

至于天皇当时对田中首相都讲了些什么，天皇本人的讲话记录已于1989年1月公开发表了。根据1946年3月天皇本人对当时任侍从次长的木下道雄所说的，他对田中首相说过：“这么说不是有违前言吗，提出辞呈吧！”当面斥责他。^①关于天皇斥责田中时的表情，只有天皇和田中两人知道。

7月2日日，田中提出内阁总辞职。其后，9月29日，田中心脏病发作，突然死去。一时甚至谣传为自杀。关于天皇对田中所说的“你提出辞呈吧”的话，是日本战败后天皇本人说出来的，谈话记录在天皇死后才公开发表。通过这一讲话才第一次弄清内情。田中

^① 见共同社发表的《木下道雄日记》。

内阁是因天皇要求田中辞职而垮台的。

* * *

田中内阁垮台是由于天皇的一句话。但促使天皇讲这句话的原因却是：田中首相当初向天皇报告说日本陆军军人似乎有炸死张作霖的嫌疑，或者是点了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大佐的名；在查明事件真相之后采取严惩有关人员的方针，但向天皇上奏时又陈述违反该方针的结论。因此，天皇认为田中首相在撒谎，遂明确表明对他的不信任。

田中首相是在军部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的情况下才从主张严惩事件凶手、给予司法处分后退为仅追究警备责任给予行政处分的。军部说服阁员使之转到军部一边；把手伸到众议院的在野党和贵族院，对它们做了政治工作；在枢密院则假手平沼一派，甚至把手伸到宫廷内部，耍了各种手段。

天皇身边的内大臣牧野伸显(大久保利通元勋的次子)与上原元帅同属萨摩阀。在山县有朋反对让有萨摩藩主血统的人入选皇太子妃的“宫中某重大事件”^{*}中持反对山县的做法；当山县系统的军人出身的中村雄次郎辞去宫内大臣时，牧野作为后继者进入宫中。在山县系统的官僚出身的平田东助因病辞职后，牧野担任了内大臣。牧野的女婿是前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吉田同陆军中在“解决满蒙问题”上持强硬态度的河本大作、石原莞尔、铃木贞一等“一夕会”的成员是一脉相通的。

但是，这些政治压力都不是迫使田中让步的决定性因素。捆住田中手脚的、若隐若现的白川陆相辞职才是决定性的王牌。

* “宫中某重大事件”是：皇太子裕仁选妃时，长州阀首领山县有朋意欲选择长州藩出身的女儿为妃，但遭到皇后和內大臣牧野伸显的反对。1918年2月，皇族久迩宫邦彦亲王的长女良子与裕仁订立婚约。良子的母亲出身于萨摩藩，这更使山县有朋不快。后来，某医学杂志发表文章论述萨摩藩岛津家的色盲会遗传几代人，有岛津家血统的良子可能染上色盲。山县有朋等人逼邦彦亲王退婚，从而引起轩然大波。1921年2月10日，宫内省发表文告确认裕仁 and 良子的婚约不变。这一事件反映出长州阀与萨摩阀之间的政治矛盾和斗争。反对山县主张的牧野是萨摩阀的头面人物。——译者

只要陆相辞职,内阁就会被迫总辞职。田中为避免出现总辞职,除接受陆军的要求之外没有其它出路。田中首相向陆军屈服,除给有关人员以行政处分以结束事件外别无它法。行政处分是指采取追究警备方面的责任的形式,即于1929年(昭和四年)7月1日给当时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以停职处分(翌年7月1日编入预备役);同日将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编入预备役;当时任关东军参谋长、后来升任东京湾要塞司令官的斋藤恒中将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水町竹三少将于8月1日等待分配,于8月31日编入预备役。

如果将河本等事件凶手交付军法会议审判,那会定什么罪和受到什么处罚呢?按照陆军刑法的规定,陆军军人在国外占领地触犯刑法时的处置方法与国内相同。事件现场的交叉点在南满铁路附属地内,处于日本主权之下,而北宁铁路线则在日本主权之外。在附属地通过的该趟列车是在关东军的警备范围之内。河本等人的罪行符合刑法规定是很清楚的。

《刑法》第126条规定:犯有颠覆或破坏列车“罪并致人死亡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禁止爆炸品罚则》第一条规定:“以损害人的身体、财产为目的而使用爆炸品者以及指使别人使用爆炸品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的徒刑或禁锢。”这都是很严重的重罪,首犯河本不可能避免死刑。

犯下这样的重罪的河本不仅只受到行政处分,而且在1932年(昭和七年)10月还被任命为南满铁道公司理事。陆军对给予行政处分本来就不满,为了谋求减轻处分,试图通过皇族直接对天皇做工作。下面是1929年7月29日皇族东久迩稔彦亲王^①的副官安田镜之助少佐致上原勇作元帅的信件:

您所教诲、指示的那件事,立即反映了。××(原文如

^① 东久迩稔彦亲王当时是近卫步兵第三联队长,战败后任首相。

此,殿下?——作者)有话:“上原任何时候都是那样亲切,对此非常感谢。”他的意思是:“关于实行的方法待考虑后决定。”此后,原田男爵应约谒见两次,或许这会使殿下听到不利于军部的判断的话语。另一方面,村冈中也将也亲自拜谒殿下,还约定他日偕河本大佐同来。因此,卑职也在不断注意,待有良机将进一步进言。但前些时候对“家族的不和”之事稍有耳闻,最近处于非常状态,卑职也为此很苦闷。过分积极进言反而会招致不利,因此,请稍事等待。

东久迩宫的王妃是明治天皇的公主。他为昭和天皇的姑父。由于王妃在巴黎留学时有了情人,不想回国(大正天皇逝世后才勉强归国),家庭遂出现混乱。那时天皇对东久迩的看法极为不佳,可以认为“家族的不和”与此事有关。因此,该项工作归于失败。

迫使田中首相陷入困境的决定性因素是陆相单独辞职。陆相单独辞职对陆军来说怎么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呢?而这是《明治宪法》所未曾规定的。原因就在于“统帅权独立”^①是由惯例形成的制度。

译自大江志乃夫著《炸死张作霖——昭和天皇的统帅》(日本中央公论社,1989年)

林卫平译 肖 苏校

(责任编辑:丁如筠)

^① 统帅权独立问题,根据《明治宪法》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但行使统帅权的机构是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它们直属天皇,是不受政府控制的独立的军令机构。1878年参谋本部成立之后,它可将其所决定的军令事项下达陆军大臣执行。这一来,参谋本部便可通过陆军省控制内阁,而陆军大臣又必须由现役军官担任,参谋本部如不推荐陆军大臣的人选,内阁就不能成立;如果陆军大臣单独提出辞职,内阁将被迫总辞职。“统帅权独立”这个由惯例形成的“制度”造成了日本军部高于政府的局面。

日中战争的爆发和近卫文麿的 “国际正义”论 ——走向建立东亚新秩序的进程

庄司润一郎

一 序 言

1937年6月4日,日本国内外期待的第一届近卫内阁诞生了。此时,近卫首相强调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是基于“国际正义的真正和平”,“而不是单纯维持现状的真正和平”。^① 记载这一具体方针的备忘录至今还保存着。^②

在备忘录里,近卫一方面主张“国际正义非到公平分配世界领土时是不可能彻底实现的”,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不过是“空想”,退一步的办法在于诉诸于确保三项必要的条件,这就是:获得资源的自由、开拓销路的自由和移动劳力的自由。其结论是:今后必须为实现这三项条件而努力,但是在“经济的国家主义”抬头的当今国际形势下,实现三项条件是困难的。“在没有实现国际正义之前,我们日本属于‘没有资源的国家’之列,不能不保障我民族自身的生存权。日本的大陆政策就是基于保障这一生存权的必要性而制订的,现在国际主义尚未实现就是我国实行大陆政策属于正当的根据。”

① 东京《朝日新闻》,1937年6月5日晨刊。

② 近卫文麿:《第一届内阁的指导精神》,载《改造》,1949年12月号,第35页。

这就是近卫参加凡尔塞和会之际发表题为《排斥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论文以来一贯坚持的国际政治观。^①

但组阁仅一个月便爆发了卢沟桥事变,近卫内阁遂忙于制订事变的对策。

本文分析近卫内阁所鼓吹的这一基本方针是如何以日中战争爆发为契机,经过怎样的过程而发表了东亚新秩序声明;又如何实施过程中因加强防共协定问题而导致内阁总辞职;它将日本同德、意以及英、美间的关系置于怎样的位置。本文以近卫的思想与决定政策过程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进行剖析。

过去,对日中战争扩大的有关政治、军事两方面决策过程研究得很多,而将其思想背景置于焦点的位置上而加以研究的则几乎没有。^② 本文试图填补这一空白。

还有,近卫文麿从很久以前起就持有明确国际政治观,在重大时期三度出任首相,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通向太平洋战争道路的契机之一,就潜存在近卫的独特的个性之中。重新考察这位政治家的思想与决策过程的关联,将从另一个侧面揭示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的外交潮流。

二 日中战争的爆发和走向打破现状的过程

1 日中战争和“国际正义”

近卫组阁后鼓吹的“国际正义”,将重点放在为日本至建立满洲国时为止的大陆政策的辩解上,而不是积极而直接地指向殖民地再分割。

^① 关于近卫文麿的对外认识,见拙著《近卫文麿形象的再探讨》,载近代外交史研究会编《变动时期的日本外交和军事》一书,原书房,1987年,第97—115页。

^② 主要著作有:三轮公忠的《东亚新秩序宣言》和《“大东亚共荣圈”设想的断层》;三轮公忠编《关于太平洋战争前夜的再思考》,创世纪出版社,1961年,第195—231页。

在日中战争爆发后召开的第71届日本帝国议会上,近卫在施政方针演说中强调了这一点。^① 当有的议员质问“国际正义”的具体含义时,近卫说:不达到领土和资源再分割这一步,就不是彻底的,但是今日提出这种主张则是“幻想”。不过至少要对“人和物的移动自由”这个可能实现的问题提出要求,这是第二步的办法。他说:日本政府目前正在国际联盟原料调查委员会上提出这样的主张。^②

此外,在帝国议会召开的同一天(7月27日),近卫在广播中说:“对外举出东亚安定力量的成就,就是对世界和平贡献负有的重大使命”,强调(日本)作为日中战争中亚洲盟主的责任。在8月15日帝国政府声明中暗示形成东亚集团新的政治目标,说:“除取得日、满、华三国间的融洽合作的成就以外,没有其它意图。”^③

9月11日,他在日比谷公会堂的演说中鼓吹以下主张:

世界如此不安定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在于实质上的国际正义还没有充分实现。

对于日本的行动,有认识肤浅者或许会曲解为别有用心,然而在世界历史的主流中日本的行动本质上却是真正主张国际正义的。^④

日本过去一贯认为,日中战争是针对中国的抗日运动而采取

① 社会问题资料研究会编《帝国议会志》,东洋文化社,1977年,第30卷,第295-296页。

② 例如,近卫于7月28日对安藤正纯的答辩,同上书,第320页。1936年前后起,为了对付德、意对外侵略,殖民地再分割成为世界性的话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际联盟成立了原料调查委员会。详见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编《国际联盟的原料委员会和我国的立场》,载《周报》,1936年6月16日,第35号,第20-28页。

③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62年,第370页。

④ 近卫文麿:《帝国的决心与国民的觉悟》,载《中国》,1937年10月号,第6-7页。

的自卫行动。但是,近卫把它扩大了,认为它是实现“国际正义”的军事行动,从而首次把日中战争同“国际正义”结合在一起。当时担任内阁秘书长的风见章也在杂志上发表了同样的见解。^①

10月6日,外务省情报部长河相达夫发表谈话,反驳罗斯福总统在前一日所作的“隔离演说”中称日本的行动是无法无天的侵略行为的责难。河相说:没有资源的国家打破现状的行为是基于正义的立场。日中战争属于这种战争。^②这同近卫的演说是一脉相通的。近卫在10月12日也暗地指责罗斯福的上述演说,说:“以往欧美者流乃至唯物论者所谓的侵略战争的论点实在是肤浅的、十分错误的见解。”^③

但是,当时日本国内有人对情报部长的谈话提出批评,认为日本的行为已超越自卫行动的范围,日本自己承认是侵略行为。^④外务省修正了情报部长的谈话,认为日本所采取的是自卫措施,日本没有违反任何条约。^⑤

2 近卫外交的确立

自11月3日始,在布鲁塞尔召开了讨论日中战争的九国公约会议。日本通告不参加,并在其政府声明中暗示《九国公约》无效:“帝国此次行动是针对中国方面的挑衅所采取的自卫手段,不仅不存在违反《九国公约》的问题(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且近来中国赤化势力渗透、国内情势变化等情况已使东亚局势迥然有别于《九国公约》成立之时。”^⑥

当时,日本报纸在日中战争爆发之后屡屡刊登批判《九国公

① 风见章:《向日华合作迈进》,载《中央公论》,10月号,第27—31页。

② 《中国》,1937年11月号,第230—231页。

③ 近卫在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成立会上的演说,见厚地盛茂编《近卫首相演说集》(二),1939年,第49页。

④ 东京《朝日新闻》,1937年10月9日晨刊“铁笔”栏。

⑤ 同上,1937年10月10日晚刊。

⑥ 《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第374页。

约》的社论，有的甚至提倡在东亚实行门罗主义。^①

在这种情况下，近卫在11月11日招待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的宴会上发表了重要的演说，提到：

在东亚实现对赤化威胁的完全防御、真正建立国际正义以及建设新文化的使命，将由日、满两国共同承担。当此之际，盟邦满洲帝国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分配者将日益健全地发展。^②（着重点为引者所加）

此时，近卫已经有了为确立“国际正义”、建立“东亚新秩序”的设想。这个演说的基调为一年后发表的东亚新秩序声明所继承。

接着，近卫于11月26日在火车车厢的谈话中进一步讲道：“《九国公约》会议正如所预料的那样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就闭幕了。我们日本要采取废除该公约的步骤……我国几年前就已明确表示不让欧美介入远东的问题。这是我们的前提，而且早就这么做了。”^③近卫在同一谈话中还警告：“关于（上海）租界问题，按照对方的态度也许有使用实力的必要。”对此，英国外相艾登发表强硬声明予以反驳。^④日、英关系一度紧张起来。

近卫在1938年新年之际讲了下面的话。他说，为了建设世界新秩序，必需战斗。进步的国家大概不惜同情日本的行动。但是（日本）受到了保守阵营强大的抵抗。然而，“日本只有前进”。列强也有再考虑的余地。他的结论是：“今天的日本在世界上是进步的存在。其行动的意义是世界性的。”^⑤在《周报》年初致词中，他进一步主张：“世界大战后世界和平的基调总算接受了维持现状的原

① 东京《朝日新闻》，1937年7月14、18、19日及8月4日晨刊社论等。

② 厚地前引书（二），第54页。

③ 东京《朝日新闻》，1937年11月27日晨刊。

④⑤ 东京《朝日新闻》，1937年11月27日晨刊；12月3日晨刊；1938年1月1日晨刊。

则,而今天产生了许多矛盾和对立,它将丧失机能。因此,今日建设适应现实新时代的和平组织的任务自然就落到我们进步的国民的肩上。”^①

以上表明近卫以日中战争为契机,不惜打破现状而建设新秩序。

近卫在第73届帝国议会上说:“帝国外交应着眼于确保东亚安定势力的地位。所谓追随欧美,作为今后帝国外交的方针,必须断然予以排斥。”^②另一方面,他也主张尊重列强在中国的权益,强调对列强开放中国的门户,而对事关给第三国以无谓的刺激和制造新的敌人的言行则必须慎之又慎。^③近卫还说:“对于国民政府背后的势力,在理论上要考虑。当然,可以考虑。但是,在中国的势力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第三国的想法也可能改变。我们可以促使它改变,也许这就是日本的外交吧……因此,必须避免那种轻率地认为不打倒英国就不可能解决中国问题的想法。”^④就是说,日中战争导致亚洲新格局的出现;由于日本的胜利,列强也会改变认识而加以承认,所以必须避免同英、美直接对立。

3 近卫与广田外相

外务省与近卫的对立反映在对华政策上。在国际政治观上,从外务省修正河相情报部长的谈话也能看出两者的构想是不同的。

国际政治观的差异肯定影响到广田弘毅外相与近卫之间的关

① 《周报》,1938年1月5日,第64期,第14页。

② 在1938年2月3日第73届帝国议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的答辩,载《第73届帝国议会众议院委员会会议录(速记)》(国立图书馆法令议会资料室藏)。

③ 在1938年1月24日第73届帝国议会贵族院会议上的答辩,载社会问题资料研究会编《帝国议会志》,东洋文化社,1978年,第32卷,第257页。

④ 1938年1月18日关于时局的谈话,载东京《朝日新闻》,1938年1月19日晨刊。

系。广田外相继承前外相佐藤尚武的日、英协调的方针,^①改变了过去仅限于日、中两国解决日、中间问题的方针,企图通过日本驻英大使吉田茂用日、英交涉来调整日、中邦交。他在日中战争爆发后也多次主张通过英国进行调解。^②而近卫则鼓吹“国际正义”,对此始终是消极的。^③

此外,广田外相于8月13日就1937年7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的关于以不采用武力、遵守条约为内容的美国国际政策的基本原则的声明作出了回答,对赫尔所说诸原则表示赞赏。^④他告诫主张废除《九国公约》的近卫:“如果日本现在提出废除(《九国公约》),列强可能产生误解,认为中国事变使日本感到《九国公约》对他们不甚方便,因而现在提出废除。”^⑤

广田外相针对近卫和内相末次信正所强调的纠正第三国的认识和英国的反省等意见,^⑥在第73届帝国议会施政方针演说中指出:“对英关系将来也要努力保持友好关系”,把日、英协调置于重点位置上,这种主张被评论为“协和万邦”的外交,^⑦从而博得了英、美的好感。这同近卫在火车车厢谈话中就(上海)租界问题对英国进行责难的态度恰好形成对照。广田外相担心日、英关系恶化,因此通过吉田大使表示今后将加强日、英关系,并且通告英国,说即使日本在战局中取得进展,也没有侵害英国利益的意向。^⑧但是,在日本国内,广田外相的这种姿态,被批评为对非常时局缺乏相应的力量 and 气魄。^⑨

① 细谷千博:《日本的英国观与战时的东亚》,载细谷千博编《日英关系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第19—21页。白井胜美:《佐藤外交与日中关系》,载入江昭等编《战时的日本外交》,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第259—262页。

② 《广田弘毅》,中央公论社,1966年,第256—257、296—298页。

③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1),三铃书房,1973年,第328页以及1938年5月10日近卫的时局谈话,载东京《朝日新闻》,1938年5月16日晨刊。

④⑤ 东京《朝日新闻》,1937年8月16日、1937年11月1日晨刊。

⑥⑦ 东京《朝日新闻》,1938年1月25日晚刊;1938年2月14日晨刊。

⑧ 1938年2月1日原田熊雄述:《西园寺公与政局》,1951年,第6卷,第220页。

⑨ 东京《朝日新闻》,1938年5月10日晨刊社论。

因此,山浦贯一评论说:“他(指广田。——引者)是同重臣集团合拍的维持现状的亲英派外交家,在今天的时局中往往有挺不起胸膛的倾向。而近卫则决心把脚踏上所谓革新、所谓打破现状的方向。”山浦认为这是广田外相辞职的原因。^①

近卫在组阁时本来希望外相一职由鼓吹打破现状的永井柳太郎担任,但限于内大臣汤浅仓平的意向而任命了广田。^②可见当初两人之间就存在隔阂。

广田在辞职时对原田熊雄*说:“关于新大臣的人选,无论是在对华问题上还是在其他任何问题上,最为重要的还是以能得到英、美信任为好。”^③

关于建设新秩序和同英、美协调这两大对立的方针,近卫并非企图直接打倒英、美或者刺激它们,但他把重点放在建设新秩序上,而广田则强调同英、美协调。

三 东亚新秩序声明和近卫

1 近卫和宇垣外交

内阁改组于1938年5至6月间进行,宇垣一成就任外相,板垣征四郎就任陆相。两人在6月17日最初的五相会议**上就暴露了在国际政治观上的对立。

板垣陆相作了《关于指导中国事变的声明》,其中有如下的话:

① 山浦贯一:《近卫时代的人物》,高山书院,1940年,第35页。

② 原田前引书,第3页;木户幸一日记研究会编《木户幸一日记》,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上卷,第567页等。

* 原田熊雄是西园寺公望元老的书长。——译者

③ 原田前引书,第46—47页。

** 首、陆、海、外、藏相与会。——译者

此次事变事实上是打倒欧美在华势力的开端,在处理当前事变上没有仰第三国鼻息的必要。但是应该避免持过早地同它们惹起事端的态度,就是说,要通过采取强有力而明快的断然行动处理事变,使它们事实上理解我国的对华政策,不得不为保持本身的既得权益而自动采取支持我们的态度。^①

板垣就这样暗示要朝着打倒英、美势力的方向扩大战局。

针对板垣陆相这一声明,宇垣外相企图表明他的调整日、英关系的态度。宇垣就任外相之前曾批评过末次内相的排英论,^②就任外相之后他在日记上写道:

为了收拾对华时局,尤其有必要调整同英、美、俄的邦交,而且应该把考虑调整对英关系作为收拾时局的先决条件。^③

在6月1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宇垣外相表明了自己的见解,他说:“总而言之,可以断然地讲,帝国与列强之间的友好关系在逐渐增进,而增进同列强的友好关系是我经常的愿望。”^④

在6月24日的五相会议上决定《今后指导中国事变的方针》,其内容是:日中战争由日、中两国直接解决而达到战争的目的,并接受第三国的居间调停。^⑤从此内容可以看出是相互矛盾的。可以说,这个文件是板垣陆相的根本解决的意向与宇垣外相的妥协解决的意向相妥协的产物。

按照这一方针,宇垣外相从7月下旬开始就与英国驻日大使

① 稻叶正夫等编《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资料篇),1963年,第263页。

② ③ 角田顺校订《宇垣一成日记》(2),三铃书房,1970年,第1212、1241页。

④ 东京《朝日新闻》,1938年6月18日晨刊。

⑤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资料篇),第263页。

克莱琪举行会谈。宇垣外相就此事在五相会议上说：“根据尊重第三国权益的既定方针，以不妨碍作战和其它关系为限度考虑英国的主张”，^① 表明暗示让步的态度。

人们期待宇垣外相改变广田前外相的“追随外交”而向“自主外交”迈进，但宇垣的态度表明他沿袭了广田的前外交方针。近卫的立场不如说接近板垣陆相，而同宇垣外相是有距离的。

近卫在7月6日中国事变一周年之际发表了以下内容的谈话：

战争的进展刺激了英国人的神经，他们的心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日本稍有胜负，他们的态度就有所变化。因此，只要日本坚定决心和将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第三国人的想法也将会继续发生变化。^②

就是说，以较前更为强硬的论调要求第三国纠正认识。可以看出，近卫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是：如果第三国不表示反省，就有压迫其在华势力的可能。

8月25日，外务省东亚第一课拟出《对于陆军有关时局外交的希望的意见书》，指出“为促使列强持支持帝国的态度”，“仅仅从日本的立场出发而设计国策第一主义”是行不通的，日本方面也有进而妥协的必要，从而批评了上述板垣陆相的说明所反映的陆军方面的希望。^③ 可以认为，这也是对近卫的态度的批评。

9月19日，宇垣外相在对英交涉一无所获情况下，以（成立）兴亚院问题为由提出辞职。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我国战时的政策有明确起来的必要，而且必须使英、美能够理解。……”

① 东京《朝日新闻》，1938年7月30日晨刊。

② 《中国》，1938年8月号，第199页。

③ 《有关中国事变文件》，第30卷（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我相信,无论如何,在收拾战局以及战后的经营问题上都必须善于利用英、美,并要取得十二分的战果。这是帝国应该采取的明智态度。至于对华机构的争执问题则是由此产生的。”^① 宇垣以兴亚院问题为由提出辞职,是由于他同近卫、板垣陆相之间在对英、美关系上存在矛盾。

宇垣辞职后,由近卫本人兼任外相的近卫内阁在对英谈判上的热情迅速冷却下来。10月14日,近卫内阁以列强通过国际联盟继续支持中国为由发表声明,终止同国际联盟之间的合作关系。

10月21日,内阁会议通过《关于处理时局的问题》。^②文件规定:“为了尽早消除中国依赖英、美的弊害,以便建立以日、满、华合作为轴心的新的东亚和平机构”,“当然要排除第三国在前途设置一切障碍的干涉”。这就是该文件的核心。从这一核心发展到发表东亚新秩序声明。

2 东亚新秩序声明

11月3日,近卫内阁发表《东亚新秩序声明》。^③它是日中战争爆发以来的声明,集中表明了日本的国际政治观;它以世界为对象,使各国“正确认识日本的意图,毫不怀疑而且相信要适应东亚新形势”。其中除色彩浓厚的“亚细亚主义”外没有任何新的东西。^④ 据风见章回忆,早在一年以前就已经首次使用“东亚新秩序”的字眼了。

当日的广播对“东亚新秩序”作了详细而具体的描述:^⑤

第一,确立以“国际主义”为根据的“新和平体制”;

第二,我们认为:“在东亚相互为邻的日本、满洲、中国三大国

① 《宇垣一成日记》(2),第1243—1244页。

② 《近卫文磨公有关中国事变资料》(阳明文库藏)

③ 《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第400—401页。

④ 风见章:《近卫内阁》,日本出版协同社,1951年,第167页。

⑤ 厚地前引书(二),第44—46页。

充分发挥各自的特性,在保全东亚的共同使命下建立牢固的结合关系正是历史的必然。”

以这两点为基调,企图“联合东亚各国,建设真正站在道义的基础上的自主而又共同一致的新组织”。

广播里所说的东亚新秩序声明草案是由与近卫在思想上共鸣的中山优^①撰写的,而东亚新秩序的构想是中山一贯的主张。^②

关于确立“新和平体制”问题,中山说:“在这个声明里使用“新秩序”的措词是因为前年近卫公爵访美时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任威尔逊总统顾问的豪斯上校的启发,豪斯说:“如果日本否定华盛顿会议的体制,那必须提出一个能够使我们接受的新秩序来。”近卫本人也曾暗示在访美时受到豪斯言论的启发。^③

关于在“亚细亚主义”基础上的一致性,近卫早就有这个潜在意识。为了不刺激英、美,在论述国际政治的论文中曾有所抑制。此外,中山优还说:“在全世界几乎都要归白人支配的西洋势力的东渐波涛直到最后关头会被日本东海的蜻蜓州的边岸所阻挡。这是开端。尔后近百年的历史虽然缓慢,但日本抬头了。”^④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强烈的“亚细亚主义”的主张以前就已提出来了。近卫之所以把演说稿的起草工作委托给中山,不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吗?中山同近卫一道都担任了以亚洲民族的团结和独立为纲领的“亚细亚协会”理事,而内相末次、陆相板垣也是这个协会的有关人士,这一点是引人注目的。

就这样,近卫第一次向欧美各国正式表述了“亚细亚主义”理论,向欧美阐释了东亚新秩序的正当性。同时,日本以“汪精卫工

① 风见前引书,第175页。关于近卫与中山优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山本人,前引三轮论文叙述得甚为详尽。

② 中山优:《中山优选集》,中山优选集刊行委员会,1972年,第279—280页。

③ 近卫文鹰:《东亚问题的解决和保障和平的基础》,载《中国》,1936年1月号,第111页。

④ 中山优:《日本就这样走》,载《中国》,1937年9月号,第22页。

作”相配合,从更高的立场来解释日中战争,打算把日、中之间的对立说成是亚洲同欧美的对立。

上述东亚新秩序的构想,正如堀场一雄所说:“建设东亚秩序是战争指导当局的语言。作为日、中关系新建设的中心思想,可以看作是重建东方道义文化,也可能是(近卫)政府为当时西欧的德、意着想。果然,东亚新秩序的实现国际上引起了反响。”^① 这表明,近卫反映了推行“汪精卫工作”的参谋本部的意向。

此外,人们称之为近卫文麿的智囊团的昭和研究会也于9月30日拟定《中国事变对策的草案(汉口作战结束前后)》,^② 要求在攻下汉口的时机发表声明,向中国和世界呼吁复兴东亚。

不难想象,这些活动与东亚新秩序声明是有关联的。

12月1日,近卫在枢密院答辩时说,^③ 他认为,日、满、华共同建设新秩序之时就是(中国)事变结束之日。这表明,建设东亚新秩序就是终结日中战争的目标。

3 有田外交的展开

宇垣外相辞职后,外相一职暂时由近卫首相兼任。鉴于上次的失败,近卫想慎重加以权衡。以能够在五相会议上“实现协调的人物”为标准,起用有田八郎为外相。以前,有田就积极持打破现状的立场。^④ 东京《朝日新闻》也在社论中评论有田外交“着眼于日、英间的根本问题,即促使英国改变对远东的认识。关于这一点,可以认为日本政府对英国将采取强硬的方针”。

11月18日,有田外相正式暗示否认华盛顿体制。他说:“当今天东亚大地出现新形势之际,仍然以适用于事变以前事态的观念

① 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原书房,1973年,第207—208页。

② 白井胜美等编《现代史资料》,三铃书房,1964年,第9卷,第543—546页。

③ 枢密院委员会编,国立公文书馆藏。

④ 有田八郎:《围绕防共轴心的世界外交》,载《现代》,1938年5月号,第2—13页。

乃至原则来处理现在和今后的事态,不仅不能解决当前任何问题,而且决不可能在东亚确立持久和平。”^① 这同大约一年前近卫在火车车厢的谈话大体上是一致的。

再就是,有田外相在12月19日的外国记者招待会上声明:“将来第三国在中国从事经济活动时必须受新体制下相结合的(日、满、华)三国自主形成的国防上和经济上的必要的限制,而且决不能附带政治上的特权。”这再次断定《九国公约》是旧时代遗留下来的东西。^②

过去,近卫内阁为避免不必要的刺激,一再声明尊重第三国的权益,这一回却首次正式暗示(日本)将朝着限制列强(实际上是指英国)在华权益和势力的方向迈进。有田外相提出:“在建设东亚新秩序阶段,不应采取同英、美摩擦而导致关系紧张的态度,而应采取尽可能调整的方针。即使英、美暂时采取牵制或者压迫日本的态度,帝国也将坚持既定方针而决不动摇。”^③ 这不能不说是改变了以前广田、宇垣的外交方针。

近卫也在1939年新年之际说:“把东亚各国从现今日本登台以前束缚东亚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东亚文化融和的任务已落到现代日本国民的肩上。”^④ 他这样讲不是没有根据的。

促使近卫内阁着眼于推行把欧美势力从亚洲排除出去的方针的,就是昭和研究会。日中战争爆发之后,昭和研究会决定“促使驱逐英国在东方的势力”,^⑤ 它在1938年6月拟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的一般方针和目标》(草案)。草案认为,虽然当前要尊重英国在华中、华南的权益,但是“日本的世界政策的最终大目标却在于使大英帝国退出东亚”。在这一方针下,他们提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的

① 《美国大使关于保障美国在华权益的建议及答复》,载《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第399页。

②③ 东京《朝日新闻》,1938年12月20、21日晨刊。

④ 厚地前引书(二),第47页。

⑤ 酒井三郎:《昭和研究会》,TBS不列颠出版社,1979年,第75页。

提议。^①

四 加强防共协定问题

1936年11月签订了日、德防共协定,防御对象是苏联以至共产国际。日本当事者强调它不是反英、美协定,期待英国参加。^②

当意大利提出签订同样协定的请求时,第一届近卫内阁的广田外相担心这会刺激英国,认为日本应当将调整日、英邦交置于优先地位,因而对意大利的请求持消极态度。

此后日中战争爆发,日、英间调整邦交发生困难,意大利再次表示强烈的愿望,日、德、意遂于1937年11月签订防共协定。当时,意大利与日、德不同,没有受到苏联的直接威胁,但由于吞并埃塞俄比亚等问题而加深了同英国的对峙。再者,日、英关系也因许阁森事件*等问题而趋于恶化,尽管这一协定就条文而言是针对苏联的,但事实上也是针对英国的,一般称之为“没有资源的国家的联合”。^③因此可以说,(日、德、意)防共协定与一年前的日、德协定在性质上发生了变化。

近卫在祝贺日、德、意防共协定签订的宴会上说:“现在,整个世界在旧时代的和平基调——维持现状的原则方面产生许多矛盾和对立。此时此刻,以解除世界苦恼根源之一为目的而联合在一起的意、德、日三国,为实现国际均势和建设真正的和平建立了相互合作关系。”^④近卫的讲话给防共协定增添了树立“国际正义”的新含义。

① 大久保达正等编《昭和社会经济史料集成》,岩南堂书店,1983年,第6卷,第76页。

② 有田八郎:《看破红尘》,讲谈社,1984年,第281—282页。

* 许阁森为英国驻华大使。1937年8月26日,许阁森在乘车从南京到上海途中遭到日本飞机扫射而负伤,是为许阁森事件。一度引起日英关系紧张。——译者

③ 《东洋经济新报》,1937年11月3日社论,第10—11页。

④ 厚地前引书(二),第55页;另见在德国驻日大使馆的演说,第95—96页。

近卫本人在签订日、德防共协定时,就表示赞成^① 期待“没有资源的国家”“能建立同盟”,认为“无法容忍英、美控制全世界”。而且他还在1937年4月15日的“化装聚会”上打扮成希特勒,这反映他憧憬当希特勒的一面。^②

进入1938年,德国因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而处于严重孤立的境地;日、英关系也因援华和权益问题而大大恶化了。在这种情况下,陆军和外务省的一部分人想打开日中战争长期化的局面,主张加紧同德、意建立轴心关系。五相会议决定付诸具体行动。^③

6月16日,板垣陆相在五相会议上作了《关于指导中国事变的说明》,^④ 称:在外交方面,与其同英国协调,不如把重点放在加强同德、意的轴心关系上面。

7月19日的五相会议决定“在加强日、德、意防共协定的方针之下加以研究”;与此同时,采取以下方针:“加强对‘苏’的威慑力以及对英国的牵制力。对德国,发展防共协定精神,并引向建立对‘苏’的军事同盟;对意大利,主要是利用它来牵制英国,与之签订秘密协定。”^⑤ 这一方针同陆军于7月3日拟定的《陆军关于时局、外交的希望》^⑥中加强轴心的要点完全一致,可以认为是板垣陆相的提案。

8月26日,五相会议审议德国方面提出的条约草案,认可了写有“加强对共产主义破坏的防御”的前言以及将对象仅限定为苏联的修正案,草案规定“以防御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破坏工作为主要

① 关于近卫回答美国通讯社的采访,见近卫文麿:《清谈录》,千仓书房,1936年,第273—274页。

② 平泉澄:《日本的悲剧和理想》,原书房,1977年,第43页。

③ 关于加强防共协定问题的详细经过,参见《大畑笃四郎》:《日德意防共协定与加强问题》,载《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朝日新闻社,1936年,第5卷。

④ 前引书(资料篇),第262—263页。

⑤⑥ 角田顺编《现代史资料》,三铃书房,1963年,第10卷,第173页。

目标,而并非以英、美为正面的敌人”。^①(着重点为引者所加)可以看出,关于对象国的规定并不太明确。其原因在于,海军首脑部、外务省虽然同意牵制英国,但在具体实施阶段则重视英、美关系而将对象仅仅限定为苏联。他们与陆军、外务省内一部分革新行政官员所主张的将英、法也列为加强防共协定对象的想法相对立。因此可以说,这是对立双方相妥协的产物。

那么,对立的双方是怎样认识加强防共协定和国际形势的呢?

前者,特别是海相米内光政和海军次官山本五十六的态度是明确的。他们认为,日本不会成为民主主义国家,也不可能成为独裁国家,对两个国家群不得不采取不同的立场,因此至少必须继续保持同两者合作、友好的关系。他们从这一认识出发,认为在日中战争问题上虽同德、意达成了谅解,但把英、美放在一起而置于敌对地位,是不会有成功把握的。^②此外,他们认为存在这样的危险:“以建立世界新秩序为目标而同德国联合起来的做法必然会导致破坏英、美的旧秩序的战争。”^③这样,美国同英国联合的可能性就很大,日本因此将面临受(美、英)经济压迫的值得忧虑的局面。因而不赞成加强防共协定。

另一方面,后者即陆军与外务省内一部分革新行政官员认为:鉴于“日、德、意防共协定的内容与它所具有的‘打破现状’的巨大的世界性意义相比较,显得太抽象,迟早需要以什么形式予以加强”。^④于是,从“打破现状”的立场出发,“迫使英国抛弃亲蒋援华政策”,^⑤企图以加强防共协定的国际政治压力来促使英国改变政

① 外务省欧亚局第二课:《加强防共轴心问题经过备忘录》,载《现代史资料》,第10卷,第168页。

② 绪方竹虎:《一个军人的生涯——回忆米内光政》,文艺春秋新社,1955年,第41页。

③ 福留繁:《海军的反省》,日本出版协同社,1951年,第61页。

④ 外务省一部分少壮事务官:《关于日德意三国加强合作》,载《现代史资料》,第10卷,第345页。

⑤ 《陆军对于时局外交的希望》,载《现代史资料》,第9卷,第263页。

策。但是并不打算直接使用武力,而是通过加强防共协定使“日、德、意完全掌握世界外交的指导权,任何国家都无须通过战争,一步一步地实现其主张。因此,本同盟在最近的将来不会使日本卷入战争”。^①这样,如果日本毅然采取强硬的态度对付英国,英国就会妥协。一旦英、美关系变得冷淡,美国就会坚持孤立政策而维持其中立态度,这样便可诱使其亲日。他们就是这样对形势作出乐观的判断的。

昭和研究会还在1938年6月拟定的《处理中国事变的一般方针及目标》(草案)^②中声称:通过加强防共协定牵制英国,迫使其撤出东亚,这是日本的最终目标。

如上所述,围绕加强防共协定的对立的内幕表明,在国际政治观和对形势的判断上存在着分歧。

从8月下旬在到9月,近卫对日本新任驻意大使白鸟敏夫讲过下面的话:

(1)“关于外交问题,海军首脑会的消极态度实在令人头痛。核心人物,我想是山本(五十六。——引者),但不可能是山本一个人的意思。我看松平(宫内大臣松平恒雄。——引者)时常依赖美国。”这表明加强轴心合作的意向。^③但是,当原田熊雄问近卫是否讲过这话时,近卫却予以否定。^④

(2)关于缔结三国军事同盟,我不赞成。但是,如果日本表示愿同德、意牢牢地团结在一起,受到刺激的英、美会大幅度地改变其亚洲政策,对日也许会采取姑

① 外务省一部分少壮事务官:《意见书》,载《现代史资料》,第10卷,第343页。

② 《昭和社会经济史料集成》,第6卷,第76页。

③ 《高木史料·政界各种情报》,1938年9月10日(防卫研究所图书馆藏)

④ 原田熊雄:《西园寺公与政局》,岩波书店,1952年,第7卷,第113—114页。

息的态度。^①

(3)白鸟敏夫后来对别人说：“不，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因为日本国内对三国同盟案非一致赞同。正如近卫首相所说的那样‘不如由德、意出面推动我们’。”^②

据本论文考察，近卫本人的国际政治观以及对防共协定的态度接近陆军和外务省内革新派，此外，近卫不顾天皇、元老和外务省的反对，^③积极地认可让加强防共协定的推进论者白鸟敏夫和大岛浩分别担任驻意大使和驻德大使的新人事任命。^④就这一点而言，近卫上述一系列发言可以认为是接近真实的。^⑤至于对原田熊雄否定加强防共协定的发言，则应认为是考虑到强烈表示反对加强防共协定意向的天皇、元老而作出的辩解。^⑥正如海军所观察的那样，近卫对白鸟的发言是近卫对思想上接近而又亲密的白鸟“不留神”而“吐露”了真情。^⑦关于第三点，尽管户部良一先生说是“白鸟之流的夸张”，^⑧但是，近卫本人有向第三者表明自己见解的行动特点，因此可以说，近卫考虑到日本国内以海军为核心的消极气氛，想通过任命大岛浩为新任驻德大使来引导日本国内朝着加

① 户部良一：《白鸟敏夫和“皇道外交”》，防卫大学纪要，1980年，第40号，第101页。

② 白鸟敏夫对日本驻意使馆有末精三的发言，见板垣征四郎刊行会编《板垣征四郎秘录》，芙蓉书房，1972年，第232页；另见《有末精三回忆录》，芙蓉书房，1974年，第469页。

③ 原田前引书，第7卷，第64、285页。

④ 重光葵：《重光葵著作集(1)昭和之动乱》，原书房，1975年，第51、56页；上村伸一：《走向破灭的道路》，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65年，第95页。外务省这些有关人事说，关于新人事，近卫负有重大责任。

⑤ 近卫和白鸟在思想上也有共鸣。近卫以前就曾推荐白鸟任外务次官，说明近卫瞩目于他。山浦贯一：《近卫周围的变迁》，载《改造》，1938年11月号，第118页；原田前引书，第7卷，第13—14、143—144页。

⑥ 田村实：《太平洋战争和日本军部》，山川出版社，1983年，第237—238页。

⑦ 《高木史料·政界各种情报》，1938年5月10日。

⑧ 户部前引文，第101页。

强防共协定的方向前进。^①

综观上述,近卫对加强防共协定问题的立场是:为了牵制英、美,促使它们改变亚洲政策而赞成加强防共协定。他对海军从重视英、美关系的观点出发企图把(防共协定)对象限定为苏联的消极态度表示不满;但他对德国以及日本陆军所提倡的完全的军事同盟又感到踌躇。从这个角度看,石井菊次郎所认为的当时与近卫立场接近的白鸟敏夫并不是“完全的三国同盟论者”的看法,^②是值得注意的。

9月15日,近卫在火车车厢的谈话中说,关于加强防共轴心问题,政府内部意见一致。目前正就其范围、限度进行研究。^③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立即发出警告,说加强防共协定是针对英国的“没有资源的国家”的同盟。^④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加强防共协定就意味着把矛头指向英国。

其后,由于8月26日五相会议没有作出明确的决定,外务省方面的解释是以苏联一国为对象;而陆军则解释为主要以苏联为对象,不把英、美排除在外,并向其派出机构发出训令。围绕修正方案,陆军和外务省之间产生了分歧。

在11月11日的五相会议上,接替宇垣的有田新外相提出如下基本方针:“本协定以对付苏联为主,英、法等国在与苏联共同行动情况下,也将成为防御对象,而非单单以英、法等国为对象。”这个方针得到全体与会者的同意。

但是,收到这个协定通知的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对它与8月26日五相会议的决定不同表示强烈抗议。板垣陆相改变了主意,

① 作为例证,参见新名丈夫编《海军战争探讨会议记录》,每日新闻社,1976年,第71—72页;小川平吉文书研究会前引书,第434页。

② 户部前引论文,第101页。

③ 东京《朝日新闻》,1938年9月16日晨刊。

④ 9月19日、10月3日克莱琪对堀内谦介外务次官的警告和11月1日克莱琪对近卫的警告,载《现代史资料》,第10卷,第170—171页。

说并非把苏联以外的国家排除在外。在解释上存在的对立表面化了,召开五相会议因此变得困难。^①

近卫此时不站在任何一方,而是始终处于中间的立场。他对有田外相将对象限定为苏联的方针不予赞同,但对陆军所主张的签订军事同盟的意见也不能立即接受。可以说,这说明近卫陷于困惑之中。近卫之所以曾经赞成有田外相,是因为米内海相表示“如果竟然想以英国为对象的话,本人即使以解职为赌注也要加以阻止”,^②他受米内海相以下的有田外相、池田成彬藏相等主要阁僚的强烈意向所影响。确实,尽管驻德大使大岛抗议,池田藏相仍坚持一向的主张。近卫对此表示不快。^③

关于解释混乱的原因,正如内大臣汤浅所评论的:“在加强防共协定问题上最大的责任者是前外相宇垣……宇垣失败的原因首先在于他在结论上常持脚踏两只船的态度”,^④五相会议决定对英牵制,同时又限定对象国是苏联。就是说,宇垣打算通过加强同德、意的轴心牵制英国,以打开日中战争的局面,^⑤但又不希望使(日本)同英、美的关系恶化,因而处于进退维谷状态。不难想象,这也适用于近卫本人,因为通过对其国际政治观的考察发现他比宇垣更加缺乏对英、美的注意。

加强防共协定问题同日中战争长期化一起,成为导致第一届近卫内阁总辞职的主要原因。这是确实的。具体地说,近卫曾考虑也将英、美列为对象,所以对宇垣外相在五相会议上的不明确的态度听之任之;由于有田新外相追究,这一点才明确起来,但又出现板垣陆相与有田外相、米内海相等主要阁僚间的对立。结果他陷入

① 有田八郎:《人家说是傻瓜》,光和堂,1959年,第92页。

② 绪方前引书,第43页。

③ 河野恒吉:《日本历史的最黑点》(前篇),时事通讯社,1963年,第404页。

④ 原田前引书,第7卷,第285页以及原田熊雄:《西园寺公与政局》,岩波书店,1952年,第8卷,第10页。

⑤ 宇垣从就任外相时起就对加强防共协定积极表示赞成,见东京《朝日新闻》,1938年6月18日晨刊。

窘境。只要近卫积极支持后者的立场,问题即可解决,但是,同有田外相等人见解不同的近卫,没有自行作出决断而选择了辞职的道路。

在总辞职前,天皇对待从武官长宇佐美兴屋说:“近卫总理辞职这样困难,不如不要挽留他……代之以把对象仅限于苏联的纯粹的防共协定,如何?”^①与其说辞职是近卫本人的意向,不如说是天皇的意向。

事实上,近卫在第二次组阁之前曾委托矢部贞治起草以下宗旨的奏章:

在奉接继任的圣旨之际,……对同英、美协调的三条圣旨已予注意。如果自己接受继任之大命,恐将有同样的指示。……如有同样的指示,我将难以接受。从目前的国际形势看,鉴于英、美的态度,也为了同英、美谈判,在某种程度上有同德、意加强关系的必要,请皇上允准。^②

与其说这是近卫的真心话,不如说天皇和近卫在防共协定的想法上是有相当距离的。

五 结束语

在日中战争爆发之际,是通过调整日、英邦交来解决中国问题还是按“国策第一主义”选择实力手段来解决?处在这样的岔路上和站在“国际正义”的立场上的近卫采取了后一种方针,撤换了持前一种见解的广田、宇垣两位外相,直到发表建立东亚新秩序声

① 原田前引书,第7卷,第280页。

② 矢部贞治:《具有皇室血统的近卫文麿》,《文艺春秋特辑 天皇白皮书》,1956年10月,第188页。

明。当时的东京《朝日新闻》评论：实现了“从广田、宇垣外交即所谓‘协和外交’到有田外交即‘兴亚外交’这样一个重大的转变”。^① 由于推行破坏现状的外交，同英、美对立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对此任何人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另一方面，围绕加强防共协定的对立，就是指“通过同欧洲新兴势力结合将自主的操纵东亚的经验（原文如此）断然推行于东亚，从而与不摆脱依赖英、美旧势力境地之间的对立，乃至革新思想与维持现状思想之间的对立”。^②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打破现状”和对英、美关系的论点以及东亚新秩序的构想是表里一致的关系。

据近卫的秘书牛场友彦说：希望加强防共协定的近卫“面临意想不到的日本外交政策根本未定的局面，日本政治处于重要关头”。^③ 日本从日、英同盟和华盛顿体制以来，一直同英、美保持协调关系，完全打破因袭而转到日、德、意三国同盟轨道上来，这在1938年阶段尚有若干犹豫。但是，两年之后的第二届近卫内阁却签订了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通过这一着，日本外交完成了彻底的转变。

译自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国际政治》，第91期《从日中战争到日美英战争》，1989年5月。

林卫平译 肖 苏校

（责任编辑：丁如筠）

① 《事变第二年·回顾足迹》，东京《朝日新闻》，1938年12月26日晨刊。

② 《日德意三国协定问题的经纬》，载《现代史资料》，第10卷，第361页。

③ 牛场友彦：《第一届近卫内阁总辞职的经纬》，见矢次一夫：《昭和动乱时我的历史》，经济往来社，1971年，上卷，第528页。

介绍俄罗斯学者的两篇论文

薛衔天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当时为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于1991年签订的两所合作协议中有一项合作内容,即两所轮流举办以两所学者为主的中俄双边学术讨论会。随后不久,苏联解体。苏联科学院首先面临的是体制转换问题。考虑到这一具体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领导设想先由中方举办一次中苏关系史双边学术讨论会;为便于俄方学者与会,会议选在中俄边境中国某城市举行。1992年秋,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远东研究所副所长B. C. 米亚斯尼科夫访问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当时的副所长张海鹏及有关学者将上述设想告知了米亚斯尼科夫教授。米亚斯尼科夫教授表示全力支持这次会议,他本人一定争取参加。经过近一年的筹备,由近代史研究所和满洲里市共同举办的“中苏关系与中俄关系双边(中俄学者)学术讨论会”于1993年9月在满洲里市举行。会议共收到米亚斯尼科夫通讯院士等10位俄罗斯学者(均未能赴会)的论文,本文所介绍的是其中两篇。

一是P. A. 米罗维茨卡娅著《1941—1942年中国的国家体制和苏中关系问题》。P. A. 米罗维茨卡娅是历史学副博士,专攻中苏关系史,发表著作几十种,近著有《苏联在国民党战略中的地位》(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0年)等。她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俄罗斯中国学家。

《1941—1942年中国的国家体制和苏中关系问题》一文实际上是作者为满洲里学术讨论会准备的报告提纲,因此文中提出的

问题并未展开论述(作者准备在会议上作进一步的论述),但其论点和要点已经提出来了。所谓“国家体制”,即指国体而言,是国家政权的性质问题,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执掌国家政权的问题。文章指出,中国国共两党都为建立统一的新中国国家体制而斗争,但国民党所追求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平等成员的中国”;而共产党则是“发动其本国的劳动大众,为民族、民主和反帝革命的胜利而斗争”。用我们通常的用语来表述,就是国民党要建立的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新中国”,共产党要建立的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国家。但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只有建立起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最有效地抵抗外来侵略,并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两党的阶级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作者指出:“由于中国在30—40年代的特殊性,通往抗日统一战线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同苏中关系密切相联。”1941—1942年是法西斯轴心国发动世界战争最猖狂的年代;中国经历了艰难曲折、付出重大代价而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对国共两党都有重要影响的苏联在促成抗日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方面就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最为突出的例证是苏联从中调解,帮助国共两党妥善地解决了皖南事变所造成的严重局势,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直维持到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国内有的学者认为,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之后,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以及对中国的影響力已大大地削弱了,甚至起不到什么实际作用,米罗维茨卡娅教授的论文根据第一手资料修正了这一误识。这正是这篇论文的学术价值所在。我们期待着米罗维茨卡娅教授有新的论文问世,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论述。

二是Г.Н.罗曼诺娃著《30—40年代远东的苏中经济关系》。Г.Н.罗曼诺娃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历史、考古和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副博士,专攻远东中俄经济关系史,因学位论文《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远东地区俄中经济关系史》成名,

1987年出版专著《19世纪—20世纪初远东俄中经济关系》。该书已由中国学者宿丰林、厉声译成中文出版(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

《30—40年代远东的苏中经济关系》以其资料丰富见长。中俄(含中苏)经济关系史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尚属薄弱环节,近年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的由孟宪章主编的《中苏贸易史资料》和《中苏经济贸易史》,可以说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但是在这一学术领域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其中有些重要问题尚未着手研究;有些问题虽然涉及到,仍有待深入研究。例如,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经济关系,中国新疆地区与前苏联中亚地区的经济关系等问题就是需要从头做起的课题。罗曼诺娃的论文对研究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关系无疑具有参考价值。与米罗维茨卡娅的论文一样,罗曼诺娃这篇文章也是属于概述性的,文章提到的一些问题很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例如,关于苏联政府于1935年将中东铁路转售给“满洲国”的问题。且不说这种转售方式是否合法,但既已售出,就没有理由恢复原来对该路所拥有的权利。然而日本投降以后,苏联政府却根据同国民党政府订立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实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签订的)恢复了对中东铁路的原有权利。对这一历史过程究竟作何评价,我们非常希望在深入讨论中与俄罗斯学者取得共识。

(责任编辑:丁如筠)

1941—1942 年中国的国家体制 和苏中关系问题

P. A. 米罗维茨卡娅

在国内外的政治学和历史文献中,有关战争、革命、社会文明的进化过程对大国和小国、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国体所产生的影响这类全球性问题的研究,始终很薄弱。本文拟论述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以 1941—1942 年苏中关系为例说明国家体制和战争的相互影响。

我们怎样理解国家体制这一词的含义呢?国家体制就是作为国际关系主体的国家。本世纪 40 年代,中华民族和亚洲其它民族一样,面临着建立民族统一的国家、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走上文明发展道路的任务。1990 年,我们出版了专著《苏联在国民党战略中的地位》,书中强调指出: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在 20 年代民族民主革命时期,在“南京十年”时期,中国一直试图解决 20 世纪国家面临的主要战略任务——建立新中国国家体制。很清楚,对新中国的认识或者是对一个大国的现实的国家民族利益、重振和大大增强国家往日的雄壮威武精神的道路,中国各派政治领袖的看法是不同的,这主要取决于他们的政治、阶级、帮派等立场以及整个政治文化水平。国民党的首脑和领导人物(尽管国民党和中国政府领导层或高级官员对这个问题的立场、观点并不一致)认为,建立一个统一的、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一个平等成员的中国,乃是其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基本战略任务。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发动其本

国的劳动大众为民族、民主和反帝革命的胜利而斗争。但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在为新中国的国家体制、中华民族和国家的未来而进行斗争。

中国的斗争进程引起了邻国日本和苏联的注意。在 20 世纪，它们为从政治、经济上影响中国而继续角逐。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及其它一些国家的历史文献所说，30 年代日本侵略中国的目的在于阻止建立统一的国家，从本质上改变中国的现实，破坏远东力量的均衡。

文明社会逐渐地卷入了世界大战之中。在远东地区，日本侵占东北（1931 年 9 月）和开始大规模侵略中国（1937 年夏）是一个重要的阶段。中国被迫先于其它国家着手解决在战争条件下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

现在我们着重阐述 1941—1942 年这两年。那是法西斯德国强加给苏联的卫国战争爆发的年代；是当时军国主义日本强加的太平洋战争，即苏、美等世界大国被迫实际参加的战争爆发的年代。象以往一样，中国的国家、民族利益迫使中国政府在当时必须制定一个政治方针，以便保证国家建设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制止日本侵略的蔓延，并在中国的条件下结束抗日战争。

可见，在战争情况下，只有在民族统一的基础上才能组织国家力量抗敌。同时，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中国和其它国家通往民族统一的道路显然是非常艰难、曲折的。由于中国在 30—40 年代的特殊性，通往抗日统一战线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同苏中关系密切相联。早在 1931—1932 年，中国政府就设法改善同苏联的关系。正是由于苏联当局的援助，中国才度过了严峻考验时期。1933 年 4 月，中国外交部向中国驻西方各国公使发出专门指令，让他们着手同美、英、法、德、意就双方外交代表升格和互派大使问题进行接触。同月，苏联大使抵达南京，这导致苏中关系的恢复。

日本的侵略有增无已，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在维持原政治路线的情况下开始研究一个更加积极地吸引苏联投入日中战争的计

划。但重要的是，中国不能在评价苏联外交路线时犯错误。苏联是否准备给中国以实际的军事技术和其它方面的援助？中国外交人员顺利地解决的首要任务是：克服那种认为在苏联的帮助下能够在军政方面迅速发生实质性变化的错觉。在制定有关中苏关系的方针时，注意到了领土的毗邻关系。从长远来看，日本不仅对中国，而且也对苏联构成威胁。此外，中国的社会政治条件人所共知。20年代末，国内有相当大一部分领土已处于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控制之下。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即使认为苏联政府的国际政策与共产国际的宗旨未能协调一致，但否认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之间的有机联系仍是不可思议的。显然，中苏关系和苏中关系，都不能不考虑上述特殊性。

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并和日本交战。中国共产党把主要力量部署在远离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在这种情况下对苏关系的正常化是决不可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国民党代表大会和全会的决议证明，在30年代前期中国主要关注的是“国内和平”，而不是考虑抗日，也不是设法解决同中共就未来中国发展道路展开的历史性争论。然而，日军向纵深推进迫使中国当局或政权机构对战时的战略方针做出根本性的改变。至1941年，形势对中国十分有利：抗日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内战停止；苏联开始给抗日的中国军队以军事技术上的援助；苏联军事顾问在中国工作；苏联飞行员在中国领空与日军作战。

苏联的政策是否有利于巩固中国的地位？我们认为，援助中国这个国家是一项很现实的政策。然而，中国的战争在继续。中国的政策将朝着什么方向演变？在中国领导人中间出现了分裂，有关国家前途的辩论和斗争也在继续。在确定政治方针时，应考虑国家、民族的利益，以及邻国和盟国的国家利益，因为我们要研究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显而易见也要考虑同一区域国家及斗争前线盟国的国家、民族利益。

中国政府和一些舆论界人士做出很大努力争取苏联更积极地

介入日中战争,事实上中国力主苏联对日宣战。

30年代末,中国政府高级代表和苏联政府、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了一系列会谈。苏方陈述了如下观点:苏联表示同情中国,苏联将援助中国,但不可能承诺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苏联不可能在西方和东方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由于担心过早地卷入远东战争而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但这引起了中国的不满和误解(指与日本签订保持中立条约)。显然,这使苏中关系复杂化。不过,苏联能给予中国巨大帮助,而这对中华民族和解的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国共两党关系是中国的内政,但必须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发展前景出发。两党的领导人希望苏联出面调解(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下面,我们回过头来谈谈这个问题。

甚至在德国进攻苏联以后,中国依然继续力争苏联在远东参战。我们拥有的档案资料可以证实这个论点。例如,1941年7月对苏联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时刻。中国外交部长郭泰祺在同苏联驻中国大使潘友新会谈时推心置腹地说,他这个部长的任务就是尽力实现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的合作;还说苏联和中国应协同反对远东“轴心国”成员的军事行动。^①

蒋介石政府吸引苏联及早参战的明显企图之一表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伊始。1941年12月8日(误,应为1941年12月7日。——编者)珍珠港事件后,蒋介石会见了苏、美、英三国大使,请他们向其政府转达:鉴于远东受到背信弃义的进攻已是既成事实,“太平洋地区所有反帝国家必须共同采取迅速而有效的措施,以加强同共同的敌人的斗争”。斯大林在给蒋介石的回信中说:苏联同情中国,在太平洋建立反日战线以及中国的抗日战争都是反对“轴心国”的共同阵线的一个组成部分。^②

必须解放被法西斯占领的苏联领土,恢复苏联的领土完整和

^①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25,卷宗9,文献205,第15张。

^②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29,卷宗11,文献205,第37张。

国家独立,组织反击并歼灭敌人,协调所有反法西斯和反军国主义国家的力量——这一切决定了苏联在1941—1942年的政治方针。同时,中国也处于战火之中,人民饱尝战争之苦。从某些方面可以看出:把战争的结束与苏联和盟国的援助联系在一起的中国,肯定会欢迎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仅从中国的角度来分析世界大战的进程,它们就会感到失望。1942年5月,苏联大使会晤了中国著名活动家、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当时大使在谈话中显然企图让她把苏联的观点转告中国朋友,这就是:在中国,特别是中国报界,经常说苏联应对日宣战;如果不这么做,日本将会首先进犯苏联,等等。大使说:我们很清楚,日本早晚会进攻苏联,我们将不得不与日本交战,但是,苏联承受了轴心国的主要打击,单独与力量十分强大的轴心国成员作战。这是一场血战,伤亡和损失很大。我们难以承受这场大战的重负。而在中国这里,人们对这一点显然是不了解或是不想了解。中国人要我们在远东开辟第二战场,向我们求援,其实我们自己也已捉襟见肘。我们帮助过别人,而且今后也决不会拒绝属于正义的帮助,但是也希望别人理解我们,理解我们的困难和我们的看法,理解我军和我国人民所建立的前所未有的伟大功勋和英雄主义。我想,关于苏联的立场我已讲得十分透彻。

毕竟苏维埃国家在这个十分艰难复杂的关头还是帮助了抗战中的中国的。以国共两党的脆弱的民族和解为基础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处于监督之下。据我们现有的资料可以肯定地说,两党代表希望苏联调停;在统一战线的困难时刻国共两党都曾向苏联求援。苏中关系的这一方针给了中国那些关心国家以及整个反帝联盟的命运的力量以强有力的帮助。1941年上半年及其后,高层间进行了对话,苏联大使同国共两党领袖有了直接的接触。

我们有可能利用一系列资料进行研究工作。首先应该明确指出,苏联专家把中国的民族和解同苏中关系的发展联系起来。例如,蒋介石政府的首席军事顾问崔可夫于1941年1月15日在苏联驻华使馆内同周恩来、叶剑英会谈时说,蒋介石企图在1941年

年初重开内战,是因为“他明白,无论是苏联,还是英、美都不会帮助中国武装抗日”;在那个时期,为了防止苏中关系进一步恶化,苏联政府不得不就对华政策做出某些修正。

1941—1942年,抗日统一战线中屡次出现危机形势,苏联明确的立场制止冲突扩大化。人所共知的事件之一便是皖南事变。现有的资料表明,莫斯科认为事态性质非常严重,把它看成是内战再起的征兆。莫斯科高层研究了这个问题。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于1月和3月同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邵力子讨论了这件事。洛佐夫斯基坚持有利于政治解决同中共发生的磨擦的想法,并且提到:在目前国际、国内形势下,一旦中国内战再起,中国就会促使日军长驱直入。类似性质的会见在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局的负责人和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之间举行过多次。同时,苏联驻华大使同中共驻国民政府的重要代表讨论了上述问题,并且利用当时同作为中国舆论界各派代表的中共党员之间的互相谅解,请他们把莫斯科的立场转告中共中央。现援引1941年1月中旬某次会谈的资料:中方出席人员有周恩来和叶剑英,苏方有苏联大使和首席军事顾问崔可夫。当时周恩来和叶剑英说:中共中央认为,组织突袭新四军的是国民党军界要人,其中有蒋介石。大使很关注客人所讲的情况。也是这个时候即1月份,他同国民党领导人讨论过此事。在上面提到的讨论解决危机的可行方案的会晤中大使指出,无论如何,“目前日本仍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敌人”。他接着说,他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采取更积极的军事行动对付国民党,那只会使中国的内战升级,不利于中国的抗战。大使表明了他对解决危机可行办法的设想:“正如你们所说,你们已经对国民党发起了政治攻势,所以必须使之继续下去,一方面是为了恢复自己的名声,另一方面把江苏南部事件的真正肇事者揪出示众。”同时,他还说:“需要竭尽全力保全统一战线。”^①在1941年后几个月和1942年,

^①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25,卷宗8,文献200,第28张。

中国不止一次地讨论过国家统一这个问题。有资料为证：1942年5月，大使对宋庆龄的看法很感兴趣。他问道：鉴于蒋介石拟赴华盛顿参加太平洋会议，那么蒋不在国内期间，国民党内的某些人会不会趁机为所欲为，对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宋庆龄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她强调：在分析内战爆发的问题时，应该注意到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态度，他们在同蒋介石会见时首先说明现在决不是搞任何内哄和争斗的时候。大使对宋庆龄提到中国盟国的立场很感兴趣，他坚持继续同国共代表加强接触的立场。例如，这年的6月16日，在周恩来的倡议下他和潘友新举行了会谈。周恩来通知大使，按他所掌握的情况，蒋介石为督导国民党围剿共产党及其军队而去了西安。白崇禧将军也为此目的而衔命去了宁夏。潘友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中共必须制定一个应对计划。他建议延安安排有声望的代表与蒋介石会晤，如果蒋抵达西安，就可在会晤中讨论所有有争议的问题和要求。1942年，希特勒军队向苏联腹地推进，逼近伏尔加河。显然，这不能不对统一战线产生影响。周恩来说，最近7、8个月来他一直未见蒋介石的面，而且他接到延安的指示：不要去见蒋，根本不要理他。

战争，这是国家经受考验的时期。中国在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民族和解，所以它不仅成为战胜国之一，而且在世界大战末期加强和巩固了国际地位。国共领导之间以及国共领导同苏联领导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谅解，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大战期间既符合两国的利益，也巩固了中国的国家体制。

杜 华译 李玉贞校

（责任编辑：丁如筠）

30—40 年代远东的苏中经济关系

Г. Н. 罗曼诺娃

苏中关系史和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紧密相关。其最重要的方面,是苏联对这一斗争的坚决支持,它在中国的困难年代给予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本文着重探讨我国历史文献尚未充分研究的苏联对中国人民的经济援助问题、远东的苏中经济关系,以及日本占领东北前夕和占领期间该地区的经济状况。

30 年代初,东北在中国的经济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就总的发展水平看,东北的工业在中国占第二位(仅次于上海工业综合体)。东北占中国领土的 11% 强。它的农产品约占全部农产品出口的 1/4,大豆生产占 60%,铁路线占 40%,森林面积占 40%。^① 东北的人口,1929 年为 3100 万,其中辽宁省的人口达到 1500 万。^②

在东北建立军事工业,日本资本是有潜力的,因为在占领前它已在那里有了相当巩固的地位。日本在中国的大部分投资正是在此地区,投资额约为 15 亿日元。日本的投资占外国对东北投资总数的 95.6%。^③ 对中国来说,失去东北,就意味着丧失 79% 的铁产

① А. М. 列多夫斯基:(А. М. Ледовский):《美国对华政策和苏联外交(1942—1954)》(Китай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США и совет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1942—1954)),莫斯科,1985 年,第 114 页;《中国现代史》(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莫斯科,1972 年,第 141 页。

② 苏联中央国家国民经济档案馆,全宗 8002,目录 1,文献 232,第 5 张;文献 225,第 3 张。

③ А. М. 杜宾斯基:(А. М. Дубинский):《苏联在远东的解放使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中东亚和东南亚各国人民国际关系、民族解放斗争史)》(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ая мисс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из истор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орьбы Народов Восточной 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в годы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莫斯科,1966 年,第 47 页。

量、93%的石油开采量、55%的黄金开采量、23%的发电量、41%的铁路线和 37%的对外贸易。^①

日本把中国东北变成它反对中国革命势力和发动反对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国的战争的经济基地。例如,在主要的原料开采和金属生产方面,中国东北承担中国所开采的煤炭的 45%、铜——100%、铅和锌——76%、铝——100%、镁——100%,等等。^②

日本在东北扩张以前,6280.5 公里的铁路中有 29%属中东铁路,18%属南满铁路,20%属日中铁路,只有 33%纯属中国的铁路。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开始大规模的铁路建设,以期实现经济任务和战略任务。在日本占领期间修建约 5000 公里铁路,约占整个东北铁路网的 45%。^③

东北的经济由两个康采恩控制:一是“南满铁路公司”(“满铁”);二是满洲重工业公司。这些康采恩的股东是日本的国家、各垄断组织、军阀和大官僚的代表们。中国民族资本在开发东北资源上所占的比重不超过 10%。^④

南满铁路从整个东北铁路获得的利润最多。30 年来,康采恩的资本从 1906 年的两亿日元增加到 1936 年的 8 亿日元,即增加了 3 倍。康采恩的利润从 1907 年的 200 万日元增长到 1941 年的 14400 万日元。^⑤

苏中在远东的经济关系持续发展 to 日本占领东北为止。这主要指的是边境贸易,它一直延续到 1933 年,即日本完全占领东北,

① 《远东国际关系》(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第 2 卷,莫斯科,1973 年,第 86 页。

② 《中国现代史(1928—1949)》,莫斯科,1984 年,第 239 页。

③ 苏联中央国家国民经济档案馆,全宗 8002,目录 1,文献 15,第 57 张。

④ 《中国古今史》(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莫斯科,1974 年,第 384 页。

⑤ 苏联中央国家国民经济档案馆,全宗 8002,目录 1,文献 15,第 54—55 张;《17—20 世纪中国东北史》(История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го Китая XV—XX вв.),第 2 卷,《中国东北(1917—1949)》,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第 132 页。

并强行从边境地带迁走中国居民的那个时期。

1929年伯力议定书签订之后,^①远东各贸易组织——“国家进出口贸易局办事处远东分处”、“全苏粮食出口联合公司”和东北边境地区从事贸易业务的一些中国商行之间开始了贸易往来。1930年期间,国家进出口贸易局办事处远东分处在图里罗格、波尔塔夫卡村和依曼市(达利涅列琴斯克)等地开设了商务代办处。第一个商务代办处在三岔沟地区开展了贸易业务,第二个商务代办处在虎林市周围地带建立了贸易关系。这几个代办处购买了大豆,通过乌苏里铁路从富锦运往海参崴。通过全苏粮食出口联合公司驻哈尔滨办事处和几个中国银行进行基本结算。^②

应指出的是,20年代后5年到30年代初,苏联贸易额的77%到84%都来自境外的亚洲。1925至1933年,伊朗所占比重最高,约为32%;中国——20%;蒙古——14.5%。向中国出口的石油和石油产品,占全部对华出口的61.7%。^③1928年,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苏联所占比重最大,为5.4%;之后在1929年下降为3.3%,1933年又降至1.4%。^④

1933—1934年日本占领东北之后,全苏粮食出口联合公司购买大豆和豆饼运往苏联和通过海参崴转运的业务停止。因此,该联合公司设在富锦和其他沿边境各站以及后来设在哈尔滨的代表机构全都撤销了。1935年9月,领导苏联各机构在东北的业务活动的苏联商务代表处驻哈尔滨分处也关闭了。在华北和东北只剩下

① 苏联中央国家国民经济档案馆,全宗8002,目录1,文献232,第108—111张。

② М. П. 斯拉德科夫斯基(М. П. Сладковский):《苏联与中国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1974)》(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1917—1974]),莫斯科,1977,第31页。

③ А. М. 彼得罗夫(А. М. Петров):《苏联与亚洲各国的外贸联系(1918—1940)》(Внешнеторговые связи СССР со странами Азии [1918—1940]),载《亚非人民》(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1977年,第5期,第35、38页。

④ 何平音:《中国与苏联的贸易综述》,载《中国经济杂志》,1935年,第16卷,第5期,第455页。

一个苏联贸易代表机构——苏联商务代表处驻大连分处，它是苏联商务代表处驻日本的分支机构。

苏联在东北的各贸易机构关闭之后，苏联对中国东北和中国内地的出口几乎全部中止，1936年的贸易额比1929年下降了7倍多（从10980万降至1340万卢布）。向中国出口的只有中药材（鹿茸、人参等），是通过苏联商务代表处驻大连分处办理的。^①

苏联在中国进口中所占的比重也从1929年的1.5%下降到1936年的0.2%和1938年的0.6%。1934年，苏联在中国进口中排在第17位，而1935年已降到第31位。苏联在中国出口中的比重已从1929年的5.6%缩小到1936年的0.6%，1938年则为0.1%。^②

日本入侵中国伊始，苏联就坚决捍卫中国。1932年12月12日，中苏互换照会，恢复1929年因中国军阀和国民党的原因而中断的外交关系。苏联和中国恢复外关系受到日本报界的猛烈抨击，日本侵略集团在中东铁路进行了一系列的挑衅活动。^③

根据1933年2月9日签订的合同，满洲国政府把自己的全部铁路交给南满铁路管理。从而日本掌握了借以向中东铁路施加经济压力的机构。

另一方面，从法律观点看，中东铁路的地位也是相当不稳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苏联和中华民国政府以及东三省的自治政府签订的条约已经丧失了实际效力，并可能被苏联和满洲国（日本）关于共管中东铁路的条约所取代。此外，这一条约的可行性是很成问题的，这种条约在法律上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苏联不可能和它不承认其为国家的国家签订条约。

日本发起的反对中东铁路的运动，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该运

① M. И. 斯拉德科夫斯基：《苏联与中国经济贸易关系史》，第112—113、116页。

② 苏联中央国家国民经济档案馆，全宗413，目录1，文号2560，第25—27张；文献13，第44张。

③ A. M. 杜宾斯基：《苏联在远东的解放使命》，第58页。

动组织了轰动一时的和敌视中东铁路的游行示威并逮捕苏联职工。^①

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直接强占中东铁路的决定已经酝酿成熟。为了打乱日本在远东发动战争的侵略计划,苏联政府决定以出让给满洲国的方式,放弃自己对中东铁路所拥有的权利,为此曾于1933年5月2日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议。

1933年7月3日,苏联代表和满洲国代表(有日本人参加)曾就赎买中东铁路的基本原则问题召开过会议。苏联代表团提出的备忘录中有下列条件:

(1)满洲国应赎买中东铁路的全部财产(包括主线1726公里,加上辅线总长2544.9公里,还有全长2567公里的电报线路、电话及供水;民用建筑物、修配厂、机车库、电站、江河船队、森林的租让,等等)。

(2)赎买总金额为25000万金卢布(约合62500万日元),而修建铁路时的总费用相当于411691976金卢布,……还不算中东铁路开通后最初几年俄国政府用于弥补它的亏损的补贴金额(178579618金卢布);50%的赎金(12500万金卢布)应在两年内用货物偿还,3120万金卢布用现金支付,其余的在3年期限内用日本政府担保的满洲国债券偿还,年附加额为4%。^②

在满洲国赎买中东铁路的基本原则备忘录文本中强调了中东铁路的巨大国际意义——欧亚之间极为重要的交通枢纽,以及作为北满的主要干线,它把这块富饶的、具有发展前景的地区和满洲

① 苏联中央国家国民经济档案馆,全宗8002,目录1,文献15,第53张。

② 苏联中央国家国民经济档案馆,全宗8002,目录1,文献232,第112—113张;文献48a,第28张;M. И. 斯拉德科夫斯基:《经济贸易关系史》,第109—110页。

南部及海洋连接起来。近几年,中东铁路的经济状况正常。从苏中共管时起到1930年底,铁路的运营收入超过支出,为14000多万金卢布,即年平均额超过2000万金卢布。^①

满洲国代表团起初只同意支付2500万卢布(合5000万日元),即苏方要价的1/10,以购买中东铁路。苏联代表团表示不同意。经过多次谈判(有关转让铁路的谈判持续约两年),满洲国当局同意支付14000万日元(约合7000万卢布)购买中东铁路。为了维护和平,苏联政府决定做出让步,同意按所提价格出售中东铁路。1935年3月23日签订了规定支付苏联14000万日元(以供货方式)和偿付苏联铁路职工3000万日元津贴的条约。^②条约签订后,中东铁路与满洲国的国家铁路连接;之后,于1936年10月1日又与南满铁路连成一体,总管理局设在沈阳。^③

与西方大国的立场相反,苏联真诚地渴望远东和平。它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并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援中国人民。1935年5月9日,苏联提出一个通商条约草案,南京政府回避签订这一草案。南京政府甚至千方百计拖延有关苏中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直到1937年8月21日才正式签订条约。就其性质而言,该条约对正在和日本武装干涉者进行斗争的中国人民具有很大的精神上的作用,中国舆论界对此评价很高。^④

经国联提议于1937年11月召开的布鲁塞尔会议上,苏联政府是唯一支持中国关于向其提供援助和美国、英国及其它西方国家停止向日本供应军事装备的请求的政府。^⑤这是对指望在国际

① 苏联中央国家国民经济档案馆,全宗8002,目录1,文献48a,第28张。

② 苏联中央国家国民经济档案馆,全宗8002,目录1,文献48a,第32-34张;M. И. 斯拉德科夫斯基:《经济贸易关系史》,第110页。

③ 同上,全宗8002,目录1,文献15,第54张。

④ M. И. 斯拉德科夫斯基:《经济贸易关系史》第122页及《中国:历史、经济、意识形态的基本问题》(Китай: осно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и, экономики, идеологии),莫斯科,1978年,第85页。

⑤ M. И. 斯拉德科夫斯基:《中国:历史、经济、意识形态的基本问题》,第20页。

上孤立中国的日本侵略计划,以及对日本的侵略采取姑息政策的西方大国的严重打击。1938年3月,苏联就向中国提供了利息为3%、期限为5年的5000万美元贷款。同年7月又提供了一笔同等数目的贷款。

此后,美、英两国政府也向中国提供了贷款,因为它们担心不这样做会彻底损害自己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名声。在1938年这一年,美国政府向日本提供了为数12500万美元的贷款,而1939年2月,中国只从美国得到期限为5年的2500万美元贷款。英国在1939年3月向中国提供184千英镑的贷款,利息为5%。

1939年6月,苏联向中国提供第三笔贷款,数额为15000万美元。苏联提供贷款的条件优惠得多(年利率为3%,而西方的贷款年利率为4%,甚至6.5%)。而且苏联提供贷款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也不干涉中国的内政。美国和英国的贷款却是以中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进一步对它们俯首贴耳为条件的。^①

从1938年到1940年,苏联对中国的贷款约为45000万美元(这期间,美国和英国向中国提供的贷款总共才有10200万美元)。苏联的贷款是通过提供中国急需的飞机、大炮、坦克和其他种类的武器、弹药、运输工具以及低于市场价格20%的燃料来兑现的。^②这几笔贷款对中国起了重大的作用,因为它们是在中国极其困难

① Б. Г. 萨波日尼科夫(Б. Г. Сапожников):《日中战争和日本在中国的殖民政策(1937—1941)》(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ая война и колони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Японии в Китае [1937—1941]),莫斯科,1970年,第81—82页及《战火中的中国(1931—1950)》(Китай в огне войны [1931—1950]),莫斯科,1977年,第123页;А. М. 杜宾斯基:《1937—1945年日中战争时期的苏中关系》(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период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ой войны [1937—1945]),莫斯科,1980年,第80—84页。

② В. И. 阿奇卡索夫(В. И. Ачкасов)和 М. Ф. 尤里耶夫(М. Ф. Юрьев)合著《苏联在中国人民粉碎帝国主义日本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作用》(Роль СССР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й войне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разгром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Японии),载《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38年,第9期,第43—44页;М. И. 斯拉德科夫斯基:《经济贸易关系史》,第138—140页。

时期以优惠条件提供的，实际上这是进行抗日战争的唯一的补充经费。中国没有自己的外汇，它通过向苏联提供农产品和矿产来偿还贷款。在很多情况下，中国货物的价格高出世界平均价格的30%—50%。贷款的扣款一年不超过3%，偿还贷款的期限为5至13年。^①

苏联提供武器始于1937年10月31日，即苏中于1938年3月1日签订第一笔贷款协定之前。按照苏联的贷款供应的苏联军用物资，在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北部地区之前就已通过越南港口海防和云南省的铁路运送了。自1940年7月6日开始，所有供应都是经新疆省，沿着从图尔希布到兰州敷设的全长3500公里的公路线，以及阿拉木图至哈密航线运送的。1937—1941年期间，苏联提供了904架飞机、1140门大炮、9720挺机枪、2118辆汽车和拖拉机，等等。^②有3600多位苏联军事专家，包括最优秀的志愿飞行员被派往中国。军事顾问当中有天才的、后来成为著名军事将领的B. H. 崔可夫，П. С. 雷巴尔科，П. Ф. 巴季茨基，А. И. 切列帕诺夫。^③

中国历史学家也对苏联对中国抗战的巨大援助作出了评价，这一援助体现在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提供贷款、派遣军事顾问和志愿飞行员上。这些飞行员当中有100多人在同日本侵略者作战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④

1939年6月16日，苏联和中国签订了贸易条约，规定以对等原则解决贸易业务和航海方面的一切问题。根据条约的条款，每一方都在进口货物、征收关税和捐税等方面享有最惠国待遇。条约还对海轮驶入对方海港、使用那里的码头和港口设施、征收关税及捐

① 《苏联对中国的列宁主义政策》(Ленин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итая)，莫斯科，1968年，第99—100页。

② В. И. 阿奇卡索夫和 М. Ф. 尤里耶夫合著《苏联在中国人民粉碎帝国主义日本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作用》，第138—140页；М. И. 斯拉德科夫斯基：《中国与日本》(Китай и Япония)，莫斯科，1974年，第167页。

③ А. М. 列多夫斯基：《美国对华政策和苏联外交(1942—1954)》，第20页。

④ 《中国现代史(1919—1949)》，北京，1983年，第2卷，第16页。

税,提供了最惠国待遇。^① 苏中贸易条约为发展苏中贸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巩固了中国在其与其他国家关系中的地位。

日本入侵各国导致国家被肢解,因此,苏中贸易的进行取决于中国任何一个地区的具体条件。自从中东铁路转让给满洲国,以及东北停止与苏联滨海地区和后贝加尔的铁路联系之后,苏联各组织在中国东北的商务活动几乎完全停止。少量业务通过苏联商务代表处驻日本分处和大连港进行。^②

对中国人民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是,苏联参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苏联军队帮助粉碎在东北境内的关东军。

在抗日战争时期,铁道兵紧随苏军的先头部队推进,迅速控制了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中东铁路路段。除了运营业务外,还要完成大量的恢复工作,个别分队还要和小股敌人作战。^③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日本接受苏、美、英、中提出的条件。同一天,在莫斯科签订了苏中友好同盟条约。同时还签订了苏中共享中东铁路和均等地共管该铁路30年的协定;关于使用旅顺口作为共同的海军基地,并委托苏联负责保卫,时限为30年的协定;关于大连港的协定和一系列其他文件。苏联政府认为东三省是中国的一部分,并重申它尊重中国对东三省的完全的主权,承认东三省的领土和行政上的完整。^④ 1945年秋,即仅仅过去了十年,由于苏联军队在抗击日本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中东铁路就以“中长铁路”的新名称按照和中国共同拥有的原则重新归还苏联政府。^⑤

中国政府按照1945年8月14日中长铁路协议,承认中长铁

① 苏联中央国家国民经济档案馆,全宗413,目录13,文献2557,第43-49张;M. И. 斯拉德科夫斯基:《经济贸易关系史》,第133-134页。

② M. И. 斯拉德科夫斯基:《经济贸易关系史》,第145页。

③ 苏联中央国家国民经济档案馆,全宗8002,目录1,文献1,第38张。

④ 苏联中央国家国民经济档案馆,全宗8002,目录1,文献2,第4-7、19-20、21-23张;文献5,第58-60张;M. И. 斯拉德科夫斯基:《经济贸易关系史》,第158页。

⑤ 苏联中央国家国民经济档案馆,全宗8002,目录1,文献232,第114张。

路对其全部辅助企业和补充企业的权利,因为它们是在俄国管理中东铁路期间建立的。这些企业也包括松花江上的航运业;而为组织和实现松花江上的航运,曾投入 300 多万金卢布。从 1896 至 1935 年,航运业一直属于中东铁路。1935 年转让中东铁路时,日本人抢占了松花江上的所有浮动设施,其中也包括中东铁路的财产。^① 1945 年 12 月 1 日开始,松花江河运轮船公司实际上已作为中长铁路所属的独立经济组织开始运营。^②

1945 年东北各城市成立的苏中友好协会在长春、沈阳、四平街和其他城市的广大居民群众中开展工作,宣传普及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介绍苏联各族人民的生活,讲解苏军在中国的解放使命。^③

条约为扩大苏中经济合作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它对中国的整个形势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

苏联参加对日战争和苏军解放重工业最发达的中国东北地区,为整个国家的民主发展创造了相应的条件。^④

把日本占领者从中国的土地上赶走之后,苏联军队帮助中国整顿东北(其工业产量占国家的 60%以上)的经济生活。^⑤ 日本占领期间,不仅所有工业、运输业等企业的全体行政人员都是日本人,而且全部高、中级技术人员也是清一色的日本人。因此,日本人撤回日本列岛(这是中国方面的主要要求之一)以后,东北的工业、运输业和其他经济部门就全部或部分地瘫痪了。^⑥

在苏联军队帮助下被解放的东北领土上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

① 苏联中央国家国民经济档案馆,全宗 8002,目录 1,文献 27,第 8、221—222 张;文献 28,第 91—92 张;文献 27,第 8 张。

② 苏联中央国家国民经济档案馆,全宗 8002,目录 1,文献 28,第 119 张。

③ 苏联十月革命中央国家档案馆,全宗 5283,目录 18,文献 43,第 9—10 张。

④ 《战后年代的远东国际关系(1945—1957)》(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в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 [1945—1957]),第 1 卷,莫斯科,1978 年,第 40 页。

⑤ О. Б. 鲍里索夫(О. Б. Борисов):《苏联与东北革命根据地》(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莫斯科,1985 年,第 22 页。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发展问题和矛盾》(Проблемы и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индустриа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КНР),莫斯科,1974 年,第 84 页。

机构。它们行使了政治职能和行政职能,对过去由日资占有的大工业、运输、通信、银行等实行国家监督。^①

东北解放初期,中长铁路的活动基本上由苏军部队来保障。^②在经营中长铁路方面的最大困难是铁路各经营单位的人员配备问题。在许多路段上,原来的当地铁路员工全都没有了,或者只留下一部分,而且基本上是日籍和中国籍员工。因此,经营和恢复铁路的重担便完全落到后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二方面军铁道兵7个团的全体指战员身上,而且他们还不得不着手解决从当地居民中招收做辅助工作的劳动力和为进一步配备铁路人员而培训干部的问题。日本占领时期,被吸收到东北铁路上工作的中国铁路员工担任的都是低级职务(修理工、乘务组和机务组人员),一切高级职务和行政管理工作则仅由日本人担任。中国职工也和俄国职工一样,所得工资要少5至6倍,粮食供给量也特别低。

懂技术和会俄语的人员很少,以及缺乏足够的资金来支付所招收的劳动力的工资——这一切使得培养干部的任务复杂化,从而造成劳动力的流动性。由于通过铁路管理局重新建立的合作社来获得资金和组织食品供应,就有可能在铁路上建立固定编制,并组织当地居民的专家培训班。^③

根据中长铁路苏联铁路员工的倡议,组织了一般职业的中国铁路员工干部培训班。1945年10月,在哈尔滨开办的中央培训班曾接受536人,沿线的分支培训班曾接受900多人,学习期限1至6个月。在苏联专家的领导下,中东铁路所属哈尔滨工学院的工程建筑系、运输经济系和电机系培养了400名大学生。^④这对从中国

① M. H. 斯拉德科夫斯基:《中国与日本》,第209—210页。

② 苏联中央国家国民经济档案馆,全宗8002,目录1,文献6,第264张。

③ 苏联中央国家国民经济档案馆,全宗8002,目录1,文献1,第7—8张;文献6,第265张。

④ 苏联中央国家国民经济档案馆,全宗8002,目录1,文献1,第7—8张;O. B. 鲍里索夫:《苏联与东北革命根据地》,第162页。

人当中培训业务水平高的干部的事业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实际意义。

此外,还对过去所有铁路专修班和中等技术学校进行了统计,经查明共有 44 所学校,学员人数共 10745 人,主要是中国人和日本人。以 1945 年 11 月 20 日为准,铁路各经营单位的人员基本上是铁道兵和当地居民。在满洲里至绥芬河路段经营铁路的有 5744 名军人、17871 名当地铁路职工。在哈尔滨至大连路段工作的有 35980 名当地中国籍和日本籍铁路职工。在铁路编制中,铁道兵占 15%。而就当时的运输量看,铁路主要专业干部的总配备(把招收的当地居民计算在内)不超过需要量的 80%。^①

这时期东北的形势相当复杂,它也反映在中长铁路的业务上。苏联对华政策旨在阻止美国对中国内政进行军事干涉,并尽量帮助中国人民争得民主、自由和民族独立。

根据苏联政府的建议讨论了中国的局势。1945 年 12 月,在苏、美、英外长莫斯科会议上通过了决议,部长们在决议中“重申信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认为必须制止中国的内战,力求实现中国国民政府所有机构的联合和民主化。

在苏、美两国外长的单独会议上就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从中国撤走苏联和美国的武装力量问题达成了协议。苏联政府与中国国民政府商定,除旅顺口和大连外,苏联将从东北撤出它的部队。按照条约的条款,苏军应在条约规定的其他期限内留在旅顺和大连,以便反击日本可能发动的侵略。

苏军于 1946 年 3 月开始撤军,同年 5 月 3 日全部撤完。美国政府的做法正好相反,它开始往那里派遣新的兵员,千方百计加紧向国民党军队供应美式武器。

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的帝国主义集团相勾结,走上挑衅和撕毁同苏联的协议的道路。国民党当局违反关于中长铁路协议的条款,

^① 苏联中央国家国民经济档案馆,全宗 8002,目录 1,文献 1,第 9 张。

抢占了位于它的控制区内的一些路段，从而切断了哈尔滨和由人民民主行政委员会管理下的大连之间的直接交通。在当时的情况下，苏联被迫于1946年3月至4月从长春、吉林和四平街召回其所有代表。留在沈阳的苏联总领事馆和苏联商务代表处处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

由于国民党军队侵入东北各省并占领了这些省份的南部和中部地区，中长铁路的大部分财产便落入国民党人的手中。保存下来的机车车辆和其他铁路器材迫切需要大修。但是，人民民主政权没有为恢复铁路运输及其正常运营所需的技术熟练干部和物资。^①

根据1946年6月1日资料，为中长铁路(包括两个地区)工作的总共有32458人，其中俄国人7161名，中国人24973名，日本人200名(在1946年夏，日本人被从东北遣送回国之前为1654人)，朝鲜人9名。^② 修理的任务由苏联帮助完成。

1946年底，从苏联派来约100名工程师、技术员和其他技术熟练的铁路职工，他们听从中长铁路的苏方经理A. Ф. 茹拉夫廖夫指挥。苏军走后，他和一小批苏联铁路职工留在哈尔滨和几个火车站上。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工厂负责修理属于中长铁路的破旧的或损坏的机车和车厢。苏联交通部把各种材料(钢轨、金属、工具等)和苏联的机车车辆(机车、车厢等)运到人民民主行政当局区域。

虽然苏联在东北执行解放使命，美国却以苏联“威胁”这一地区和全中国的安全，以及“关心”中国利益和它的主权等为借口来掩饰自己的行为，企图在国民党的帮助下把东北变成美国垄断组织的经济附庸，变成针对苏联远东的最大海军基地和把中国与苏联隔离开来的“防疫线”。^③ 1946年11月6日，蒋介石政府同美国

① 《苏联对中国的列宁主义政策》，第122—131页。

② 苏联中央国家国民经济档案馆，全宗8002，目录1，文献12，第108张。

③ A. M. 列多夫斯基：《美国对华政策和苏联外交》，第127页。

签订了所谓友好、贸易和航海条约以及变中国为美国军事机器和经济机器附属品的一系列协议。这个条约成了蒋介石为发动内战而撕毁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协议和协定的信号。^①

1946年4月苏军撤走后在东北爆发的内战,到1947年已广泛蔓延,除苏联根据1945年8月14日的条约租借的辽东半岛南端外,几乎席卷全国。

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之间的战争,东北于1946年底被分成以下地区:人民民主行政当局控制的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北满和辽东半岛;中满和南满掌握在国民党手中。这一来,1947年中长铁路就不能正常运营了,整个中苏协会也无法正常发挥其职能。在此时期,从东北领土撤回苏联的中苏协会理事会和中长铁路管理委员会的苏方工作人员,已不能直接领导铁路的业务。^②

由于东北的战事,约有6000公里铁路被毁或被破坏。1945年9月1日前,中长铁路已开始正常运营。到1945年末,铁路线全长为10000公里。由于在苏联铁路职工领导下进行了大量工作,至1948年12月15日修复了10000多公里东北最重要的铁路干线和全长为9000多公里的120座大中型桥梁。^③1947年,经中长铁路运往苏联滨海地区和后贝加尔的外贸货运吨数约为75万吨,1948年增至90万吨,1949年达到100万吨。^④

从1948年11月25日起,恢复了于1945年中断的奥特波尔站(今后贝加尔斯克站)和格罗杰科沃同大连和旅顺的直达铁路交通。苏军对旅顺口海军基地进行了彻底的改建。旅顺口装备了现代化炮兵、航空兵、海军,建设了现代化的筑城工事。^⑤

① O. B. 鲍里索夫:《苏联与东北革命根据地》,第116页。

② 苏联中央国家国民经济档案馆,全宗8002,目录1,文献10,第2—3页。

③ O. B. 鲍里索夫和B. T. 科洛斯科夫(B. T. Колосков)合著《苏中关系(1945—1970)》(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5—1970]),莫斯科,1980年,第35—36页; O. B. 鲍里索夫:《苏联与东北革命根据地》,第161、165页。

④ M. И. 斯拉德科夫斯基:《经济贸易关系史》,第172页。

⑤ O. B. 鲍里索夫:《苏联与东北革命根据地》,第166页。

与中国中部各省断绝联系的北满解放区，特别需要燃料、汽车、煤炭、药品、食盐、棉织品、鞋、衣服、食糖以及许多其他工业品和食品。居民和战斗中的人民解放军急需的生活必需品，只能靠苏联紧急运送。^①

1946年12月21日，在伏罗希洛夫斯克（今乌苏里斯克）苏联外贸机构和中国东北行政委员会的代表结束了贸易谈判，签订了贸易合同。根据该合同，开始有计划地向居民以及军队、医院、军医院、学校、俱乐部等供应苏联商品。缴获的财产和苏军从日本公司征用的粮食，也已转交人民民主组织。

这一时期，苏联外贸组织和东北人民民主行政当局之间的贸易联系不断扩大。例如，苏联和中国东北间的贸易额从1947至1949年增长了一倍多（从41380万卢布增至91590万卢布）；中国供货总值为101890万卢布，苏联供货总值为98480万卢布。中国供货总值超过苏联供货总值的原因是，（由于铁路运输中断）东北一部分粮食从海上经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和大连运送。

从中国东北运到苏联的首先是农产品（谷物、大豆、肉类等），而苏联向东北各省的出口则基本上是工业品。1947—1949年，各苏联组织向北满人民民主行政当局提供了石油产品、汽车、摩托车、食品（糖、盐、糖果、点心）、衣服、棉纱、橡胶和橡胶制品、工业设备。^②

组织大规模的经贸措施，要求进一步完善交通线，其中包括利用黑龙江和松花江的水路干线。

1945年战争期间，日本给松花江的物资装备造成很大的损失。日本军阀破坏和毁掉了几乎所有船只和通航设备，毁坏和盗走了哈尔滨造船厂的修船场和设备。松花江上实际上已无船队了。为

^① 《苏联对中国的列宁主义政策》，第131—132页；O. E. 鲍里索夫和B. T. 科洛斯科夫合著《苏中关系》，第29页。

^② M. H. 斯拉德科夫斯基：《经济贸易关系史》，第174—175页。

了保证松花江的水路运输,中长铁路苏方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花费很大力气和资金去修复大致能用的和保存下来的轮船和驳船。至1946年春,已有15艘船修好并准备航行。哈尔滨造船厂的设备全部修复,安装了136台崭新的机床。^①1947年4月,在苏联远东对外运输管理局哈尔滨分局的协助下,为沿松花江的开航准备好佳木斯、富锦、绥滨的码头,在哈尔滨内河港补建了一些停泊处。苏联阿穆尔河运轮船公司拨出一些拖轮和驳船,从1947年5月起,利用这些船只开始了中国松花江上的港口和苏联港口(哈巴罗夫斯克、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共青城)之间的定期货物运输。^②

中国东北开始了普遍的土地改革。1947年秋,在哈尔滨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苏联的协助下,中国东北各人民民主地区已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军事战略基地。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于1947年下半年在东北和中国中原展开的进攻,成为内战中有利于人民民主运动的根本性转折。^③

各苏联组织协助东北人民民主政权整顿好国内贸易和财政。在恢复和发展贸易以及巩固货币体系中,“И. Я. 秋林”公司起了很大作用。1945年,苏联的外贸组织(全苏粮食出口联合公司、远东国际贸易公司、远东对外运输管理局、全苏国际图书发行公司)成为它的股东。除苏联的外贸机构通过“同心”公司进行商品批发供应外,还把苏联商品运给“И. Я. 秋林”股份公司。该公司在中国东北拥有相当广泛的地方贸易网,按固定价格零售苏联商品和产品,这对稳定国内市场起了重要的作用。^④贸易无疑对巩固东北各省的人民民主政权起了重要的作用。

① 苏联中央国家国民经济档案馆,全宗8002,目录1,文献27,第217—219张。

② 《苏联对中国的列宁主义政策》,第133页。

③ М. И. 斯拉德科夫斯基,《中国与日本》,第221—222页。

④ О. Б. 鲍里索夫,《苏联与东北革命根据地》,第156页,《工业发展问题和矛盾》,第86页。

临近 1945 年底,在大连、旅顺和辽东半岛的其余领土上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机构。1946 年,人民委员会组建了一些(吸收中国商界参加)经营公司,并与民政管理机关发生业务联系。但是,由于缺乏工程技术人员和物资,这些公司不能完全承担管理原日本大企业的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从 1947 年春起,在民政管理机关和苏军的协助下,根据均等原则,开始在辽东半岛上组织苏中股份公司,其目的是整顿对边区至关重要的企业的工作和培训中国专家,以便在以后的年代里中方靠这些专家的力量能保证独立地管理原日本的大企业。

“远东电业管理局”股份公司是最初这些苏中公司之一。它成立于 1947 年春,拥有资本一亿元。远东电业管理局在辽东半岛整个经济生活正常化中起了很大的作用。14 个大企业(其中包括大连的两个电站)归它管理。1948 年,公司工业品的总产值估价为 25 亿元。由于东北全境的解放和人民民主行政当局经济机构的巩固,远东电业管理局股份公司便撤消了。管理局的全部财产转交中国当局管理,并把从苏联运来的设备和物资折价,给苏联股东付款。

1947 年春成立了苏中“辽东渔业”公司。其资本额为一亿元,分成 1000 股,由苏中双方平分。公司从事盐业、捕鱼业、鱼类加工以及玻璃和其他制品的生产。它修复了生产渔网的企业、渔业工厂、冰箱厂和其他企业,并使之现代化。1950 年,公司被撤消,它的财产转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①

1903 年,沙皇俄国政府的主管部门创建了大连造船厂——“大连船坞厂”。根据朴次茅斯和约的条款把工厂转交给日本以后,造船厂已经扩充并成为中国最大的一个造船厂。战争年代日本经济的崩溃严重影响了工厂的生产。1945 年,主要设备已经破旧不

^① M. H. 斯拉德科夫斯基:《经济贸易关系史》,第 178—180 页;《苏联对中国的列宁主义政策》,第 138—139 页。

堪。苏军到来之前,工程技术人员已撤回日本。结果为海港服务的大连的最大企业瘫痪了。因此,苏军的民政管理机构对造船厂实行了监管。1948—1949年间对大连船坞厂进行了重大改建。结果,至1949年底,工厂的生产量大大超过战前水平。1949年中开始就在大连船坞厂的基础上建立苏中合营股份公司——“苏中造船厂”进行谈判。1950年签订了有关协议。^①苏联远东劳动人民给为自身解放而斗争的中国以很大的援助。1945年9月初,远东海运轮船公司的苏联海员来到大连,着手重建海港、造船厂和该市的工业企业。^②

因此,上述材料证明,在日本占领东北和中国内战的严酷年代,苏联一贯给予斗争中的中国人民以全面的援助。苏联在远东对日参战、歼灭关东军、军国主义日本的投降,都促使亚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其中也包括中国民主力量增长。尽管苏联在反法西斯德国的战争中蒙受了巨大的破坏,但它还是给中国以很大的援助。同苏联的经济合作和科技合作使中国得以培养自己的管理现代化工业、运输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行政干部和技术干部。后来完全移交给中国人民管理的苏中合营公司(中长铁路、辽东半岛的一些股份公司),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在斗争的艰苦岁月里,苏中人民的友谊与合作进一步增强了。

于东林译

(责任编辑:丁如筠)

^① O. B. 鲍里索夫:《苏联与东北革命根据地》,第158—159页;M. И. 斯拉德科夫斯基:《经济贸易关系史》,第108页。

^② Б. И. 斯拉温斯基(Б. Е. Славинский):《苏联在远东的对外政策(1945—1986)》(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945—1986]),莫斯科,1988年,第42页。

近代华北的土地经营与商业运行的特征

小林一美

一 争论点

70、80年代,日本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又蔚然成风,近代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农田管理的性质和市场结构、民间信仰的特征、乡村理论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再次被日本学者当作重要的课题而重新加以研究。这是因为在中国革命过程中遇到了预想不到的困难和矛盾,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陷入困境,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史观不再起作用,继之而起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的社会主义获得新生。这使人们意识到:要理解中国的近代历史,就必须重新考察其农村社会结构与性质。在给中国的社会主义下历史结论时,研究者不得不从根本上重新思考这样的问题:中国古代农村的社会结构与特征是什么;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近代史为中国农村社会带来什么变化及产生哪些新矛盾。^①

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就曾在中国社会发展史和农村社会的性质问题上发生过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入侵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什么影

^① 在日本最近发表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内山雅生的《中国华北农村经济研究序说》(金泽大学经济学部研究丛书,1990年);小林弘二的《中国农村变革再考——传统农村与变革》(亚洲经济研究所,1987年);中生胜美的《中国村落的权力构造与社会变化》(亚洲政经学会,1990年);路遥、佐佐木卫合编《中国的家庭、村落与诸神——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研究》(东方书店,1990年)。

响？日本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也曾参加这场争论。争论者分成了两大学派：一派是封建学派，或称中国农村派，他们坚持认为中国仍然存在着封建残余；另一派是资本主义学派，或称中国经济派，他们强调中国已经发展了资本主义。^①

这两种观点的对立在后来研究中国社会与农村的进程中尚未完全消除。由于在殖民地、附属国以及类似国家和地区，人们还会看到几乎是各种形式的经济制度，其中包括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在某些地方、某些行业和某些生产程序上还可发现资本主义现象以及封建或奴隶关系的存在。因而，仅以分析经济过程，如农业经营与商业运行，为基础而对中国是否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进行的任何争论，都无助于把握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与控制，必然导致资产阶级从地主、买办和官僚中分化出来。但是，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又与地主、买办和官僚等封建势力相结合，共同维护并巩固他们各自的权力。要认识中国的近代历史，就必须阐明农业经营、商业运行、商业与信贷资本和国内外政治势力这几方面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些关系之间的整体结构。

本文旨在从整体上把握近代的中国社会，将考察农业经营、土地占有状况以及二者与商业、信贷和政权之间的关系。在中国辽阔的地域中，我之所以选择华北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原因有二：一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有大量关于华北农村的研究成果；二是我本人参加了由日本文部省资助的“关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的民众运动的综合研究”项目（该项目的负责人是山口大学的佐佐木卫副教授），在1986至1990年间，我们实地考察了山东与河北两

^① 封建学派代表人物有李立三、王学文、蒋东周、刘梦云、薛暮桥、陈翰笙、孙晓村。他们坚持认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两大敌人，中国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一篇题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整理（概说）》的文章中，作者吉田滋一批评了这一学派完全否认资产阶级从农民阶级中分化出来的观点。

省的村庄、乡镇和城市，因而获得了一些有关华北的资料和感性知识。^①

华北的农村与华中和华南的相比，有许多不同之处：第一，几乎没有一个村庄其村民是同一个姓的，绝大多数村庄是由各种姓氏的人组成的（有的超过10个）；第二，几乎没有公用土地（一般属于家族、学校、村镇，等等）；第三，与其它地区相比，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所占比重较大；第四，建有堡垒并拥有家兵的豪绅数量相对较少；第五，生产率相当低，农民的贫困化比华中、华南更加严重。^②以上这些就是华北农村社会的突出特征。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中，农民阶层已迅速地向地主和富农（地主资产阶级）与贫农和雇农（乡村无产阶级）这两极分化？作为这两极分化的结果，小农（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是否已经消失？那些被称为富农或经营地主的人是否代表农村的资产阶级？以上这些以及其它许多问题接踵而至。另外还据称，中国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变动性很大，而且正是阶级结构的这种混乱状态构成了中国社会的突出特征。果真如此，那么这种大变动的的原因何在？它是否遵循一定的规则？在社会混乱中难道就没有某种运动的机制和规律吗？——这些问题以及更多的新问题立刻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这些问题并不复杂，下面我将择而作答。

二 古代中国农村的土地 所有制形式与经营方式

首先，我们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在以前的华北农村，一个5口或6口之家仅凭家庭劳力究竟能积累和耕种多少亩土地。根据《中

^① 有关这次调查的情况已以资料选辑的形式发表，大标题是《关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的民众运动的综合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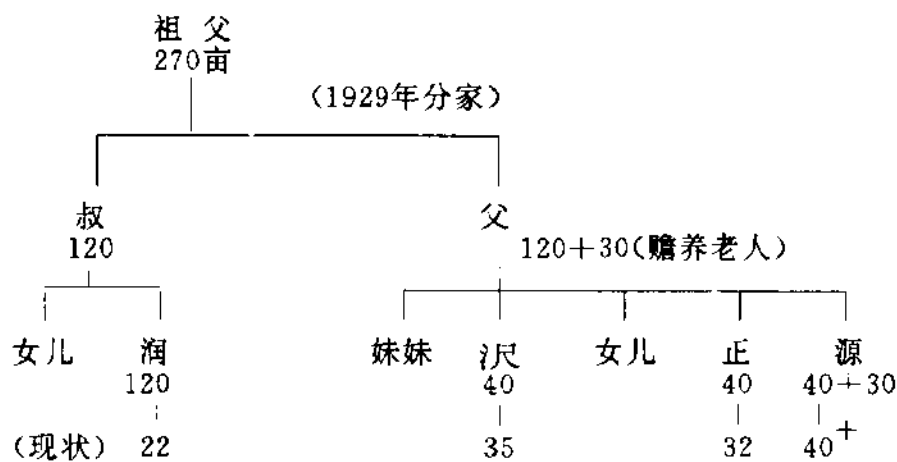
^② 这种趋势与特征已在南满铁路会社研究院编的《华北的农业与经济》（1943年）第1—2卷中指出。

国农村惯行调查》一书(岩波书店,1952年)和我们对华北实地调查的结果判断,其最大限额是70至80亩。就是说,把20年代算作一代(其前后两代所分家产相同),每一代仅凭家庭劳力所能积累的土地数量(由于妇女不参加田间劳动,家庭劳动力只是1至3个成年男子)至多不过几十亩,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其土地数量可能更少。

在华北农村,一个普通的5、6口之家需要30亩土地才足以养家糊口(而佃农则需要两倍于这个数目的土地,因为其收成的大约一半要作为地租交给地主)。一个家庭也许能买上2至3倍于这个数目的土地,并在农忙季节雇佣短工耕种,但是要在代之内使自己占有的土地数量从几十亩增加到上百亩,却是极为困难的。要做到这一点,就一定要另做小买卖、放债和雇佣长工(以一年为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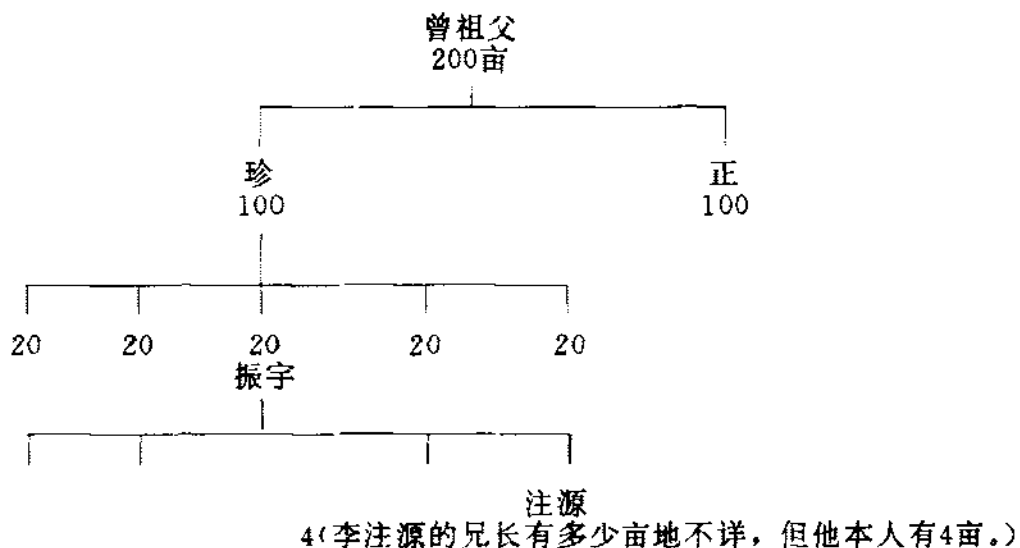
然而,如果一个农民家庭确实设法获得了几十亩或上百亩,甚至多达200—300亩的土地,那么这是否能给家庭带来长期的稳定呢?《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一书记载了许多拥有200—300亩土地的大家庭在后来的2至3代内因均分家产而不复存在的例子。下面我们举两、三个较为典型的例子。

A. 河北省顺义县沙井村杨家(1941年调查)^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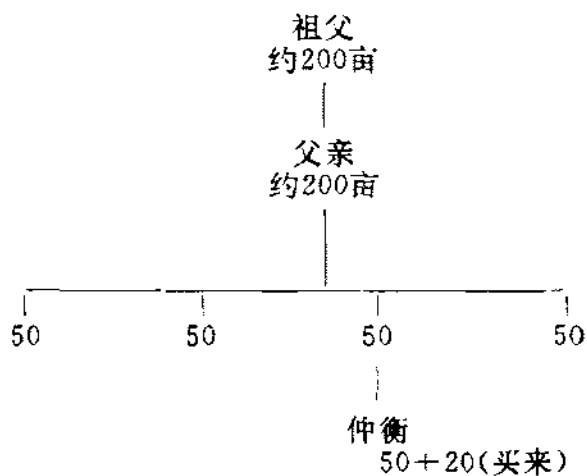


①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2卷,第117页。

B. 河北省顺义县沙井村李家(1940年调查)^①



C. 河北省良乡县吴店村赵家(1941年调查)^②



既然拥有 200 亩以上土地的大家庭到子孙这一代都难免衰落,不难想象普通农民(自耕农或半自耕农)的经营规模随着家庭分支的建立将会因均分家产而缩小,这对他们又将是一个多么大的打击。根据《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和我们自己实际调查的结果,我

① 同上一页注①引书,第1卷,第119页。

② 同上一页注①引书,第5卷,第474页。

们来看一下华北农民实际上究竟拥有多少土地。

村 名	户 数	普通农民拥有的土地
沟东村 (河北顺义县)	110(674 口人)	20—30 亩
回回营		至多有 30—40 亩,一般少于这些
苏庄	165(926 口人)	一般约为 30 亩
张家庄	125(704 口人)	一般少于 20 亩
沟北村	194	多数为 30—50 亩
十里堡	135(783 口人)	90%拥有 0—50 亩
马家营	142(802 口人)	58 户少于 20 亩
冯家营	148(816 口人)	{ 30 户拥有 10—50 亩 40 户少于 10 亩
前郝家疃	约 200	{ 60—70 户自耕农拥有 50—60 亩 50—60 户半自耕农则更少
栾城县	165 个村,22200 户	{ 拥有 100 亩耕地的约占 12% 拥有 50 亩耕地的约占 24% 少于 50 亩耕地的约占 64%
德县(山东)		一般为 10—20 亩
冷水沟 (山东历城县)	约 370	多数约为 25 亩
路家庄	约 130	多数约为 25 亩
后家寨 (山东恩县)	约 130(700 口人)	85%少于 40 亩
马家屯 (河北唐山市)	300	多数少于 30 亩
犁湾河乡 (河北昌黎县)	1609(8339 口人)	多数为 0—20 亩

村名	户数	普通农民拥有的土地
第三乡 (山西临榆县)		一般农民约为 10 亩
洪洞县(山西)		许多农民拥有 30—40 亩;绝大多数是佃农
沁县		一般为 10—20 亩

(以上根据《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 1—6 卷〕,统计数字是 1940—1941 年的。)

大宁村 (河北威县)	约 180(700 口人)	一般为 20—30 亩
红桃园 (同上)	约 200	约有 150 户拥有 0—30 亩
梨园屯 (同上)	约 200	2/3 的户为 5—6 亩
薛营村 (河北大兴县)		多数为 5—15 亩
琉璃寺乡 (山东高唐县)	270—280 (1200—1300 口人)	多数约为 20 亩或更少
曹庄 (山东巨野县)	80	一半以上少于 40 亩 (盐碱地居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拥有 80 亩亦不足以持家)

(以上根据佐佐木卫率领的调查团搜集的资料,统计数字是 1900—1910 年的)

上述资料清楚地表明,就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来说,子孙家庭分支的建立,也就是说家产的均分,导致所占土地规模的进一步缩小和农田的再次被分割。

此外,中国农民还要在老人的葬礼和兄弟姐妹的婚事上花费许多钱。根据《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所载有关葬礼的大量证据,丧葬仪式必须搞得非常隆重,以保全“面子”,免遭别人耻笑。而且,根据家产的厚薄,为支付婚丧嫁娶等特殊事件所需的费用,即使典卖土地也是十分自然和正当的。下面我们举几个典型的例子。

例 1^① 昌黎县侯家营村的保定义从父亲那里继承了 70 亩地，但为妻子出殡、儿子结婚和三个女儿出嫁而不得不分别典卖了 6 亩、5 亩和 2 亩地（共 13 亩）。

例 2^② 顺义县沙井村的赵廷魁继承了 150 至 160 亩地，但为岳父的葬礼卖了 20 亩，为其祖父出殡又卖了 20 亩，为 3 个妹妹出嫁各卖了 5 亩，为祖母的葬礼卖了 20 亩，为自己女儿的婚礼卖了 10 亩，总共卖了 85 亩。

例 3^③ 山东省即墨县邳区某村的村长说：“（出卖和典当土地的）原因主要是为支付婚丧嫁娶以及日常的生活费用。有的人为支付葬礼费用要出卖土地的一半；结婚时，女方须支付 200—300 元，男方须支付 500 元。”

例 4^④ 河北省安次县祖洛庄的曹乃武说：“我给我们的两个儿子每人 17 亩地，自己留下 18 亩养老。我母亲去世时，我从自己的 18 亩地中卖了 10 亩，没有让儿子分担费用。”

例 5^⑤ 顺义县沙井村的杜祥 1912 年时拥有 54 亩地，但在 1915 年因家人得病和两个女儿出嫁卖了 10 亩，1917 至 1918 年为母亲的葬礼又卖掉 15—16 亩。

例 6^⑥ 良乡县吴店村的禹良在 1920 年成家时继承了 67 亩地，但在 1923 年他母亲病故时卖了 22 亩半用以支付医疗和葬礼费用。当时每亩地售价 26 元。

例 7^⑦ 昌黎县侯家营一般情况是：为长辈（祖父母、父母）举行葬礼所需费用一般要比嫁娶等喜庆场合所支付的费用多一倍。为兄长或妻子办丧事的开支又比为长辈送葬要少一半。有的人为了

①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 5 卷，第 69 页。

②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 2 卷，第 238 页。

③ 同上书，第 6 卷，第 65 页。

④ 同上书，第 6 卷，第 78 页。

⑤ 同上书，第 1 卷，第 41 页。

⑥ 同上书，第 5 卷，第 557、262 页。

⑦ 同上。

给老人办丧事而出卖一半或 1/3 的家产。在拥有 50 亩地的人当中,有些声望较高的人为把葬礼搞得隆重一些而卖掉近 30 亩地。中产阶级家庭的老人去世时,中下层的家庭要花费 200—300 元(相当于 3 至 4 亩地)来办丧事,中上层的家庭则要花费 500 元(相当于 5 至 7 亩地)。

一般说来,拥有 100—200 亩地的人在长辈去世时每次要卖掉 20 亩地(或花费相当数量的钱);拥有数十亩地的人要卖掉 10 亩;拥有 20—30 亩地的人则要卖掉 2—3 亩(或等量的钱),这似乎已成惯例。从这个比例来看,可以推测,拥有几百亩乃至几千亩地的大地主,必定为葬礼支付巨大的费用。由于办丧事花销很大,所以源于儒家学说的这种强调晚辈孝敬长辈的礼仪文化,使中国农民所经营的土地面积和耕地数量逐渐减少。换言之,它带有强迫性地鼓励农民出卖、转让和典当土地,结果是土地日益集中到大地主、富裕商人和放债者手中。

至此我们已不难看出,中国农民因家产均分和特殊礼仪(尤其是葬礼)而定期地遭受着财产(土地、金钱及其它贵重物品)的分割与削减。以这种方式构成的体制所产生的影响是双重的,其结果是,那些少地而又赤贫的农民所受的经济打击最大。^①

华北地区大多数农民所拥有的土地都不到 30 亩(30 亩才能使一个家庭维持生活),而且还因均分家产和婚丧嫁娶而承受着连续不断的经济压力和支出。因此,要在一代之内仅凭种地而积累百亩以上的土地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家产通过父传子、子传孙这样单独相传 2 或 3 代而不分割的情况下,在经商和放债获得利润时,对少数幸运者来说才有可能成为拥有几十亩乃至上百亩土地的大地主。也有许多大地主不是从种地开始起家,而是先通过经商和放债致富,然后再开始攒地的。

^① 小林一美:《家产均分继承文化和中国农村社会》,载《中国的家庭、村落与诸神》(见第 163 页注①)。该文强调了与分家有关的问题的重要性。

这使我们不禁要问：在晚清和近代的华北农村是否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即从纯粹经营小农业而由小农变成经营地主，然后逐渐发展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富裕农场主？有人指出，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这就是，在光绪和宣统年间（1875—1911）山东省有许多经营地主（靠雇佣长工和短工来种地的大地主）。由景醒和罗仑撰写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一书^①提供了关于山东 46 个县 131 家经营地主的资料。

靠雇工经营的土地面积(亩)	户 数	占总户数的百分比
少于 100	10	8.0
100—199	37	28.2
200—299	20	15.2
300—399	27	20.6
400—499	11	8.3
500—599	4	3.0
600—699	6	4.6
700—799	4	3.0
800—899	0	0
900—999	3	2.3
1000 以上	9	6.8

从该表来看，它给人的印象是：有许多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靠雇工来经营自己的土地的。但这类经营者大多只经营几十亩到 400 亩的土地，拥有 400 亩以上乃至几千亩土地的人则不采用这种经营方式。为什么情况会是这样呢？同一书中的另一个表格表明，占地超过几百亩的人，其土地越多，靠使用雇工来经营的部分

^① 该书比 1972 年版的同名著作在内容上更加详实，而且该书把经营地主当成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标志。下表参见该书第 191 页。

就越少。^①

土地总面积	靠雇工经营的土地面积
70000	700
11000	200
3000	80
1000	30
20000	600
2350	75
10000	350
3000	200
6000	400
2040	152
13000	1000
1200	100
1000	100
500	50
2800	300
2600	320
2800	350
1380	180
3000	400
720	100
1000	140
450	70
600	100
800	200
450	90
5440	1200
8000	2000
1800	600
2100	1000
1000	500
1800	1000
2400	2000
1060	960
2000	1850

仔细查看这个表格就会发现,不论财产规模扩大了多少,使用雇工经营的土地面积很少有超过 1000 亩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如

^① 同上引书,第 332 页。

此经营的土地面积不超过几百亩,而且使用这种方式所能经营的土地面积一定会有一个极限,因为这种经营方式如果比把土地租给佃农更加有利、更有可能增加产量的话,那么使用雇工来经营的土地面积将会远远超出 1000 亩。靠雇工耕种的农田大多不超过几百亩这一事实,有助于我们进行下面的分析:第一,山东农村大批破产的家民为拿到少量的工钱而愿意在奴隶般的条件下进行劳动;第二,这种破产农民的数量又是有限的,以便能被当作短工或长工来雇佣和管理,而就长工而言最多不超过 6 人;第三,这些拥有几百亩土地的经营地主通过剥削雇工而直接经营自己的土地,并力争实现比把土地租给佃农更高的效率——这种事实并不代表他们的进步和资本主义性质,而只能说明山东农民的保守和这一地区劳动和经营的落后性。就占地几百亩的家庭而言,因均分家产而在 2 至 3 代之内走向衰落的可能性总是很大。这种不稳定性使这类地主产生了通过直接管理短工和长工而努力保持农民角色的心态,并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顽固地坚持使用雇工经营土地的做法。换句话说,中、小地主力求把使用雇工经营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以此作为防止自己破产的保障。这不能被看成是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证据。

小农经济因受各种限制(包括经济的和文化的)而陷于停滞,有地的人不能发展成为富裕农场主,更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的大地产经营者。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完全否认中国近代史上有资本主义的发展。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强行把中国市场同国外市场连在一起;从城市开始,中国社会在中外反动势力的操纵下逐渐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和半资本主义的社会,即各种矛盾和对立影响的混合体。上述封建大地主要么使用雇工经营自己的土地,要么把土地租给佃农耕种,通过收租(粮食、棉花、烟草)的形式获利,而这种利润逐渐地直接与国外市场连在一起。那么我们所遇到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在分配与交换过程方面中国向资本主义和殖民地转变的过程中,其生产过程是怎样为“封建制度的改革”铺平道路

的。

我坚持封建学派(或称中国农村派)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否定中国农村社会有任何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指出了农民的绝对贫困化。但我认为,许多坚持这派观点的人只是从数量和现象上解释这种状况。下面我想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有机结构中提出证据以支持封建学派观点。

三 土地经营、商业与借贷资本以及 政权之三位一体关系结构

如上所述,我于1986—1990年参加了一个由(日本)文部省资助的海外科研项目,从而调查了山东与河北两省的许多村庄、乡镇和城市。被调查的地方包括山东省的临清和济宁两大城市。在此,我将阐述并分析晚清和民国时期活跃在这两个城市中的极其富有而又很有权势的一些人的情况,并以此说明土地经营、商业与借贷资本以及政权之间三位一体关系的性质和结构。

〔临清〕^①

临清座落在山东省西北部,作为内地一个繁荣的商业和手工业城市而闻名于明、清两代。它位于大运河与卫河的交汇处,靠来自江南的漕粮运输和销售商品而繁荣起来。此外,造币、烧砖、丝棉织品的制造、皮货的制作、腌渍品的生产也很兴隆。1931年,临清有住户55600家,计273000人。

晚清和民国时期,临清一个很有权势的家族是市区东南大辛庄的孙家。这个家族在清末孙樊龙和孙樊月两兄弟这一代时开始崛起。他们兄弟二人开了个钱庄,捐了官,攒了地。由于他们拥有8000多亩地,所以人称孙百顷。这是一个很大的家族,当时有一百

^① 参见第165页注^①引用的资料选辑中“临清市”一章。

多口人。樊月的儿子御玃(正确的写法应该是玉玃)捐了个二品官并进京服侍慈禧太后。1900年,他将自己所继承的那份土地(由于兄弟俩平均继承,所以他所得土地已大为减少)扩大到6000亩。1920年发生水灾时,他又利用农民处境贫困之机,将其土地进一步增加到7000亩(据说实际上有8000亩)。樊龙的孙子孙振家通过科举考试先是出任山东知府,继而担任湖北道尹,民国时期甚至当上了湖北的代理省长。除拥有土地外,孙家还开了钱庄(私人银行)和商店,在临清城内将许多房屋出租。他们还有权将临清城内的全部粪肥统统包买下来,作为他们8000亩土地的肥料。以上是在临清拥有最高权力的孙家的情况。

施登魁晚清时为员外郎,出身武举,1918年出任山东省议员,1921年再次当选。他和弟弟施登池共拥有2700亩土地。

冀氏捐了一个候补知府,并开了一个粮店、一个百货店、一个油店和一个钱庄。

张树德和张树海兄弟是光绪年间的优贡生,哥哥最初为江苏州府州判,民国时当选为山东省议员。弟弟出任江苏府丞,民国时任临清市教育局长。他们拥有大量土地和其它财产。虽然不清楚他们究竟拥有多少土地,但他们仍被当作临清四大家族之一。

光绪年间,柏家的柏战胜和柏五岭通过了武举考试,同时柏秀岭也成了贡生,他们有财有势,成为临清四大家族之一。据说鲍云墀也属四大家族之一,为光绪年间的拔贡生,并作了州府的州判。1915年,他从山东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出任山东省议员。可算作八大家族之一的车家的车震,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后曾任陆军中将。除这些影响极大的家族外,朱庆法拥有一个37口人、600亩土地的大家庭。陈家拥有2400亩土地(由于三个兄弟平分,每人只能成为拥有800亩土地的中等地主)。朱家和陈家中是否有人做官尚不清楚。

根据上述临清的情况,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一般说来,谁在政治上有势力和权威,谁就能得到与其职位和官衔相应的巨

额财富。没有官职或尚未及第的中小地主，可以通过获取官衔的方式大大地增加他们的财富，仅有财富是不稳定的。徐、冯、彭、冀、陈和张家都拥有大钱庄，但在 1922 和 1927 年的政治、军事动乱中，他们的财产被军阀和政客们剥夺，他们得到的是连废纸都不如的军用货币，结果纷纷破产。1911 年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到处都是军阀割据，各自为政。那些在当时只有财富而无权无势的人（即银行家们）很快便在动乱中走向破产。本世纪 30 年代初，整个临清地区的人口约为 30 万，其中妇女和儿童约有 15 万人，如果除去手工业者、商人、士兵和无业游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只剩下 20%—30%。赋税和徭役全都落在了这少数的农民身上，农民难以生存，农村经济陷于凋敝。

〔济宁〕^①

济宁是山东省西南部的中心城市，座落在大运河畔，作为一个交通运输中心而繁荣起来。与交通运输有关的行业以及工商业兴旺发达，那里有许多劳工和手工业者。1910 年前后，城郊人口达 8 万，而整个济宁地区则有近 7 万户，381000 人。

晚清和民国时期自称在济宁拥有至高无上权势的是孙家。1775 年，孙玉庭中了进士，嘉庆年间（1796—1820）又当上两江总督并晋升为大学士。接着，孙毓汶于 1856 年中进士，光绪年间（1875—1908）历任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和兵部尚书。在这两个人活跃于官场期间，这个家族拥有独山湖周围 3 万亩的荒地（嘉庆年间），然后（在咸丰和光绪年间）又从鱼台县强行购买了 6000 多亩地。到了清末，孙家在济宁、鱼台、金乡、滕县、曲阜等县均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并全部租给佃农耕种。除上述二人外，孙家还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官。民国初期，他们是济宁最有权势的家族。1906 年，他们完全包揽了曾与其他家族联合经营的玉堂酱园。

^① 参见前引资料选辑中“济宁市”一章。

到了民国初期,玉堂酱园已经发展成为年利润 60 万两银子、拥有 400 工人的大商号。据说孙家将利润的 80% 用于购买土地。他们是这类家族的典型,即通过做官以致富,经商以谋利,然后逐步积累以广占土地为中心的家庭财产。

晚清时期,与孙家抗衡的另一个家庭是李家。李澍这一代开始出人头地。他因做了郎中而逐渐有点名气。在他的儿孙辈中也有许多做官的,他们有当铺 18 家、土地几万亩。晚清时期的两个大户是孙家和李家,但在民国初期,靳氏和潘氏家族开始发迹。靳家的靳云鹏积聚了 10 万亩土地;潘家的潘复则做了官,也获得了几万亩土地。这两家都是通过做大官、掌大权以扩大其影响的典型。

民国中期出现的四大家族是济宁有名的“四大金刚”。在这四大家族中,吕家在吕静之(字德镇,绰号吕半城,因他侵吞了济宁半数土地)时代成为大土豪。他经营的行业多种多样,包括钱庄、当铺、百货店、洋油店、洋烟店以及进出口商行。但在 20 年代的军阀混战中,吕静之成了军阀的牺牲品,家破人亡,财产丧失殆尽,自己穷困潦倒,流落街头,死于道旁。

王家是济宁的旧族,王慕周时代开办了许多商店和商行,包括一个和外国人合伙兴办的包销煤油公司。但是他的儿子对商业不甚感兴趣。北伐战争时期,他遭到致命的打击,失去了所有财产,最终沦为乞丐,死于北京。

刘子玉(字汝岩,出身于市井,祖辈以制帽为业)在光绪年间开了布店、百货店、油店和钱庄。此外,还盖了许多房子用于出租,并积累了 3000 亩土地。1916 年在济南开设了丰大银行,并投资济南鲁丰纱厂。这个刘子玉死于 1922 年。此后,刘家逐渐衰落。

另一刘氏家族的刘韵樵继承了其父办盐政时积聚的财产。通过经营钱庄、百货店和面粉厂,刘韵樵崭露头角,于 1921 年被选为济宁市商会会长。1927 年他死后,他的家庭很快破产了。

以上在民国时期涌现的四大家族代表着另一种新生力量,他们除了经营原有的商业和借贷业外,还经营从帝国主义国家进口

的洋货,如洋油、洋火、洋烟、洋布。然而,这四家都在 20 年代的军阀混战中破落了。他们的破产是由于军阀与政客们的巧取豪夺、税饷的支付、投资的有去无回,以及债务的沉重负担。

从晚清到本世纪 20 年代济宁豪门家族的兴衰变迁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清代那些以帝国政府为后盾的大官僚,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巨额财富并光宗耀祖。另一方面,在民国时期出现的新兴力量,如“四大金刚”,则用他们精明的商业手腕广聚财富;他们不仅采用传统的商业和借贷方式,而且还不失时机地从事洋货的销售。由于处在军阀统治时期,这些新兴力量找不到能与之携手的稳定的政治势力,他们也不能充当政府的公职人员或成为土豪,以致最终未能经受住战乱和经济不稳定的考验。

从以上对临清和济宁有影响的豪门富族的历史所作的大概的介绍中我们了解到,在中国,政权是通向富裕的最稳定的捷径。在紧接清朝之后的民国时期,与外资和洋货相结合的新兴力量登上舞台,这些暴发户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但由于没有解决政权、军阀纷争、经济恐慌、帝国主义入侵等问题,所以对山东的商人和企业家来说,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是极其困难的。

不过有一份材料所显示的情况与我的上述分析不相符合(见下表)。

晚清山东 46 县 131 户的行业分析

	经商起家	种地起家	做官起家
济南及郊区	28	20	4
运河区	2	8	1
鲁北区	9	12	1
山东半岛区	11	6	2
鲁西鲁南区	14	13	0
总 计	64	59	8

(引自《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第 115 页)

从表中可以看出,靠经商起家的家庭和靠种地起家的家庭数目大致相等,看上去靠种地而获取大量财富也并非难事。但实际上该表所列的地主中,85%经营商业、手工业和借贷业。不管他们是靠种地还是经商起家,其绝大多数的发迹是来自开店做生意:经营百货、酒、布或油,还插手面粉加工、纺织制造和借贷等行业,并同时积累土地成为大地主。但这只能说明靠做官发迹、积累土地并亲自经营的人很少,而并不意味着成为大地主的官僚很少。临清和济宁的例子证明,获得一官半职是在短期内积累巨额财富的重要途径。通常所称的乡绅地主或土豪劣绅(二者皆属土地贵族),代表着产生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正统的统治阶级。例如,明代有个杨氏家族,被特许垄断全国的制镜业。后来杨家变得极有权势,被称为“镜杨宅”或“制镜杨氏”。在整个清代,他们仍然继续保持专利权。而到清末民初,他们已在22个县拥有20万亩土地。但在本世纪30、40年代,他们也遭到破产之灾的侵袭。

随着民国时期的到来,封建专制制度宣告破产。皇室、贵族和八旗子弟的财产与土地被瓜分而置于私人控制之下,其中大部分落入军阀、政客、大地主和富商之手。民国成了这样一个时期:人们试图以各种方式从事冒险投机,以便迅速致富。不仅在政权方面,在其它任何领域都不再有稳定可言。济宁“四大金刚”的兴衰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贫困状态下,华北广大农村的资产阶级并没有在小农经济的解体过程中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没有占据支配地位。我们还不得不说那是一个走向进一步普遍衰退和普遍贫穷的时期。民国时期,近代以前封建势力的瓦解和贫困化在加剧,把一切都世俗化并以金钱来衡量一切的倾向也在加剧。这至少是山东与河北两省广大农村地区的特征。

即使在民国时期到来以后,华北人所追求的仍然是从“种地到经商、放债,直至做官、成为大地主”这种高升之途。华北人立志走的高升之路就是“经营商业借贷业→做官、成为大地主”。但在本世

纪 20、30 年代,由于受老牌资本家、帝国主义、军阀和大地主的压迫,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逐渐贫困化。

以上是我接受了中国乡村派(或封建学派)所提出的观点及其关于贫困化的论点之后,对这种贫困化的过程和内容所作的阐释。

四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工商业的命运

下面我将分析传统型的中国商人对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混乱局面的方式及其命运。

在济南东北部的章丘县有个李氏家族,^① 他的商行叫太和堂。从 1761 至 1905 年,李家积累土地 515 亩,其中 472 亩由雇工在其家人的直接监督下耕种。此外,在同治和光绪年间(19 世纪末),李家扩大了经营范围,开设了酒坊、药铺、杂货店和钱庄。1907 年,李家已是一个很大的家族,虽然这时李家已分成若干个小家庭,但被平分的只是土地,店铺和其它生意仍是共同经营。随着家庭的不断被分割,太和堂的管理人员开始大肆挥霍,生活日趋堕落。帐房和经管人员也相继故去,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土地化整为零。1928 年后,构成李氏家族的各个家庭几乎全部败落,沦为普通的贫民家庭。太和堂没有造就出能够经受住近代社会巨变的企业家;相反,他们受到剧变的冲击,挥霍了全部财产。这导致家庭的不和,结果大家庭分化瓦解,最终在本世纪 20 年代的军阀混战中一败涂地。

山东章丘县旧军乡的孟氏家族,^② 在乾隆时期靠经营纺织品起家,经历了两次因均分家产而导致的家庭危机后,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将经商范围扩大到了济南、北京、天津、烟台、青岛和上海。在分家后建立起来的各个独立的商行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矜恕堂的孟洛川(1851—1939)。他经营了一个叫瑞蚨祥的商行,取得

^① 《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第 82 页。

^② 《章丘孟家所经营的瑞蚨祥》,载《山东文史资料》,第 4 辑(1982 年)。

了轰动一时的成就。瑞蚨祥在上述各城市中建立了 16 个商店和货栈,经销丝绸、洋货、皮货及茶叶,还开了一个钱庄、一个印染厂和一个纺织厂。此外,该商行在章丘县买了 2000 多亩地,在上述各城市中也拥有许多房地产,而且还采购了大量的贵金属、艺术品和古玩。瑞蚨祥的会计和职员与北京、济南、天津等地的皇亲国戚、贵族、高级官员以及军阀建立了联系,并通过广送红包来获得信息和特许权。

瑞蚨祥的经营范围得以不断扩大,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1900 年义和团运动以后,它由批发和零售土布改为销售洋布;第二,它不仅经销日用必需品,而且经营贵金属和奢侈品,借以接近贵族和政客,以获取巨额利润;第三,它采取了开发多种行业的冒险措施,在 6 大城市建立了自己的商业网点,并且从效益好的行业 and 部门调拨人力、财力去扶持亏损的行业,从整体上保持事业的繁荣与稳定。统管瑞蚨祥数十年的孟洛川提出的管理之道是:(1)不涉足工业和金融业(借贷业、银行业,等等);(2)不与别人合伙做冒险生意。孟洛川不抽鸦片、不酗酒、也不喝茶,饮食起居无特别之处。另外,他不仅对其子女进行严格的封建礼教教育,而且要求全家人同桌吃饭,共同参与家庭的预决算。此外,他不允许儿子们独自冒险经营、私聚财产。

1854 年,孟家的 4 个儿子分得了家产,各自开办了自己的商号并另起了名称。那时仍为孟家核心商行的庆祥和瑞生祥(包括分店)外加 3 个当铺,留作 4 兄弟的共同财产。商行由最小且最能干的四弟孟洛川负责。只是在 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这些联合经营的商行才由各家分开经营,而在此之前,他们联合经营事实上已持续了几十年。但随着 1927 年的北伐战争和 1937 年中日战争的爆发,孟洛川的事业开始面临严重的危机。

上面我们对孟家一百多年来的商业活动情况作了一个概述。原济南瑞蚨祥的帐房和其他雇员中,有人批评孟洛川和整个孟氏家族,说他们的观念太封建,剥削他们的雇员,没有现代企业家的

精神,唯利是图是他们的唯一追求。但我认为,孟氏家族的人经历了从鸦片战争到中日战争(抗日战争)一百多年的风云变幻,特别是孟洛川,应被看成是传统的中国商人中最有经营才能和实干精神的典型。虽然他确实没有涉足近代工业,也没让他的孩子接受近代教育,但他不喜欢借贷业和银行业,没有培养做官之人,非常注重家庭团结,并且保持日常生活节俭。他尽一切可能防止将来因均分家产而可能导致的生意上的萎缩和衰落,同时把自己的商业活动范围扩展到所有领域,并在6个主要城市建立了自己的商业网点以增加保险系数。他还与皇室成员、贵族、军阀、高级官吏以及洋人建立了联系,以获取信息和取得特许权。他自己不抽烟、不喝酒,在1924年全家迁到天津以前一直住在家乡山东省章丘县,因此,他的儿子们都未沾上市井恶习。这种经营之道与伦理生活自然会被人认为缺乏现代精神而受到批评。但孟洛川一心想当一个彻底遵守传统社会的苦行主义的私营企业家和商人,并想尽一切办法保持整个家族的利益和稳定。正因此,孟氏家族才得以历经百年的风云变幻而不衰,并不断扩大经营范围。虽然到20世纪30年代,孟家最后仍然未能逃脱破产的命运,但从孟家的历史中可以看出中国式的企业家和商人高超的智慧和修养,可以看到近代中国一个家族领袖的奋斗历程。我认为,孟洛川可算作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中国要想生存下去所必需的精神力量和伦理道德的典型代表。

五 结 论

在前面,我们研究了晚清至本世纪30年代华北农村的社会状况,分析了山东省的临清和济宁两个重要城市的许多商人、大地主和商业巨头的的生活经历。我也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古代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和土地所有制、商业与借贷,以及政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我着重论述了继承权的平均分配和丧葬礼仪对中国人

的家庭和商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我还说明,对想在社会等级中往上爬的小农来说,必须首先利用商业和借贷业为支撑点;如果要进一步积累巨额财富,那么获取政权则是绝对必要的。此外,我还谈到晚清与民国时期的巨富们积累惊人财富的方式是有所不同的,而着重依赖银行、货币兑换、借贷、当铺的民国时期的富豪们在 20 世纪 20 年代遭到了破产。我认为,在华北农村是很难产生近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的。我还指出承认中国封建学派观点,即整个华北农村逐渐贫困化并陷于破产的重要性。^①但是,这种贫困化并非指在清末以前占统治地位的所谓封建制度还继续存在或是获得了新生,而是指市场与销售过程与外国资本主义市场相连接的一般状况。二者相结合的结果是,华北农村传统的社会结构趋于瓦解,形成了一个金钱剥削的社会(非资本主义)。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大批农民失去了他们的全部财产,从而到各城市和满洲地区去寻找工作。

在这种总的情况下,也有一些人奋力拼搏,经受住了这些动荡的岁月的考验,并体现了中国人的独立精神和私营企业主的道德规范。孟洛川的一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他的奋斗过程我不仅看到经过几千年的风云变幻而生存下来的中国商人和企业主那种典型的精明和创业精神,而且认识到他们在同资本主义的入侵相对抗中必然遭到的破产的命运。

译自《东方文化研究所简报》,1992年,第62期。

孙晓青 孙青译 张士义校

(责任编辑:丁如筠)

① 对于华北农村普遍贫困化的论断,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为什么华北地区自耕农所占的比重比华中和华南地区还高?这是因为,华北地区的土地从总体上看是不肥沃的,而且通常含碱量很高,许多地方不适于地主和高利贷者开发。这一地区还常常遭受水灾(特别是黄河),而且霜期长,以致许多地方不能推广租佃制。此外,与华中和华南的情况不同,华北地区的地主和富裕家庭不与其他家族的人联合,也不培植私人武装,因此,他们在短时间内即迅速破产。这就是华北地区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所占比重较高的原因,尽管普遍贫困化。

苏军在远东的战斗行动

罗 申

8月9日凌晨,苏联武装力量转入进攻。空军对铁路目标、防区、行政政治中心哈尔滨和长春,以及罗津、雄基和清津等港口实施了沉重的打击。第一天,后贝加尔方面军的主力就向前推进了50公里,机动部队则推进了150公里。在第36集团军的行动地段内遇到了最大的困难。集团军各部分两路进攻:主力由旧楚鲁海图伊地区直指海拉尔,部分力量则由奥特波尔地区指向满洲里和扎赉诺尔市。突击部队顺利地渡过了额尔古纳河,沿公路向海拉尔推进。由B. A. 布尔马索夫少将指挥的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在进攻中打先锋。

在抵达海拉尔之前,苏联部队没有遇到敌人的抵抗。只在该城市附近展开了激战。在这里,日本占领军构筑了由若干个抵抗枢纽部组成的坚固的防区:在通往枢纽部的要冲设置了各种障碍物:铁丝网、雷场、崖壁、反坦克壕。防区由有近3000名日本官兵的守军防守。^①

8月9日24时前,先头部队分队占领了离海拉尔几公里的额尔古纳河桥。敌人的火力阻止了部队继续推进。同时,日军从设在海拉尔西北10—12公里处的奥博图(Оботу,音)山上的抵抗枢纽部猛烈开火。顽强的战斗开始了。先头部队在战斗中取得了一些无足轻重的胜利。许多军人在战斗中表现出色,第205坦克旅的红军战士、共产党员因诺肯季·巴托罗夫尤为突出。在一次进攻中,

^①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36a,目录8878,卷宗38,第46页。

他越过两道反坦克壕，向两个永备工事的枪眼投去许多枚手榴弹，从而保证了分队的前进。但在日军的机枪火力下分队很快就趴了下来。巴托罗夫看到这种情况决定帮助同志们。在这之前他的手榴弹已经用完。于是，他爬到永备发射点跟前，站了起来扑向枪眼。敌人的机枪哑了，分队得以继续前进。^①

8月10日这一天，先头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但战果不大，因为敌人进行了猛烈的抵抗。直到次日清晨才占领了火车站、发电厂和兵营。8月11日在海拉尔地区进行了浴血战斗。通过这些战斗，苏军占领了几个永备发射点、城市的大部和机场。8月12—14日，第94师和第210师在海拉尔防区的各主要抵抗枢纽部展开了顽强的争夺战。

在第36集团军右翼，部队粉碎了小股敌人的反抗，占领了满洲里和扎赉诺尔市，并向海拉尔进发，在那里参加了消灭敌人的抵抗枢纽部的战斗。为了尽快地粉碎海拉尔防区的残敌，集团军司令于8月14日组建了一个由第94和第293步兵师以及两个得到炮兵部队加强的独立炮兵机枪旅组成的作战联队。就是这些部队粉碎了敌人：8月18日敌军残部投降了。

后贝加尔方面军的右翼兵团也在迫使敌人向中国东北纵深后退。热河方向的骑兵机械化集群的摩托化部队占领了多伦城，而在张家口方向，8月15日开始了争夺张北城的战斗，第17集团军部队攻占了大板上。

后贝加尔方面军的突击群处境困难：它必须翻越大兴安岭，克服这座大山形成的障碍。部队在崎岖难行的荒山野岭之间行进。连绵的雨水增加了行进的难度。山峦起伏，山坡陡峭。士兵们往往不得不把装备扛上山。酷暑使人周身乏力。尽管如此，苏联军人仍然迅速地向前推进。8月11日，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的先头部队翻越了大兴安岭，来到了它的东坡，并于傍晚前占领了鲁北城，行程

^①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32，目录440026，卷宗89，第43页。

将近 400 公里。不久以后,坦克兵占领了洮安城。

空军第 12 集团军的飞行员给步兵以很大的支援。他们轰炸了铁路车站路段和桥梁,使长春—乌兰浩特—阿尔山和哈尔滨—海拉尔—满洲里两线一些路段的运输陷于瘫痪。由于空军的积极行动,日军指挥部未来得及调集预备队和占领大兴安岭的山口通道,把物质财富从边境地区运走,以及撤离部队免遭苏联坦克兵团的打击。

第 39 集团军所部前进到大兴安岭山脚,两昼夜内翻越了大兴安岭,开始向索伦和王爷庙发动进攻。它们在向王爷庙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来自阿尔山防区的敌部的激烈抵抗。该地区正面约 40 公里、纵深 6 公里处筑有土木结构和钢筋混凝土发射点,由第 107 步兵师第 90 团和一支边防分队守卫。8 月 12 日,第 124 步兵师部队攻克阿尔山。但是,一些从该防区逃出来的日军零散部队,以及由西向满洲纵深撤退的部队,在 8 月 30 日之前仍在王爷庙和阿尔山之间的地区活动。8 月 13 日,第 39 集团军所属兵团在解放了索伦和王爷庙以后开进了满洲中部。

后贝加尔方面军所部自 8 月 9 日至 14 日在满洲境内推进了 250—400 公里,深入到敌后,向中国东北最大的中心——张家口、热河(承德)、沈阳、长春、齐齐哈尔发起了进攻。

远东第 1 方面军所部进攻顺利。先头部队于 8 月 9 日凌晨 1 时利用夜幕和雷阵雨的掩护向位于边境沿线的日军防区发起了攻击。这些部队的行动异常神速,敌人甚至来不及进行有组织的抵抗。苏军迅速占领了敌人的前沿阵地,破坏了他们的防御体系,为主力的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原计划实施的炮火准备就不再需要了。

无畏的红军战士勇敢、坚决地击溃了敌人。8 月 9 日拂晓,第 106 防区第 98 独立机枪炮兵营和第 25 集团军第 384 步兵师第 567 步兵团所属分队,对日军东宁防区发起了攻击。一队士兵冲向位于高地的一个永备发射点,Г. Е. 波波夫就在其中。战士们用自

动步枪和手榴弹歼灭了敌人的警备队,但是未能攻占这个永备发射点,因为日军的火力极其猛烈。分队趴下了。波波夫见此情景,便向发射点的枪眼扔去手榴弹。但敌人的机枪仍在扫射。这位苏联士兵在所有手榴弹都已用完的情况下扑向了枪眼,用自己的身躯挡住了枪眼。英雄牺牲了。分队一跃而起投入了冲锋,完成了任务,拿下了高地。^①

第384师第567步兵团第3步兵营下士、共产党员A.Я.菲尔索夫和第75独立机枪炮兵营上等兵B.С.科列斯尼克也建立了与士兵波波夫同样的功勋。^②

有关这些英雄的消息闪电般地传遍了整个方面军。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授予波波夫、菲尔索夫和科列斯尼克苏联英雄称号。

方面军主力紧随先头部队转入了进攻。在第35集团军地带内,部队强渡了乌苏里江和松阿察河,当天就向前推进了10公里。远东第1方面军部队的战斗行动遇到了困难,因为横在他们面前的是茫茫一片原始森林,无路可走。为了让大炮、坦克和汽车前进,开辟了一条急造军道,而为此组建了包括几辆坦克、几个自动枪手和工兵分队的部队。坦克把树木推倒,自动枪手和工兵则把树木拖开,清理出一条宽约5米的道路,然后由专门的部队将道路平整好。为了消灭一股股被围在抵抗枢纽部里的敌人,留下了一些配备有炮兵和航空兵的分队。直至8月26日,这些据点的敌守军仍利用大量永备工事负隅顽抗。在山林地区的困难条件下,方面军主力两天来在一些方向前进了75公里,占领了防区的中心——虎头、波格拉尼奇纳亚、东宁和其他一些居民点。方面军航空兵给地面部队以积极的支援。它对虎头、长春、牡丹江等城市进行了密集的轰炸。歼击航空兵从空中可靠地掩护了自己的部队。敌机只敢偶而

①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234,目录107268,卷宗5,第175页。

② 同上,第185页;全宗294,目录216879,卷宗1,第54页。

而且是单机或小批量地飞越前线。

日军指挥部为了掩护通往满洲中部的要冲,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坚守穆稜河和牡丹江防线,尤其是牡丹江市上。这里由日军第5集团军部队防守,它由5个步兵师组成,并得到炮兵的加强。通往牡丹江的要冲由许多用机枪和大炮装备起来的永备钢筋混凝土工事掩护。

在牡丹江方向实施进攻的是方面军的两个突击集群——红旗第1集团军和第5集团军。轰炸航空兵和强击航空兵团从空中加以支援,对敌人的抵抗枢纽部、撤退中的部队和开过来的预备队给予有效的打击。红旗第1集团军步兵第59军与第75坦克旅一起,摧毁了敌人在麻山镇地区的拼死抵抗,占领了大的铁路枢纽——林口市,于是从北面把牡丹江给截断了。

步兵第26军协同第257坦克旅消灭了敌人的一些集群,先行部队强渡牡丹江,并从北面突入牡丹江市。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直至肉搏战。与此同时,第5集团军所部突破了敌人的严密设防地带,占领了穆稜市,并从东面对牡丹江展开进攻。

日军深知牡丹江具有重要的战役和战略意义,因此竭尽全力固守该市,以阻止苏军向满洲中部推进。日军指挥部为了加强牡丹江集群,重新部署了部队。仅在第5集团军所在地带内就配置了10个火炮连和11个迫击炮连。敌人在通往牡丹江的各个要冲预先有所设防。争夺牡丹江的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

在牡丹江激战时,联共(布)滨海边疆区委员会给方面军部队发来了贺电,说:“联共(布)边疆区委员会代表滨海地区劳动人民,祝贺远东第1方面军战士成功地向满洲纵深挺进,并希望你们,亲爱的前线战士同志们,在彻底粉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战斗中进一步建立新的战功。”^① 方面军军事委员会通过政工机关、党和共青团积极分子以及印刷品,立即把贺电内容传达到方面军全体指战

^①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234,目录29358,卷宗2,第111页。

员。边疆区的贺电鼓舞了苏联军人去建立新的功勋。

8月14日,争夺牡丹江的战斗更加激烈。苏联战士在粉碎敌人的抵抗的同时向城市推进。步兵第26军所部的处境极为困难,他们在市区内进行战斗。日军多次转入反攻。数百名敢死队员追杀红军的军官和将领,摧毁坦克。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下,第26军的先头部队不得不撤离牡丹江,向该市东北方向后退了8—10公里。苏联战士当前必须对这个抵抗枢纽部再次发起突击。方面军左翼部队(第25集团军)顺利地向汪清展开了进攻,8月12日其一部占领了北朝鲜的罗津港。在罗津上空的空战中,少尉飞行员米哈依尔·扬科的英名永垂不朽。8月10日拂晓,他在袭击敌港时发现了一艘敌方运输船,于是勇敢地发起了冲击。尽管扬科遇到了敌高射炮兵的密集炮火,但他没有改变战斗航向。苏联飞行员的炸弹准确地投中了目标,敌运输船沉没了。在这次战斗中,大无畏的战士的飞机被击中起火,火焰迅速笼罩了整个战机。飞行员和射击手、共青团员И. М. 巴布金本可以跳伞,以保全性命,但还有些炸弹没有扔完,用这些炸弹可以重创敌人。于是,米哈依尔·扬科驾驶着着了火的飞机冲向军港工事的中心。日军用各种武器对飞机进行射击,形成了一道弹幕。但勇敢无畏的飞行员是不可阻挡的。轰然一声巨响,敌人的一个重要目标被炸毁了。^①

经过6昼夜的连续战斗,方面军部队和兵团突破了永备防御,向满洲腹地推进了100公里,打响了夺取牡丹江的战斗。同时为向南,即向朝鲜发动进攻和分隔在满洲和朝鲜的日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8月9日夜间,远东第2方面军部队也转入了进攻。战役初期,在松花江(沿着松花江)和饶河两个方向采取了积极的进攻行动。在第一个方向(主攻方向)作战的是第15集团军,在第二个方向作战的是步兵第5军。进攻是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进行的。7、

^①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32,目录22154,卷宗4,第8页。

8 两月大雨滂沱,引起了水灾。阿穆尔河水氾滥。原定的部队集结地被淹没,道路被冲毁。遭水淹的河岸极难靠近,可以选作渡口的地段有限。因此,部队的集结地和渡河地点不得不重新安排,而且还要远离敌人的防御地带。

为保证强渡阿穆尔河,远东第 2 方面军指挥部给第 15 集团军增加了渡河工具:舟桥纵列、水陆两用汽车、阿穆尔河运局的驳船。红旗阿穆尔河区舰队的舰艇起了主要作用。它们把大部分士兵和战斗技术装备运到了登陆地点,以火炮和机枪火力压制了敌人筑在岸边阻挠渡河的发射点。8 月 9 日,先头部队击溃了顽抗的敌人,占领了阿穆尔河的几个岛屿、同江市以北的桥头堡,粉碎了那里的日本守军,突入了抚远市。在攻占抚远市的战斗中,苏联战士英勇无畏。红旗阿穆尔河区舰队海军中士尼古拉·戈卢布科夫在这次战斗中建立了英雄的功勋。在强攻一座山岗时戈卢布科夫向敌发射点投去一颗又一颗手榴弹,使部队得以向前推进。

正当第 15 集团军部队在阿穆尔河上挫败敌人的反抗时,步兵第 5 军用手边的各种工具在饶河方向强渡了乌苏里江,占领了东安镇据点。在该市稍南地方夺取了第二个桥头堡。红旗第 2 集团军的先头部队查明,敌人在阿穆尔河沿岸只留下小股部队,在一些据点里还留有守军,而主力则已调到满洲腹地 10—15 公里地区去了。方面军司令员 M. A. 普尔卡耶夫对当前情况作出判断后决定让方面军主力转入进攻。8 月 9 日夜间,主力开始在主攻方向即松花江方向渡河。当夜,步兵第 361 师用红旗阿穆尔河区舰队第 1 支队的舰艇和运输船将 4000 多人以及火炮、汽车、弹药等运过了河。^① 8 月 10 日晨,已经渡河的分队未等全师集结,便在强击航空兵第 253 师的积极支援下转入了进攻,并且占领了同江城。第 15 集团军部队继续向佳木斯和哈尔滨展开攻势。争夺富锦防区和富锦城的战斗相当顽强。在该城南郊有一座装备精良、适合环形防御

^①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 238,目录 352680,卷宗 9,第 21 页。

的军事小镇。它的四周有反坦克壕和设置永备和土木质机枪发射点的围墙。小镇内有完整的永备和土木质火炮和机枪发射点体系，它们被伪装成住房，相互之间用堑壕和交通壕连接。在通往军事小镇的要冲的北面 and 东面有几个据点。小镇由日军步兵第 134 师的 3 个营守卫。^①

在攻打富锦城之前，步兵第 361 师第 445 团召开了党委会，会上讨论了党组织的任务和共产党员在战斗中的先锋作用问题。会后各连召开了党的会议。步兵第 394 团召开了各连党小组长会议，党组织书记在会上对上一次战斗进行了总结，商议了如何更好地配备共产党员问题。会上决定在战斗过程中出版战报。^② 这些措施有助于动员部队的力量迅速完成战斗任务。

8 月 11 日夜間，第 361 师和第 171 坦克旅主力进入富锦。8 月 13 日晨起，该师在坦克旅的配合下，在舰艇炮火的支援下，向军事小镇发起冲击。敌人疯狂抵抗，不止一次地进行反扑，但终究未能顶住苏联战士的压力。不久，军事小镇守军全部被歼。至 8 月 14 日傍晚，富锦防区的日军已被肃清。对第 15 集团军来说，通往佳木斯的道路已经打通。在此次战斗过程中，第 21 强击工程兵旅上士、共青团员 И. М. 雅库宾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冲击军事小镇时，步兵营（雅库宾按照它的战斗队形行动）遇到来自敌土木质发射点的猛烈火力。为了消灭该发射点，派出了以尼古拉耶夫少尉为首的 3 名工兵。勇士们爬到发射点跟前把它炸掉，为该营开辟了道路。返回时，苏联工兵遇上了 6 个日本兵。双方展开了肉搏战，尼古拉耶夫受了重伤。一个手持军刀的日本兵趁机扑向满身是血的少尉。就在附近的雅库宾及时帮助少尉，用枪托打死了日本兵。日军利用数量上的优势，企图把尼古拉耶夫少尉拖走。这时，共青团员雅库宾奋起保护指挥员。他终于在这次力量悬殊的搏斗中牺牲了，但指挥员的

①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 238，目录 352680，卷宗 9，第 27 页。

②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 138，目录 310121，卷宗 2，第 10—11 页。

性命保住了。尼古拉耶夫返回自己的部队。传单式的快报专门报道了雅库宾的功绩。他的不朽功绩很快就在远东方面军的部队中传开。雅库宾牺牲后，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授予他苏联英雄的称号。^①

步兵第5军所部在饶河方向的军事行动也很顺利。8月10日晨，饶河的敌守军非但拒不接受投降的建议，而且还向我军阵地开火。于是，该军部队经过短暂的交战后占领了饶河，并向宝清展开攻势，于8月14日将之攻克。

这一切使远东第2方面军指挥部得以命令红旗第2集团军转入进攻。8月9日—10日，集团军先头部队会同结雅—布列亚江河舰支队的水兵们抢占了位于阿穆尔河对岸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康斯坦丁诺夫卡和波亚尔科沃以南地区的桥头堡。8月11日，红旗第2集团军向齐齐哈尔进军。

苏军指挥部对远东方面军在对日作战初期取得的重大战果作出判断以后，决定发动对萨哈林（库页岛）的攻势。中国东北各主要战略方向的情况使苏军有可能实施萨哈林（库页岛）战役及其后的千岛群岛战役。解放南萨哈林的任务落在远东第2方面军所部的肩上，它们于8月11日晨开始执行此项任务。

当天，第16集团军第79步兵师的主力在古屯—气屯—Найоро方向，随后又在丰原方向转入了进攻。^②这是主攻方向，因为那里有一条通往萨哈林南部的道路。在北面，主攻方向得到古屯防区的掩护，这是日军第83步兵师部分兵力防守的地区。古屯防区是一个筑有许多工事的复杂体系。8月13日，该师先头部队占领了防区的中心古屯市，为拿下整个防区并进攻南面创造了条件。

可见，在战斗头6天，苏军就完全控制了防区战线，粉碎了日

^①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238，目录210121，卷宗2，第27页；全宗32，目录22154，卷宗3，第126—127页。

^②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238，目录310119，卷宗1，第1、16、17页。

军的主力,接近了哈尔滨—长春—沈阳战线。在这些战斗中,敌人在人力和技术装备方面遭受了重大的损失,而且关东军司令部对部队失去了控制。红军部队在中国东北的作战行动中很少遇到敌空军的抵抗。苏联航空兵独自拥有了制空权。

在战斗过程中,苏军战士经常可以目睹日本侵略者对当地居民和红军战俘犯下的兽行。在王爷庙地区,苏军战士见到了这样的情景:部分居民因为害怕轰炸而逃离了城市,躲在河床内。日军在撤退前换上红军的制服,袭击并枪杀了手无寸铁的妇女、老人和儿童。将近 250 名伤员被刀砍死。日军这种暴行的目的在于挑衅,想以此激起和平居民对红军的仇恨和愤怒。^①

在穆稜地区,日本兵把因伤被俘的 3 名红军战士切成几段。^②在牡丹江东南,苏联士兵们在一批死难者当中发现了 Д. Т. 加里宁中士的残骸。德米特里·加里宁受伤后被日本人俘获。日本人砍下了他的一条腿,挖去了他的双眼,身体右侧被割去一块三角形的肉,头皮也被撕掉了。^③这些兽行激起了苏军战士对万恶的占领军的仇恨。红军战士们发誓要更无情地打击日本侵略者。

红军战士进入中国东北各省后,目睹了人民群众贫穷、困苦的惨状。日本侵略者多年统治和对中国人民残酷压迫所造成的后果随处可见。

获得解放的中国东北居民帮助苏军搜捕隐藏下来的日军士兵、修复道路。在巷战中,当地居民经常帮助红军战士。在敌人顽抗的富锦城(属远东第 2 方面军战区)里,发现了一个永备发射点,里面盘踞着一伙日本兵。当地居民(市人民警察)积极协助苏军战士摧毁了这个发射点。^④战斗仍在进行,为使红军部队加速前进,

①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 21),目录 371776,卷宗 1,第 181 页。

②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 323,目录 5047,卷宗 703,第 122 页。

③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 32,目录 440026,卷宗 90,第 112 页。

④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 234,目录 293347,卷宗 10,第 79 页。

富锦居民还出来修路。^①

苏军在进攻初期就给关东军以强有力的打击,使日本侵略者面临灭顶之灾,要想把战争拖延下去已不可能。据日军总参谋部 Асаэда 上校说,日本“无疑已没有力量”继续这场战争了。^② 8月9日,当东京获悉苏联参战后,立即开始接连不断地讨论对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的态度问题。红军的攻势使日本人大为震惊,天皇当天下诏内大臣木户幸一立即拟定停战计划。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亲临最高战争指导委员会和内阁联席会议,通过了关于日本投降的决定。尽管天皇的诏书谈到了要结束战争,但军事行动并未停止。即使目前,在关东军接连失败的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者仍然企图顽抗。

为此,红军总参谋部发表了一个特别声明。声明说:

(1)日本天皇8月14日关于日本投降的公告只是关于无条件投降的一般性宣言。对武装部队还未发出停止战斗行动的命令,日本武器部队仍在继续抵抗。

由此可见,日本武装部队还没有真正投降。

(2)只有当日本天皇命令自己的武装部队停止战斗行动并放下武器,而且这一命令确实付诸执行时,日本武装部队才算投降。

(3)有鉴于此,苏联远东武装部队将继续发动对日本的进攻。^③

所以,苏军在不停地进攻。至8月中旬,苏军已深入满洲腹地100—150公里。这次进攻是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后勤机

①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238,目录64166,卷宗2,第42页。

② 苏联国家十月革命、国家最高政权机关和国家管理机关中央档案馆,全宗7867,目录2,卷宗173,第244—262页。

③ 《真理报》,1945年8月16日。

关没有跟上。部队的供应开始出现中断现象。燃料供应成了严重的问题。为了给坦克兵团运送燃料和弹药,动员了空军集团军的输送航空兵。为完成此项任务,仅空军第12集团军输送航空兵第54和第21师的飞行员就出动了1755架次,向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运送了2072吨燃料和186吨弹药。^①空军第9集团军的运输机向远东第1方面军的坦克兵团运送了90.5吨燃料、75.3吨弹药,^②而空军第10集团军的飞行员则为远东第2方面军的坦克部队空运了104吨燃料和302吨弹药。^③与此同时还采取措施修复铁路线。除特种分队外,还派出步兵进行这项作业。于是,满洲里—海拉尔、阿尔山—洮安站地段很快就通车了。

后贝加尔方面军部队进入东北平原以后在南面展开了攻势。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夺取沈阳上。这项任务落在了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的肩上。第39集团军进攻长春和四平。第36集团军应开进齐齐哈尔、泰来、安广地区。为了消除近卫坦克第17和第6集团军在进攻过程中形成的缺口,方面军司令员动用了第2梯队——第53集团军,其任务是开进开鲁地区。

8月16和17日,骑兵机械化兵集群完全占领了张北城,并顺利地向张家口展开攻势。在张北,两个内蒙师(德王的部队)连同其司令部和全部武器装备被俘获。^④第17集团军部队占领了赤峰。

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继续进攻的速度减慢了,因为燃料用完,坦克和汽车陷入泥泞之中而掉队了。人们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吃上面包和热汤了,但苏联战士并没有止步不前。坦克部队从通辽向东南方向沿着铁路路基前进,因为所有公路都被刚下过的暴雨冲毁了。在长达12公里的路段上,坦克以每小时4—5公里、汽车以每

①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360,目录515277,卷宗1,第89—111页。

②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349,目录5753,卷宗2,第48页。

③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5872,目录5510,卷宗1,第75页。

④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3424,目录164038,卷宗1,第4—6页。

小时 5—6 公里的速度行进着。^①

第 39 集团军在洮安地区集结,以便继续向东南方向进军。该集团军的部分兵力展开了战斗,消灭在阿尔山防区被攻克之后残留的小股敌人。8 月 15 日夜间,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在索伦西北打退了敌人 6 次疯狂反扑。而每次投入反冲击的步兵人数都接近一个营。在王爷庙以北 70 公里处,第 94 军第 221 步兵师与敌第 107 步兵师展开了顽强的战斗。战斗中歼灭敌官兵千余人。8 月 30 日,敌人投降了,7300 多名日本兵当了俘虏。^②后来,第 39 集团军奉命沿铁路开往旅顺。第 36 集团军以部分兵力完成了消灭海拉尔防区小股敌人的任务,主力则进攻齐齐哈尔。

就这样,后贝加尔方面军所部进入了中国东北的中心地区。其右翼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会合后,切断了关东军残部与华北和华中占领军的联系。

远东第 1 方面军所部由东面开进满洲的中心地区。8 月 17 日,第 35 集团军占领了勃利城,俘敌官兵近 2000 人。^③

主攻方向的进攻进展顺利。牡丹江之敌陷入半包围之中。红旗第 1 集团军由北、第 5 集团军所部由东逼近该城。日军失去了调动其兵力的可能性。攻城的准备很细致。部队对敌情、对牡丹江进行了研究,选定了强渡的地点。在负责进攻的兵团部队中召开了党的会议。红旗第 1 集团军步兵第 26 军第 22 师第 246 团所属各分队在党的会议上讨论了共产党员在战斗中的作用问题。第 8 步兵连的党员们在决议中写道:“我们,共产党员,在即将进行的巷战中要巧妙地、主动地战斗,要以自己的战斗行动来证明我们无愧于布尔什维克的崇高称号。我们将以个人的榜样来动员非党战士在战斗中建立英雄的业迹。”^④ 他们向第 257 坦克旅的全体政工人员讲

①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 210,目录 3116,卷宗 317,第 24 页。

②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 394,目录 9072,卷宗 385,第 65、91 页。

③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 234,目录 29358,卷宗 2,第 145—146 页。

④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 234,目录 341352,卷宗 3,第 17、21—22 页。

述了牡丹江的作用及其在日军防御体系中的地位。

步兵第26军的指挥部决定从两个方向打击敌人。第22步兵师在该市以北10—12公里处强渡牡丹江后,应占领该市的西北部,第300步兵师会同第257坦克旅占领该市的东部和东南部。

8月15日12时,第300步兵师从牡丹江以北地区转入进攻,经过激战处境有了改善。19时,第22步师利用手边的各种工具开始强渡牡丹江。8月16日晨,部队在牡丹江左岸集结,准备从北面进攻该市。8月16日晨7时,第26军重新发动了攻势。敌人的步兵依靠炮兵的支援和工事进行顽抗,但苏联部队的攻势猛烈,占领军未能守住阵地。第300步兵师会同第257和第77坦克旅(后者是在8月15日的战斗过程中开过来的),占领了牡丹江以东5公里的爱河(Эхо,音)车站,来到了牡丹江边,并着手渡河。第22步兵师在粉碎敌人的抵抗之后同时从西北突入城市。日军担心被包围,开始撤退。第300师部队趁机用木筏和渔船渡过了牡丹江,并从东面突入该市。

由于步兵第26军的巧妙行动,作为大工业中心和铁路枢纽,作为掩护中国东北中心地区出口处的据点的牡丹江市被攻占了。日军第5集团军主力在这里被击溃。前第5集团军司令野里常中将是这样说的:“我们没有料到俄军会越过原始森林,而俄国强大的兵力从难以逾越的地区发动的进攻对我们来说也是完全出乎意料的。第5集团军损失了4万多人,也就是总数的近2/3。我集团军已不可能继续抵抗。不管我们怎样去加强防御工事,要守住牡丹江是不可能的。”^①

8月16日晨,第5集团军所部也转入了进攻。他们突破牡丹江以东的永备性防线,逼近市郊,在这里停了下来,因为红旗第1集团军所部在市内的军事行动进展得很顺利。第5集团军奉命向吉林展开攻势,而红旗第1集团军则向哈尔滨发动进攻。

^①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234,目录29358,卷宗2,第165页。

第 25 集团军在解放汪清(8 月 16 日)和图们(8 月 17 日)两城市后,向朝鲜北部地区发动进攻。部分兵力同时沿着北朝鲜的东海岸向清津市进军。

清津是日本海军在北朝鲜的基地,它把北朝鲜与其宗主国联结起来,是重要的铁路枢纽。市内有不少军事工业。日本侵略集团把清津变成一个强大的防区,在那里配置了 4000 人的守备队。^①城市四周构筑了由堑壕和用地下交通壕联结起来的 180 个永备发射点和土木质发射点组成的两道防线。防线的前沿设有雷场。海岸要冲由海岸防御炮兵连守卫,市内的石料建筑物也适合于防御。

为了攻占清津,太平洋舰队指挥部决定准备实施登陆行动。参加登陆行动的有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第 140 侦察分队、海军陆战队第 390 营的自动枪手连、海军陆战队第 13 旅和远东第 1 方面军第 335 步兵师。总计装备 189 架飞机(138 架轰炸机和 51 架歼击机)的海军航空兵掩护载有登陆部队的舰艇从海上登陆。在登陆行动开始前进行了火力侦察。此项任务由 B. H. 列昂诺夫海军上尉指挥的支队完成。在顺利情况下,支队应在清津港设防固守,并在登陆部队第 1 梯队到来之前坚守已占领的登陆场。^②

舰队航空兵在战役前两天对清津的防御工事实施了猛烈的突袭,为登陆部队的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8 月 13 日,登陆部队在两小时内占领了港口,敌人没有料到从海上会有这样凌厉的攻势,故未进行有组织的抵抗。但是,当日军看到支队人数不多(总共 181 人)时,就企图把它赶下海去。日军首先向登陆部队加紧炮击,接着发起了多次反冲锋,但都被打退了。8 月 13 日夜间,敌人在夜幕的掩护下调来了兵力,重新转入反冲锋。8 月 14 日晨起,敌人在进行了炮火准备之后,在各个方向重新发动了反冲锋。登陆部队同占优

^① 海军海洋学研究所档案,全宗 129,卷宗 26766,第 116 页;太平洋舰队档案,全宗 413,目录 002352,卷宗 4,第 1 页。

^② 海军海洋学研究所档案,全宗 129,卷宗 17669,第 1—3 页;卷宗 26768,第 2—3、52—80、83—86 页。

势的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水兵们坚忍不拔地防守自己的阵地。但因力量过于悬殊,支队遭受了重大的损失而后撤了。^①

8月14日晨,登陆部队第1梯队——海军陆战队第355独立营在M. П. 巴拉博尔科少校指挥下,在清津港登陆。它的任务是占领港口,在登陆部队主力到来之前坚守阵地。独立营粉碎了敌人的顽抗,抢占了登陆场,并与列昂诺夫的支队会师。敌人千方百计地要把英勇的登陆部队赶下海去。8月14日夜间,敌人的7次反扑被打退。太平洋舰队航空兵大大支援了坚守阵地的登陆部队,给日军以有力的打击。8月15日晨,在舰艇炮火的掩护下,登陆部队主力——海军陆战队第13旅在B. П. 特鲁申少将的指挥下在清津港登陆。登陆部队边行进边同敌军战斗。与此同时,远东第1方面军第25集团军部队由北面进攻清津。8月16日14时前,在水兵和步兵的协同努力下歼灭了日本侵略军,彻底解放了清津市和清津港。

在战斗中,苏军粉碎了敌人的强大集群,切断了关东军与本土的一条重要交通线,为向朝鲜继续挺进创造了有利条件。

远东第2方面军所部由北面逼近满洲中心。红旗第2集团军在8月17日日终前在孙吴地区摧毁了敌第4独立集团军的一支重要部队,俘虏了2万名官兵。此后,坦克部队开始迅速向南挺进。8月20日,第74坦克旅开进北安镇。^②

第15集团军所部在占领富锦城后转入追击佳木斯方向的敌人。为了阻挡苏军前进,日军在撤退时炸毁了松花江铁路桥;而为了阻挡红旗阿穆尔河区舰队的舰艇进入松花江,向江中抛入了木材并沉没了几般驳船。^③但这并未能阻挡进攻部队前进。第361师的一个团、第34步兵师的一个营和第388步兵师的一个团乘坐红

① 海军海洋学研究所档案,全宗129,卷宗26767,第167页。

②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238,目录68579,卷宗2,第47页。

③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238,目录68579,卷宗1,第23页。

旗阿穆尔河区舰队的舰艇,沿松花江开进佳木斯地区。8月17日,它们在舰艇炮兵的支援下,从各个方向向佳木斯发起了攻击。激战趋向白热化。

日军第134步兵师师长满中将下令炸毁佳木斯。为此,各步兵团成立了专门的破坏和埋雷小组。敢死队特别营也负有同样的使命。除此之外,该营还要分成小股在红军后方开展斗争。日军从佳木斯撤退时,焚烧了城市,炸毁了一批最大的建筑物。^①但苏军没有让他们彻底破坏城市的目的得逞。居民手持小旗和戴着红袖章走上街头欢迎红军战士。当地居民给苏军战士提供各种服务,积极参与搜捕隐藏起来的日军官兵的行动。^②

在占领佳木斯之后,第15集团军所部沿松花江两岸向哈尔滨进军。自8月15日起作为第15集团军所属部队的步兵第5军,同时顺利地向勃利城推进。

远东的苏军部队在连续进攻的8昼夜内,强渡了三大水上屏障——阿尔贡河、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越过了大兴安岭,摧毁了敌人的坚固的永备防线。各方面军的两翼几乎合围了。苏军部队从四面八方像洪流一般逼近满洲的中心地区。

自苏军攻克北朝鲜的各个港口以及后贝加尔方面军部队前出到张家口地区,在那里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八路军会师后,关东军同在中国其他地区作战的日本武装部队以及日本本土的联系被切断了。敌人在战斗中遭受了重大损失。关东军丧失了预先构筑的各条防线。其残部在红军的压挤下向中满撤退,但这里没有预先构筑的防线,日军无法在这里组织长期的抵抗。因此,8月17日关东军司令部被迫请求苏军远东司令部停止战斗行动。^③但它至今仍只字未提准备放下武器投降之事。

①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238,目录352680,卷宗1,第31页。

②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238,目录64166,卷宗2,第55页。

③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234,目录29358,卷宗2,第142页。

远东的侵略者回避无条件投降的企图是徒劳的。苏联元帅 A. M. 华西列夫斯基在 8 月 17 日发表的声明中说：“兹向关东军司令提出从 8 月 20 日 12 时起在全线停止对苏军的任何战斗行动，缴械投降……一旦日军开始缴械，苏军将停止战斗行动。”^①

8 月 17 日 17 时，远东第 1 方面军侦察处电台接到了关东军司令部的无线电报，说已命令日本军队投降和停止军事行动。此外，该处也抄录了关东军司令下达的命令：“关东军所有战斗部队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和放下武器。”^②

在这些声明之后，大量日军仍在继续抵抗。只在个别地段（在远东第 1 方面军右翼的勃利地区和在该方面军第 25 集团军行动地带，以及在博克图——后贝加尔方面军左翼），日军才开始大批投降。因此，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向各方面军部队发出下列指示：“在日军缴械投降的战线地段停止战斗行动。”^③

为了加快彻底粉碎敌人的步伐，苏军指挥部采取措施提高进攻的速度。为此，各方面军部队都组建了由坦克营、反坦克炮兵连、乘坐汽车的步兵分队组成的集团军先头部队。后贝加尔方面军第 17 集团军组建了 3 个支队，第 39 集团军组建了 7 个支队。然而，这些机动部队也不可能处处加快前进的步伐。雨水破坏了道路，难以通行；有些地方河水氾滥，简直无法通行。辽源、法库、沈阳、四平地区一片汪洋。

8 月 18 日 10 时以前，日军指挥部命令其部队向苏军部队投降作俘虏。但这一次也并非所有地方的日军都开始投降。当天，海拉尔防区守军残部的 2200 人向后贝加尔方面军部队投降。扎兰屯地区有 2000 名日军官兵投降。^④ 在远东第 2 方面军红旗第 2 集团军作战地带的孙吴地区，第 123 步兵师师长率部投降，17065 名官

① 《真理报》，1945 年 8 月 17 日。

②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 234，目录 29358，卷宗 2，第 143 页。

③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 210，目录 3116，卷宗 293，第 63 页。

④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 210，目录 310117，卷宗 1，第 115—120 页。

兵被解除武装当了俘虏。第15集团军所部在发展自西南方向的佳木斯的进攻的同时,占领了汤原和三姓(依兰)两城。^①

远东第1方面军所部继续进攻。8月18日,红旗第1集团军的先头部队从牡丹江地区直奔哈尔滨。第25集团军和机械化第10军则发展对吉林的进攻。

为了使关东军尽快投降,苏军指挥部决定向中国东北的各大城市投空降兵。8月19日,225人的小分队在沈阳着陆,在长春则空降了200人。^②军事委员会全权代表向关东军代表提出了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并开始解除当地守军的武装。

8月19日,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从哈尔滨来到远东第1方面军司令部。A. M. 华西列夫斯基和 K. A. 梅列茨科夫元帅接见了。华西列夫斯基在谈话中警告秦将军,说日本部队应与军官一起有组织地投降。秦彦三郎同意苏军指挥部的要求,并提出了下述请求:在红军部队到达哈尔滨、长春、Ранан(他尚不知道苏联空降兵已着陆的事)等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据点之前,允许日本士兵保留武器,因为“那里的居民不可靠”。^③日军最高统帅部的一位代表的这种自白再次证明:日本殖民主义者在被征服国家主要是靠刺刀维持其统治的。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通过秦将军向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将军提出了最后通牒。苏军指挥部的这份文件要求“立即停止关东军部队在各地的战斗行动。对于那些不可能迅速下达立即停战的命令的地区,必须在1945年8月20日12时之前停止战斗行动”。^④

由于红军进攻顺利,关东军部队被解除武装和投降当俘虏的进程加快了。在后贝加尔方面军左翼,第36集团军所部于8月19日占领了齐齐哈尔,在那里解除了近6000名敌军官兵的武装。第

①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238,目录68579,卷宗3,第85—86、89页。

②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234,目录29358,卷宗2,第163—166页。

③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234,目录29358,卷宗2,第167页。

④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234,目录29358,卷宗2,第168页。

275 步兵师部队入城时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在主攻方向,近卫坦克第 6 集团军的先头部队于 8 月 20 日攻占了沈阳,并向长春逼近。在沈阳,他们解救了一批在日本集中营里受煎熬的美、英战俘。战俘们感谢苏军指挥部的解救和给他们提供的物质上的援助。^①

为了尽快攻占辽东半岛,8 月 22 日向旅顺和大连空投了部队。第一架飞机在旅顺刚刚着陆,就有一群中国人和朝鲜人来到了机场。他们提供了有关日本守军在市内的部署情况的重要情报。苏军指挥部利用这些情报迅速解除了敌守军的武装。红军部队开进旅顺成为苏中两国伟大人民的友好节日。

8 月 24 日,近卫坦克第 6 集团军所部沿铁路开进旅顺。在它们之后,第 39 集团军所部也抵达辽东半岛。它们占领了营口、盖平等城市,在半岛东部进入安东。在远东第 1 方面军地带内,空降部队于 8 月 18 日在哈尔滨登陆,次日在吉林登陆。8 月 20 日,第 25 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开进吉林、敦化。同一天,远东第 2 方面军第 15 集团军的先头部队乘坐红旗阿穆尔河区舰队的舰艇在哈尔滨登陆。^② 红旗第 1 集团军的部队很快也开过来了。第 25 集团军所部正一步步地解放北朝鲜。8 月 21 日,太平洋舰队的登陆兵在元山港登陆。该城的守军被迫投降。

正当苏军部队向满洲纵深推进时,在南萨哈林,与第 75 步兵师发动进攻同时,苏军指挥部组织了一些登陆兵登陆。8 月 16 日,由第 113 步兵旅的一个营和海军陆战队一个营组成的登陆部队,在北太平洋区舰队的航空兵和舰艇的支援下在塔路港登陆。8 月 20 日,由第 113 独立步兵旅组成的登陆部队乘坐北太平洋区舰队的舰艇在真冈港登陆,并通过战斗占领了港口。^③ 同时,第 79 步兵

①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 210,目录 371776,卷宗 1,第 156—157 页。

②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 233,目录 68579,卷宗 3,第 89 页。

③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 238,目录 68579,卷宗 3,第 93 页。

师所部突破了古屯防区,然后马不停蹄地南进,因为敌人已停止了有组织的抵抗。为给在南萨哈林进攻的部队供应物资,配备了3艘运载弹药、燃料和食品的海上运输船。这些运输船沿着萨哈林的西海岸随军南进,给港口的部队发放储备品。

苏军在中国东北、朝鲜和南萨哈林的军事行动进展顺利,使苏联武装部队得以着手实施歼灭千岛群岛日军的战役。占领千岛群岛的任务交给堪察加防区指挥部。为了实施这一战役,动用了堪察加防区部队、舰艇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拥有的各种浮动工具,以及第128航空师。^①

战役的准备工作是在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因为时间太紧,浮动工具又不足。实施战役的命令于8月15日7时才接到,而当天16时就要将决议向上级报告。在作出决定和制订战役计划的同时,必须将部队集中到上运输船的地区,因为一些兵团占领了堪察加半岛各个地段的防御阵地。为了把部队调到(堪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动用了军用和民用运输工具,以至小汽车。特种登陆艇严重不足,因此,不得不动用商船。但由于大多数商船都已满载,故必须立即把货物全都卸下来。由于采取了措施,8月16日日终前,部队连同武器和物质保障设施全都装上了船。^②

在进行战役准备时,政工人员向党小组长、团小组长、宣传员们讲述了此次战斗行动的特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战斗中的先锋作用。在同全体指战员谈话时着重指出了同帝国主义日本所进行的战争的性质问题。战役实施前,仔细检查了武器的情况和现有的弹药。政工人员在使战士们作好战斗准备的同时,向他们介绍了《海军陆战队战士手册》。部队和舰艇召开了党员和共青团员大会,官兵们在会上讨论了怎样更好地完成作战任务,并且宣誓要光

^①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238,目录68579,卷宗3,第94页;目录352680,卷宗10,第8、11—12页。

^② 苏联国防部档案 全宗238,目录352680,卷宗10,第8—12、17页。

荣地执行祖国的命令。

在完成战役准备之后,登陆舰在作战舰艇护航下于8月17日4时离岸,沿堪察加半岛东海岸前进,向千岛群岛北岛——离堪察加最近的占守岛方向驶去。海上浓雾迷漫。这有助于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登陆地点。次日晨,登陆部队进入千岛第1海峡,紧接着海岸防御炮兵连从洛帕特卡岬角向登陆地段的日军炮台开火。

8月18日清晨,П. И. 舒托夫少校指挥的所谓“首批冲击”支队乘坐的登陆舰在离岸150—200米处靠岸,支队涉水登岸。在大雾的掩护下,登陆兵丝毫未被敌人觉察便登上了岸,并开始向该岛屿纵深推进。第一批堑壕里没有敌人。苏联战士深入该岛达2公里。在这里,登陆兵被发现了,日军向他们开了火,但已无法阻挡登陆了。9时前,又一个步兵团登陆。由于未能尽快将炮卸下,登陆人员是在护送他们的军舰炮兵的支援下开始战斗的,他们遇到了敌人有组织的抵抗。敌人不但向攻上岛屿的战士们开火,而且还向停泊在岸边的军舰开火。尽管敌人拥有雄厚的兵力:约8500名官兵、100门大炮和迫击炮、60辆坦克,但苏联战士仍然勇敢地、继续不断地向前推进。^①正在登陆的苏军战士没有压倒敌人的优势,何况敌人还占据着事先构筑的有大量永备发射点和土木质发射点及其他工事的防御阵地,因此,为夺取岛屿展开了浴血之战。

8月18日中午,日军步兵营在18辆坦克和炮兵部队的支援下,向苏军战士发起了反攻。战斗更趋激烈,敌人迫使苏军战士有所后退,但并没有取得重大战果。苏军战士用有组织的炮火、反坦克枪和手榴弹对付敌坦克,摧毁了17辆日军坦克,只有一辆躲到高地后面去了。在这次战斗中,支队指挥员舒托夫少将指挥巧妙。他两度受伤,但仍不下火线。第3次重伤后,他精疲力竭,这才把指挥权交给了参谋长。几小时之后,登陆部队在军舰炮兵的支援下转

^①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238,目录352680,卷宗10,第22、37页;卷宗11,第30、63页。

入了冲锋,占领了重要高地。这一天,航空兵第128师的飞行员对敌炮兵部队和运输船实施了猛烈的轰炸。^①

在战斗进程中继续从舰艇上把炮和弹药卸到岸上,从而增强了苏联登陆兵的战斗力。日军指挥部代表看到自己的处境极为艰难,便向苏军指挥部表示准备在8月19日16时前停止战斗行动。^②但是,此后日军并未放下武器。这时,苏联舰艇开进了千岛群岛第2个海峡。敌炮台猛烈开火。为了回击敌人,航空兵第128师对它们实施了沉重的空中打击,占守岛上的登陆人员也重新发起了进攻。8月22日中午,敌人开始缴械。次日,岛上所有敌部队都成了俘虏。解放占守岛是整个千岛群岛战役中的决定性事件。占领其他岛屿已无须苏军花费很大力气了。最高统帅部在8月24日发布的命令中说,关东军已停止抵抗,向苏联部队投降,当了俘虏。

8月24日至9月初,苏联远东武装部队摧毁了日军在中国东北留下的反抗基地。此外,北朝鲜也获得解放。8月24日,远东第1方面军的空降部队占领了北朝鲜的主要城市平壤。次日,沿着朝鲜半岛东海岸挺进的第25集团军所部开进元山市和元山港,同太平洋舰队的海军陆战队会师。而在这之前,日本守军已于8月22日向海军陆战队投降了。

8月25日,远东第2方面军所部彻底肃清了萨哈林南部全境的日军。8月23日至9月1日,苏军完全解放了千岛群岛。战役期间在这里共俘获63340名日军官兵。^③

* * *

1945年,苏联远东武装部队在自己光荣的胜利史册上又谱写了新的篇章。这个战区的军事行动持续时间不长,但就其规模、实施军事行动的技能、所取得的战果来看,是伟大卫国战争中最杰出

①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238,目录352680,卷宗10,第32—35页。

② 同上,第38页。

③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234,目录68579,卷宗3,第101页。

的战役之一。这证明，苏联的作战艺术有了进一步的改进。

在 15 天连续不断的战斗中，敌人损失近 70 万名官兵，其中 83737 人被打死，59.4 万人被俘。我们部队缴获了大量战利品。仅后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 1 方面军部队就缴获了 1565 门大炮、2139 门迫击炮和掷弹筒、600 辆坦克、861 架飞机、9508 挺轻机枪和 2480 挺重机枪、2129 辆汽车。远东第 2 方面军和红旗阿穆尔河区舰队部队缴获了松花江江河区舰队的全部舰艇。^①

全歼关东军成了苏联武装部队所实施的真正闪电战的范例。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武装力量的强大威力，是保证此次战争在如此短期内取得胜利的的决定性因素。日俄战争以来，交战双方经历了同样长的时间，但它们的武装力量及战争手段又是如此之不同！日军精锐部队关东军在组织方面，尤其是在技术装备方面，远不如苏联远东部队。苏联武装部队在远东所取得的胜利，乃是战斗威力增强、在战争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技术装备高超、苏联部队具有无与伦比的精神和战斗素质的结果。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在对远东战区的军事政治形势作出判断后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为了迅速达到战争的目的，仅靠位于远东战区的苏联部队的力量是不够的。于是，苏联指挥部对兵力进行了大规模的重新部署。由于把部队从西部战区调到远东，在力量方面，特别是在坦克、炮兵和航空兵方面形成了必要的优势。

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战斗行动是在远离我国中心的战区内进行的。成立苏联远东部队总指挥部是完全正确的，它统一组织方面军和太平洋舰队的行动。这样一来才能始终不断地实现对参加远东战争的整个武装部队的领导，才能迅速、彻底地歼灭敌人。

歼灭关东军的战略行动，无论就行动计划，或是就解决既定任务的手段来看，都具有独创性。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充分利用了战线

^① 苏联中央马列研究院伟大卫国战争史室文献资料，第 9609 号，第 745 - 746 页。

的地形(其突出部远远地伸向北方)来包围整个敌集群。在关东军两翼,对在满洲中心地区会合的方向实施强有力的打击,并辅之以由北面实施的突击,这样就保证了对敌主力实现大包围,将其分割,然后逐个地彻底消灭。

方面军的主要打击方向确定在敌人根本意想不到会有大规模进攻行动的方向。为此,坦克集团军要完全出其不意地在大兴安岭东侧的突泉、鲁北地区出现,而且远东第1方面军要越过被认为是无法通行的崇山峻岭、沼泽洼地、原始森林前出到牡丹江地区。前日军第5集团军司令说:“我们没有料到俄国人会发起闪电般的突击,因此没有来得及组织应有的防御。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俄国军队会穿越原始森林,在无法通行的地区会出现如此有威力的力量。”^①

大胆地把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和骑兵机械化兵集群推到后贝加尔方面军第一梯队上,是一种独出心裁的决定。这使苏联武装部队得以进行高速的战役。坦克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在战斗中前进了700—775公里,在第12昼夜开进了沈阳。远东第1方面军指挥部所采取的决策,即在夜幕掩护下通过突击各防区的接合部,而在这一个或另一个防区范围内,则突击单个的抵抗枢纽部的接合部的办法来突破防区地带的决策,是很有意思的和可资借鉴的。在人力和物力有限的情况下,甚至在没有炮火准备的情况下,这种决策就能使苏军在进攻的头一天攻占整个防区地带。

为了完成突破防区地带的任务而动用拥有突破德国法西斯军队强有力防御阵地的经验的部队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顺利地突破防区地带。在突破防区、摧毁敌人的独立抵抗枢纽部和据点时,广泛使用了经过同法西斯德国战争考验的强击群。在把战斗推向纵深和追击敌人时,使用了包括各兵种分队在内的先头部队。

苏联部队在满洲的战斗行动具有很大的机动性,这是因为远

^①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234,目录228296,卷宗34,第3页。

东方面军拥有足够的装甲坦克部队和机械化部队,以及它们巧妙地使用了这些部队。

不过,与过去历次战争一样,步兵在这场战争中起了主要作用。它们是方面军部队的基本部分,它们突破敌人的防御地带,紧随坦克部队向满洲纵深发展攻势,并占领敌最大防御枢纽。

炮兵部队,尤其是营和团的炮兵,是步兵的永久伙伴,在进攻中直接支援步兵。总指挥部预备队的炮兵因为实施军事行动有困难,故而未能跟上部队。所以,当战斗在防御阵地纵深进行时,它几乎没有参加,但在摧毁边境附近的防区时给步兵以很大的帮助。

工程兵部队和分队在诸兵种合成兵团和坦克兵团强渡水上障碍时提供了渡河保障。在茂密的原始森林和无法通行的沼泽地带铺设道路,在摧毁敌人的永备工事时参与了强击群的行动。

海军部队广泛地参与了此次战役。必须强渡阿穆尔河的第15集团军和红旗第2集团军部队是在红旗阿穆尔河区舰队的直接协同动作下发起攻势的。第15集团军所属兵团是在区舰队舰艇的积极支援下在松花江方向发展进攻的。在太平洋舰队舰艇的大力协助下,第25集团军所部攻占了朝鲜的东北海岸。由于陆军和海军的紧密配合,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终于解放了。

苏联航空兵将其主要力量用于直接支援地面部队和海军上。满洲战役一开始,轰炸航空兵就对铁路枢纽和敌人的其他军事目标以及通信枢纽部实施了强有力的打击,这有助于破坏敌军的指挥系统。在战役进程中,航空兵不断地进行侦察,协助部队和兵团完成其面临的任務。战役期间,仅方面军航空兵飞行员就完成了近9000架次的战斗飞行,向敌人投掷近2000吨炸弹。^①在后贝加尔方面军坦克兵团远离供应基地的情况下,运输航空兵给它们运送燃料,使进攻不致因燃料而停止。

^① 苏联国防部档案,全宗349,目录5753,卷宗2,第75页;全宗5872,目录5910,卷宗15,第71—73页;全宗360,目录6134,卷宗41,第120页。

空降部队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它们的协助下,加速了占领满洲许多工业和行政中心、解除敌武装和俘虏日军的步伐。

尽管战区独特,尽管展开战斗行动的区域辽阔,但后方机关能够完成保障方面军、舰队和区舰队所属部队的供应的任务。甚至在部队远离铁路线达 1000 公里的情况下,后方机关仍然能越过草原和山岭源源不断地向苏联部队供应所需物资。在这种情况下,战役中的主要运输任务是由汽车输送队完成的。

政治机关、党和共青团组织对在远东取得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进攻过程中开展的党政工作有助于维持部队的高昂的进攻热情,推动部队快速前进。苏联远东人民表现了勇敢的精神、高超的军事技能、群众性的英雄主义和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无限热爱。这是苏联共产党的巨大功绩,是它在部队中进行紧张而目标明确的思想工作的结果。

节译自罗申(С. И. Рошин)主编《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Истори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第 5 卷,莫斯科,1963 年。

李金秋译

(责任编辑:丁如筠)

传教士与官吏

——19世纪末中国教育改革先驱

阮桂雅*

中国因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西方列强挫败,所以在1860年代初开始推行“自强”政策,或者说“洋务”政策。^①这次有时被称作“第一次近代化”的洋务运动,目的并不是进行一次如10年后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深刻的制度变革,而是为了使国家掌握军事、外交和经济方面的技术。西方人之所以能取得军事方面的成就,原因就在于他们掌握军事技术。一些与洋务相关的活动,如兴办兵工、轮船、采矿、铁路、电报等官督商办企业及方言学堂和实业学堂等,主要是那些以勘乱闻名的总督——曾国藩(1811—1872)、左宗棠(1812—1885)、李鸿章(1823—1901)——搞起来的。为了便于对外交涉,如商业贸易、传教和在华外国人等事务的处理,清政府于1861年在北京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它并不是清政府的一个部。洋务运动的反对派极力反对修改同文馆(隶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教学计划。近代教育问题只是在中国受到甲午战争(1894—1895)的冲击之后,确切地说,是在洋务运动后期才成了官吏和文人考虑的首要问题,因为他们开始认识到,“自强”、“求富”再不能

* 阮桂雅(Christine NGUYEN TRI),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著有《南洋公学——上海精英与上海近代教育(1897—1937)》。

① 有关这一时期历史的著述,见本文注释。

仅仅依靠引进技术和资金,应该靠变法,甚至改变某些传统。这场变法维新运动使传统主义者内部出现了两个势力均等的激进派,并且两大阵营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的数年间分掌国家大权。1898年6月,光绪帝(1875—1908)接受康有为(1858—1927)的变法主张,颁布了一系列有关行政、经济和教育的维新法令。同年9月,清廷发生政变,维新运动被迫中止。慈禧太后(1835—1908)及保守派重新掌权后,废除了大部分维新措施,并且开始接近带有传统主义倾向的反洋人激进分子。这种联盟关系终于在1900年把政府推上了支持义和团运动和向列强宣战的道路。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以及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后,慈禧太后为了重新联合朝廷内的温和派促进她几年前曾经反对过的维新,便抛弃了极端主义者。新政是随着督办政务处的设立于1901年4月开始推行的。这个新设机构收到的奏章,对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改革都提出了具体措施。1902—1904年间,管学大臣张百熙(1847—1907)签署过不少有关在全国开办近代学校的法规。次年,科举制被废除。

这场维新运动能否取得政治方面的成功,完全取决于朝廷与各省、中央政权与官绅之间的合作。由于政体问题方面的争议导致合作各方的分裂,并且把清王朝推上灭亡的道路,这种合作不仅不会持续长久,而且在朝廷和各省就一项共同关心的政策达成一致意见时还使一些旧的统治方式得到了延续。19世纪末中国出现的骚乱结束后,教育受到普遍重视,这主要归功于个别先行者(决策人物、官吏和绅士)的活动,再就是他们善于现身说法。洋务派代表、李鸿章的幕僚、费维恺^①笔下的著名官办企业领袖盛宣怀(1844—1916)就是先行者之一。天津中西学堂是他在1895年创办

^① 费维恺(A. Feuerwerker):《中国的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与中国官办企业》(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Sheng Hsuan-huai (1844—1916) and Mandarin Enterprise)(纽约,1970年);夏东元:《盛宣怀传》(四川,1988年);谢世佳:《盛宣怀与他所办的企业》(成都,1988年)。

的。^① 1896年,他在《条陈自强大计折》中^② 建议对军事、财政和教育三方面采取新的措施。1897年,他再次上奏皇帝,^③ 建议在上海创办另一所近代学校,即于1897年4月8日正式开学的南洋公学。

盛宣怀并不是教育家。他的首要任务是制定南洋公学的大政方针,利用他本人的威望确保办学成功,以及选用合格人才,以取得最佳预期成效。虽然他采取的手段和重用的人才符合一种充满革新的环境的需要,但是他仍然以官绅身份行事。因此,一些大的办学方针确定下来之后,需要他直接插手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就学校管理权及经费筹集问题上奏皇帝;二是任命学校管理人员。最早两位负责人的选择恰恰反映了盛宣怀有关西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愿望。被选用的两个人,一个是西学代表、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 1866—1945),另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代表、地方官、盛宣怀的亲戚何嗣焜(?—1901)。这一策略与不少洋务活动相类似,但是它既不是应运而生,更不是官吏普遍参与洋务的情况下形成的。何嗣焜和福开森是两股汇合在一起的改革潮流的代表,或者说是两种象征。何嗣焜对盛宣怀的影响颇深,他为实现张之洞(1837—1909)和刘坤一(1830—1902)——总督、1901年4月为督办政务大臣——这两位高级官吏在本世纪初提出的教育体制改革计划增添了光彩。就福开森在南洋公学的活动而言,可以说是新教传教士在塑造新型精英和改革中国教育体制方面所做努力的结果。然而,如果说这两股潮流的汇合可以说明盛宣怀的选择和南洋公学经验的模范作用,那么中西合作也还

① 天津中西学堂,见拙著《南洋公学——上海精英与上海近代教育(1897—1937)》(*L'Ecole publique de Nanyang, élite et éducation moderne à Shanghai, 1897—1937*)(巴黎,1990年)。

② 见吕景端编《盛尚书愚斋存稿初刊》(上海,1939年;台北,1963年)第1卷,第3—10页。以下称《愚斋存稿》。

③ 同上。

是有限的。有关这个问题，我们从制度和计划的制定中就可以看出，人是最直接的因素。

盛宣怀：南洋公学创始人、 近代企业领袖、官吏和改革者

盛宣怀出生在江苏武进一个儒吏家庭，自幼接受传统文化教育，1866年中秀才，嗣后三次应乡试，终与举人无缘。虽然后半生名声显赫，但晚年仍对科举失败感到遗憾。19世纪末，盛宣怀以企业领袖和高级官吏的身份对许多“近代化”活动不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还发挥了指导和保护作用。他是在追随李鸿章的同时开始发迹的。1870—1880年间，他对李鸿章的洋务活动向民用企业转化起了关键性作用。为了引导和资助由1872年筹办轮船招商局而引发的经济近代化，李鸿章提出了招商的形式，这不仅使盛宣怀掌握了招商局的大权，而且也大大削弱了招商局“私人”合作者的影响。1881年，盛宣怀任电报局总办。1893年，李鸿章派盛宣怀到上海重建纱厂，即华盛纺织总厂。应该说，这座纱厂是靠盛宣怀奔波筹集私人资金创办起来的。他用于资助南洋公学的款项，大概就是他这些经济活动的盈余。创办南洋公学可以说是一项教育和政治计划的产物；而对盛宣怀和许多与此相关的人来说，这项计划又是因为中日甲午战争失败而形成的。此外，中日战争既使盛宣怀得以解除与李鸿章的上下级关系，也使这所学校成为由他领导的一项主要事业，即他自己的事业。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盛宣怀正在津海关道任上，他目睹这场战争，同时也看清了它失败的原因。中国之所以战败，就是因为它的官兵不懂军事，没有受过任何训练。他认为，军民都应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语言和科学知识。只有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用武器战胜敌人，才能打赢外国人在中国本土上发动的经济战争。李鸿章因为被洋务派对手指控为战争失败的责任者而丢掉了

自1870年起担任的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的官职。尽管盛宣怀的保护者李鸿章在慈禧太后那里还有一定的威信，但是，李鸿章的失宠使盛宣怀的地位受到冲击。因为盛宣怀对李鸿章的影响很大，他也受到了李鸿章失败的牵连。盛宣怀离开天津去上海——他后来的活动中心时，仍然控制着招商局和电报局。此外，他还掌握铁路、^①煤矿、冶炼和纺织企业的控制权，并且用中国资金创办了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在扩大经济活动范围的同时在仕途方面也取得了成功。1896年，盛宣怀官至太常寺少卿，并且享有专折奏事的特权。后来，他居然还对外国人产生了影响。他虽然没有去过西方任何一个国家，不懂西方任何一国的语言和文字，但是，他在这些方面的损失却因他与西方人的频繁接触而得到了补偿。他不但善于从自己的活动中总结经验，而且善于虚心向他人求教。他在帮助父亲盛康（1814—1902）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续编》中还提到了诸如薛福成（1838—1894）、郭嵩焘（1818—1891）等亲李鸿章的维新人物。1877年，郭嵩焘出任驻英国公使，行前曾与盛宣怀会晤。^②在教学这个特殊领域，他不但能借鉴中国人的教学经验，而且能借鉴西方人（传教士或教会其他人士）在中国的教学经验。天津和上海两地既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范例和大量有关信息，又可以提供由外国专家等培养出来的中国专家。中国第一批洋务翻译和专家大都是传教士的学生。为了布道，教会在所创办的报刊杂志及撰写和翻译的著作中描绘一幅幅西方的画面，为传播有关西方国家的知识做出了贡献。中国洋务运动倡导者和维新派承认教会的“才能”，并且从教会的专家那里学到了知识。英国人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在这方面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在江南制造局从事翻译工作达

① 1896年，清政府派盛宣怀督办刚刚设立的中国铁路公司事务。

② 见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1984年），第25页。

28年之久。^①盛宣怀在创办天津中西学堂时曾聘请于1882年来华的美国公理会教士丁家立博士(C. D. Tenney, 1857—1930)^②任学堂总教习。丁家立大概是在1886年脱离传教会投身教育事业的。丁家立在负责天津中西学堂教务之前曾担李鸿章的家庭教师。为了天津中西学堂的招生事宜,丁家立曾直接去函向南京汇文书院监督福开森请教。^③尽管福开森自认为与盛宣怀相识纯属偶然,但我们仍可以说丁家立在他们之间起了媒介作用。不管他们的相识出于何因,它仍然反映了传教会(特别是基督教教会)的教育使命与维新或改良主义思想的融合。如果说,大多数文人和官吏的思想变化对这种融合起了很大作用,那么没有传教会自身思想的相应转变,这种融合也是不可能实现的。福开森在这方面是颇具代表性的。

福开森:传教士、教育家、中国一所 高等学院的美国监院

最初加入基督教的中国人,大都是与外国人有联系的商人。1840年间,中国基督教徒约有百十人。至1856年,基督教传教活动开始出现转机。第一批中外条约签订后,传教士开始陆续在开放口岸定居,并且开始在18个省内传教。1858年,中国有传教士81人,传教会20个;1889年,传教士人数增加到1296人,传教会达

① 见A. A. 贝内特:(A. A. Bennett);《傅兰雅与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19世纪中国》(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坎布里奇,1967年)。

② 见福开森:《丁家立博士》(Dr. Charles D. Tenney),载《中国美术杂志》(The China Journal)(1930年,第13期),第5—6页;又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北京,1981年),第471—472页。

③ 前引福开森:《丁家立博士》,载《中国美术杂志》(1930年,第13期),第15页。

41个。^① 基督教新教传教会与天主教不同,分成若干个差会,并且能够相互合作。新教传教会分别于1877和1890年在上海召开过两次国际性教务会议。会上,在华布道会提出了许多问题,其中主要是有关教育的问题。与会者还就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关于基本策略的争论,即应该强调劝人改宗、教书育人(当然也希望这些人改宗)、培养精英并做出榜样还是聚集更多的基督教信徒(以此给中国官吏造成压力)? 基督教传教士既没有放弃各自的不同看法,也没有做出明确的选择,而是在传教活动中比天主教传教士更明显地倾向于文化教育、培养精英,特别是城市精英。不过,把教育作为传教的一个发展方向是在1900年以后,并且是经过各种激烈争论才明确下来的。而且在19世纪末最后10年间分成三股势力的基督教会,被彻底地卷入了这场争论。^②

布道士愿意将毕生精力献给传播福音这唯一事业。但有的传教士认为教育与传教是不能分割的,因为一个虔诚的教徒应能读懂《圣经》,更何况要为教会培养未来的神职人员。此外,基督教并非只是一种信仰,它也是我们应让教徒了解的一种文明的表现;我们应该把宣扬西方科学看作是另一种使中国人破除迷信、放弃传统、归依上帝的手段。说教的收获虽然不大,但却使一部分传教士把教育从纯粹的布道中分离出来。传教会在为所有中国人的教育

① 赖德烈(K. S. Latourette):《基督教在华传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纽约,1929年),第226、405页。

② 有关教育对基督教传教所起的作用问题,见刘广京(Liu Kwang-ching)编《在华美国传教士——哈佛研究论文集》(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Papers from Harvard Seminars)(坎布里奇,1966年),第11—92、95—103页;白威淑珍(Suzanne W. Barnett)与费正清(J. K. Fairbank)合编《基督教在中国——早期基督教传教会文献》(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哈佛大学,1985年),第135—151页;鲁珍晞(J. G. Lutz):《中国与基督教教会学校(1850—1950)》(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伊萨卡,1971年);鲁珍晞:《在华基督教传教机构——传播什么的福音传教士?》(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Evangelists of What?)(波士顿,1965年)。

做贡献、为“西学”救国^① 培养人才的同时,也就是为所有人服务。教会学校为教外人敞开大门,这只能有利于更广泛地联系民众。既然文人对西方的语言和科学知识越来越感兴趣,那么应当鼓励他们办教育。这就是福开森和美从美会其他传教士的观点。如果说,有关在华兴办教育的倡议在基督教传教会第一次国际会议上曾遭到强烈的反对,那么教育家在第二次国际会议上却占了上风,而且他们的工作成绩还得到了承认。这与福开森的积极努力是分不开的。不过,要想开办高等学校,教育家还必须做进一步的努力。事实上,这些教育家的观点是在1900年以后才被接受的。^②

福开森是受美国美以美会的派遣于1887年10月间来中国的。^{③④} 他到南京之后便开始学习中文,阅读中文书籍,把中国经典著作翻译成白话文,并且很快就开始了自己的教育活动。1888年,美以美会在中国创办了两所学校:一所在北京,另一所在南京。福开森创办了汇文书院,^⑤ 并且担任书院监督(1888—1897)。汇文书院草创时颇为艰难,最初开办的一个预备班就设在福开森的寓所,而且这个预备班当时只有15名学生。^⑥ 1890年,汇文书院开始增设医学课,此后还开设了神学课。^⑦

1893至1899年间,福开森曾与傅兰雅合作,承担了《教务杂

① 前引刘广京编《在华美国传教士——哈佛研究论文集》,第82—83页。

② 有关基督教徒创办高等学校的争论,见刘广京:《中国早期基督教教会学校》(Early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载《亚洲研究杂志》(1960年)第20(1)期,第71—78页;又见前引鲁珍晔:《中国与基督教教会学校(1850—1950)》。

③ 见龙塔(C. Lunt):《当代在华外国人名录》(The China Who's Who)(上海,1926年),第79页;1927年,第77—78页。有关书目见拙著《南洋公学》,第84页注④。

④ 福开森:《福开森博士旅华四十年之纪念文》,载《东方杂志》(1927年)第27(19)期,第36—39页。

⑤ 汇文书院于1910年易名金陵大学。

⑥ 见前引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第448页。

⑦ 同上。又见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编《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1807—1907)》(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上海,1907年),第443页;高罗佩(R. H. Van Gulik):《纪念福开森博士诞辰75周年》(Dr. John C. Ferguson's 75th Anniversary),载《华裔学志》(北京,1941年)第6期,第340—341页。

志》^①“教育栏目”主编工作。这份杂志最初是1868年5月在福州创刊的,1874年转到上海出版,是基督教传教会最重要的刊物。1890年代,传教士就是借助这份杂志的“教育栏目”维护教育地位的。^②1893年8月,福开森在该杂志上发表文章,^③阐述中华教育会的目标。^④中华教育会于1890年在上海成立,福州开森是创始人之一。中华教育会第一次会议于1893年在上海召开。福开森发表的那篇文章实际上是他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文章指出的三个发展目标是:中华教育会应承担编写和发行教科书的任务、帮助培养热衷于教育事业的人、为使传教士担负起让教内外的中国人普遍受教育的任务而奋斗。福开森认为,传教士应以西方教会学校为范例,敞开校门,使所有人接受文化教育。

翌年,^⑤即1894年,福开森撰文驳斥了一位名叫戈登^⑥的传教士的一些想法。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福开森办“教育”的信念更加坚定和明确了。办教育并不是浪费时间,更不像戈登所说的那样会使传教士的活动偏离传教的重心。基督教徒的活动不应仅限于传播信仰。他们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他们的信仰的见证;在使中国人接受这种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推动了基督教事业前进。如果传教士能成功地消除暴力,帮助缩小贫富差距,如果当局在传教士

① 有关《教务杂志》,见库寿龄(S. Couling)编《中国百科全书》(The Encyclopaedia Sinica)(香港,1985年),第105页。1868—1872年时该杂志为月刊,1872年停刊;1874年1月由长老会主持复刊并改为双月刊出版;1885年3月起又改为月刊。

② 前引刘广京:《在华美国传教士》。书中大部分文章都是《教务杂志》曾经发表过的,它们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基督教传教士在传教事务中对教育的作用所持态度的转变,特别是该书的第95—103页。

③ 福开森:《我们教育会的工作》(The Work of our Association),载《教务杂志》(1893年)第24(8)期,第379—386页。

④ 关于中华教育会,见前引库寿龄:《中国百科全书》,第155—156页;《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载庄俞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上海,1931年)。

⑤ 福开森:《教育与传教之研究》(Education and Missions, a Study),载《教务杂志》(1894年)第25(4)期,第177—179页。

⑥ 戈登(A. J. Gordon):《教育与传教》(Education and Missions),载《教务杂志》(1894年)第25(2)期,第66—72页。

的影响下采取各种措施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条件,那么即使没有争取得到更多的人归依上帝,他们也算是为基督教事业的成功做出了贡献。福开森等人的这些想法恰好迎合了那些既渴望自己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又不想因此而与自己的传统决裂的中国官绅的心理。传教士和官绅能在这方面看法一致,也说明他们对中国教育都是持批评态度的。

对中国教育制度的批判

1892年,^①福开森就曾明确指出: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现代教育制度。他认为,传教士应该在发展中国教育方面发挥作用,而不应仅满足于向那些希望同外国人谈生意、作买卖的学生传授英语基础知识,^②更不应企图同那些为科举制培养学生的中国学校展开竞争。相反,他们应向学生讲述西学的基础,传授中国制度中所没有的知识,如有关推理的科学和艺术。同时,他也指出,传教士在传授西方知识时还应尊重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人拥有丰富和悠久的文化遗产。传教士应在学生自己的文化领域内对学生和培养,教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新的思想。传教士如果能取得比中国学校更大的成效,那么他们在培养学生用清晰的笔调阐述对自己国家发展有利的问题的同时,也就克服了中国传统教育中存在的主要弱点——空泛无用的八股文。

福开森曾在1893年一次演讲中逐一指出了中国教育制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例如,中国的大部分学生都是私立学校培养出来的,政府从不对这些学校的教学进行检查。学校的课程没有明确的

^① 福开森:《中国的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载《教务杂志》(1892年)第23(4)期,第149—157页。

^② 福开森:《我们教育会的工作》,载《教务杂志》(1893年)第24(8)期,第379—386页。

规定,教师更无人监督。福开森在从宗教和政治的角度分析中国问题方面表现得既现实又坦率。他认为,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他还指出,负责教育检查的官吏不能总是在考试时才介入教育事务,还应让他们承担新的任务。^① 福开森曾断言,在使现代教育在更大范围内取代旧的教育体制方面,教育与官吏的选拔彻底脱钩将是一件难办的事。新政的迅速演变在印证基本方针的同时也削弱了这种分析,而他的1893年的“计划”就是在这个基本方针的基础上实现的,即传教会的作为只有在中国人自己着手进行现代化活动的前提下才会有意义,才会有成功的希望。福开森还号召传教士参与中国整个教育制度的改革。他指出:

这不过是一个最普遍问题的一个方面,^② 而且这个问题的提出仅仅是为了引起中华教育会的注意:必须高度重视为所有人公开办学的紧迫性。^③ 我们不能只考虑我们自己学校的利益,还应帮助解决普及教育的问题,因为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我们才能使自己在在中国开办的学校处在一个健康的教育制度的发展前列。^④

这个“面向所有人公开办教育”的号召,主要是针对文人发出的,因为“教育家”们在跨越宗教和文化方面的障碍时才意识到,要想使整个中国皈依上帝,必须首先对中国的精英人物施加影响。^⑤ 这种精英教育的观点正是创办南洋公学的指导思想。福开森能与南洋公学的中国创办人持同一观点,说明这种观点也是融合的另

① 福开森:《中国的高等教育》,载《教务杂志》(1892年)第23(4)期,第149—157页。

② 指教育体制的主要弱点和可行的解决办法。

③ 即一种不仅面向基督教信徒的教育。

④ 福开森:《我们教育会的任务》,载《教务杂志》(1893年)第24(8)期,第386页。

⑤ 前引鲁珍晞:《中国与基督教教会学校》,第12—19页。

一个因素。

福开森在南洋公学

福开森在与何嗣焜共同主持南洋公学事务之前就已同中国上层人士建立了联系,并且是个知名人士。1891年秋,两江总督刘坤一^①曾聘请他为洋务顾问,但他谢绝了刘坤一的聘请,表示决心继续献身教育事业。不过,聘请这件事对他来说倒是一次有效的自我推荐,因为他可以因此结识更多的文人和地方官吏,特别是象张謇(1853—1926)^②那样的人物。因此,当盛宣怀企图实施其在上海的计划时,很自然地想到了请福开森负责计划中有关西方事务的问题。盛宣怀和福开森是两年前,即1895年,在上海至宁波的“江孚”号轮船上相遇的。^③他们之间的友情与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已远远超出了南洋公学的范围)直至1916年盛宣怀去世后才结束。福开森在盛宣怀身边始终起着洋务顾问的作用。曾是南洋公学的学生(1910—1915)、交通大学^④教师(1924—1925)和校长(1921、1924—1927)的凌鸿勋(1894—?),曾把福开森排在“客卿”之列,^⑤就是因为当时中国缺少这方面的专家。福开森谢绝刘坤一的聘请,但却毫不犹豫地接受盛宣怀提出的建议这个事实本身,恰恰反映了福开森专心实施对教外中国人开展西方式教育的计划的愿望。他在这同一时期脱离传教会,也说明他决心在教育方面求得更大的发展。福开森和许多传教士一样,最初也是到中国传播基督教信

① 两江总督掌管江苏、江西和安徽三省事务。

② 高罗佩:《纪念福开森博士诞辰75周年》,载《华裔学志》(1941年)第6期,第341页。有关张謇在教育改革中的作用,见巴斯蒂(M. Bastid):《从张謇的文献资料看20世纪初中国的教育改革》(巴黎,1971年)。

③ 有关这次相遇,见福开森为吕景端编《愚斋存稿》(上海,1939年)所写序言,以及福开森:《四十周年》,载交通大学编《交通大学四十周年纪念刊》(上海,1936年)。

④ 南洋公学于1920年代初易名交通大学。

⑤ 见陈明章编《学府纪闻——国立交通大学》(台北,1981年),第163—169页。

仰的,但后来他却被中国和中国的問題所困扰,以致改变了初衷。高罗佩在一篇略带使徒行传色彩的纪念福开森诞辰 75 周年的文章中,把福开森说成是集高级官吏顾问的活动和著名中国文化专家的活动于一身的“学者—官吏”。^①

福开森在南洋公学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我们通过文献资料可以看出,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推动南洋公学办学计划的实施方面。^②福开森自称是南洋公学校长,^③并且说:最初密切合作的三位负责人没有明确的分工;^④何嗣焜只是每周到公学工作三个上午。总教习张焕纶(?—1904)不久就辞去了在南洋公学的职务(1898年8月)。^⑤因此,各类事务都由福开森决定。此外,何嗣焜还把所有同盛宣怀交涉的任务都委托给福开森。^⑥这似乎也是参加 1902 年南洋公学学生运动^⑦的学生们的看法。这次学生运动是因公学华文学科一个班的师生之间出现矛盾引起的。学生利用这次矛盾冲突发泄他们对公学领导的不满,如学生们指责何嗣焜对福开森“妥协、让步”。南洋公学的校舍是在福开森的监督下建起来的,校舍图纸最初也是由他设计的。不过,盛宣怀最初曾责成何嗣焜来完

① 福开森是一位艺术收藏家,他曾经撰写过不少有关中国艺术的著作和文章。有关他的著述情况,见前引高罗佩:《纪念福开森博士诞辰 75 周年》,载《华裔学志》(1941年)第 6 期,第 343—355 页。

② 有关福开森的个人活动,我们只掌握其晚年的一些相关资料,如《南洋公学的过去与未来》,载南洋大学编《南洋大学三十周年纪念征文集》(上海,1927年);《南洋公学早期历史》,载西安交通大学编《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西安,1986年)第 1 卷,第 14—24 页;《四十周年》,载《交通大学四十周年纪念刊》(上海,1936年)。有关福开森对中国教育的看法,除前引《教务杂志》发表的文章,又见《中国科举制的废除》,载《美国东方学报》(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Journal),波士顿,1906年,第 26 期,第 79—87 页;《中国的近代教育》,载《教务杂志》(1922年 10 月),第 1—8 页。

③ 福开森:《丁家立博士》,载《教务杂志》(1930年)第 13 期,第 5 页。

④ 福开森:《南洋公学早期历史》(Early Years of Nanyang College),载《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 1 卷,第 16 页。

⑤ 见交通大学编《交通大学四十周年纪念刊》。

⑥ 见福开森为吕景端编《愿斋存稿》所作序言。

⑦ 这次以“墨水瓶风波”闻名的学生运动,是中国大学里最初几次学运之一。见拙著《南洋公学》,第 345—365 页。相关史料,见上海《选报》,第 35 期(1902年 12 月)。

成这项工作。^① 福开森在建造校舍问题上成功地说服了盛宣怀选择西洋式建筑,并且主张建筑物不要任何无用的装饰。他当时的计划是,这些楼房只供学校使用。^②

福开森在1897年11月与何嗣焜签订的4年合同^③把他本人摆在了一个最普通的位置上。何嗣焜是公学总理,负责制定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被公学聘为监院的福开森不但自己要遵守这些规章制度,而且还要监督公学的教习、学生及执事共同遵守,这也是他的明确职责。^④ 在处罚或开除学生的问题上,他必须事先征得公学总理的同意,因为只有总理才有权做出最后决定。福开森也承担一些教学方面的责任,如监督教习的教学、分配课程、检查学生的学习情况。此外,他每个月还要向公学总理递交一份书面报告。他虽然有权建议修改规章制度,但决定权却在总理;总理出缺时,由总理代理人作决定。福开森被置于公学的中国负责人之一——总理的控制之下。他的根基并不稳固,南洋公学有权随时解除聘用合同。如果公学负责人决定不再续签聘用合同(如1902年),这条规定便是一个理由。^⑤

福开森在施加影响和使用权力方面是否有超越这条严格规定之处?如果我们认真阅读他的回忆文章,^⑥ 那么回答就应是肯定的。实际上,他的回忆已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即他所作的思想准备和他介入南洋公学这个事实。他希望能长期在南洋公学供职,所以他声明要给公学以一切必要的帮助。相反,何嗣焜不住在公学,而且他的主要精力放在盛宣怀控制下的铁路的财务管理上。在

① 见吕景端编《愚斋存稿》,第6卷,第1页。

② 见福开森为《愚斋存稿》所作序言及其《南洋公学早期历史》,载《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1卷,第20页。

③ 见《聘福开森为南洋公学监院(合同)》,载《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1卷,第3-4页。

④ “南洋公学章程”,见《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1卷,第97-108页。

⑤ 见前引《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1卷,第4页。

⑥ 前引《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1卷,第16页。

这种情况下，一些决定就要由福开森来做。然而，由于他的活动常受公学的中国负责人的限制，他自然会抱怨自己的建议没有受到重视。对于他的建议，中国负责人只是在认为与自己的想法一致的情况下才予以采纳。

在南洋公学毕业生的记忆中，福开森^①是一个狂妄自大、企图监督一切、与总教习张焕纶格格不入的监院。在何嗣焜之后出任公学总理的张元济（1867—1959）因与福开森不合而辞职就是佐证。^②学生对公学设监院并不满意。他们认为，既然有中国人担任公学总理，设外国监院就纯属多余。我们通过1902年学运指责福开森以一个中国官吏的姿态行事，对类似问题就已部分地得到了证实。通过分析他的职权——监督教习和学生遵守纷繁复杂的清规戒律、检查学生的学业、行使处罚和开除学生的权力，也可对上述指责做出解释。相反，自1910年起在南洋公学供职的凌鸿勋，却给人们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印象。^③他对批评者一向持赞扬的态度，因此，学生与他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以至他去北京之后，他的学生旅行经过京城时也要去拜访他。

福开森是在本世纪初被迫放弃教育家的活动的。他认为，他的离去是出于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缘故。但他也指出：中国学校中所有外国负责人都应像他一样离开学校。^④丁家立曾遭到自己学生的攻击。福开森在提到丁家立当时的处境时不禁回想起自己当年的境遇，悲伤之情油然而生。^⑤我们姑且不谈前面提到的福开森与中国官吏之间的共同点，就福开森为南洋公学建设所提各种构思和设想这一事实而言，他已把自己摆到中国负责人的对立面上了。关键不在学生和知识分子那种具有鼓动性的民族主义情绪，

① 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北京，1981年），第4卷。

② 前引《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1卷，第27页。

③ 前引陈明章：《国立交通大学》，第163—169页。

④ 福开森：《丁家立博士》，载《中国美术杂志》（1930年）第13期，第5页。

⑤ 同上。

而在教育实用观(如福开森提出的北美教育模式)与合作者的主张之间的冲突。而且,尽管这些合作者创办或领导过近代企业,但他们仍然不会忘记他们所受的传统文化教育及其官吏职责。

教育家与官吏

南洋公学和 在 1861—1895 年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多数近代学校一样,也是在个人的倡导下创办起来的。然而盛宣怀在创办南洋公学时是有着更高的追求的,即不只是通过创办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而在小范围内分阶段地建立从中学向大学过渡的、完善的学校制度。盛宣怀也不仅仅是想为自己的企业培养少量人才。他既是官吏,又是企业家,因此他希望以附属学校的形式扩大教育规模,进而达到为全国培养于近代化有用的“人才”。正如我们下面将要提到的,如果说何嗣焜从满足国内需要出发曾经为创办一所师范学校竭尽全力,那么福开森则为建立学校的等级制度,以及把按年龄分班并因材施教这个新观念引进中国教育制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例如,附属学校的学生(共分 3 个班)只有在读完附属学校一年级的课程,并且掌握每个阶段所学知识之后,才能升入高一年级;而对那些没有学习天赋的学生,只能令其退学。此外,盛宣怀关于为南洋公学学生颁发凭证的主张,无疑也是受福开森的启发的。

19 世纪末,中国的近代学校曾遇到不少困难,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课本问题。南洋公学的课本是由公学教师自己编写的,但是为了编好课本,他们往往不得不翻译日本的教材。在从事这项艰苦的工作方面,福开森曾给予极大的帮助。他是中华教育会会员,同时还参与教材的编写工作,所以他在专业术语的翻译方面极为认真。1895 年他结束对日本的访问之后,曾撰文详细介绍日本各界有关西方著作译本的发行情况和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他还呼吁中

国向日本学习。^① 南洋公学编印的近代课本在被商务印书馆的教材取代之前,曾被视为最佳教材,为全国学校所采用。^②

另一方面就是如何摆平西方教学同中国传统教学之间的关系。南洋公学创办40周年(1937年)之际,福开森在总结这40年来取得的成就时说:南洋公学已经有能力为学生提供两方面的教育,即学生不但可以熟练地掌握中国的文化知识,而且还可以熟练地掌握西方的文化知识。^③ 然而,如何平衡这两方面的教学,却成了一件难办的事情。南洋公学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各方在如何评价和认识公学办学宗旨问题上,仍存在不少分歧。福开森感到遗憾的是,办学之初过分强调了文学,而这是由于要吸引文人造成的,因为这些文人一心想科举及第、步入仕途。^④ 他承认,1898年考试中增加算学和科技知识考试是科举制改革迈出的关键性一步。不过,他也觉得,公学的那种呆板的教学方法和学究气氛,直至1905年废除科举制后才有所改变。^⑤ 使他感到欣慰的是,从1900年起,即天津中西学堂学生为躲避义和团之乱纷纷逃往上海时,他把南洋公学的教学引上了更具西方色彩和技术特点的专业化轨道。公学的“铁路”班就是那时开设的。^⑥

在福开森的思想中,南洋公学的首要任务是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南洋公学不就是靠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拨银创办起来的吗?而且办学之初的理想就是把这所公学办成一所西方式的高等商业学校。^⑦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福开森曾于1901年被派往欧美各国

① 福开森:《西方著作涌入日本》(The Book Crusade in Japan),载《教务杂志》(1895年)第26(10)期,第473—475页。

② 有关教科书问题,见拙著《南洋公学》,第116—125页。

③ 福开森:《四十周年》,载交通大学编《交通大学四十周年纪念刊》(上海,1936年)。

④ 前引福开森:《南洋公学的过去和未来》。

⑤ 福开森:《中国的近代教育》,载《教务杂志》(1922年10月),第1—2页。

⑥ 福开森:《丁家立博士》,载《中国美术杂志》(1930年)第13期,第5页。

⑦ 前引福开森:《南洋公学的过去与未来》。

考察商务学堂。^① 然而,令福开森深感遗憾的是,他于考察后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并未立即引起重视。^② 此外,福开森还建议:为了避免政治方面的干扰,南洋公学应该摆脱政府部门的管理,成为一个由董事会管理的纯私立学校。管理公学的董事会可以由资助公学的上海银行家、企业家和商贾组成。^③ 然而,这个建议也没有被采纳。

毫无疑问,将南洋公学办成一所私立商学院的计划的提出,确实有些为时过早。中国的改革家们因为依恋仕途和传统文化而没有破釜沉舟的精神准备,同时也没有考虑过把一所他们曾想办成公共教育革新的楷模的学校变成一个仅仅用西学培养企业、商业和科技人才的场所。就南洋公学而言,何嗣焜这个既保守又关心公共利益的人物在这些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

何嗣焜:地方官、中国公共教育改革的倡导者

传统的捍卫者和改革者

何嗣焜原籍江苏武进,盛宣怀的远亲,举人、进士出身,领三品衔分省补用知府。曾为淮军将领张树声(1824—1884)的幕僚,负责对外交涉;1884年还乡之前曾随张树声赴朝鲜。^④ 他虽然已辞官还乡,但仍与李鸿章、刘坤一保持联系。1897年,何嗣焜应刚出任铁路督办的盛宣怀的聘请,负责监督铁路建设并兼管财务,^⑤ 而且在出任南洋公学总理期间也没有放弃这些权力。

① 前引《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1卷,第41页。

② 前引福开森:《南洋公学的过去与未来》。

③ 前引福开森:《南洋公学早期历史》,载《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

④ 有关何嗣焜的资料,我们主要参考以下几种:《前总理何梅生先生小传》,载南洋公学编《南洋公学二十周年纪念册》;吕景端编《愚斋存稿》,第1卷,第1—5页;《何梅生先生传略》,载《南洋》(上海,1915年)。

⑤ 前引吕景端编《愚斋存稿》,第1卷,第26页。

与福开森一样,何嗣焜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好的印象。毕业于南洋公学的部分学生在1960年接受采访时^①说何嗣焜是清朝末年的一名典型官吏,很少关心南洋公学的具体事务,整天关在办公室里书写对联。从参加过1902年学运的学生留下来的文字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学生对他的不无讽刺意味的评价。学生对他制定的章程十分不满,指责他像个皇帝,把所有决定权都交给了福开森。也有个别教习批评他过分宽容。他尊重学生,允许学生就各种有关国家的政治问题展开争论。学生也感激他为学生发奖学金,让学生去日本学习。

当然,何嗣焜确实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但是他绝不是没有任何权力,更不是不过问公学事务。如果说,福开森在处理公学的某些事务方面有超越规定权限的行为,那么作为公学总理的何嗣焜在指导和实施办学计划方面却起了直接的作用。从盛宣怀的有关史料^②我们也可以得到证实,如盛宣怀的禀文中明确下来的有关措施的补充部分,就是何嗣焜亲自起草的。此外,为弥补天津中西学堂的不足拟在上海创办一所新学堂的设想,也是何嗣焜提出的。如果说,何嗣焜不能与1907—1920年间出任公学总理的既住在公学又为学生授课的唐文治(1865—1954)相比,那么也就是说,何嗣焜在南洋公学的作用不仅远远不可忽视,而且主要表现在协助盛宣怀制定更加全面的教育规划方面——他为教育改革提出了一个既有保留又有革新的前景。何嗣焜非常重视(或者说偏爱)他所代表的那个阶层和文化。他认为,鉴于天津中西学堂的学生——商贾子弟及未来商贾——国学知识肤浅,南洋公学的学生——文化子弟及国家未来有用之人——一定要有扎实的国学功底,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天津中西学堂对学生的培养是纯技术方面的,并且以教授西学为主要目的,而南洋公学则只能把西学作为补

① 文史资料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北京,1981年)第4卷,第63—64页。

② 前引吕景端编《愚斋存稿》,第6卷,第1—5页。

充引入教学。因此,南洋公学招收的都是熟悉中国经史的学生,入学后再向他们补授科学技术知识。^①

南洋公学为师范班招收的第一批学生大都是秀才或举人出身。由于愿意到南洋公学学习的文人不多,公学负责人不得不想方设法去吸引他们。这种想法与1901年开始大规模改革之前采取的过渡性措施是相辅相成的。盛宣怀向学生保证,他们毕业后能在政府部门谋到职位。盛宣怀和何嗣焜还在《请设学堂片》中建议设立达成馆,^②以培养国家所需要的出使大臣、总署大臣。1900年,特班曾招收部分秀才和举人。这个特班由蔡元培(1868—1940)——翰林院庶吉士、革命者同路人、五四人物——主持,是为经济特科做准备的。经济特科这个戊戌变法中的死婴是由于新政措施出台而起死回生的。然而,变法维新发展速度之快,涉及范围之广,以致很快出现各种变化。达成馆未能办成,特班也因1902年的学运而被放弃。相反,“保守派”何嗣焜倡导开办的师范班却把南洋公学推上了教育改革的顶峰。

和许多中国教育改革者一样,何嗣焜在这方面也受到梁启超(1873—1929)的思想的影响。何嗣焜和盛宣怀是通过梁启超的文章了解梁这个人的。1897年4月间,盛宣怀曾奏请皇帝允准聘用这位学贯中西的年轻举人。^③1896年,梁启超曾在《时务报》上发表了许多有关变法维新的文章,而且大都是论述教育改革的,其中一篇谈到了师资培养问题。^④师范学校创办之前,近代学校的教师主要是那些受传统教育的中国人和讲授外国语文及科技知识的外国人,中国没有考虑过专门培养教师的问题。外籍教师大都不能用中文授课,必须借助翻译,这就给学校的教学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因此,中国在发展近代国民教育时必须建立一支教师队伍,以满足各

① 前引《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1卷,第16页。

② 前引吕景端编《愚斋存稿》,第1卷,第21—22页。

③ 前引吕景端编《愚斋存稿》,第1卷,第26页。

④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台北,1960年),第1卷,第1—92页。

省(包括开放口岸以外地区)新办学校的需要。此外,延聘外籍教师的费用也是十分昂贵的。以南洋公学为例,福开森月薪为豆银 350 两,总教习张焕纶月薪 100 两,而公学师范班培养出来的年轻教师的月薪仅 40 两。在师范班内设附属小学的办学形式,是效仿日本师范学校的做法。何嗣焜还鼓励派学生到国外学习,特别是到日本留学。在南洋公学教授日本语的教师,就是最初派到日本学习的学生。他们也是在日本的师范学校里接受培训的。

何嗣焜与本世纪初的教育改革计划

何嗣焜对盛宣怀的影响,以及他在南洋公学办学方面所起的作用,实际上仅仅是他那些十分广泛的顾问活动中最为明显的一部分。我们知道,那些为朝廷推行新政献计献策的大臣们所依靠的都是他们的幕僚。刘坤一所提议案就是责成何嗣焜起草的。^①这种选择并非出于偶然。何嗣焜于 1884 年还乡之后仍然与刘坤一保持联系。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学校的计划,刘坤一早已耳闻。1896 年春,刘坤一批准了盛宣怀有关创办南洋公学的禀文,因为当时盛宣怀还没有专折奏事的特权。何嗣焜去世之后,盛宣怀曾在奏折中讲(大概也是为了说明自己如何善于选用人才):何嗣焜对刘坤一交办的事情无不尽心竭力;^②为国效忠,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为了寻求中学与西学相结合的最佳办法,何嗣焜经常闭户精思,通宵达旦翻阅中西政书。1901 年 3 月的一个早晨,人们发现他手中握着笔,伏案死去。刘坤一和张之洞最初几次联名奏疏中提出的有关教育改革的建议,是在 1901 年 7 月间公布的。^③1902 年,刘坤一也曾奏请皇帝允准江南各省创办学校。^④所有这些建议无一不反映何嗣焜的劳绩。和盛宣怀一样,张之洞、刘坤一也是在何嗣焜的影响

① 前引吕景端编《愚斋存稿》,第 6 卷,第 1 页。

② 前引《愚斋存稿》,第 6 卷;《何梅生先生传略》,见《南洋》(1915 年)第 1 期。

③ 朱筹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北京,1958 年)第 4 卷,第 4729—4771 页。

④ 朱有瓛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上海,1983 年)第 1 卷,第 785—788 页。

下^①把德国和日本视为“西方”楷模的。此外，他们也和盛宣怀、何嗣焜一样，主张从具备中国经史基础知识的文人中招收学生，并且希望这些学生将来能在新的机构中任职，以便建立一个以中学和大学为中心的国民教育体制。他们还建议逐步建立起一种类似科举制的新的考试制度，但要通过废除八股文、增加新内容来改革科举制。他们不但希望支持学生出国，特别是到日本留学，而且还是最早公开请求派遣年轻师范生留洋的官吏。

*

*

*

福开森和何嗣焜在中国教育近代化方面所做的贡献已经远远超出了南洋公学的范围。这应该说是两人之间的又一共同点。两人的想法和行动一致这一事实所反映的并不完全是对中国教育的一种补充看法。在基督教传教方面，福开森在维护那些进步的观点的同时，主张传教士应关心并积极参与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而何嗣焜则主张在尊重中国传统的基础上逐步进行教育改革。如果说，他们能在中学和西学相结合方面达成共识，并且为同一目标相互配合，那么在中学在教育改革中应有的位置这个问题上，西方教育家和最终主张教育改革的官吏之间应该说是不存在意见分歧的。从这个观点出发，通过对南洋公学中西合作的研究我们便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如果中国的改革家周围能有更多的西方顾问，他们是永远不会放弃他们的初衷的。在创办师范学校方面，梁启超的论据和福开森的经验可以说具有同等意义，甚至可以说梁启超的论据更有意义。众所周知，南洋公学初创时期的教学是明显注重中学的，尽管福开森曾对此提出过不同意见。福开森虽然对南洋公学

^① 艾尔斯(W. Ayers):《张之洞与中国教育改革》(Chang Chih-tung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坎布里奇,1971年),第205—216页;傅吾康(W. Franke):《中国科举制的改革与废除》(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坎布里奇,1971年),第48—53页。

的办学起过一定作用,但是公学是在他被解聘之后才选择以传授科技知识为主的教育方针的。而且南洋公学是在公布学堂(1902—1904)章程和废除科举制(1905)之后才在新的教育体制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当然,公学创始人的威望也对此起了很大作用。不过,1903—1907年间,南洋公学也曾因社会动荡而经历了许多变迁,教学活动基本上仅限于上院和中院。此外,高等实业学堂这个名称虽是1902年由盛宣怀提出的,但直到1905年被正式采用才算是与实际情况相符。南洋公学是一所开拓型学校,它不仅抛弃了初创时的种种犹豫和徘徊,而且发展成为一所非常出色的高等综合技术学校,以至1920年初被定名为著名的交通大学。

译自《中国研究》,第11卷,第1期,1992年春(“Le missionnaire et le mandarin; Deux pionniers de la réforme éducative à la fin du XIXe siècle en Chine” dans “Etudes chinoises”, vol. XI, no. 1, printemps 1992.)

黄庆华译

(责任编辑:丁如筠)

日军战俘学校——大同学园园长

汪大捷先生的足迹

桐生润三

过去日军曾侵占了中国的东北部(旧满州,伪满州)。随后于1937年(昭和十二年)7月7日开始大规模地侵略中国本土。在此期间,中国国民党政府于次年(1938年)为收容日军战俘在西安创立了军政部第一俘虏收容所。最初被收容到这里的是空袭南京时被俘的日本空军士兵。

一位中国政府要员曾邀请留学于日本的高等师范学校(现在的筑波大学的前身)及旧东京帝国大学、熟谙日本国情和语言的汪大捷先生出任这个战俘收容所的所长。汪先生提出了“应以人道的立场对待俘虏,将收容所办成教育场所,所内一切事务要听凭他本人处理”的条件。政府接受了这些条件,于是汪先生辞去了大学教授的职务,就任所长。

汪先生坚信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最终必定以中国方面的胜利而告终,并且认为:“作为邻邦的日本与中国,不能像德意志和法兰西那样,德法两国在过去的150年间从未停止过战争。(中日之间)不应出现这种情况,有必要在某处划上休止符。而中国取得胜利之时,正是这一时机到来之际。”因此,汪先生严肃地声明:中国对待日本“必须以德报怨,化敌为友”。

汪先生首先将战俘收容所改称大同学园。“大同”是中国古代的思想,也是汪先生大力提倡的思想。它也可以释译为“人道主义、

同邦主义、家族主义”等。将战俘收容所改为学校，在历史上可以说是汪先生的首创。正是这个大同学园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战俘学校之先河。

但是，大同学园的日常运营存在许多实际困难。由于当时中国正处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举国民众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同仇敌忾，奋不顾身地投入抗日救国运动。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及“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在全中国尽人皆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汪先生尊重日军战俘的人权的主张及其人道主义实践可谓举步维艰。而且，大同学园地处偏僻山区，交通不便，物资供应困难，经费有限，懂日语的人更是少得可怜。

尽管如此，汪先生夫妇依然为办好这所学校而同心协力。他们的亲密朋友张光祖、白光里、刘麟阁夫妇、周止等也相继来到大同学园，共同携手为大同学园的生存倾注心血。他们的工作几乎是无偿奉献的。他们都是曾留学海外的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但遗憾的是，曾留学法国的张光祖博士解放后曾在监狱中生活了20年。如今出狱了，虽然已年逾八旬，但仍在积极地从事促进日中友好的活动。

大同学园彻底地改变了收容所时代的军人管理体制，成为名符其实的学园。

汪先生的信条是：将顽固的军国主义者、侵略的先锋——日军战俘改造成“日中友好与和平的战士”，将大同学园变成传之后世的日中友好、日中不再开战的发源地。播下和平种子，打好和平基础，这实在是个长远的计划。

对于坚信日本必胜，具有强烈的军国主义思想的日军战俘，汪先生谆谆训导，给他们讲解日中战争的性质及日中关系今后的发展趋势，等等。他还经常讲述阿倍仲麻吕（中国名叫晁衡）、小野妹子、空海、唐朝高僧鉴真和尚的历史业绩。

在大同学园，除了学习之外，还举办运动会、文艺会演、游泳以及远足等活动。自然，在大同学园也没有任何报复、体罚、虐待、苦

役等行为。这实在是以宽容之心、大度之态对待敌国的士兵。因此，日军战俘渐渐理解了日中友好的必要性，明白了日本在中国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它既不是为中国人民，也不是为东亚和平，更不是圣战；同时看穿了日本军部所谓的“三个月完全征服中国”的狂言。日军战俘最终自发地成立了“大同学园反侵略同盟会”。

大同学园逐渐闻名海内外，甚至国外的新闻记者也前来参观采访，《西安日报》、《大美画报》、《大地画报》等报纸多次作了报道。但大多数日本人不仅不知道大同学园，不知道日军战俘的存亡，不知道日本侵略军对华的“三光”政策，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甚至连日本曾经战败也不知晓，因此完全认识不到日中之间的战争是日本方面发动的侵略战争。更有甚者，有的日本人至今还强词夺理说这场战争有利于亚洲的解放。实在是愚昧无知，令人苦恼。

在大同学园创立后两年零几个月的时候，中国政府将其领导机构由“天水行营”改为“西安办公厅”，各级领导几乎全部更换。汪先生也突然被解除园长职务。

对于汪先生在大同学园的做法，有的人能够理解，但反对势力仍根深蒂固。中国人在思想上能够理解汪先生的主张，但在感情上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汪先生最终因受到反对势力的攻击而不得不离开大同学园。汪先生不是一个郁郁寡欢，而是爽快开朗的人。但在自己的远大计划被迫搁浅、所作的努力将化为泡影的情况下，汪先生无法排遣失望的情绪，他曾以一首七律诗来表达极其痛苦的心情。

大同学园、大同学园的思想不幸中途夭折。大同学园又恢复为原来的战俘收容所。假如大同学园继续存在到1945年（昭和二十年）日本战败之日，在世界史上一定会光彩耀耀，在促进日中友好方面一定会对中日两国人民的思想产生巨大的影响。大同学园中途夭折实在令人感到遗憾。

汪先生生于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现年（1992年）86岁。定居于埼玉县川口市。担任“日中人民交流促进会”顾问。他还在群

马县沼田市以原学园的名字创立了大同日本語学院,在川口市指导中国人学日语,参与《日英汉科学技术大辞典》的编纂和出版工作。在这种种活动之余,他仍在寻找大同学园时代的有关人士。

汪先生离开大同学园后,曾担任大学教授。1945年8月,日本战败。中国开始了国共之间的内战。蒋介石总统为了控制满州,于10月将其长子蒋经国及熊式辉、张嘉敷三人派往满洲地区。三人中的最高负责人熊式辉大将请汪先生出山。他对汪先生说:“满洲地区有为数众多的日本人,确实非常需要您汪先生,来满洲当我们的秘书吧!同时这里的翻译工作也希望您承担起来。”汪先生接受了邀请,同年10月13日与三人同机飞抵满洲。汪先生当时的身份是少将秘书官,但他丝毫没有因此而狂傲自大。

汪先生利用一切机会反复地、热情地宣传:“不要报复日本人,中日友好第一,要建立中日不再开战的基础,中日关系今后的发展比曾经发生的事情更为重要。”汪先生的主张数次见诸报端。这对等待撤离的日本人来说是多么难得呀!

曾担任满洲国的重工业总裁的高碕达之助,在日本战败后仍在中国留任。汪先生负责高碕与中国方面的交涉工作。汪先生对这位曾经是敌国高级官员的高碕氏以礼相待,高碕氏被汪先生的态度和人品深深感动,尊敬他、信任他,无论何事都与他商量。两人最终还结为至交,并共同发誓为中日友好竭尽全力。

高碕氏听到过有关大同学园的事,他对汪先生感慨地说:“对大同学园的人道主义精神,我由衷地感动。”当高碕氏回日本时,汪先生为他举行了送别会。不仅如此,高碕氏动身时,汪先生还亲自到沈阳车站(旧奉天车站)送别。由此也可看出汪先生对日中友好的真诚心意。

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控制了旧满洲地区(中国东北地区),汪先生于1947年7月6日随国民党东北行政最高领导小组回到了北京。

金海兰译 (责任编辑:丁毅)

纠偏创新、启迪思路——评介 冯兆基著《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

郭太风

澳大利亚学者冯兆基博士撰写的《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以下略作《军事》)英文版问世后,^①“在国际上受到学术界广泛好评”。该书联系辛亥革命,论述新军的兴衰变迁,其价值既体现在对新军系统详实的刻划上,也反映在从军事角度阐述辛亥革命上;对中国文武关系演变等问题的思辨也颇有新意,从而在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领域里独树一帜。

笔者在完成《军事》英译中的基础上,试将结合中西学者的评论和有关历史研究状况,对该专著作简单介绍并分别展开辨析。

一 对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的纠偏创新

受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刺激,清政府决意组建新式陆军,以取代战守两不足恃的旧式军队。新军在摸索中走向近代化,这是中国军事史上第一次发生的根本性变化。1955年,拉尔夫·L. 鲍威尔的《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以下略作

^① Edmund S. K. Fung, *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anberra and British Columbia, 1980(中译本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

《兴起》英文本问世,^①此后,该书在这一研究领域保持了 25 年的权威地位。而冯兆基的《军事》则对《兴起》作了大量修正,代表了 1980 年以来的研究水平。

《兴起》的价值主要在于,最早较系统地叙议晚清和民国初期的军事史,直到 70 年代末仍在西方学术界独领风骚;即使中译本迟至 1979 年才出版,仍比中国学者取得近代军史通史性成果的时间早了两年,^②无疑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起了开拓性作用。冯兆基受鲍威尔启发,深入考辨,纠偏创新。他的研究成果正如麦金农(Stephan R. MacKinnon)在《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发表的评论所言:“继鲍威尔之后,冯进行了扎实的研究,从而将中国近代军事史的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笔者仔细阅读了这两部著作,认为《军事》视野开阔,涉及军事改革广义影响的方方面面;即使就狭义的军史研究而言,其价值也超越了《兴起》。

第一,从中国陆军近代化起始点和第一阶段主线条的把握来看。《兴起》设定的时间主跨度为 1895—1912 年,即以 1895 年小站练兵为中国陆军近代化的起点,第一阶段结束在民国初期。这种分期法不失为一家之说。1986 年 11 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首届中国近代军事史学术讨论会上,有些学者也持同样观点。但《兴起》的问题在于,鲍威尔为了寻根究源,用了 1/3 以上的篇幅铺叙湘淮军的崛起、练防军取而代之、军工企业的发展,并延伸到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枝蔓过多,冲淡了主线,给人留下不知所云的困惑:鲍威尔认定的军事近代化起点究竟反映在什么地方?军事近代化的标准是什么?

《军事》自定的时间主跨度是,从 1903 年清廷设立练兵处起,到 1913 年袁世凯大致控制全国军队为止。其依据是,1903 年以后

^① Ralph L. Powell, *The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 1895—1912*, Princeton, 1955.

^② 《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年;张玉田等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 年。

的军事改革从军事体制改革着手,而且是全国规模的;军事训练和军事技能逐渐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并受到社会各阶层较普遍的支持,这在中国军事史上是没有先例的。^①《军事》前3章从总体上论述中央到行省的军事改革,脉络分明,要言不繁,勾勒出晚清军事改革的框架。其它章节则对各地区新军的武器装备、官兵状况、教育训练、战斗技能等作了细致的考察,并选取典型事例进行论证,从而有条不紊地论述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第一阶段的过程。保尔·鲁尔(Paul Rule)在《澳大利亚书评》(Australian Book Review)上撰文指出:“冯博士的著作的价值之一,在于阐明了被忽略的中国早期的振武主义。……我们从中得以透彻地考察新军的成份和后勤供给的变化,更深刻地认识中国近代军事史。”

第二,着眼于新军的兴衰及影响。鲍威尔在考察中国陆军近代化时注重“兴起”的过程,但未深究其原因,且对新军的崩溃未作明确的交代。鲍威尔在其著作最后两章里谈到了近代“军事力量兴起”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但行文松散,中心不明,使人读后不得要领:新军究竟朝什么方向演变?是军事力量的兴起还是军事力量兴衰的全部历史影响了以后的军事与政治?

《军事》认为,新军是中国不甘于屈辱地位的产物,是抵御外来侵略、报仇雪耻的“工具”。冯兆基在论述新军朝着近代化方向前进的同时,不断旁证博引,说明传统的腐败现象仍然猖獗蔓延,军官还胜任不了他们的工作;训练和武器装备缺乏统一标准;落后的工业使军事运输和通讯设备极不完备——这就为民国最初几年新军崩溃提供了军事和经济方面的依据。清帝逊位后,军队很快成为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革命时期仓促组建起来的部队流别复杂,军饷无从筹措,哗变骚动层出叠现,加上高级军官各据地势,勾心斗角,从而进一步破坏了军内的纪律和凝聚力,以致“新军很快被革命本

^① 《军事》英文版导论与第10章,第252页。本文关于《军事》的注释,均以英文本为准。

身瓦解了”，^①业已改善的新型军人形象也不复再现。

必须指出的是，冯兆基没能从更高层次上分析新军瓦解的原因，即革命排满的目的达到后，下一步革命目标不明确；军队对外抵抗侵略的宗旨也被政治纷争冲淡；各支部队的近期目标不统一，影响了正规的军事训练，致使军事近代化进程一度中断。尽管如此，冯兆基对新军近代化进程的历史作用仍作了有见地的评价：新军一度达到相当高的近代化程度，大大缩小了中国军队与先进国家军队之间的差距；作为中国第一支近代化陆军，新军在19世纪60、70年代零打碎敲的军事改革和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整顿军备之间，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②这一评价非但恰如其分地明确了新军在军事史上的地位，而且勾勒出中国陆军近代化、正规化的历史轨迹。

第三，历史的判断离不开作者的立场和观点，判断标准的选择有时会影响历史论著的质量。鲍威尔曾以美国军事分析员的身份于1946—1947年在中国服役，政治倾向一直颇为明显。他写新军历史意在古为今用。他在《兴起》导言中坦率地承认：“我的最终目的是阐述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的特征和影响。”在《兴起》的结论部分屡屡展开攻击性的政论，指责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政策和措施，污蔑“今天的中国就像1910年日本军官深入帝国时那样，也被苏联军官渗透了”；对朝鲜战争的结果表示“不幸”，提醒国际反华势力记取教训，注意中国的军事潜力。^③出于同样目的，鲍威尔对近代中西冲突、中国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评论也怀着固有的偏见，发表众多言不及义的论断，从而损害了《兴起》的学术严肃性。他将近代中西冲突的首要原因归之于中国人不把其它国家“作为平等国家看待”，^④为列强侵华强辞辩护；不提辛亥革命的政治

① 《军事》，第9章，第230页。

② 《军事》，第10章，第254页。

③ 《兴起》，第307—309页。本文有关《兴起》的注释均依据内译本。

④ 《兴起》，导论。

性质,简单地论定为“陆军的叛变;”^① 不分析中国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战争的具体原因和性质,武断地得出中国人好战的结论,认为“中国历史上满是向外扩张和内部战争”。……如此史论,无疑出自作者的政治偏见,同时也暴露出其学问根底不深。

《军事》作者冯兆基是地地道道的学者。他在香港大学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后,即于1968年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深造,1972年获博士学位。曾在澳大利亚莫纳须大学及新加坡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1974年重反澳大利亚,在格列菲斯大学先后任高级讲师、副教授、亚洲国际研究院院长等职,并兼任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协会秘书,以及《亚洲研究杂志》与《中国及东南亚杂志书评》编辑。1994年1月起任西悉尼大学亚洲学教授。冯兆基是国际上有相当知名度的中国近现代史专家,论著甚丰:曾与美国的庞百腾(David Pong)教授合编《理想与现实》(Ideal and Reality);与格列菲斯大学的科恩·麦克尔斯(Colin MacKers)教授合著《从疑惧到友好交往:1966—1982年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演变》(From Fear to Friendship: Australia's Politics toward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6—1982);独自完成专著《帝国在外交上的退却:1924—1931年不列颠的华南政策》(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 Retreat: Britain's South China Policy, 1924—1931)。^② 《军事》是他的力作之一。冯兆基跟中国史学界保持友好关系,时常赴中国大陆、港台进行学术交流。

在《军事》一书中,冯兆基在对中国军事近代化进程及其影响进行纯学术性探讨的过程中,力图摆脱中西史学界已有的理论框架和历史结论的束缚,尽量选用中性措辞表述人物的活动和历史事件,在求实的基础上展开思辨,努力创新。他对某些西方学者对中华民族的偏见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历代皇权主要依靠以儒家

① 《兴起》,第257页。

② 冯兆基简历以他近年来给笔者的信件为依据。

理论为基础的文官统治来维持,战争只是维护皇权的必要手段。他将列强侵华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高涨的第一要素。他认为,新军中民族主义抬头与近代军事教育有关,更是对外来侵略威胁的必然反应,“那些批评青年军官盛气凌人或清政府解聘外国教习政策的在华外国人,忽略了中国人对振兴武备的迫切要求。对中国来说,如果没有一支由中国人自己控制的陆军,没有素质良好的军官,军队没有强大到足以保卫国家主权,那么她就无法获得真正的独立”。^①此外,他不赞同中国学者用“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等概念来界定某些军队和社会势力的政治属性,同时也否定了一些西方学者所坚持的有关概念与观点。他对军事近代化导致军队成份变化和中国社会政治异变的辨析是扎实、有力的,同时不让史论异化为政见。作为一个西方历史学家,冯兆基注意客观地和公正地回顾历史,尽可能不受政见分歧的干扰。这种治学态度使《军事》保持了纯正的学术价值。

第四,历史研究中的资料选用也有优劣之分。“历史”似乎应该指过去发生的事实,但实际上它是经历史研究者收集与过去事实有关的材料,并对之作出判断与论述后才成为人们头脑中的“历史”的。巴勒克拉夫说过:“历史学家如果没有一个‘宏观历史’结构,就不可能将‘微观历史’现象纳入庞大的论述体系中去。”^②而微观历史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所用资料的价值。

一般说来,西方中国史学者,包括那些熟谙汉语的专家,很难深入发掘分散在中国各地的尚未整理的史料,往往限于吸取中国学者已经取得的初步成果。鲍威尔和冯兆基在资料收集和运用方面都下了不少功夫,《兴起》和《军事》分别参考了100余种中外文书报杂志及档案文献,后者开列的参考书目更多些,但这不是主要

^① 《军事》,第3章,第81页。

^②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33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区别。《兴起》较集中地引用了《清史稿》、《东方杂志》、《邸钞全录》等书刊。这类史料对中国学者来说并不陌生。而冯兆基则利用许多国家开放历史档案的机会奔波于欧、美、澳、亚 4 洲,收集了不少宝贵资料,尤其是英国外交部档案和美国国防部档案,这是中国学者难以查阅的。这些第一手资料的合理运用使所述历史的可信性大大提高,从而得到西方同行的充分肯定。周锡瑞(Joseph Eshe-
rick)在《澳洲中国事务杂志》(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
fairs)上指出,由于“倚重英国外交部档案,冯使我们不再纯粹地从意识形态角度解释军内的革命骚动,而是更深刻地认识到直接影响士兵生活的社会、经济因素——这些因素显然助长了反清情绪”。

二 充分肯定新军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不受严格的理论框架的限制,将纵深的研究与广度的展开相结合,从专题研究出发阐述社会与政治全局性的变化——这已成为西方历史学家的时尚。冯兆基联系社会、政治的多重层面,对军史进行横向研究,尤其在新军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使不少西方学者觉得有必要重新评价辛亥革命。

历史研究如果纳入单一的模式,就容易以偏概全,所展现的历史在局部上是真实的,但其他侧面却被掩盖了。辛亥革命研究的早期倾向是集中探讨并赞颂同盟会及其领袖人物的思想言行,后来的研究兴趣则转移到省谘议局议员、立宪派人士以及绅商等非革命党人身上,由此又引伸到晚清的系列改革措施在客观上促成的巨变上。中外学者不约而同地沿着上述研究方向走了半个多世纪。70 年代,西方学术界倾向于接受这么一种观点:清王朝最终垮台是立宪派等改革精英们背弃清廷的结果,与支离破碎的革命运动关系甚微。^①

^① 《军事》,导论。

上述思路表面上各有侧重，实际上都突出了上层代表人物的作用，忽略了完成革命任务的主要社会力量。辛亥革命的主力军不是上层代表人物，也不是平民百姓，而是新军。长期以来缺乏全面论述新军与辛亥革命关系的中英文专著。《军事》深入探讨了这一领域，使我们得以从另一角度透视这场革命，从而启迪思路，繁荣学术。

《军事》在论述辛亥革命时注意拓展被忽略的论题：为什么新军背弃清王朝？为什么新军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是不可取代的？清政府组建新军的目的是以此抵御外来侵略，使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免遭进一步蹂躏，以及强化清王朝的统治。但实际上新军却成了专制政治的工具。当新军不愿尽力平息民众骚动时，当新军的民族主义情绪蕴含排满锋芒时，清廷便无法有效地驾驭新军，严重的统治危机便就此潜伏下来了。

冯兆基坚持认为，单单强调革命党人的活动还不足以解释新军普遍背弃清王朝的现象。新军对清王朝失去忠诚是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若干军事改革措施本身就是造成新军失控的重要原因。按新规定，总督或巡抚兼任省督练公所督办，有权筹措驻省新军的军费。《军事》认为，这是清王朝入不敷出、财源枯竭情况下分散财权的不得已措施，结果严重动摇了中央对兵权的控制。1909年起满族官员掌管最高军务，他们平庸无能，不得人心，致使地方军政财务趋于半独立，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已名存实亡。

此外，清政府还规定新军必须在从本省征募兵士，结果土生土长的士兵占了多数。一旦发生骚动，新军往往同情乡亲民众而拒不执行开枪的命令；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观念陈旧的巡防营仍然效忠于清廷，时常被用来无情地镇压民众骚动，甚至对付新军中不可靠的部队的兵变。冯兆基赞同肯特的评论，即认为清政府依仗落后的地方部队来防止先进的国家部队的叛变，反而激化了

军队之间的矛盾。^①

军事近代化本质上是一场政治性变革。新式的军事教育和军事技术的变革使军人认识到科技进步对国家发展的意义,了解当时中国社会与政治的弊病,从而树立起新的国家民族观和明确自身的社会责任。清政府力图将军人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意识引向排外,但正如冯兆基所描述的那样:“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利剑,当它被用来反击外来侵略的同时,也朝满清统治者砍去。”^②

革命通常发生在民不聊生之际,社会动荡对军心有普遍的影响。在清王朝的最后几年里,水灾、旱灾、瘟疫等自然灾害极为严重,农业凋敝,饥荒四起,社会矛盾激化。经济状况恶化导致1910—1911年大幅度削减军费,加上克扣士兵军饷的风气蔓延,普通军人难以养家糊口,结果众生愤怒、军纪涣散。军费削减也使扩建新军的计划难以实施,官佐晋升前景渺茫,不满情绪也在滋长。《军事》认为,军人普遍不满现状是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革命党人不可能制造出军人的怨愤;但是,革命党人的积极活动推动了军内革命思想的传播,助长了排满、反侵略的民族主义感情。也就是说,革命党人利用了军人的不满情绪,把军心思变与社会革命有机地联系起来。冯兆基据此说明,革命在军内发生并得到大多数新军部队的支持是必然的。这就避免了孤立地评价人物或事件。

为数不少的西方学者认为武昌起义的成功有一定的偶然性,正统的国民党学者则视武昌起义为同盟会发动一系列起义后的最后一击,从而低估了湖北军人首举义旗的贡献。与此相应,同盟会领导人和立宪派等改革精英的言行及作用得到极高的评价。中国大陆学术界也有类似倾向,尽管程度上较轻。原因之一是,有关杰出人物的历史记载比较完整,相关的官方文件档案也不难查到,这

^① 见珀西·H. 肯特(Percy H. Kent):《满清统治的结束》(The Passing of the Marchus),第127页,伦敦,1912年。

^② 《军事》,第10章,第255页。

方面资料的相对集中使得一些专题论著的研究中心长期不变。原因之二是方法论上的问题。在革命历史和军事历史的研究中存在着这么一种倾向,即理论上并不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在具体研究中却忽视普通军民的作用,让少数领袖人物的光彩掩盖了芸芸众生的伟力。^① 陈旭麓曾尖锐地批评道,有些人在评论历史时把个人架于时代环境之上,骨子里还是“英雄造时势”的思想。^② 领袖人物的思想言论只有与具体的社会力量相结合,才有可能发展为成功的革命行动,其间还离不开正确选择革命主力军和做好细致扎实的组织发动工作等必要环节。

从武装斗争策略看,同盟会并不高明。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成员倚重会党,暴动旋起旋灭,尽管孙中山称之为“胜利之母”,但由于同盟会的革命活动不仅跟普通民众相分离,而且对军队的工作也做得太迟、浮在表面上,其失败的命运实难避免。冯兆基早在1974年就撰文强调,湖北的革命团体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起来的,跟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关系很松散。^③ 他在《军事》一书中高度评价了湖北革命党人在军队中的独特的策反方式——革命领导人和基层革命组织成员打成一片,把工作重点放在军内。先后加入新军的一批批学生在军界和知识界之间起了纽带作用。湖北新军军官大多毕业于该省军校,与士兵有着乡土情谊,这有利于革命团体开展秘密活动。《军事》探讨了军内各革命团体的连续性,以及组织、策略和活动方面的特色,并由此说明武昌起义是在当地新军有充分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爆发的,是在种种力量汇聚到最适于暴动的形势下发生的。它不是各地起义相继失败后的

① 见陈洪:《上海研究的方法论》,载《上海研究论丛》,第5辑,第6—7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

② 《陈旭麓学术文存》,第11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③ 冯兆基:《同盟会中部总会与武昌起义》(The T'ung-meng-hui Central China Bureau and the Wuchang Uprising),载《中国研究会学报》,第7卷,1974年,第2期。

一个“偶发事件”，而是指引其他各省新军纷起反叛的灯塔。^①

黛安娜·拉里(Diana Lary)在《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上评论道：“冯博士的著作首次全面论述了新军在辛亥革命前和革命过程中的作用。这是极有价值的研究，因为它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回到这样一个问题上来，即这个革命的决定性因素实际上是武装部队。”除湖北新军外，冯兆基还考察了其他地区的新军对武昌起义的态度及其原因。长江流域各省率先响应湖北新军起义，是因为长江连年泛滥成灾，民众骚动较多，军人生活状况也趋于恶化，改变现状的愿望最为强烈。但这些省份兵力相对单薄，革命党人的活动时断时续，不具备发动大规模兵变的条件。华南诸省军饷低微，受革命宣传影响较早，那里的新军很快就响应了武昌起义。华南新军为什么不能单独成功地发动起义呢？因为在华南新军中做宣传鼓动工作的是同盟会成员，他们把工作重点放在少数军官身上，而来自外省的军官跟当地士兵的关系又不融洽，因此整体的革命力量并不强大。

北洋军(北方的新军)待遇优厚，军心相对稳定。冯兆基争辩道，如果因此把北洋军看成效忠于袁世凯的集团，断定这是一支保皇部队，那是缺乏足够依据的。^②北洋军并不是一致效忠袁世凯或清政府的。武昌起义爆发后，驻滦州第20镇官兵拒绝开赴汉口；第6镇官兵不仅拒绝镇压山西“叛军”，而且还屯兵石家庄，切断汉口第1军与北京的铁路通道；即使在汉口与起义部队交锋的第1军，也只满足于对清廷和起义军双方保持威慑力这一点。事实上，新军中的精锐部队北洋军大多以静观变。如果北洋军合力征战，南方新军是难以招架的。所以冯兆基认为，辛亥革命爆发及其初始阶段的进展，是全国大多数新军部队程度不同地同情或支持革命的结果。

^① 鲍威尔断言武昌起义与同盟会领导的多次暴动无甚差别，见《兴起》，第276页。

^② 《军事》，第7章，第186页。

根据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历史发展进程是受内在规律支配的,重大革命事件是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总爆发,并由革命主力军承担重任。这种史学观已为国外许多学者所接受。冯兆基或许无意确定自己的史学观的属性,但他对社会矛盾、新军状况与革命关系的分析,从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角度看,比我们有些论著更实在一些。

我们不妨从军事角度考察武昌起义。如果武昌起义未能顶住清王朝的军事重压而坚持下来,改革精英们和大部分新军部队将继续骑墙观变,全国革命便无从发生。《军事》指出,湖北起义新军实力较强,抵挡住了部分北洋军的进攻,这才把其它省份逼到了险境,使它们不得不在保皇还是革命之间作出抉择。长江流域及南方的新军受武昌地区的军事形势的鼓舞,普遍背弃了清王朝;省谘议局除了宣布追随共和事业,已别无选择。北洋军也认识到,深深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没有多大意义。因此,起义新军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双重的作用:担任武装斗争的主力,这是直接的作用;对省谘议局和地方士绅施加必要的压力,则是间接的作用。当双重作用取得明显效果后,北洋军也由举棋不定到最终抛弃清王朝。这是辛亥革命迅速席卷全国并取得成功的军事原因。

由于起义官兵最关心的是推翻清王朝,起义后他们感到自己声望不足,不具备足够的号召力,所以自愿让军政界地方高级官员和社会名流享受革命成果,以利尽快重建政权,恢复秩序。这既说明了他们为人质朴与政治上幼稚,也反映了客观环境对他们的影响。军事指挥官因而得以跟军外要人和名流合作,成为起义各省的领袖或实权人物。袁世凯后来出任临时大总统不仅是同盟会领袖妥协的产物,更重要的是全国各地绝大多数军事首领当时将中国统一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从武昌起义到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起根本作用的是军心向背所产生的威力和压力,在这一阶段同盟会显然心余力绌。

《军事》论证的军事革命观点使许多西方学者惊愕之余大加赞

叹,说它“填补了”在军事近代化与革命关系方面“相当大的历史空白”。安东尼·陈(Anthony Chan)在《作者与作品》(Quill and Quire)上撰文,称冯博士令人信服地论述了新军在革命中的作用,“这理应使国民党中最坚持党派观念的强硬派相信,在推翻清王朝的过程中,孙逸仙没有起过任何重要作用”。布鲁斯·肯特(Bruce Kent)则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通讯》(ANU Report)上给予很高的评价:冯博士在“对本世纪初组建的新军的历史进行考察时提出了非常宝贵的见解,致使那些自称改革家的满族官员和排满的革命党人黯然失色”。此类评论,在中国学者看来是言过其实的,笔者也觉得难以全盘接受。但是,《军事》促使某些西方历史学家开始重视新军对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变革的作用,促使他们进行多角度的历史反思。

三 重新评价近代尚武观与文武关系异变

西方学术界对《军事》的评论集中在中国军事近代化及其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上,而忽略了该著作关于近代尚武主义崛起与异变的论述。笔者认为,冯兆基对晚清知识分子鼓吹尚武、部分士绅弃文就武以及传统的文武观、近代军人干政等都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

中国历史的主要特征并不象鲍威尔所说的那样,反映在武力开拓疆域和实行军事统治上。儒家学说宣扬仁义、中庸和社会和睦,认为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通常应通过和谈与妥协来解决,战争只是最后手段。冯兆基认为,中国历代战争的终极目的是迫使敌人服从皇权,因此军事思想的原则是尽可能进行“有限战争”,避免“全局战争”。^① 中国崇文抑武的传统跟日本和欧洲古代的价值观形成鲜明的对照,即便描述战争的文学作品着力刻划的也大多是

^① 《军事》,第4章,第90页。

战争的灾害和军人的痛苦,很少颂扬战争和征服者的骄傲。

但是,和平主义仅仅是中华文明的一个侧面,中国传统文明包括和平主义和尚武精神。晚清大力振兴武备与中国尚武的传统并不矛盾。《军事》认为,当军事割据导致政治分裂时,战争就成为确保皇权的必不可少的手段。

由于晚清屡遭外来侵略,新式学人士子便故意夸大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和平主义特征,力图说明崇文抑武的传统使中国积弱,呼吁政府振兴武备,唤起民众的战斗精神。鼓吹尚武与救亡图存的爱国心紧紧相连。这种呼声被某些西方人曲解为中国人富有侵略性。

《军事》冷静地分析了近代学人士子的尚武观,指出他们所谓的仿效帝国主义列强走强国之路,是含有文明进步的意义的,即希望全体国民树立起新的尚武观,协助政府建立近代化国防体系,以达到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的目的,并没有建立军事统治或构筑军国主义思想体系的意图。冯兆基对建立国防军作出耐人寻味的解释:一支充满新生活力的军队不仅是保卫国家的工具,而且将成为社会新道德的象征,带动尚武的民风 and 献身于公益的精神。“作者的这种见解对于辛亥革命准备阶段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和弃文就武的活动,确实是一种独辟蹊径的解释。”^①冯兆基还提到,尚武主义又是面向全民的,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培训大批观念更新的尚武国民。这项教育工作应由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承担,这就是军国民教育。要求实施军国民教育的呼声在统治集团中引起积极的反响。清政府采取过不少改革措施,以便把正规军事教育的革新和普通学堂的准军事教育结合起来。

军国民教育尚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清王朝就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尚武主义的潮流业已形成,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以后的时期。不幸的是,原先那种积极的全民振兴武备的设想,在以

^① 见沈渭滨为《军事》中译本撰写的前言。

后几十年里演变成为军阀的地方割据。”^① 鼓吹尚武是否必定会导致近代军阀崛起呢？可惜冯兆基未再深入考辨。笔者认为，晚清学人和改革者在促进民众尚武意识方面，功不可没，有长远的积极影响。中国人民希望早日结束军阀混战的局面，希望军队主要用于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中国人民以反侵略为核心内容的民族主义明显增长，越来越多的人自觉地投身到“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革命运动中去。这是近代尚武主义健康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辛亥革命发生并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在社会大变动中，人民作出抛弃清王朝的政治抉择。《军事》受题材限制，对民心向背与社会的深层变化未能作全面的论述，但它深入探讨了士绅阶层的变迁、分流及其与军事革命的密切关系。士绅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坚力量。作为封建政权扶持起来的特权阶层，士绅向来属于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愿望与当局维持现存社会制度的政策是大致吻合的。但是，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制度意味着士绅获取地位和权力的主渠道被堵塞，他们面临被社会抛弃的威胁，不得不顺应社会变化，迎合近代化潮流。而与此同时，新军成了社会变革的有力工具，这就给那些彷徨于社会变革十字街头的士绅提供了谋取职业、施展抱负的机会。

区划士绅等第与作用，通常依据其功名级别与社会地位。^② 《军事》以对待社会变革的态度来区划科举制度废止后的士绅，把关心时事政局、热心改革的士绅列为急进派。他们跟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界精英一样，都把个人前程和国家命运融合在一起。有些书生受过传统教育，但失去了博取科举功名的机会，他们的思想意识与士绅是相似的。^③

部分急进士绅投考国内各类军事学堂，或留洋学习军事，形成

① 《军事》，第4章，第10页。

② 见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1年。笔者认为，用“绅士”一词称秀才以上的士子不妥，称“士绅”较顺。

③ 陈志让：《军绅政权》，第13页，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79年。

有先进思想的青年官佐阶层。另一些书生士子直接从军当兵,使普通士兵的总体文化素质大大提高,读书看报、议论时政渐成风气。大量有文化的青年投身军界,使军人的社会形象焕然一新。清政府也采取切实措施提高军人的地位,使军人享有的特权不低于先前的旧式士绅。“当从军不再受歧视,军人不再在等级社会里被列为最低层时”,^①根深蒂固的陈旧观念开始瓦解,晚清军事改革产生的冲击波越出了最高统治集团预定的框架,使清王朝最终自食其果。

辛亥革命爆发前,年轻的高级军官集团已经形成,这些人或在新军部队掌握兵权,或在新式军事学堂身居要职。他们大多读过几年四书五经,又接受了正规的近代教育,是传统文化与近代科技知识结合而成的军界精英,也是下层急进士绅的延伸与变异。他们的民族意识不断添加新的内容,但他们本人又渴望仕途发达。^②这就使他们既不敢冒然发动反清革命,也不愿意尽力镇压革命运动,在辛亥革命中先是观望,进而俟机投入。

发动武昌起义和率先响应革命的官佐,主要是长江流域的军事学堂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他们军事素质良好,在军界地位不如留日系和北洋系,他们希望通过革命改变自己的处境。另一方面,新式教育促使他们更新观念,产生使用武力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感。

地位的不同固然影响了不同层次的军官对待革命的态度,但这还不足以说明,同样为革命党人领导的争取新军的活动,为什么有的屡屡以惨败告终,有的却获得成功?是否深入而持久地组织发动普通士兵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以黄兴为首的留日军校生组成的铁血丈夫团虽有远大志向,却游离于普通士兵之外。孙中山等人曾指望广东籍军官在华南发动革命,但没有深入部队做细致、扎实的工作。《军事》指出同盟会成员在军队中的工作都因缺乏深入持久

① 《军事》,第4章,第112页。

② 《军事》,导论。

而终归失败。

冯兆基直截了当地提出辛亥武昌起义与同盟会关系不大,而这是多数西方学者没有考虑到的,也是中国史学界,尤其是台湾学者,不很愿意细加辨析的论题。这里涉及这样一些问题: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是间接的还是直接的?提出革命思想是不是等同于直接领导了这场革命运动?反清武装斗争的胜利应归功于谁?从对军队策反和武装起义成功的史实来看,上述问题值得重新探讨。

冯兆基充分肯定另一种争取军队的方式,这就是革命党人深入到普通士兵中去。思想急进的青年学生必须先加入军队,然后在合法文化团体外衣掩护下长期从事艰苦工作,以获取军内的广泛支持。军内革命活动的核心力量是有文化的急进军人,他们不受同盟会等革命团体的支配,在反清斗争的策略和方法上独树一帜。他们熟悉军界内情,了解官兵的情绪与意向,能够抓住有利时机发动革命,并且善于把握军事斗争的分寸。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湖北新军的革命活动。湖北革命党人虽然也利用会党的反清传统,但对社会上的帮会势力不很重视,而是注意利用军内的会党成员,让他们在部分不问政治的士兵与幕后的急进分子之间牵线搭桥,以扩大革命活动的影响。

湖北革命党人有能力发动成功的起义,但不具备左右革命形势发展的能量。发动起义的新军官佐人微言轻,投机革命的高级军官也缺乏全国性的号召力,这是因为军内革命活动是秘密进行的,出身于低级士绅的军官集团也来不及树立足够的权威。高级军官一旦响应革命,就指望得到省谘议局和立宪党人的支持。革命排满大势既定之后,各地军队指挥官都相信,迅速恢复稳定可以避免南北军队决战和列强借口干涉的危险。由于军界权威非袁莫属,结束南北军队对峙的政治代价只能是同盟会领袖们作出让步了。

既然掌握近代文化知识的军官大多忧国忧民,为什么辛亥革命后会出现数十年军人跋扈、政局混乱的局面呢?《军事》认为,新

军反戈一击,不仅摧毁了一个旧政权,而且冲垮了中国以文制武的传统统治模式;新旧政权交替之后,往往实施较长期的军事统治。西方评论指出,冯博士提出了一个与近现代世界政治有关联的历史见解,可用以解释民族独立斗争胜利后,不发达国家政治生活中军方作用为什么会显著增长。

在中国传统的统治模式中,军队虽然支撑着皇权,但在承平时期通常不干预政治。新军被清廷视为精锐的国家军队,但受到文职官员的层层制约。与以往不同的是,晚清文武精英对帝国主义侵略都有切肤之痛,普遍怀有民族危亡的忧患意识,军界民族主义情绪增长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清廷的认可,各种政治力量都很重视新军对时局的反应。新军的民族主义斗争的锋芒首先指向满清政权。尚武精神在革命实践中的空前高涨也使军人意识到自身的力量。“但是,辛亥革命使得军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首当其冲,因而在旧政权覆灭后造成极大的混乱。”^①

武昌起义后不久,16个宣布独立的省相继出现25个都督,其中14人是军官。在军官不出任都督的起义省份,地方新政权的支柱仍然是新军。冯兆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军事首领不再是文职精英的附庸,新的省级政权的统治方式是文武结合。^②而且,由于以维护封建帝制为核心的传统思想理论体系迅即崩溃,新的国家学说和调节社会的意识形态并未形成,适应近代社会的以文制武的统治模式便无从产生。

从中央到地方,军人参政、干政成为风气,“拥袁统一阵线”缺乏共同的政治基础。无论从政治分歧还是军人集团利益看,袁世凯无法协调诸多尖锐的矛盾。民国中央政府试图集中兵权,这就引发了地方文武官员之间原已存在的权力失衡的矛盾,从而威胁到都督的职权。都督是革命时期的产物,有掌管一省或一地区军务和民

① 《军事》,第9章,第230页。

② 《军事》,第8章,第216页。

政的大权。都督文武大权一把抓,对中央集权构成一定威胁。《军事》从都督擅权入手分析民国初期文武关系的演变,这一点确有新意。不过,史论求新不宜深入一点,不及其余。冯兆基单纯从军事角度分析民国头几年矛盾冲突的性质,以致将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武装斗争统统归于南北敌对双方借助军队进行以“谋取官职”为目的的权力之争。诚然,革命反袁还不足以全面解释民国头几年的政治矛盾和军事冲突。从更深一层来看,民国政府搬用的西方政治体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无法得到预期效果的,相反它提供了党派争论与文武对峙的场所,而议会和政府就成为矛盾的焦点。

辛亥革命几乎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军方与官僚政治的传统关系。袁世凯去世后,北洋主要派系曾先后设法加强中央集权,企图以本系统武装力量为后盾,借政府名义号令或压服地方军事集团。但事与愿违,争斗不已。许多高级军官热衷于攫取各级政治权力,由于没有社会认可的统治思想和政治模式,这就使各种军事集团越来越不愿接受文官系统的约束。它们抢占地盘、争权夺利,由此进入军阀割据与混战时期。国民党元老中不乏较高文化素养者,他们曾是革命党人,宣扬过用民主政治取代军事专制,以结束军阀割据局面。1928年东北易帜,国民党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国民党南京政府也依仗军队维持其专制统治;文职部门不可谓不多,形式上中西合璧,实际上却降为军事独裁的附庸。《军事》认为,国民党全面实施军事独裁专制,使中国共产党别无选择,只有依靠武装斗争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冯兆基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对文武关系的处理,认为党指挥枪是共产党调整文武关系的必要决策,并已取得相当大的成功。冯兆基对此点到即止,态度是审慎的。

复旦大学近代史学者对《军事》作了言简意赅的评价:“从中国社会内部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中寻求中国军事改革的必然性;从传统的文化结构和知识阶层对军事政变的共识来解释新式陆军的发展,……分析新军起义对立宪派及地方士绅背叛清王朝所产生

的重要影响；以都督擅权和军阀割据论证维护‘以文制武’传统的必要性”，通过叙议结合的方法，“将军史研究与社会巨变结合起来”。^① 这种联系社会变迁的多层面、纵横展开的治史方式是值得借鉴的。

（责任编辑：丁毅）

^① 见沈渭滨为《军事》中译本撰写的前言。

史景迁著《近代中国探索》

斯蒂芬·B. 波尔特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By
Johnathan D. Spence. London, Hutchinson.
1990. 876pp.

本书的确是一部很好的近代中国史纲,我们应该对之进行长期的研读。“近代中国”以何时为起始?关于这一点,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始于1850年,当时西方帝国主义迫使中国开始了近代化历程;二是认为始于17世纪中叶,当时最后一个传统王朝开始了由盛到衰的周期性循环,西欧人和俄国人对中国边界的统一构成严重的威胁。史景迁对近代国家所下的定义是:“既完整又有接受力,对自身的独立性非常确信,同时又能同其他国家平等参与新市场的拓展、新技术和新思想的运用。”(第20页)他认为中国不具备这些条件。作者一开始就从容地考察了1600年中国传统的国家结构,然后探讨了明王朝的快速灭亡以及清王朝的快速建立和巩固。在清王朝不可避免的衰亡和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进入共和政治、君主复辟、军阀政治及国共两党合作等混乱(但在史景迁的笔下显得紊而不乱)的过渡时期。1927至1949年间,中国几乎一直在进行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则几乎一直在经济和社会重建方面进行旨在使中国富强的(尽管不一定是现代化的)各种试验。1978年以来,中国的某些工作重点发生了变化,

但目的依旧。

尽管我们比较熟悉这段历史,但史景迁的论述方法使本书充满了吸引力和可读性。在掌握大量事实的基础上,他以优美的语言和高度的智慧详细描述了这段历史以及有关的争议问题和发展动向。他一般是让事实说话,让读者自己去下结论。从微观到宏观,从宏观到微观,史景迁在提供大量能说明问题的细节的同时,保持了他对历史大背景的总体看法。他利用了西方最新的学术成就,甚至专家也可以从他的著作中得到新的东西。

本书未对文化史进行论述。史景迁把重点放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偶尔也涉及知识分子圈。如果有谁死抠本书的书名,想从中更多地了解 1900 至 1920 年代初之间的宪政、无政府主义、封建主义、君主制度和共和运动的情况(它们与中国未来发展模式的选择有关),那么他将会失望。另一方面,1949 年前 20 年间的军事历史在书中得到了非常详细的描述。史景迁的着重点在他给予不同历史时期的篇幅上反映出来:书的前半部分涵盖 330 年,后半部分则涉及最后的 60 年。

这是一部上乘之作,制作精美,编排确当,收录在内的 50 页的索引资料更使它成为一部有价值的参考书。有许多理由称赞这本书,并希望它获得成功,而绝不是因为它的价格极为低廉。

译自《亚洲事务》(Asian Affairs),第 22 卷,第 2 部分,1991 年。

杜继东译

(责任编辑:丁如筠)

迈克尔·Y. L. 卢克著《中国
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形成中
的一种意识形态(1920—1928)》

格雷戈尔·本顿

The Origins of Chinese Bolshevism: An Ideology in the Making, 1920 — 1928. By Michael Y. L. Lu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366pp.

在研究中国共产主义的早期历史时,我们应该注重它是从莫斯科传过来的,还是它在北京和上海被接受的。换一种说法,即共产党怎么是这个样子,怎么会中国化?在德里克、沙培德和其他人使我们注意到其内在根源之前,许多人都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舶来品,是共产国际带给中国的。迈克尔·卢克深入细致地研究了20年代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认为它是“独立且独一无二的思想体系”;他还发现,它后来对“毛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影响比通常人们想象的要大。许多论述共产主义的作者都从莫斯科的角度来看待“布尔什维克化”,认为这是苏联按照斯大林路线统一各个外国共产党的计划。与此相反,卢克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要把自身建设成为“地地道道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一种愿望。他的分析颇有新意和价值。他认为,20世纪初叶的中国知识分

子有充分理由接受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无政府主义显然为此提供了前提条件。但是卢克认为,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具有传统的唯意志论思想、革命精神以及权力主义,所以“五四”时期中国的激进派是“本能的”列宁主义者。刘少奇说,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即“继承了”布尔什维主义。但是卢克指出,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初叶对党的列宁主义理论知之甚少;相反,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自然而然地”体现了列宁主义思想的许多基本东西。特别是他们在尚未读过列宁著作之前即相信“群众”是十分落后的,没有精英的领导,革命是无法进行的。他们还为中国的“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作出了极大的贡献。1924年底和1925年,他们开始(作为新的“宣传计划”的一项内容)怀疑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声称要用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卢克说,他们是按自己的意愿采取行动的(尽管共产国际同意他们的新路线)。他们甚至提出了跟共产国际完全无关的思想观念,例如,1924年陈独秀提出的“无产阶级民族主义”概念。

卢克认为,中国布尔什维主义的出现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内在和外在的因素、连续性和非连续性因素都起了作用。他的研究方法值得称赞。其著作资料丰富、思路清晰、描述确当、观点公正客观,确为典范之作。我与他有争议的是他对某些特别的事件和决定的解释。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一心致力于”使党无产阶级化,这在布尔什维克传统中是“不同寻常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对他的这个论点,我尤其不敢苟同:这根本不是独一无二的,而是1924年斯大林的“为纪念列宁而征收党员活动”的翻版,该活动的目的是向苏共输送“来自工作台的工人”。我对他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计划”的来源的分析感到费解。这个计划真像他所说的那样是由他们自己发起制订的吗?我认为,我在《中国季刊》第102期中提出的论点是正确的,因为我在文章中提出的证据表明新路线是从莫斯科传入的。

译自《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第126期,1991年。

杜继东译

(责任编辑:丁如筠)

叶文心著《中华民国
的文化与政治(1919—1937)》

阿里夫·德里克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By Wen-hsin Ye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449pp.

本书对日益增多的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著作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贡献。我认为,这是把中国近代史上的高等教育问题作为综合性的社会和知识分子问题进行研究的第一部著作(有别于深入研究单个问题的著作)。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历史学家们承认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史上起了重大作用,但他们基本上忽视了知识分子活动中的这一最重要的部分。在这个问题上,本书是一个重要的开端。本书的研究细致入微、精辟入里,对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深刻的见解,可读性很强。

叶关心的首要问题是,知识分子文化是怎样通过 20 世纪中国的高等教育赖以存在的那些特殊方式形成的。题目中的“疏远”一词既指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位置,又指他们与政治的关系。她的研究中有三个论题最为重要:第一,中国的教育负有重新确立知识分子的定义的重任。这是 1905 年废除科举制度的后果。千余年来,知识分子在与社会和政治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由科举制

度确立的。第二,她认为,这个重任非常复杂,原因不仅在于1911年民国成立后政治秩序彻底崩溃,更重要的在于伴随着欧美帝国主义势力向中国社会渗透,社会和地区关系发生了变化。第三,高等教育是直接(通过外国的教育活动)或间接(通过采用外国的教育模式)受外国语言(文字上和隐喻方法)和方法的影响而形成的。这些外国语言和方法使中国知识分子的成果与他们面临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

本书的重心在于揭示这些势力是如何分布到某些特定的教育机构的,在于展现为出现的问题提供不同解决方法的互相竞争的教育模式,在于说明这些不同的解决方法未能完成创建一个可靠(或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教育模式的任务的缘由。叶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教育机构是不独立于其社会环境而存在的。各种各样互相竞争的教育模式不但没有给在多元化过程中受社会离心力量支配的知识分子文化带来多少统一性,反而把原有的统一性一扫而光,而统一性正是新兴的民族主义政治文化所需要的。研究的重点放在北京和上海的教育机构上,大多数近代化的教育机构都集中在这两个地方。北京和上海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关系有所不同,其政治和文化传统也有所不同。它们使作者在新兴的教育模式方面发现了重要的地区性差别。本书重视私人教育超过公共教育,同时又谨慎地把中国和国外的私人教育机构区别开来。我认为,对私人教育机构的重视减轻了对上海的研究的分量。对方兴未艾的革命运动对教育的影响,作者始终极为敏感。两次事件对本项研究尤为重要:一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二是1927年革命力量的分裂——这导致中国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局部统一。“五四”运动以其文化繁荣和革命运动使教育机构增添了活力和生机。另一方面,1927年革命派的分裂引起了政治上的幻灭,对教育造成了消极影响。本书的最后两章对这一分裂以及国民党通过“参与”以统一教育的活动是如何加深知识分子分裂的过程作了精彩的描述。

叶在论述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近代中国教育面临的困难(或

者说矛盾)处境:国家统一所要求的知识分子文化的统一性与环境造成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本书表明了对多样性的赞美,不是因为它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教育界,而是因为它抽象地确认了美学中的个性。本书也称赞了那些在20世纪30年代面临“被隔离的学术”的知识分子。她最同情的是朱光潜。她把他的态度描述为“唯美主义的道德准则”。

本书也存在一些缺点:对应该探讨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学生的实际活动、教育机构中班级的构成、毕业生的职业选择等,本书研究得很不充分;对妇女的研究那就更谈不上,而妇女是当时新近进入教育界的一个重要团体。本书也未进行比较研究,而比较研究也许能使本书对教育在社会中以及中国在全球关系中的位置的研究更加贴切。尽管如此,本书仍是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史上的这个中心问题的一部重要著作。

译自《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第64卷,第4期,1991年。

杜继东译

(责任编辑:丁如筠)

托马斯·G. 罗斯基著
《战前中国经济的发展》

罗伯特·Y. 恩格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By
Thomas G. Rawski.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448pp.

托马斯·G. 罗斯基的这本书是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大贡献。书中包含了罗斯基对战前中国农业和非农业生产、投资、消费、货币供应和人均产值等的新的综合性评价。罗斯基还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即中国的经济在 1912—1937 年间没有停滞或衰退,而是有了很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势头使它度过了困难的战争年代,并促进了 1949 年以后它的快速恢复和发展。

罗斯基认为,战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国内民间营销队伍的发展。由于财政困难,国家的作用十分有限。虽然外国经济的直接影响比较小,但对外贸易以其对农产品出口的需求(这促进了农业的商业化)和对新产品及新生产方法的引进(这促进了仿制和替代进口产品的生产)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催化作用。对外贸易的影响因货币、财政、运输和通讯方面的革新(这些革新降低了交易成本,拓展了市场)而得以扩大。长江下游和东北等发达地

区对经济发展的推动甚至影响到边远的农村地区。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的那种破坏旧势力的活动尚未充分展开,近代化的经济活动就已对传统的生产手段作了补充,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强有力的刺激。

三个方面的思考有力地支持了罗斯基的论点,尽管他赖以进行评估的资料常常不太过硬。第一,罗斯基巧妙地运用间接评估的办法,避开了无统计资料或统计资料不全的问题。考虑到约翰·L.巴克关于提高农村生活水平的调查报告中的抽样数据也许不具有代表性,罗斯基以棉花消费量的上升和工业及矿业工人工资的增加为论据,令人信服地指出农村的收入有了增长。他的假设是,棉布需求量的伸缩性非常之大,工业主愿意以最低工资吸引农村工人。第二,他非常谨慎地采用保守的数字,以免夸大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第三,他所作的许多估计勾画出了战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完整画卷。

罗斯基的书将促使大家对一系列问题进行进一步争论。第一,中国的市场结构是象罗斯基所说的那样充满竞争还是像其他学者认为的那样由垄断资本家和垄断势力主导?罗斯基本人认为或许可以做这样的推断,即核心地区的特点是竞争,而边远地区则以市场垄断力量为主导。第二,虽然政府的开支只占国民收入的很小一部分,但政府的介入在某些特别时刻和对某些特别地区仍然十分重要,尤其是考虑到政府的政策具有客观性。罗斯基指出,1957年山西省获得高额人均工业产值是战前阎锡山进行工业化努力的结果。30年代大萧条时期中国经济状况良好,部分原因可能是银行和税制改革的实行以及政府对交通和通讯进行了投资。第三,正如罗斯基所指出的,他的书没有涉及各地区和各阶层的收入分配问题。将来对落后地区经济的研究或许可以说明经济利益的扩散程度。

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将继续参考罗斯基这本书,因为它对传统观点提出了许多挑战,并含有大量的经济资料和关于经济机

构和经济运行过程的许多信息。

译自《亚洲》(Asia),第96卷,第1期,1991年。

杜继东译

(责任编辑:丁如筠)

托马斯·G. 罗斯基著
《战前中国经济的发展》

古炎民*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By
Thomas G. Rawski.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448pp.

当我阅读史景迁的《近代中国探索》时,我常常想到一点:中国的党史是过去的继续和延伸。这种看法在罗斯基的新书《战前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再次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果我们认为史景迁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有一些推测的成份,那么罗斯基的研究则以更坚实的实证为基础。正是这种实证的态度使作者能够否定或修改许多关于 19 世纪末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传统看法和解释。

战前时期是经济停滞或大幅度下降时期的看法在中国史研究中很盛行。罗斯基把重点放在制造、银行、金融制度、运输、通讯和投资等现代行业上。罗斯基阐明,尽管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极不稳定,但那个时期中国的经济仍然得到了重大的发展。在工业、运输和银行业中运用的新技术甚至为远离现代经济活动集中的沿海城

* 古炎民(Yanmin Gu,音)

市的内地村民提供了新的机会。技术的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统一,加强了经济对动荡局势的抵抗力,在政治不稳定、外国入侵和经济波动的情况下保持了生产的发展。经济发展是全国性的,包括农业等每一个重要的经济领域。

罗斯基的论述很有说服力,但他在书中提供的某些资料过于单薄,难以支持他的论证。尽管存在这一小小的缺憾,我认为本书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著作,特此向研究中国史的学人以及对对中国问题有兴趣的读者推荐。

译自《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第26期,1991年。

杜继东译

(责任编辑:丁如筠)

凯文·P. 莱恩著《主权与现状：
中国的香港政策的历史根源》

彼得·韦斯利-史密斯

Sovereignty and the Status Quo: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China's Hong Kong Policy. By Kevin P. Lan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0. 167pp.

莱恩的论题是，中国素来对香港主权的要求与不愿打破现有安排的作法之间的矛盾关系。中国对香港政策的特点是妥协和灵活，尽管目前的事态发展造成了一些困难，但妥协性和灵活性也许会继续保持下去。本书风格平实、立论确当、对历史的研究清晰而简明。作为对香港问题及其历史进程和政治环境的全面介绍，本书与已出版的其它著作同样出色。

本书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本书第 11 页称，外国人对中国海关的控制剥夺了中央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源。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赫德爵士和他的继任者都是中国的雇员，负责为中国政府征收关税。经咨询枢密院而不经过议会颁布的敕令不能“修改”一项条约（第 52 页）。关于 1979 年默里·麦克尔霍斯与邓小平会晤的论述（第 86 页）过于简单，使人们对“失去”香港过程中的某些重要问题知之不详。莱恩提及使香港政府在 1997 年以后不能继续租借新界

的所谓“法律上的窘境”(第 89 页),实际上,这个窘境是指政治上的和外交上的,而非法律上的。近来的事态发展或许推翻了这种观点:只要能够平稳过渡,中国官员就不会在 1997 年以前干涉香港的内部事务(第 146 页)。与莱恩的观点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悲观的看法也许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赞同:社会主义的官员们将能够轻而易举地以他们的前任在香港还是英国殖民地时愤而放弃的那种态度干涉香港的事务。过去的事也许没有实质性意义,因为所有的人都已承认中国对香港的主权要求。原来的矛盾已获妥善解决,使以前中国采取的灵活性变得毫无必要,至少在英国国旗降下来以后会如此。

这是一本篇幅不长的书,如果更广泛地查阅资料,其论述就会更好一些、更详细一些。其中有一本参考书是陈罗凯琴(Chen Lau Kit—ching,音)的《中国、英国和香港(1895—1945)》(1990 年)。该书是与莱恩的著作同时出版的一部内容详实的专著。该书把某些问题放在较短的时期内加以考察。不过,这并没有降低莱恩的著作的价值。

译自《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第 128 期,1991 年。

杜继东译

(责任编辑:丁如筠)

凯文·P. 莱恩著《主权与现状：
中国的香港政策的历史根源》

诺曼·迈因纳斯

Sovereignty and the Status Quo: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China's Hong Kong Policy. By Kevin P. Lan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0. 167pp.

本书考察了自1912年以来历届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政策。作者认为,尽管中国领导人和外交官在公平讲话时均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完全恢复中国的主权,但中国的实际行动一直受到这两个方面的主导:谨慎从事,以期被视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认为保持香港的稳定能给中国带来经济利益。1950年以来,中国政府也一直关注着针对香港的任何行动对台湾的影响。作者的分析以现有的研究这一时期的权威著作为基础。作者没有提供任何新论据或对历史资料的新解释。作者没有对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进行研究。例如,1929至1936年中国和香港为签订商业和关税协定而进行的未获成功的谈判;1950年英国承认共产党新政府后中英之间进行的谈判等。

本书特别注重中国的政策及其实践,而对英国方面的情况则未予重视。实际上,英国政策的改变影响了中国的态度和实际行

动。例如,1951年后英国驻军人数的缩减使香港处在完全受中国支配的境地,而这种情况以前是从未出现过的。1982至1984年导致中英两国签署“联合声明”的谈判是由英国的企图促成的:英国企图在看上去绝对有利的时机扩大新界的范围。

作者声称,中国由于考虑到从香港获得的经济利益,所以一直不对香港采取极端措施。1950年以后,情况也许真是如此。但在20和3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香港是依附于中国经济的寄生虫,它分散了原来以广州为集散地的国际性贸易,是严重影响中国关税收入的走私活动的基地。在1912、1922和1925—1926年,广州政府曾竭尽全力要在商业方面毁坏香港,并多次打算大力发展黄埔港以超过香港。1937—1938年,香港成为进口军火的重要渠道,中国政府只是在这一短暂时期承认其作为自由港的价值,并采取措施把广九铁路和广汉铁路联结起来,而在此之前的30年间,中国政府一直拒绝把这两条铁路连在一起。从1952年开始,中国在扩大出口的同时,尽可能少地利用香港进口外国商品。1979年之前,中国从香港的进口数量一直未恢复到1951年的水平。

作者认为,对过去中国的政策的研究可以为思考未来提供背景材料。他对1997年以后香港的前景持乐观态度,尽管他警告说1997年后存在中国过度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管理事务的危险。然而,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主要关注的似乎是,香港会成为针对大陆的颠覆活动的基地,从而威胁到共产党的统治。中国决心使自己的意愿在香港占主导地位而不计较失去国际贸易信誉和香港企业家及专业技术人员移民海外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与1967年的骚乱不同,这显然不是暂时的偏差,而是此前中国的香港政策的大转向。

译自《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第64卷,第2期,1991年。

杜继东译

(责任编辑:丁如筠)

近代改革者伍廷芳

Wu Tingfang, 1842—1922,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y Pomeraniz Zhang Lind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2. 320pp.

清末民初的重要人物伍廷芳是中国政府政体中先锋派改革家。

作为中国第一位律师，伍廷芳很快便成为香港一位有立法权的议员。1882年，伍开始担任李鸿章的前期助手，除了历任清驻美国及其他国家公使外，他寻求在法律、外交和管理诸方面实施改革。1911年，他在通过谈判使清帝逊位上发挥了作用，并且出任初建的中华民国司法部总长。晚年仍继续支持孙中山的主张，坚持民国的宪法原则。

这本传记全面评论了伍廷芳——本世纪转折关头的积极的政治家和改革者的一生，披露了中国史上这一严酷时期诸方面的情况。

作者从60年代初期开始致力研究伍廷芳。这本关于伍廷芳的生平的论著参考了伍廷芳的公开的书信文件集和品种繁多的原始文献资料，并增补了伍一生中结交的许多知名人士的著述，成为一部关于政府要员伍廷芳的政治传记。正如原始资料所揭示的，传记

集中注意力于伍廷芳的业绩和思想,很少涉及个人生活和情感问题。这本传记尽可能根据原始资料详细地介绍中国近代政治史,介绍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具有文化上的爱好和受过教育的海外商人家庭(在伍的同代人中,这种家庭背景的人很少)出身的才子的政治生涯。作者在书中试图尽力展现清朝末年伍廷芳及其周围人物所亲身经历的历史变革。最后,该书指出伍廷芳及其同僚们在民国初年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时所遇到的不可克服的难题。

该书共分7章:殖民地发源地(1842—1847);香港律师(1877—1882);进入李鸿章幕府(1882—1896);在美国的期望与失意(1897—1902);面对新时代(1905—1911);伍廷芳与辛亥革命;政界元老(1912—1922)。

万 燕编译

(责任编辑:丁如筠)

从波茨坦到冷战：三巨头外交

(1945—1947)

From Potsdam to the Cold war, Big Three Diplomacy, 1945 — 1947. By James L. Gormly. Wilmington Scholarly Resources. 1990. 256pp.

东西关系近期的发展不断提出了一些问题，它们均针对 1946 年结束二战的一系列和平谈判所一直保持的平缓不动的局面：如此强大的德国为什么竟能容忍这种局面？美、苏难道就有权支配其他弱小的欧洲势力的命运吗？世界的超级霸权能够和平共存吗？

在《从波茨坦到冷战》一书中，高力考证了特定的理由和根源，论述了为什么在二战期间由三巨头外交创造的国际合作体系没有为战后国际间的稳定打下基础。虽然在战争结束时，既不是美国、苏联，也不是英国在寻求冲突，但它们关于欧洲的不同议事日程迅速形成了。作者在追溯自 1945 年 7 月至 1946 年 12 月一系列和平调解会议所造成的战时合作的破裂的同时，论证为什么和平谈判是导致冷战的根源。

该书共 8 章，它们分别是：通往波茨坦的道路；波茨坦会议（1945 年 7 月 17 日—8 月 2 日）；大联盟的衰落（1945 年 9—12 月）；和苏联人打交道（1946 年 1—6 月）；在巴黎的僵持（1946 年 4 月 25 日—5 月 16 日）；外交部长们的再度尝试（1946 年 6 月 15 日

—7月12日);巴黎和会(1946年8月6日—10月13日);寻求稳定、寻求安全。

万 燕编译

(责任编辑:丁如筠)

1992年日本关于中国近代史 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宫田道昭

众所周知,目前近代中国研究正处在转换时期。与以往以革命史框架为前提的研究不同,新的研究者多从其它角度进行探讨。尽管如此,新的研究也刚刚起步,整体上仍处于浑沌状态,但可以说,正是在这样的时期我们才更有必要不去人云亦云,而是重新审视自己身边的情况。久保田文次的《围绕中国的近代化》(辛亥革命研究会编《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汲古书院)提到了近年研究的变化。他认为,以往的普遍提法是以革命史、人民斗争史为中心研究的结果,而用这一标准来衡量,以往对未被评价的体制或民众的多样性活动所做的考察是不充分的。作者总结了近年来对普遍提法的批评意见。但是,我们在这里谈的“对普遍提法的批评”(尤其是沟口雄三的批评)实际上是针对近代中国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者的立场、态度问题。在这种批评中成为问题的并不是那些普遍提法的表面结论,而是其研究方法和研究体系,即这种普遍提法为什么能够如此长久地在学术界占据统治地位。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一种假设性的普遍提法之所以在学术界占了优势地位,与其说是由于实证研究的积累及其说服力,毋宁说是由于战后的时代状况和权威性理论。这样说来,普遍提法是在中国研究之外赋予其权威性的。现在随着时代和理论的变化,近代中国研究似乎也有很大的改观。但是,以前的那种研究态度和作风在我们中间仍有残留。问题

在于我们能否创造这样一种研究氛围,即一种不凭借权威或集团而是能根据对“个案”的判断力自由地开展批评和讨论的氛围。

本文拟归纳总结 1992 年的研究动态,以研究论文为中心按经济、政治、对外关系和思想四方面顺序来谈。

社会经济关系方面。近年来的倾向是重视历史的连续性。与以往仅将近代的一个个现象分割开来,以既定标准进行评价的做法相反,近年来的研究力图追溯到开埠以前,或直到现在为止,在这样一个长时期的视野中把握一个个现象;并在此基础上同将历史分割为一个个横断面、将中国社会分解为一个个地区进行探讨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这样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首先让我们看一看以各地区的社会经济为对象的研究。以往多是从土地占有关系出发来认识地方社会的。近年来,宗族作为地方社会的核心受到重视。菊池秀明的(1)《太平天国前夜广西的移民与“客籍”精英》(《史学杂志》,10:—9)和(2)《广西藤县北部的移民与太平天国》(《中国近代史研究》,7)从宗族这一新角度从广西社会内部探讨了太平天国产生的基础。两文均是作者利用在广西当地搜集的族谱和人们的口述写成的。论文(1)考察的是金田地区。论文(2)考察的是李秀成的出生地大黎乡。它们阐明了以有实力的宗族、家族分支为中心的社会秩序在这些作为汉族移民社会的地区形成的过程,暗示宗族间、分支间的对立与拜上帝会的渗透密切相关,很有意思。不过,菊池关于太平天国的研究还只限于提出其前提条件,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入展开。关于宗族的事例研究方面,西川正夫的《四川省隆昌县郭氏札记》(《论集》,载金泽大学文学部,《史学》,12)颇为详细。族内有实力支系的变换见于 19 世纪,文章暗示这与隆昌县的夏布生产有关。在菊池的论文(1)中也提到了广西稻米外运这一商业活动,认为它是强有力的宗族兴盛的原因之一,并指出宗族与地区在经济上结合的重要性。另外,作者将视线放在宗族研究上,但似乎忽视土地所有关系。从这个方面说,夏井春喜的(1)《太平天国与苏州农村》(《纪要》,载北海道教育大学,《社会科

学》，43—1）、(2)《关于清末、民国时期江南的租栈经营》(《史流》，32)引人注目。论文(1)探讨了太平天国给苏州的地主—佃农关系带来的影响，指出了这一关系从个别的私人关系向所谓收租组织化和公共权力介入这种公共关系的变化。论文(2)对苏州一家租栈的帐簿做了数量分析，认为地主的实际所得在民国初期增加了。夏井氏的论文可以说是阐明收租、纳租实态的宝贵之作。只是纳租以外的农业经营诸问题以及地租与生产、地租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似乎被搁置起来了。另外，关于江南的地主制度，小岛淑男的《清末民初江南的田业会》(神田信夫先生古稀纪念论集编纂委员会编《神田信夫先生古稀纪念论集·清朝与东亚》，山川出版社。以下简称《神田论集》)就地主、佃户及各自的组织化做了论述。另外，从内部的市场结构出发考察地区的尝试也在进行之中。森正夫编的《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考察了江南市镇的过去和现在。其中第三章——稻田清一的《关于清末江南的镇董》指出，清末以市镇为中心的行政区域是由被称为“镇董”的有实力的人物管辖的，这一体制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背景，在开埠以前已经形成。森胜彦的《清代、民国时期山东省中心地区的扩展(一)》(《论集》，鹿儿岛经济大学，33—1)以地方志为基础，将山东省的定期集市的分布及其推移通过数字加以表现。但存在这样的可能，即所依据的地方志不同，定期集市的标准也不相同。这样一来，对数字所表示的意义加以确认就很有必要。主张地区经济独立化的山本进在《清代后期四川省地方财政的形式》(《史林》，75—6)中提出了四川省的财政问题，将19世纪后半期的厘金及地方财政的独立化追溯到开埠以前，并将此解释为乾隆中期以后的商业课税及其财政体制被继承发展的结果。正面研究东北地区社会经济的论著有塚本进的《近代中国东北地区的农业发展与铁路》(《社会经济史学》，58—3)。此文脱离了帝国主义统治这一政治观点，客观地考察了铁路给东北经济带来的影响，认为20世纪前半期东北农业的发展是通过依靠铁路实现的关内移民的流入及农产品外运的影响所致。但是，如果按照以铁路

为中心整理出来的数据加以分析,那么浮现在我们眼前的必然是周边地区在外因作用下形成了与世界市场接轨的外向型农业的景象。所以有必要采取另外一种方法和角度来探讨各地区的内在发展。还有,从列强之一的法国入手考察铁路建设的篠永宣孝的《云南铁路与法帝国主义》(《土地制度史学》,136)一文认为,铁路建设的结果未必与本国经济利益相关联。宫田道昭的《清末潮州地区砂糖贸易的开展与地区社会》(《神田论集》)以广东省潮州地区为对象,指出由于依靠面向沿海市场的砂糖贸易,该地区日趋富裕。

如上所述,目前的研究现状是地区划分渐趋详细,并从根本上对社会经济实态加以重新检讨。但是研究中所进行的详细划分不应导致研究视野的狭隘化,确定作为研究对象的地区在整体中所占的地位仍然是不可缺少的。

其次,让我们看一看有关工业化的研究。铃木智夫去年出版了他的《洋务运动研究》(汲古书院),其中收入了《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创设过程》(一)、(二)(《纪要》,岐阜药科大学·教养学部,3,1991年4月)一文,很令人感兴趣。该文描述了中国方面在引进西方技术时所遇到的关于中国棉花不适合作为机械纺织原料这一难题上所作的种种错误尝试,改变了人们以往将责任完全归结于洋务派的顽固看法。关于承担引进西方技术任务的熟练工人,菊池敏夫在《清末工业化与机械工人》(《神田论集》)中考察了他们在福州船政局的状况。关于辛亥革命以后的经济状况,滨口允子的《中国北洋政府时期的企业活动与〈公司条例〉》(《研究年报》,广播大学,9)探讨了企业设置数量的变化,从经营的高分配、内部积累不足等方面探讨本世纪20年代企业不景气的原因。另一方面,关于西方商人进行的工业化活动的研究,有本野英一的《马关条约第六条第二款第六个问题再考》(《中国近代史研究》,7)。文章以英国方面的情况为中心,考察了马关条约以前中英围绕外国人开办的棉纺织厂的经济纷争,认为由于在华外商与其本国棉业资本的对立使清朝得以免受强大的外交压力。此外,考察外国商品从通商口岸向内地市

场流通的,有佐佐波智子的《19世纪末中国的通商口岸与内地市场的关系》(《社会经济史学》,57—5)。作者以汉口的商业圈为对象指出了其内在的地区性需求的差异。

近年来有关社会经济实际状况的实证研究渐有进展,1992年虽然也能看到一定的成果,但仍限于局部性问题的阐明。这种实证性的研究进展缓慢,我认为原因之一在于存在着一种不平衡,即以往那种抽象的议论脱离了实证研究,而通过评论等途径又使这种空论受到专门的评价。这类空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重复性研究。希望今后学术界能对此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

在有关政治史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民众形象的变化。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把民众运动绝对化,而是现实地去认识其真实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说,人们似乎更关心“自上而下的改革”。1992年关于清末新政的研究引人注目。其中贵志俊彦的《“北洋新政”体制下地方自治制度的形成》(横山英、曾田三郎编《中国的现代化与政治的统一》,溪水社)指出了新政的推行和来自地方社会的统一自治的动向与城市中实力阶层的上台之间的关联,令人瞩目。该文以议会的权限及议员的出身为中心探讨了由袁世凯引进的天津地方自治制度和地方议会的建立问题,认为这是把地方性举措纳入了体制之中。此外,关于袁世凯的北洋新政还有两篇研究论文:古泽诚一郎的《光绪末年天津巡警的创建与行政的变迁》(《史学杂志》,101—12)在城市行政的变迁中考察了天津警察(巡警)组织的创设;桑田耕治的《北洋新军的建立过程及相关诸问题》(《兵库史学研究》,38)从财政方面考察了北洋新军。关于商部所属的产业行政问题,曾田三郎的《清末围绕产业行政的分权化与集权化》(《中国的近代化与政治的统一》),对商部为统辖地方产业行政所作的集权化尝试因地方的抵制而归于失败作了论述。作为新政的一环,曾在内蒙古推行土地转让,铁山博在《清末内蒙古的“移民实边”政策》(《地区综合研究》,鹿儿岛经济大学,19—2)一文中探讨了这一问题,评价了“移民实边”在当地经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这是一篇

以内蒙古为对象的独具特色的研究。不过希望能进一步看到有关其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的基本说明。关于清末的改革运动,以探讨同盟会的建立过程为中心的中村哲夫的《同盟的时代》(人文书院)已经出版。作者指出,在近代政治变革中曾有过国民统一、建设国民国家的志向,存在过立宪派与革命派联合的可能性,等等。另外,关于曾参与辛亥革命的日本大陆浪人,上村希英雄的《辛亥革命与大陆浪人》(下)(《论集》,熊本短期大学,42—3)论述得较为详细。在以辛亥革命后的政治进程为对象的研究中有(1)楠濑正明的《中华民国的建立与临时参议院》(《中国的近代化与政治的统一》)和(2)镰田和宏的《关于护国运动中蔡锷的作用》(《史潮》,新30)。论文(1)探讨了围绕改造临时参议院的对立和斗争。论文(2)把护国运动中的蔡锷与立宪派和革命派等各种势力联系起来进行了评价。

关于民众运动。今井骏的《关于白朗之乱的考察》(《人文论集》,静冈大学,42)一文不加掩饰地指出了民众反叛的现实,很有意思。该文对白朗集团的实际组织情况作了分析,认为就其本质而言不是农民军,而是土匪和游民无产者集团。但同时也指出,由于知识分子的参与,它有了政治上壮大的可能性。並木赖寿的《民众反叛与近代中国社会》(《响沫集》,7)是关于民众反叛的研究的展望,认为在民众反叛的内部也具有与王朝统治相同的权威主义的要素。上述两文都让人感受到作者正视民众反叛的现实态度。希望他们今后有进一步的研究。不过,1992年关于民众反叛的研究论文数量之少着实令人担忧,这同民众斗争史研究兴盛时期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虽然过去的民众斗争史观点必须受到批评,但原来的观点也并非空穴来风,从底层或者是从少数人的角度出发去认识社会的做法不应被弃之不顾。

另外,关于教育有两篇文章。高田幸男的《清末地方社会与近代教育的引进》(《神田论集》)认为,来自底层的地方精英将近代教育引进了无锡。小林善文的《中国近代的初等教育》(《东洋史研究》,51—1)依据教育领域的实际情况考察了初等教育的历史。后

者认为,被视为现代中国最大问题的初等教育的不完备是一个历史问题,这一点给人留下了印象。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关于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近年来,较之与西方的关系,以往较受轻视的中国与周边亚洲地区的关系正在受到重视。以往对于前往东南亚的中国移民尽管比较重视,但这仍是研究薄弱的领域。不过,最近斯波义信在他对研究史加以整理的《移居与流通》(同上)一文中,对这一问题有所注意。随着人口移动受到关注,中国移民和华人社会的研究总算有了进展。滨下武志的《移民与商业网络》(《纪要》,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16)就泰国华人社会的特征及这些特征与他们的的主要祖籍广东潮州地区的关系作了考察。指出移民的巅峰时期是1920年前后;由于交流的增加,商业方面和汇款方面的网络得以形成,等等。另外,从华侨祖籍福建、广东入手考察华侨问题的《华南专题论文集》(庆应大学·地区研究中心)已经刊行。

关于日中关系的研究。研究者们考察问题的目光涉及多个方面。首先看看外交关系。茂木敏夫的《中华帝国“近代”的重新构建与日本》(《殖民地帝国日本》,载《岩波讲座“近代日本与殖民地”》,(1))考察了日中两国围绕朝鲜、琉球和台湾发生的外交关系。传统的东亚秩序在19世纪后期发生了变化,与渴望建立近代国际关系的日本相对应,李鸿章的外交政策也致力于改变与周边属国的关系,即从传统的松散关系向实力统治变换。这是一篇探究东亚国际关系变动的规模可观的论文。不过,作者在对传统世界秩序的把握上似乎有点死板。关于日中关系的论文,另外还有粟原纯的《甲午战争与媾合谈判》(《史论》,45),该文对甲午战争的媾和问题作了探讨。神户辉夫、黑屋敬子的《日清之间在早期间岛问题上的纷争事件》(《研究纪要》,大分大学·教育学部,14—6)探讨了间岛问题。菅野正的《福建辛亥革命与日本》(《纪要》,奈良大学,20)论述了日本对福建辛亥革命的对策。关于日中间的通商关系。原康记在《明治时期在长崎的外国商社的扩张及其贸易情况》(《经济学研

究》，九州大学·经济学部，57—2，1991年）一文中，探讨了在长崎的中国商人的状况，提出一个有意思的看法，即认为中国商人在长崎的贸易统治确立于19世纪80年代，而明治末期中日贸易出现了阴影。以与日中贸易有关系的日本人为研究对象的文章有（1）中村义的《亚洲主义源流》（《纪要》，载东京学艺大学《社会科学》，43）和（2）村上胜彦的《产业革命初期的日中贸易》（《东京经济大学会志》，174）。论文（1）以早期在上海从事贸易活动的日本人岸田吟香为主提出问题，认为岸田氏的通商立国的中国观和行动为荒尾精等人所继承，形成了亚洲主义的源流。论文（2）对荒尾作了详细研究，把由他设立的日清贸易研究所和日中贸易中日本恢复商业权的过程联系起来加以说明。可以看出，他们既有日中合作的愿望，又围绕商业权同中国商人形成对抗。此外，关于与中国有关的日本商业会议所的资料，饭岛涉的《关于〈商业会议所资料〉》（《中国近代史研究》，7）可供参考。

关于日中间的相互了解。从日本一方出发研究的成果有松泽弘阳的《幕府末期的西方之行与中国见闻》（一）（二）（《法学论集》，北大，38—5、6，1988年，43—2），这是一篇力作，它指出了日本人对中国认识上的偏颇。文章提到幕府末期开国时的日本使团、留学生的西方之行，认为在西方了解到的中国和由此形成的中国观、世界观成为近代日本的基本认识，并指出这样的中国观此后在近代日本社会组织中，在其构造体系的作用下曾再次出现。从迄今人们惯用的论点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我们对中国的认识也许不可能不受其限制，我们必须对制约这种认识的社会结构、研究架构加以认识。另外，佐佐木正哉的《外国人进入广州城问题与〈特别传闻书〉》（《神田论集》）根据荷兰的《特别传闻书》在日本的流传情况，就鸦片战争后进入广州城问题指出了日中两国在接受海外情报方面的差异。另一方面，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的认识，有佐佐木扬的《清朝第一代驻英公使郭嵩焘的明治初期日本论》（《东方学》，83）、坂出祥伸的《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的明治维新论》（《文学

论集》，关西大学，41—4）和区建英的《中国对福泽谕吉的理解》（《日本历史》，525）。上述文章似乎展示了中国方面在认识上的偏颇，即根据对西洋文化的接受和包容来评价日本。另外，桥本南都子的《清朝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设立及其历史作用》（《纪要》，东海大学·外国语教育中心，12）就日中两国翻译西洋书籍的状况作了比较，并检讨了日中间的相互关联。此外，在日中关系研究中，阐述日本在中国各地的新闻工作这一独特问题的有大谷正的《日本外务省在中国及朝鲜的“新闻操纵”》（一）（《法学论集》，55、56）和中村孝志的《台湾总督府华南新闻工作的开展》（《学报》，天理大学，171）。

关于思想史。与政治史中的倾向相同，对改革思想的分析引人注目。村田雄二郎的《孔教与淫祠》（《中国——社会与文化》，7）对康有为倡导的孔教国教化的历史意义作了考察，颇有意思。作者认为，孔教运动是以统一国民为目的的重建传统儒教运动，类似基督教的重建运动。另外还指出，与清朝对待民间信仰的宽容的宗教政策相反，这一基础性的变动意味着国家宗教管理的一元化。此外，关于康有为，有董士伟（高柳信夫译）的《新文化运动与“孔教”》（同上），该文探讨了康氏与陈独秀围绕孔教的论争，认为他们的对立是在近代化的共识下产生的文化理解上的分歧。滨九雄的《康有为的变法思想与春秋学》（《纪要》，大东文化大学·人文学部，30）则通过康氏的著作《春秋董氏学》探讨了其春秋学。滨氏还发表了《公羊学的建立及其展开》一文。关于20世纪初的立宪主义思想，林来梵的《中国立宪主义的形成和展开》（《国际地域研究》，立命馆大学，3）分析了清末宪法，探讨了宪法中体现的国家优先的特征和政治领导者所谓的“还不存在能够实行宪政的国民”的看法。孙文甚至也有这样的认识。中山义弘的《孙文的统一国民论的逻辑结构》（《中国的近代化与政治的统一》）指出，孙文的政治思想中有优先进行国家建设的所谓“自上而下地统一国民”的一面。再有，细野浩二的《“西方冲击”下日本与中国的状况》（下）（《纪要》，载早稻田

大学·文学院·文学部,《哲学·史学》,37)从探讨走向国际法秩序的日中两国的对策的角度去认识孙文的对外观基础中的华夷观念。此外,与思想史有关的藤田敬一的《〈人圣武记〉与〈海国图志〉的关系》(《研究报告》,载岐阜大学·教育学部,《人文》,40)对《海国图志》“筹海篇”的作者重新作了考证。村尾进的《〈海国四说〉的意义》(《东洋史研究》,51—1)举出最早介绍西方情况的著作《海国四说》,指出其认识上的特征以及作者将西洋的状况当作“自己内部的问题”加以把握这一点。小松原伴子的《日俄战争前后的人种论》(《响沫集》,7)比较研究了20世纪初日中两国的人种理论。大谷敏夫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札记》(二)(《人文学科论集》,鹿儿岛大学·法文学部,35)对民国初期思想史的研究史作了总结,作者在结束语中论述了最近引起世界性震动的“再一次站在问题的出发点上考察问题”的必要性。自不待言,这并不仅限于思想史。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开放政策的进一步实施,日本研究者在中国实地搜集资料和调查访问工作得以进行。这一工作的成果体现在去年的几项研究和佐佐木编的华北农村调查资料集《近代中国社会与民众文化》(东方书店)中。可以预料,这一趋势今后将进一步加强。不过,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经验,有必要经常反省实地调查、搜集资料工作的方法。

关于外国研究者在中国搜集资料时遇到的困难,作为个人的体验,姬田光义在其介绍中国研究状况的《中国的地方史研究方法》(《历史评论》,506)中也曾谈及。但我认为,如姬田氏所言,问题在于中国的研究体制“不仅对外国人,即使对中国研究者也未提供完善的研究手段”。我们所要求的资料搜集,不应被看作是对外国人的特殊照顾,而应同对中国国内研究者公开资料同步进行。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译自《史学杂志》,第102卷,第5号,1993年。

张永江译 王士花校

(责任编辑:丁毅)

日本中国近现代妇女史研究状况

石川照子

序

本文的目的在于综览日本中国近现代妇女史研究的状况。不过,这里讨论的中国近代史限于清末以后(具体为鸦片战争以后)时期。在日本,存有一些战前有关中国妇女的研究和记述,而其中比较多的是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史角度对缠足、同姓不婚、多妻制、婚姻风俗以及从法制史角度对婚姻法及其它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另外,关于女工及其政治参与的记述随处可见(关于以上诸问题,参考下面第一个大问题的第四个小题)。但正规研究开始于战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本文想集中介绍20世纪40年代末期以后的研究情况。以下依主要的文献目录和通史、概论的次序分类加以介绍。

一 中国近现代妇女史研究有关文献目录

关于日本中国近现代妇女史研究的主要文献目录,仅就本人所知列举如下(1—7、8—10分别以发行年代为序):

1. 小野和子:《中国妇女史》(平凡社,1978年《参考文献》);
2. 小野和子:《妇女史》(《亚洲历史研究入门》,同明舍,1983年);

3. 中山义弘:《日本中国近代妇女史研究》(《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想和行动》,北九州书店,1983年);
4. 谷光隆编《亚洲妇女史文献目录》(奈良女子大学东洋史学研究室,1984年);
5. 秋吉祐子:《现代中国妇女研究的特征及课题(二)——中、日、英、美的研究中心》(《在近畿》,第14期,1988年);
6. 历史科学协会编《妇女史研究入门》(三省堂,1991年《参考文献》);
7. 《会员的妇女史研究业绩一览》(中国妇女史研究会:《中国妇女史研究》,创刊号—第4期,1989—1992年);
8. 市古宙三和费正清:《中国研究文献指南》(东京大学出版会,1974年);
9. 市古宙三编《近代中国·日中关系图书目录》(汲古书院,1979年);
10. 伊藤一彦等:《现代中国研究指南》(《岩波讲座·现代中国》,别卷2,岩波书店,1990年)。

第一种是迄今唯一用日语撰写的中国近现代妇女史总论性专著。在各章的注释及卷末的参考文献里,除日文外也介绍了中文、英文文献。第二种含近代与现代,涉及整个时代。第三种也是论述近现代妇女史的专著,但仅限于太平天国到五四运动的近代史的前半部分。该书在副篇——第二部分“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成果与课题”中,叙述了日本和中国妇女史研究的状况,对从太平天国到1920年代的主要研究作了可供参考的简要说明和介绍。第四种是从一些目录、著作中收集来的有关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各国、地区的研究文献。1980年代以后的文献没有收录,不过,收录了不少可以说是很珍贵的战前文献。第五种分三个章节介绍了1978年以后中、日、英、美有关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问题的研究情况作了详细的说明。第六种以日本妇女史的研究

现状及课题为中心,收录了有关妇女史的参考文献和史料介绍。第七种是中国妇女史研究会会刊,该会为日本妇女史研究方面颇具代表性的研究团体。会刊每期都登载会员的论文及研究动向、书评、资料、文献介绍、例会报告等。从创刊号到近期刊行的第4期,连载了会员及其他研究者的业绩。第八、九、十种是有关中国研究总体的文献指南,其中第八种中的“村落共同体与家族”、“法律与行政”部分的文献可资参考。它收集了至70年代初为止日本、中国、欧美的研究情况,并附有简单的说明。第九种以日中关系为中心,整理了从战后至70年代的用日文撰写的图书,其家族关系和传记部分可供参考。第十种对日、美的研究动向和有关现代中国研究的新资料、文献等作了介绍,从中可检索到婚姻法的摘译、“妇女进入社会”的说明和表格等有关资料。

二 主要研究成果

(一)通史、概论

作为通史,除了第一部分介绍的第一、三种之外,岸边成雄编的《世界妇女史(17)·中国(2)·革命中的妇女》于1976年被评论社推荐。它只是部分地勾勒出太平天国、农村及新中国的一些女性,如丁玲、萧红、秋瑾、何香凝等,严格地说还算不上通史。第二种也只触及近代史前半部分内容。因此可以说,至今仅有第一种算得上总括性的妇女史。第一种依历史发展的脉络论述了从太平天国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妇女状况、运动、解放思想等。这是由一个作者独自撰写的力作,不过,由于受到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强烈影响,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大概不难发现其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局限性。

没有比通史所包罗的面更广的了。但有关近现代中国妇女的概论性论文仍可举出一些。如末次玲子的《男女的社会关系》(滨口

允子编《中国的近代与现代》，广播大学教育振兴会，1993年）论述了从旧社会到现在历史发展中的传统男女关系及其变化。第一部分的第六种中，末次玲子的《东亚妇女形象（1. 中国）》和笕久美子的《中国妇女支撑半边天》（富士谷あつ子编《妇女学入门》サイマル出版会，1979年），简洁地叙述了旧社会妇女的状况及妇女走向解放的变化。在概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妇女状况的文章中，有石川照子的《变动中的中国妇女》（宇野重昭编《岩波讲座·现代中国（第3卷）·平静的社会变动》，岩波书店，1989年）和《妇女的现状》（野村浩一等编《更想知道的中国（二）——社会·文化篇》，弘文堂，1991年），探讨了各项政策的实施和就业、婚姻等实际情况，以及一些研究成果和课题。

（二）分类研究状况

1 政策、法律

婚姻法规定了妇女在社会及其家庭中的地位，在依照法律确保其权利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这方面的研究，日本也很多。关于新婚姻法本身的研究，著名的法制史学家仁井田陞著有《中国的传统与革命》（1）（东洋文萃，平凡社，1974年）。该书的资料也具有总括性。此外还有大塚胜美的《中国婚姻家庭法的变革》（《现代亚洲的革命与法》〔下〕，劲草书房，1966年）和加藤美穗子的《婚姻法》（《中国民法研究》，学阳书房，1987年）。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其各边区的婚姻法，前述《现代亚洲的革命与法》（下）中收有福岛正夫、宫坂宏的《中华苏维埃及边区时期婚姻法的特点》。另外，关于婚姻法与妇女的关系，石川静文在《中国婚姻制度的变化与妇女的地位》（《名城商学》，第19期，1970年）一文里作了介绍。

2 运动史

太平天国运动可以说已进入比较性的研究领域。在这方面有大塚胜美的《太平天国革命与妇女解放（1）—（4）——现代中国革命的源流》（《北九州大学商经论集》，1971—1973年）和三石善吉

的《太平天国的妇女》(收入前引《革命中的妇女》),以及中山义弘的《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与妇女的行动》(收入前引《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想和行动》)、针谷美和子的《妇女在太平天国的地位》(《中国的传统社会与家族》,汲古书院,1993年),等等。此外,作为清末思想史研究,小野和子著有《清末的妇女解放思想》(《思想》,第525期,1968年)。对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期的研究也盛行起来。关于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与教育的研究,有小野和子的《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女子军与妇女参政》(《辛亥革命研究》,筑摩书房,1978年)和末次玲子的《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与基督教女子教育》(上、下)(《历史评论》,第280、281期,1973年)。从思想史角度进行分析的有中山义弘的《辛亥革命运动时期妇女解放理论和妇女的行动》(同上书),对政治史和思想史进行了总括性研究。另外还有小野和子的《五四运动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想——家族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对立》(《思想》,第590期,1973年)。关于1920—1930年代女工及劳工运动,现在尚留有当时的记述。松林阳子的《中国纺织工人的状况》(广岛大学《史学研究》,第123期,1974年)、小野和子的《旧中国的“女工哀史”》(《东方学报》,第50册,1978年)、佐藤明子的《五卅运动中的中国妇女》(《史海》,第27期,1980年)、曾田三郎的《中国缫丝女工的状况》(《地域文化研究》,第6卷,1982年)等都对战后的女工进行了研究。此外,日本史学界对中国农村妇女从旧社会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变化做了综览,其中有石田米子的《推翻黑暗社会的农村妇女》(收入前引《革命中的妇女》)和小野和子的《农村妇女的翻身》(收入前引《中国妇女史》),以及末次玲子的《作为劳动主体的中国农村妇女的状况》(《中国近现代史讲座》,第4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和《中国农村妇女解放运动的起点》(《历史评论》,第333期,1978年)。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妇女运动,青柳纯一著有《30年代的中国妇女与抗日救国运动及其与妇女救国界的关联》(《妇女学年报》,第9期,198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日本对作为妇女解放典型的社会主义社会妇女的兴趣增强了,尤其是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研究更是前进了一步。其代表作有能智修弥的《中国的妇女解放——人民公社和妇女》(新读书社,1962年)、中国研究所妇女研究会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中国妇女》(中国研究所,1968年)、服部尚江的《大跃进与妇女解放道路——以街道活动为中心》(《中国研究日报》,第339期,1976年)、秋山洋子的《新中国的妇女》(收入前引《革命中的妇女》)。它们都分别概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妇女的状况。

3 从改革开放(80年代)到现在的中国妇女研究

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以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深度研究的学术著作,除前述的通史、概论以外,在最近的研究中我们可举出以下各例:关于教育,有新保敦子的《现代中国社会的变动与现代人的形成》(收入前引《岩波讲座·现代中国(第3卷)》);关于家族的变动,有松户庸子的《家族的变动与社会》(同上书);关于人口政策与妇女问题,有若林敬子的《人口变动与独生子女政策的出台》(同上书)。它们都把握了问题的要点。此外,关于就业问题,有小滨正子的《现代中国都市的性别职业分工》(收入前引《中国的传统社会与家族》);关于家务劳动,末次玲子在各种农村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近50年来华北农村的家务劳动史》(同上书)。

4 人物研究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人物研究的对象多数为政治领导人。中国妇女史研究会编《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驱》(1984年由日中出版会出版),介绍了秋瑾、何香凝、宋庆龄、邓颖超等人的生平。此外,作家武田泰淳撰写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秋瑾女士传》(1968年,筑摩书房出版)。关于宋庆龄,久保田博子著有《宋庆龄关系年谱简编》(《辛亥革命研究》,第3期,1983年)和《宋庆龄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一)(《辛亥革命研究》,第4期,1984年)等,以及其它许多研究成果(详见石川照子的《宋庆龄研究的现状和课题》,津田塾大

学《国际关系学研究》，第12期别册，1986年）。在其它著作中，比较多的是关于丁玲的研究，

结 语

以上简单地介绍了日本的研究状况。由于篇幅关系，笔者不可能列举更多的有关研究成果，也无法深刻地阐述各种研究论点。关于上述内容，可直接参阅本文所介绍的文献指南及各种文献。本文难免有诸多疏漏，还望海涵。我热诚希望日本与台湾的学者借此机会进行的学术交流今后能更加深入地发展。最后，我谨向给予我撰写本文机会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游鑑明先生和中国妇女研究会的代表末次玲子女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自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妇女研究》，第1期（1993年6月）。

李 宏 陈曼娜译

（责任编辑：丁 毅）

外国在华机关公团名汇(十一)

Shanghae Horse Bazaar	龙飞洋行
Shanghae Medical Hall	老德记药房
“Shanghae Recorder” Office	旗祥(报馆)
Shanghae S. N. Co.	旗昌轮船公司
Shanghae Steam Flour Mill	得利火轮磨坊
Shanghae Tug & Lighter Co.	驳船公司行
Shanghae Wharf Co.	立德成(码头公司)
Shanghai Academy of Accountancy	上海会计师学社
Shanghai Adjusters	上海公证行
Shanghai Adjustment Co.	上海华洋公证保商社
Shanghai Advertising Co.	上海广告公司
Shanghai Advertising & Bill Posting Co.	明得(广告社)
Shanghai Alcohol Distillers' Central Sales Agency	上海酒精制造厂联合营业所;上海酒精联营所
Shanghai Amateur Swimming Association	上海游泳同乐会
Shanghai American Fur Co.	中美皮货洋行
Shanghai American School	沪美学堂;沪美学校;上海美国学校
Shanghai Amusement Co., Ltd.	上海怡怡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 Canton Silk Corporation	美信洋行

Shanghai & Hongkew & Jardine's Associated Wharves	
顺泰码头公司;怡和合股公和祥码头公司;公和祥码头公司	
Shanghai & Hongkew Wharf Co.	公和祥码头公司
Shanghai & Hongkew Wharf Co., Ltd.	公和祥码头有限公司
Shanghai & Manila Trading Co.	华菲进出口行;华菲贸易公司
Shanghai & Tientsin Steamship Co.	沪津轮船总公司
Shanghai Aquarium	上海鱼世界
Shanghai Auction Room	三发(拍卖行)
Shanghai Auctioneers, Ltd.	天和洋行
Shanghai Auto Service	上海汽车修理公司
Shanghai Auto Supply Co.	上海汽车材料公司
Shanghai Automobile Club	上海美技汽车总会
Shanghai Automobile Garage	焯信(汽车行)
Shanghai Bank, Ltd.	上海银行;株式会社上海银行
Shanghai Baptist College	沪江大学
Shanghai Baptist College and Theological Seminary	
上海浸会大学堂及道学书院;沪江大学校	
Shanghai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沪江道学院;沪江神学院;沪江浸会神学院	
Shanghai Benevolent Industrial Institution	贫儿教养院
Shanghai Benrisha	上海便利社
Shanghai Bon Marche	申利(服饰衣帽店)
Shanghai Boshoku Kabushiki Kaisha	上海纺织株式会社
Shanghai Bowling Club	抛球场;上海打球会
Shanghai Brewery Co.	源和皮酒厂
Shanghai Brokerage Co.	罗美洋行
Shanghai Brokerage Corporation	上海百货经纪公司
Shanghai Bronze Power Mfg. Co.	上海金粉公司
Shanghai Bros. Trading Co.	上海兄弟贸易公司

Shanghai Building & Erecting Co.	茂昌(建筑安装公司)
Shanghai Building & Co. , Ltd.	汇广公司
Shanghai Building Co.	汇芳公司
Shanghai Buildng Co. , Fed. Inc. , U. S. A.	汇芳公司
Shanghai Building Co. , Inc.	汇芳公司;汇芳锯木公司
Shanghai Building Co. , Ltd.	汇芳公司
Shanghai Business College	上海商业学院
Shanghai Butchery	晋兴(肉庄);晋兴祥记(肉庄)
Shanghai Calling	上海呼号(周刊)
Shanghai Cardboard Box Factory	上海制盒厂;上海纸版盒子厂
Shanghai Cargo Boat Co.	会德丰驳船行
Shanghai Cargo Boat Co. , Ltd.	会德丰驳船行
Shanghai Ceramic Co. , Ltd.	上海窑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窑业株式会社
Shanghai Chamber of Manufacturers	上海实业协会
Shanghai Chemical Co.	广丰化学厂;广丰洋行
Shanghai Chemical Industrial Co. , Ltd.	上海化学工业厂;上海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Shanghai Chemical Laboratory	上海化验室
Shanghai Chinese Foreign Famine Relief Committee	上海华洋义赈会
Shanghai Chromo & Photo-Lithographic Co. , Ltd.	五彩画印有限公司
Shanghai Cigarette Co.	宝柏烟草公司
Shanghai Cigarette Merchants Guild	(上海)烟业公会
Shanghai Cinemas , Ltd.	上海中央影戏公司
Shanghai Cleaners Agency	上海清洁所
Shanghai Cleaning Co.	上海清洁有限公司
Shanghai Club	总会;上海总会

Shanghai Coal Agency	炽昌公司
Shanghai Coke Co.	上海熟煤行
Shanghai College	沪江大学
Shanghai College and Middle School	沪江大学
Shanghai Collegiate School	金寓学馆
Shanghai Commercial Art Studio	
	上海商业广告社; 上海商业美术社
Shanghai Commercial School (for Japanese)	
	日本人上海商业学校
Shanghai Co. for Merchants Defence	茂兴洋行
Shanghai Concret Co.	上海沙路公司
Shanghai Co-operative Society	上海购买组合
Shanghai Co-operative Society, Ltd.	上海协助有限英国公司
Shanghai Cotton Anti-Adulteration Association	棉花检查处
Shanghai Cotton Cleaning & Working Co.	上海机器轧花局
Shanghai Cotton Exchange, Ltd.	
	上海棉业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株式会社上海棉业取引所
Shanghai Cotton Manufacturing Co., Ltd.	
	上海纺织有限公司; 上海纺织株式会社
Shanghai Cotton Spinning Co., Ltd.	上海纺纱有限公司
Shanghai Cotton Waste & Linter Co.	德隆洋行
Shanghai Cotton Waste Co.	怡康洋行
Shanghai Courier and China Gazette	晋源西报(馆)
Shanghai Credit Bureau	上海债务局
Shanghai Cricket Club	上海拍球总会
Shanghai Cyclery	踏飞(自行车行)
Shanghai Daily News	上海每日新闻社
Shanghai Delicatessen Store	狄立生洋行
Shanghai Dental Parlour	利维(牙医诊室)

Shanghai Disinfecting Co.	上海卫生公司
Shanghai Dock & Engineering Co. , Ltd.	
	耶松船厂;耶松老船澳;英商耶松有限公司老船坞
Shanghai Dock Co.	高易(船坞)
Shanghai Dockyards, Ltd.	英联船坞有限公司
Shanghai Dollar Directory	
	(1930 年代)上海一元行名录;(1940 年代)上海行名录
Shanghai Dollar Directory Co.	上海道利行名录公司
Shanghai Dredging & Construction Co.	裕通挖泥工程行
Shanghai Echo Publishing Co.	上海回论日报(出版社)
Shanghai Eis Aktien Gesellschaft	上海机器冰厂
Shanghai Electric & Asbestos Co. , Ltd.	威麟洋行
Shanghai Electric Construction Co. , Ltd.	
	上海制造电气电车有限公司;上海电气电车有限公司
Shanghai Electro Plating Co.	
	(本世纪初)兴隆电镀公司;(1920 年代)上海电镀公司
Shanghai Emporium	节俭铺
Shanghai Engeikan	上海演艺馆
Shanghai Engineering & Contracting Co.	上海测绘建筑公司
Shanghai Engineering & Plating Co.	上海荣章电器工程电镀厂
Shanghai Engineering & Shipbuilding Works	惠令顿船厂
Shanghai Engineering, Shipbuilding & Dock Co. , Ltd.	
	和丰船坞公司
Shanghai Engineers' Club	机务总会;上海机务总会
Shanghai Equitable Trading Co. .	大通贸易公司
Shanghai Estate Co. , Inc.	上海地产有限公司
Shanghai Estates & Finance Co. , Ltd.	上海地产银公司
Shanghai European Sanitary Bakery	上海希腊面包公司
"Shanghai Evening Courier" Office	通闻西报(馆)

Shanghai Evening Post	大美晚报(馆)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大美晚报(馆)
Shanghai Exchange Chart Co.	亚孚公司
Shanghai Exploration & Development Co. , Ltd.	上海兴利垦殖公司
Shanghai Export Co.	万利公司
Shanghai Express Co.	
	(1910 年代)上海车驳转运公司;(1920 年代)上海转运公司
Shanghai Express Co. , Inc.	上海转运公司
Shanghai Express Co. , Ltd.	上海旅行案内所
Shanghai Factory	上海制造厂
Shanghai Farming & Dairy Co. , Ltd.	上海畜植公司
Shanghai Ferries & Tenders Co. , Ltd.	
	上海轮渡有限公司;上海渡船有限公司
Shanghai Ferry Co.	上海轮渡公司
Shanghai Fibre Container Co. , Ltd	上海纸器公司
Shanghai Finance & Rea. Estate Co. , Ltd.	泰和银公司
Shanghai Finance Co. , Ltd.	上海银公司
Shanghai Fire Brigade	上海水龙公所
Shanghai Fire Department	上海水龙公所
Shanghai Fire Insurance Association	上海火险公会
Shanghai Floor-Wax Manufacturing Co. , Ltd.	上海制蜡厂
Shanghai Flora	泰飞洋行
Shanghai Foreign Association of Woollen Yarn Importers	
	上海洋商毛纶公会
Shanghai Foreign Fur Exporters' Association	上海皮货出口公会
Shanghai Foreign Medicine Merchants' Association	
	上海洋商西药业公会
Shanghai Free Christian Church	上海中华福音会

Shanghai Fruit & Produce Co.	雄庆公司
Shanghai Fukkozairyo Co. , Ltd.	
	上海复兴材料株式会社;上海复兴材料有限公司
Shanghai Funeral Directors	上海文明寿器公司;上海殡仪馆
Shanghai Furniture Factory	公易(家具厂)
Shanghai Garage Co. , Ltd.	上海汽车有限公司
Shanghai Gardening Co.	上海园艺公司
Shanghai Gas Co.	大英自来火房
Shanghai Gas Co. , Ltd.	
	大英自来火房;大英自来火有限公司;上海自来火行
Shanghai General Cargo Dealers	振业洋行
Shanghai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和明商会;上海西商总会
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	上海公病院;上海公济医院
Shanghai General Store	卡天洋行;仪科卡天洋行
Shanghai General Stores	仪科卡天洋行
Shanghai Golf Club	上海高而夫拍球会
Shanghai Goodwill Industries	普益工艺社;普益工业社
Shanghai Gramophone Co.	上海唱机公司
Shanghai Guide	星发(月刊社)
Shanghai Guides Association	华美公司
Shanghai Handkerchief & Making-up Co.	上海厂
Shanghai Hat & Cap Mfg. Co.	
	上海制帽公司;上海草帽呢帽洋行;上海帽行
Shanghai Haulage Co.	好华驳运公司
Shanghai Health Studio	上海健身美容院
Shanghai Heating Plumbing & Well Digging Co.	
	上海卫生工程所

Shanghai Heng Chan & Co. , Ltd.	上海恒产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恒产株式会社
Shanghai High School	博文书院
Shanghai-Hongkong Building, Loan & Investment Co. , Ltd.	汇广公司
Shanghai Horse Bazaar	龙飞洋行
Shanghai Horse Bazaar & Motor Co. , Ltd.	龙飞马车汽车公司
Shanghai Horse Bazaar Co. , Ltd.	龙飞洋行
Shanghai Horticultural Society	中西蒔花会
Shanghai Hosoda Trading Co. , Ltd.	上海细田贸易公司
Shanghai Hospital of World The Red Swastika Society	世界红卍字会上海医院
Shanghai Household Removing Co.	上海搬场公司
Shanghai Ice & Cold Strcage Co. , Ltd.	上海机器冰厂;上海机器冰厂有限公司
Shanghai Ice Co.	上海机器冰厂
Shanghai Ice, Cold Storage & Refrigeration Co. , Ltd.	华昌造冰公司
Shanghai Import & Co.	柯汉记洋行
Shanghai Import Co.	柯汉记洋行
Shanghai Importers, Ltd.	上海商业公司;瑞兴洋行
Shanghai Industrial & Trading Co. , Ltd.	上海工商有限公司
Shanghai Industrial Co. , Ltd.	上海兴业株式会社
Shanghai Inlandwater Navigation Co. , Ltd.	上海内河轮船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内河汽船株式会社
Shanghai Insatsu Kabushiki Kaisha	上海印刷株式会社
Shanghai Insurance Office	上海保险公司;上海保险行
Shanghai International Agency	普达贸易公司
Shanghai International Radio Office	上海国际电台

Shanghai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Society	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
Shanghai International Testing House	上海万国生丝检验所
Shanghai International Testing House (of The United States Testing Co. , Inc.)	上海万国检验所;上海万国生丝检验所
Shanghai International Trade Protection Association	上海全球护商会
Shanghai International Y's Men's Club	上海万国联青社
Shanghai Investigation Agency	上海调查所;上海侦查所
Shanghai Japanese Residents' Corp.	上海居留民团
Shanghai Jewish Chronicle	上海犹太刊物(社)
Shanghai Jewish Club	犹太总会;犹太国人总会
Shanghai Jewish Recreation Club	犹太国体育会
Shanghai Jewish School	上海犹太学堂
Shanghai Journal of Commerce	上海商报印刷有限公司
Shanghai Kaimusho	上海海务所
Shanghai Keori Kaisha, Ltd.	上海毛织株式会社;永兴毛织厂
Shanghai Kinpun Koshi	上海金粉公司
Shanghai Kobai Kumiai	上海购买组合
Shanghai Koshinsho	上海兴信所
Shanghai Lac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	美商花边洋行
Shanghai Ladies Companion	女友月报(社)
Shanghai Land Development & Companies' Agency	上海地产公司
Shanghai Land Development Co.	上海建设地产公司
Shanghai Land Investment Co. , Ltd.	业广有限公司
Shanghai Leather Co. , Federal Inc. , U. S. A.	上海皮厂
Shanghai Leather Co. , Ltd.	上海制革厂;上海皮厂
Shanghai Leather Importers	查禄维洋行皮件进口行

Shanghai Leather Novelties Co.	上海美新皮革公司;上海皮革公司
Shanghai Leather Products Co.	上海皮革物产公司
Shanghai Library	洋文书院
Shanghai Licensed Pilots' Association	领江公司
Shanghai Life	上海俄文生活日报
Shanghai Life Insurance Co. , Ltd.	华洋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华洋人寿燕梳公司
Shanghai Life Publishing Co.	上海俄文生活日报馆
Shanghai Literary & Debating Society	文友辅仁会
Shanghai Livery Stables	发来(马房)
Shanghai Loan & Investment Co. , Ltd.	上海银公司
Shanghai Lodge of Theosophical Society	天人明道会
Shanghai Lumber & Coal Co.	上海木材煤料公司
Shanghai Lusitano Club	东方总会
Shanghai Lyons Silk Co. , Ltd.	维纶洋行
Shanghai Machine Co.	瑞生机器陈列所
Shanghai Machine Co. , Ltd.	瑞生机器陈列所
Shanghai Mainichi Shimbun, Ltd.	上海每日新闻社
Shanghai Mainichi Shimbunsha	上海每日新闻社
Shanghai Mantani Yoko	上海万谷洋行
Shanghai Manufacturing & Lumber Co. , Ltd.	凤凰木行;凤凰木行有限公司;英兰凤凰木行有限公司
Shanghai Marine Underwriters Association	上海水险公会;上海洋商水险公会
Shanghai Meat Supply Association. Ltd.	上海肉庄公司
Shanghai Medical Co.	上海西药公司
Shanghai Medical Hall	老德记药房
Shanghai Mercantile & Family Hotel	商家旅馆

Shanghai Mercantile & Family House	戒酒会堂
Shanghai Mercantile Co.	上海贸易公司
Shanghai Mercantile Printing Co. , Ltd.	商文印刷有限公司
Shanghai Mercury	文汇报
Shanghai Mercury Desk Hong List	文汇报行名簿
Shanghai Mercury , Ltd.	文汇报馆
“Shanghai Mercury” Office	文汇报馆
Shanghai Metal Merchants' Association	上海五金商行公会
Shanghai Metal Works	上海金属工业厂; 新星铜厂
Shanghai Milk Supply Co.	上海牛奶公司
Shanghai Milk Supply Co. , Ltd.	上海牛奶公司
Shanghai Miniature Rifle & Revolver Club	上海打把总会
Shanghai Miniature Rifle Club	上海打把总会
Shanghai Mirror & Moving Picture News	上海密勒电影报(社)
Shanghai Mission to Ricksha Men	上海车夫福音会; 上海力夫会
Shanghai Mission to Ricksha Men & Coolie Class	上海力夫会
Shanghai Missionary College of Seventh Day Adventists	三育大学
Shanghai Mitsubish. Soko Kabushiki Kaisha	上海三菱仓库株式会社
Shanghai Mitsubishi Warehouse Co. , Ltd.	上海三菱仓库株式会社
Shanghai Motor Sales Corp. , Inc.	新华汽车公司
Shanghai Motors	
	①(霞飞路)上海汽车有限公司; ②(巨籁达路)上海汽车公司
Shanghai Motors, Inc.	上海汽车公司
Shanghai Motors Co.	上海汽车公司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Library	工部局图书馆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上海工部局工程处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Tungchow Road Workshop	上海工部局通州路铁厂
Shanghai Municipal Local Post Office	工部信馆;上海工部书信馆
Shanghai Museum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博物院;亚洲文会博物馆
Shanghai Mutual Telephone Co. , Ltd.	上海德律风行;上海华洋德律风有限公司
Shanghai-Nanking Railway	沪宁铁路总公司
Shanghai New Dock	祥安顺(船厂)
Shanghai Nichi Nichi Shiribun	上海日日新闻社
Shanghai Nippo Sha	上海日报社
Shanghai Nippon Club	日本总会;日本俱乐部
Shanghai Nippon Type	大普公司
Shanghai Novelty Co.	上海美术(公司)
Shanghai Nurseries	播美(种植园)
Shanghai Nursery Co. , Ltd.	上海花种场
Shanghai Nursing Home	沪江疗养院
Shanghai Oil & Tallow Industrial Co. , Ltd.	瑞宝洋行;上海油脂工业株式会社
Shanghai Oil Co. , Ltd.	上海榨油有限公司
Shanghai Oil Distributors	捷兴机油公司
Shanghai Oil Mill, Ltd.	上海制油株式会社
Shanghai Old Dock	船厂
Shanghai Packing Co.	高茂洋行
Shanghai Painting & Decorating Co.	上海油漆装饰公司

Shanghai Paper & Woodpulp Importers' Association	上海洋商纸业公会
Shanghai Paper Co.	上海洋纸公司
Shanghai Paper Importers' Association	上海洋商纸业公会
Shanghai Paper Industry Co. , Ltd.	上海纸业公司
Shanghai Paper Mill, Ltd.	华章造纸有限公司
Shanghai Pasturage Farming & Dairy Co.	上海畜植公司
Shanghai Pedicab Service Co. , Ltd.	上海脚踏车包车有限公司
Shanghai Pet Store	上海鸟行
Shanghai Photo Engraving Co.	上海美术工艺制版社
Shanghai Photographic Enlarging Co.	光绘楼
Shanghai Physical Culture Club	上海体育会
Shanghai Pilot Boat Co. , Ltd.	领江公司
Shanghai Pilot Boat Co. (1928), Ltd.	领江公司
Shanghai Pilot Boat Co. (1938), Ltd.	领江公司
Shanghai Police Gazette	警务杂志(社)
Shanghai Polo Club	上海马球总会
Shanghai Polyclinic	上海各科专家医院
Shanghai Polyclinic for the Treatment of All Diseases	上海合组医院
Shanghai Power Co.	上海电力公司
Shanghai Press, Ltd.	
①(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益新报馆;②(日商)上海印刷有限公司	
Shanghai Printing Co.	上海印务公司
Shanghai Printing Colour Factory	上海油墨厂
Shanghai Produce & Stock Exchange	上海取引所
Shanghai Produce & Stock Exchange, Ltd.	上海取引所株式会社
Shanghai Properties, Ltd.	上海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Property Owners' Association	上海房产业主公会

Shanghai Protection & Investigation Bureau	上海侦查警护会
Shanghai Provision Merchants' Association	上海泰西食物同业公会
Shanghai Public Auctioneers Co.	普利洋行
Shanghai Public Maternity & Children's Hospital	上海平民妇孺医院
Shanghai Public School	上海西童书院
Shanghai Public School (Boys)	西童男书院
Shanghai Public School (Girls)	西童女书院
Shanghai Public School for Chinese	上海华童公学
Shanghai Public School Preparatory	工部局女童子书院
Shanghai Pulp & Paper Co. , Ltd.	华章造纸有限公司
Shanghai Race Club	跑马总会;上海跑马总会
Shanghai Raw Silk Co. , Fed. Inc. , U. S. A.	美信洋行
Shanghai Real Estate Agency	德和洋行
Shanghai Realty Co.	沪江地产公司
Shanghai Realty Development Corp.	美商上海地产公司
Shanghai Reinforced Concrete Co. , Ltd.	康克利公司
Shanghai Renkosho	上海炼钢厂
Shanghai Revolver & Miniature Rifle Club	上海打把总会
Shanghai Rifle Association	上海万国洋枪打靶会
Shanghai Rowing Club	舢板总会;上海划船总会
Shanghai Rowing Club (Lower Boat House)	下头舢板厂
Shanghai Rowing Club (Upper Boat House)	上头舢板厂
Shanghai Rugby Football Club	上海勒穉别球总会
Shanghai Rugby Union Football Club	上海勒穉别球总会
Shanghai Sanitarium	上海疗养卫生院
Shanghai Sanitarium & Hospital	上海疗养卫生院
Shanghai Sanitarium Food Co.	养身公司

Shanghai Sanitarium Hospital & Clinic	上海疗养分院
Shanghai Sanitarium Incorporated	上海疗养卫生院
Shanghai Sanitary Cleaning Co.	上海卫生清洁公司
Shanghai Sanitary Cleaning Co. , Ltd.	上海卫生清洁公司
Shanghai Sanitary Service	上海卫生公司
Shanghai Sanwa Yoko	三和洋行
Shanghai Science Institute	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
Shanghai Seamen's Mission	水手拜经堂
Shanghai Seizo Kenshi Kaisha	上海制造绢糸会社
Shanghai Service Co.	飞鹰汽车公司
Shanghai Service Co. , Inc.	飞鹰汽车公司
Shanghai Share Brokers' Association	上海股份公所
Shanghai Sharebrokers' Association	上海股份公所
Shanghai Shintaku Kaisha, Ltd.	上海信托株式会社
"Shanghai Shipping Gazette & Commercial News"	航业商务杂志(社)
Shanghai Shodoku Sho	上海消毒所
Shanghai Shoe Manufacturing Co.	新明机器制造皮鞋厂
Shanghai Shokuyohin Kaisha	上海食品会社
Shanghai Shuho	上海周报(社)
Shanghai Silk Co. , Ltd.	上海制造绢丝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Silk Filature. , Ltd.	宝昌缫丝局
Shanghai Silk Spinning Co. , Ltd.	上海制造绢丝股份有限公司;公大公司;公大第三厂
Shanghai Silk Spinning Co. 's Cotton Mill	公大纱厂
Shanghai Silk Spinning Co. 's Kung Dah No. 1 Mill	公大第一纱厂
Shanghai Soap & Glycerine Co. , Ltd.	新惠肥皂有限公司
Shanghai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上海惜畜会;上海护畜会
Shanghai Sogi Kabushiki Kaisha	上海葬仪株式会社
Shanghai Spectator	上海民视报(社)
Shanghai Speedway, Inc.	上海机器脚踏车竞赛会
Shanghai Stage & Weekly Cinema Review	上海星期剧报
Shanghai Steam Laundry Co.	上海机器洗衣公司
Shanghai Steam Laundry Co. , Ltd.	机器洗衣公司
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	旗昌轮船公司
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 's Wharves & Godowns	金利源(码头堆栈)
Shanghi Steamship Co. , Ltd.	和奥轮船公司
Shanghai Stevedoring Co.	上海驳运公司
Shanghai Stevedoring Co. , Fed. Inc. , U. S. A.	上海驳运公司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众业公所;众业公司
Shanghai Stores Co.	新泰隆洋行
Shanghai Stucco Co.	上海大理石公司;上海灰精公司
Shanghai Studio of Advertising & Art	培成美术广告社
Shanghai Studio of Music	音乐技术研究学堂;新姆千司白利洋行
Shanghai-Sumatra Rubber Estates, Ltd.	上海苏门达腊橡树公司
Shanghai Supply Co.	老卡天洋行
Shanghai Tannery Co.	上海熟皮公司
Shanghai Tannery Co. , Ltd.	上海振新机器硝皮公司
Shanghai Telephone Co.	上海电话公司
Shanghai Telephone Co. , Fed. Inc. , U. S. A.	上海电话公司
Shanghai Textile Merchants Association	上海疋头进口公会
Shanghai Times	泰晤士报(馆)
Shanghai Times and Shanghai Sunday Times	泰晤士报馆
Shanghai Times Office	泰晤时报申报(馆)
Shanghai Toilet Club	新波利(女子美发厅)

Shanghai Torihikisho Co.	上海取引所
Shanghai Total Abstinence League	上海禁酒会
Shanghai Track & Field Association(International)	上海国际田径协会
Shanghai Tract Society & Free Reading Room	时兆报馆总发行所
Shanghai Trade Protection Society	上海保商会
Shanghai Traders	惠林洋行
Shanghai Trading Co.	①(日商)上海贸易公司; ②(1934年前后)永成华行;③(1925年前后)大中公司
Shanghai Trading Corporation	兴盛洋行
Shanghai Tramway Advertising Co.	上海电车招贴公司
Shanghai Tramway Co.	上海电车公司
Shanghai Transportation Co. , Ltd.	上海运输公司;上海运输株式会社
Shanghai Travel Service	上海旅行社
Shanghai Truck Service	上海汽车公司
Shanghai Trunk Factory	上海皮件厂
Shanghai Trust & Comm. Co. , Ltd.	上海信交兴业公司
Shanghai Trust & Cooperative Society	上海信用组合
Shanghai Tube Manufacturing Co.	上海软管制造厂
Shanghai Tug & Lighter Co.	驳船公司行
Shanghai Tug & Lighter Co. , Ltd.	会德丰驳船行;上海驳船拖船公司
Shanghai Typewriter Exchange	康德洋行;上海打字机公司
Shanghai Tyre Service Station	哈维洋行
Shanghai Union School of Nursing	西门外妇孺医院协和高级护士职业学校
Shanghai United Amusements, Fed. Inc. , U. S. A.	联怡公司

Shanghai United Import Co.	申和进口行
Shanghai Universal Polyclinic	上海联合诊疗所
Shanghai University Middle School	私立沪江大学附属中学
Shanghai Vacuum Cleaning & Storage Co. , Ltd.	上海清洁保管公司
Shanghai Veneer Wood Co.	上海胶合板公司
Shanghai Vernacular Society	上海土白会
Shanghai Victory Co.	胜利建筑木器厂
Shanghai Volunteer Corps	万国商团
Shanghai Warehousing & Trust Co. , Ltd.	上海仓库信托有限公司;上海仓库信托株式会社
Shanghai Waste Silk & Boiling Co.	绪昌丝头公司
Shanghai Waterworks Co. , Ltd.	上洋自来水公司;上海自来水公司
Shanghai Waterworks Fittings Co. , Ltd.	上海自来水用具有限公司
Shanghai Wharf & Warehouse Co. , Fed. Inc. , U. S. A.	上海码头堆栈公司
Shanghai Wharf Co.	立德成(码头公司)
Shanghai Wheelers	上海车会
Shanghai Woollen Weaving Co. , Ltd.	永兴毛织厂;上海毛织株式会社
Shanghai Woman, The	妇女杂志社
Shanghai Worsted Mill, Ltd.	上海毛绒纺织厂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Yacht Club	帆船总会;上海驶船会
Shanghai Yoko	上海洋行
Shanghai Y's Men's Club	上海联青总会;上海联青社
Shanghai Zaria, The	上海柴拉(报馆)
Shansi Bible Institute	洪洞道学院

Shantung Bodega Co.	济南金谷洋行
Shantung Ceramics Co. , Ltd.	山东窑业公司; 山东窑业株式会社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齐鲁大学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Hospital	齐鲁大学医院
Shantung Commercial & Express Co.	山东商运船行
Shantung Daily News	山东日报(馆)
Shantung Development Works Co. , Ltd.	山东兴业株式会社
Shantung Domei Kisen Kaisha	山东同盟汽船会社; 山东轮船公司
Shantung Hair Net & Lace Association	山东发网花边公会
Shantung Handels, G. m. b. H.	德茂洋行
Shantung Leaf Tobacco Co. , Ltd.	山东烟草株式会社
Shantung Match Co.	山东火柴公司; 山东火柴工厂
Shantung Mission Bible School	山东圣道学校
Shantung News	英文正报社; 中华英文正报(社)
Shantung Overseas Trading Co.	鲁昌洋行; 鲁昌公司
Shantung Portland Cement Co. , Ltd.	山东洋灰公司
Shantung Products Co.	裕鲁公司
Shantung Products Manufacturing Co. , Ltd.	天利工业制造厂
Shantung Railway Society	(山东)铁路公司
Shantung Road Hospital	(上海)仁济医院
Shantung Tobacco Co. , Ltd.	山东烟公司; 山东烟草株式会社
Shantung Tobacco Leaf Co. , Ltd.	山东烟草株式会社
Shantung Traders, Inc. , U. S. A.	山东贸易公司
Shantung Traders Co. , Ltd.	德茂洋行
Shantung Travellers' Service Co.	山东旅行服务社
Shantung Union College	广文学堂; 广文大学
Shaoshing Christian Hospital	(绍兴)福康医院
Shapiro & Son, N.	泰和洋行
Shapitric, L. M.	歇毕屋克(洋行)

Shapitric, Leo M.	丽沪广告转运公司
Shapitric Advertising & Trading Agency, Leo M.	
	丽沪广告转运公司
Sharaburin, I. N.	莎拉布林律师(事务所)
Share & Real Estate Brokers Society of Hongkong	
	香港股份物业经纪会所
Sharp, E. H.	晏大英国大律师(楼)
Sharp, Edmund	臬民晏状师(楼)
Sharp, Granville	晏汇单银两经纪行
Sharp, W. F.	华昌(牙行)
Sharp & Co.	晏汇单银两经纪行;晏公司;沙公司
Sharp & Co. , H. J.	日孚(洋行)
Sharp & Co. , Ltd. , C. F.	美邦轮船公司
Sharp & Dohme, Inc.	美国协东化学血清厂
Sharp & Toller, Edmund	晏多刺公司状师(楼)
Shattuck & Hussey	沙何公司;何士工程司(行)
Shatzoff, L. M.	沙曹夫洋行
Shaw, Charles R.	
	①(1917年前)源利洋行;②(1917年后)赞臣洋行
Shaw, F. W.	怡隆洋行
Shaw, Geo. L.	怡隆洋行;怡隆轮船行
Shaw, J. T.	疏德瞻新福利行;新福利行;疏德占行
Shaw, James T.	新福利行;疏德瞻新福利行
Shaw & Co. , G. C.	巨丰洋行
Shaw, Bland & Co.	李百里洋行
Shaw Brothers, Geo L.	怡隆洋行
Shaw Brothers & Co.	
	①(十九世纪)李百里洋行;②(二十世纪)怡隆洋行
Shaw, Ripley & Co.	李百里洋行;梳公司

Shayo, Albert	新亚洋行; (1946年后) 协华洋行
Shearstone & Co. , T. W.	薛和洋行
Shefts Bros. , Inc.	谢福斯兄弟洋行
Sheki & Co.	祥泰洋行
Shekury, G. I.	实各利(牙行); 锡利(牙行)
Sheldon & Co.	显而腾洋行
Shell Co. of China, Ltd.	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
Shelley, Cuthbert E.	协利(工程行)
Shen-Chong Book Depot	申昌书局
Shen Pao	申报馆
Shendrikoff, E. N.	沈迪国夫大律师(事务所)
Sheng Chang Chung Kee Iron Works	昇昌忠记铁工厂
Sheng Chang Motor Co.	昇昌汽车行
Sheng Ching Daily News	盛京时报(社)
Sheng Ho-Hsiang & Co.	昇和祥(服装百货店)
Shengching Shihpao	盛京时报社
Shepherd, G. C.	薛白洋行
Shepherd Trading Co.	明星洋行
Shepherd's	八珍酒楼
Shepherd's Buffet	八珍酒楼
Shepherd's Café	八珍酒楼; 八珍楼; 八珍洋行
Shepherd's Call	末世牧声半月刊
Shepherd's Hostel	久大(饭店)
Shepherd's Hotel & Restaurant	八珍酒楼
Shepherd's, Ltd.	八珍酒楼
Sherbinin & Co. , A. G. de	德显明公司
Sherbinin Theatres, Inc. , A. G. de	德显明公司
Sheriff & Bros, S. L. M.	沙厘付及兄弟公司
Sheriff Brothers	沙厘付兄弟公司

Sherly & Co. , W. S.	些厘洋行
Sheman & Co.	孝门洋行
Sheman & Co. , M. D.	孝门洋行
Sherven, O.	余问(建筑工程行)
Shewin-Williams Co.	萱韦油漆公司
Shewakram & Sons, K.	(上海)开吉洋行;(香港)其先珍洋行
Shewan, A.	华记(牙行)
Shewan, Wm.	英昌洋行
Shewan & Co.	旗昌洋行
Shewan & Co. , W.	英昌洋行
Shewan, Tomes & Co.	(香港、广州)旗昌洋行;(上海及内地各埠)新旗昌洋行
Shewaram & Co. , Verhomal	大发丝公司
Shi Djao Yueh Bao	时兆月报馆;时兆报馆
Shi Yang Che Pin Hong	西洋食品行
Shiang Hsin Woodworking Co.	祥兴制木厂
Shiba Menko	芝棉行;兴顺洋行
Shibakawa & Co. , Ltd.	芝川洋行
Shibano Kan	芝酒馆
Shibanokan Hotel	芝酒馆
Shibata & Co. , Ltd.	柴田洋行
Shibata Hospital	柴田医院;柴田眼科医院
Shibbeth, E. H.	信平洋行
Shibbeth & Co.	信平洋行
Shick, Myron G.	石克洋行
Shields, H. F.	施路司制牙技师行
Shiga & Co.	志贺洋行
Shiga & Co. , M	志贺洋行本店
Shiga Typewriter Co.	志贺洋行本店

Shih Yu Bible Institute	施育妇女圣经学校
Shikigumi	志岐组
Shikishima Shokai	敷岛商会
Shilnikof, A. A	汽车器件洋行
Shimada Yoko	岛田洋行
Shimadzu Seisakusho, Ltd.	株式会社岛津制作所
Shimamatsu & Co.	岛松商店
Shimamoto & Co.	岛本洋行
Shimazu Seisakusho	岛津制作所
Shimbi Menko	新美棉行
Shimbun Rengo-Sha	新闻联合社
Shimeido Apothecary	思明堂大药房
Shimidzu Shoten	清水商店
Shimidzu Wakichi Shoten	清水和吉商店
Shimizu, S.	顺隆洋行
Shimizu Hospital	清水医院
Shimizu Yoko	清水洋行
Shimizugumi & Co.	清水组; 株式会社清水组
Shimwell & Bros. , Ltd.	公大洋行
Shin An & Co.	新安洋行
Shin Chang & Co.	信昌洋行
Shin Ko Yoko	神港洋行
Shin Shin Yoko	晋信洋行
Shin Shina Sha	新支那社
Shin Sho Contractor	秦章洋行
Shin Tai & Co.	新大洋行
Shin Tai Co.	新泰洋行
Shin Tai Yoko	新大洋行
Shin To Ruku	新斗六(糖果店及茶室)

Shin Wa Shokai	进和商会
Shina Kogyo Kaisha, Ltd.	支那兴业公司
Shinagawa Hospital	品川医院
Shinchang & Co.	信昌洋行
Shinchang Apothecary	信昌大药房
Shinei Yoko	新正洋行
Shing Chong & Co.	新昌洋行
Shing Chong Chemical Works	新昌化学社
Shing Chong Electric Co.	新昌洋行
Shing Foo & Co.	信孚号
Shing Hwa Optical Co.	兴华眼镜公司
Shing Ling & Co.	星菱洋行
Shing Shene & Co.	信成洋行
Shing Tong & Co.	兴东洋行
Shingi & Co.	信义洋行
Shingi Drug Store	信义洋行
Shingi Yoko	信义洋行
Shingishu Station Hotel	肇川宫
Shigming Handels Compagnie, China	新民商业洋行
Shingming Trading Co. (China), Ltd.	新民洋行
Shigo, R.	新大洋行
Shinki & Co.	兴记洋行
Shiko Trading Co.	新兴洋行
Shinko Yoko	①(天津、上海)信兴洋行;②(大连)新兴洋行
Shinkwa Yoko	上海新华洋行
Shinkyō Yoko	申享洋行
Shinkyō Yoko Goshi Kaisha	申享洋行
Shinliu & Co.	信隆洋行
Shinmo & Co.	信茂公司

Shinmo Yoko	信茂洋行, ; 泰利行
Shinnson Brothers Tobacco Co.	新新兄弟烟公司
Shinohara & Co. , T.	篠原洋行合资会社
Shinozaki Hospital	篠崎医院
Shinri & Co.	新利洋行
Shinsen Co.	神仙公司
Shinshin Trading Co.	新新洋行
Shinshin Yoko	晋信洋行
Shinsho & Co.	信昌洋行
Shinsho Drug Store	信昌大药房
Shinsho Yoko	新昌洋行
Shintai & Co.	①(青岛)新泰号; ②(上海)新大洋行
Shintani & Co.	新谷洋行
Shintomo Shoten, Ltd.	信友洋行; 株式会社信友商店
Shinwa Shokai	进和商会
Shinwa Shokai, Ltd.	进和商会
Shinwa Yoko	申和洋行
Shionogi & Co. , Ltd.	盐野义商店株式会社
Shionogi Shoten	盐野义商店
Shiosaki Yoko	潮崎洋行
Shiozaki & Co.	潮崎洋行
Shiozaki Yoko	潮崎洋行
Shipmerchad Co.	世普马雪德洋行
Shippers Commercial Corporation	利中洋行
Shipping & Engineering	航业机务西报(周刊社)
Shipping & Landing Agency and Customs Broker	新昌洋行
Shipping Review	航业周报
Shipping Review and Shipping & Engineering	航业周报(社)
Shiraishi Yoko	白石洋行

Shisei Hospital	至诚医院
Shiseido, Ltd.	资生堂
Shiseido & Co. , Ltd.	资生堂
Shiseido Co. , Ltd.	资生堂
Shiseido Kabushiki Kaisha	资生堂株式会社
Shister, M.	世昌洋行
Shiu Bun Sho Kwan	修文书馆
Shiya Yoko	西亚洋行
Shizuna Yoko	山北洋行
SHLM	粤南信义会
Shluger, Jacob H.	世光洋行
Sho Lee & Co.	胜利洋行
Sho Sho & Co.	祥昌洋行
Sho Tai & Co.	祥泰洋行
Shobun Yoko	正文洋行
Shoei Yoko	正荣洋行
Shoemaker, Arthur	舒美柯洋行
Shoemaker Art Looms	舒美柯洋行;舒美柯地毯公司
Shohor's Pharmacy	孝好大药房
Shoka & Co.	正华洋行
Shoka Yoko	正华洋行
Shoki Co. , Ltd.	松记公司
Shoki Yoko	正记洋行
Shoko Glass Co. , Ltd.	昌光硝子株式会社
Shoko Yoko	昌光洋行
Shokwa Dyestuffs Co.	昭华颜料厂
Sholin Yoko	松林洋行
Shooker Abraham & Co.	祥发洋行
Shoolingin, N. M.	曼胜民律师(事务所)

Shoop & Chalaire	修贝薛费大律师(事务所)
Shoor, Dr. S.	书尔(化验所)
Shopping News Press	采购周刊社
Shorrocks & Co., Saml. H.	瑞乐洋行
Shoryu Bank	正隆银行
Shoryu Bank, Ltd.	正隆银行; 株式会社正隆银行
Shoryu Yoko	正隆洋行
Shosho Yoko	松昌洋行; 梨栈松昌
Shosho Yoko, Ltd.	松昌洋行
Shotai Yoko	祥泰洋行
Shotter, Madar & Co.	英商沙达马公司
Showa Menka Kabushiki Kaisha	昭和棉花株式会社
Showa Seiyu Shoji Co., Ltd.	昭和精油商事株式会社
Showa Shipping Co.	昭和海运公司
Showa Shipping Co., Ltd.	昭和海运公司
Showa Transportation Co.	昭和海运公司
Showa Union Corporation	昭和组合
Showa Yoko	昭和洋行
Showaryu Boyeki Co., Ltd.	昭和隆贸易公司
Showchow Hospital	(寿县)春华医院
Shoyu Club	商友俱乐部
Shriro, J. A.	石利洛洋行
Shriro Bros. (China), Fed. Inc., U. S. A.	石利洛洋行
Shriro Bros. (China), Ltd.	石利洛洋行
Shriro Brothers, Inc.	石利洛洋行
Shroff, P. B.	倍森洋行; 陪森洋行
Shroff, R. F.	罗西洋行
Shroff, S. F.	永祥洋行
Shroff & Co.	瑞立洋行

Shroff & Co. , R. F.	罗西洋行
Shroff Silk Store, P. B.	陪森洋行
Shroff, Son & Co.	顺利洋行
Shroff, Son & Co. (China), Ltd.	顺利有限公司
Shuang Lung & Co.	双龙洋行
Shufeldt, Boeck & Co.	公义洋行
Shuhman, A.	天苏洋行
Shui Hwa School	私立瑞华初级中学
Shuming Tang Dispensary	思明堂大药房
Shun Lung Yoko	顺隆洋行
Shun Pao	申报馆
Shun Shin Sha	春申社
Shun Tien Shih Pao	顺天时报社
Shung Kei Bible Training School for Women	崇基圣经师范女子学校
Shung Tak Girls' High School	私立崇德女子中学
Shung Tak Girls' School	私立崇德女学校
Shunmeido Book Store	春明堂书店
Shunmeido Sporting Goods Store	春明堂运动具店
Shuntien Shihpao	顺天时报社
Shuntien Shipao	顺天时报社
Schwamberg & Co. , K. A.	
	①(1920年代)北亚公司;②(1930年代)亚北洋行
Sianfu Baptist Theological College	西安神道学堂
Siao-Kan Boys's Boarding School	(孝感)伦敦会男学堂
Sibbald & Johnston	仁济医馆
Siber Hegner & Co.	华嘉洋行
Siber Hegner & Co. , Ltd.	华嘉洋行
Siber Hegner & Co. (Tientsin), Ltd.	华嘉洋行

Siberian Agricultural Corporation, Ltd.	英商植昌有限公司
Siberian American Co.	西比利美国货物批发有限公司
Siberian Bakery	西毕立面包房
Siberian Bakery & Confectionery	西毕立洋点心铺
Siberian Co.	西比利亚商会
Sibrian Co. , Ltd.	西比利亚洋行;西比利洋行;丹商西比利股份公司
Siberian Fur Import Co. (London)	普纶洋行
Siberian Fur Store	西比利亚皮店
Siberian Furriers Store	西比利亚皮货洋行
Siberian Jewellery Store	西比利亚首饰公司
Siberian Produce Co.	安地洋行
Siberian Store	①(青岛)西比利亚洋行;②(天津)兴盛洋行
Siberian Trading Co.	(上海)西比利洋行
Siddall, Theodore	薛代尔(邮票店)
Sidiq, Mohamed	致祥洋行
Sidoroff, P.	西德洋行
Sieber & Co.	时昌洋行
Siemens & Halske, A. G.	西门子电气公司;西门子电机厂
Siemens China Co.	西门子电气公司;西门子电机厂
Siemens China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o.	西门子电气公司;西门子电机厂
Siemens Schuckertwerke, G. m. b. H.	德国西门子电气公司;西门子电机厂
Siems-Carey Railway & Canal Co.	裕中营造公司
Siemssen, Alfred	祥福洋行
Siemssen, G.	禅臣洋行
Siemssen & Co.	禅臣洋行;禅臣公司
Siemssen & Krohn	①(福州)禅臣洋行;②(上海)兴成洋行

Sienyu Christian Union Hospital	仙遊基督教协和医院
Sietas & Co.	虾厘洋行
Sietas & Co. , H.	哈利洋行;哈喇洋行
Sietas, Block & Co.	哈利洋行;哈喇洋行
Sietas, Plambeck & Co.	哈喇洋行;哈利洋行
Sign of the Lantern	大灯笼公司
Signs of The Times Publishing House	时兆月报馆;时兆月报印书馆
Sih, Vorner & Wang	华孚行
Sikh Church, The	(汉口)印度礼拜堂
Sikh Store	印度食品公司
Silas, D. H.	沙刺士洋行;泰丰洋行
Silas & Co.	瑞乐时洋行
Silberlust, I.	榭百禄洋行
Silberlust-Polly Corp.	普来洋行
Silberman, I	明泰洋行
Silberman's Drapery & Outfitting Store	明泰洋行
Silberman's Drapery & Outfitting Stores	明泰洋行
Silberman's Drapery Store	明泰洋行
Silberstein-Neulander Corporation	纽滦德洋行
Silin	西林公司
Silin & Shoshin Co.	西林绍慎公司
Silk Salon Modernique	美丽绸缎公司
Silk Reeling Establishment	纺丝局
Sillar, R. G.	浩昌洋行
Sillar Bros.	浩昌洋行
Silnitzky, G. & G.	雪宜司苟印刷所
Silva, A. M. Place da	沙面夜冷馆
Silva, C. J. da	施登韶律师(楼)

Silva, F. X. A. da	施吃古状师(楼)
Silva, Francisco A. da	施吃古状师(楼)
Silva, J. P. N. da	思利化经纪行
Silva, José da	思利化状师(楼)
Silva, L. A. da	澳门飞腾公司
Silva, Dr. Livio	薛尔惠格致矿物化学所
Silva, P. M. P. N. da	施路化股份经纪行; 司利化股份经纪行
Silva, Paulo de	义兴洋行; (1915年后) 新义兴洋行
Silva & Cia	葡产公司
Silva & Co.	司利华公司
Silva & Co., Eça da J. M.	谦泰洋行
Silva-Netto, J. P.	尼都洋行
Silva-Netto & Co.	尼都洋行
Silva Trading Co.	(上海) 帆顺洋行; (香港) 施威洋行
Silveira, G.	威林修整钟鏢店
Silver Bamboo	银竹(工艺品店)
Silver Dollar Cafe	协隆洋酒店
Silver Palace	银联座(电影院)
Silverberg, Marcus	惠茂洋行
Silverlock & Co., John	中和洋行
Silverstone & Co., Ltd., A.	茂林洋行
Si-me Engineering Co. (China), Inc.	师美机器工程公司
Simmang, Theodore E.	信孟大律师办公处
Simmang & Landesman	信孟蓝思满大律师办公处
Simmang & Simmang	信孟蓝思满大律师办公处
Simmons	新茂洋行
Simmons American Import & Export Exchange, Inc.	西门子进出口贸易公司
Simmons & Co., Geo. A.	西门洋行

Simmons & Co. , Inc. , Thomas W.	新茂洋行
Simmons & Co. , M.	新茂洋行
Simmons & Co. , Thomas W.	新茂洋行;(香港)万国商务洋行
Simmons & Co. (China), Inc. , Thomas W.	新茂洋行
Simmons & Co. (Nevada). Inc. , Thomas W.	新茂洋行
Simmons Co.	雪门司公司;雪门司洋行;席梦思公司
Simmons Hardware Co.	美国西门五金器具厂
Simoes, M. M.	西美洋行
Simon, Ltd. , Henry	亨利细磨厂
Simonin, Ch. Jh.	徐慕伦(代理行)
Simplex Gypsum Products, Ltd.	石膏粉制造有限公司
Simplex Utility Co.	信立公司
Simplicity	梦景洋行
Simpson, W. G.	辛博生洋行
Sims & Co.	森木司洋行
Sin Chong Filature Co.	信昌缫丝公司
Sin I Hui	信义会;中华信义会
Sin Lung & Co.	信隆五金药品杂货号
Sin Shing Co. , Inc.	合资会社新兴公司
“Sin Wan Pao”	新闻报
Sin Wan Pao Co.	新闻报公司
Sin Wan Pao Kwan	新闻报馆
Sin Wan Pao, Ltd.	新闻报有限公司
Sincere Corporation	先施进出口行
Sincere Mercantile Co.	华信公司
Sincere Trading Co.	
	①(上海霞飞路)成兴贸易公司;②(上海九江路)先施洋行
Sincerity Trust Co.	诚成公司
Sinclair, J. A.	克兰洋行

Sinclair & Co.	阜康洋行; 中国花生总公司
Sinclair Button Co.	克兰洋行
Sinclair, Choe & Co.	阜康洋行
Sindacate Italo Manchese	西益敏公司
Sindeyn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	信达水火保险公司
Sine Co., Ltd.	信谊贸易有限公司
Sine German Trading Co.	德盛洋行
Sine Laboratory	德商信谊化学制药厂
Sine Laboratory Co., Ltd.	德商信谊化学制药厂
Sine Pharmacy	
①(上海百老汇路)德商信谊大药房; ②(上海霞飞路)信谊大药房	
Sine Pharmacy, Ltd.	兴华大药房
Sing Ding Girls School	私立寻珍女子初级中学
Sing Hwa Trading Co.	新华洋行
Sing Kee & Co.	新记行
Sing Way Trading Corporation, Ltd.	新汇贸易有限公司
Singapore Rubber Works, Ltd.	荷兰国橡皮公司
Singer, O.	辛格洋行
Singer & Co., J.	兴记洋行
Singer Sewing Machine Co.	胜家公司; 胜家缝纽机器公司
Singer Sewing Machine Co.'s Girl's Sewing School	胜家缝衣女学校
Singham Bros. & Co.	星咸兄弟有限公司
Singming Co., Ltd., China, The	新民有限公司
Sinhwa Lutheran Hospital	(新化)信义医院
Sino American Engineering Co.	华美工程实业商行
Sino-American Engineering Co., Fed. Inc.	华美工程材料公司
Sino-American Engineering Co., Ltd.	中美机器公司
Sino-American Industrial Co.	中美实业公司

Sino-American Realty Co.	中美地产营业公司
Sino-American Syndicate	(1920年代)信申公司
Sino-American Traders	华美贸易公司
Sino-American Trading Corporation, Inc.	中美洋行
Sino-Aryan Trading Co.	谋利洋行
Sino-Belgian Carpet Rug & Lace Manufacturing Co., Ltd.	永新地毯厂
Sino-Belgian Development Co.	华比公司
Sino-Belgian Radium Institute Hospital	中比镭锭治疗院
Sino-Belgian Tobacco Co.	华比烟草有限公司
Sino-British Commercial Syndicate	中英洋行
Sino-British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Ltd.	华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Sino-British Engineering Corporation(China), Ltd.	华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Sino-British Syndicate	中英实业公司
Sino-British Traders	华英贸易公司
Sino-Chemica	先诺洋行
Sino-Continental Co.	德华礼洋行
Sino-Czechoslovak Trading Corp., Ltd.	中捷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Sino-European Products Corp.	天益洋行
Sino Foreign Engineering & Supplies Co., Ltd.	中黎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Sino-Foreign Stock & Produce Exchange, Ltd.	华洋证券物品交易所
Sino-Foreign Trading Co.	成大洋行
Sino-French Engineering Syndicate	华法公司
Sino-French Trading Co.	慎基洋行
Sino-French Trading Corp.	聚福洋行

Sino-German News Agency	德华电报社
Sino-German Trade, J. H. W. Lotz	懋德洋行
Sino-German Trading Co.	
	①(香港)中德公司;②(重庆、昆明)德华洋行
Sino-Hawaiian Corp. (New York)	中檀公司
Sino-Indian Trading Co.	祥成洋行
Sino-Italian Bank	华义银行
Sino-Italian Motors	中意汽车公司
Sino-Italian S. S. Co., Ltd.	义华航运有限公司
Sino-Japanese Co.	中东洋行
Sino-Japanese Cultural Works	濂川公馆
Sino-Japanese Dispensary	中东大药房
Sino-Japanese Egg Co., Ltd.	中日蛋公司
Sino-Japanese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Co., Ltd.	
	中日实业有限公司
Sino-Japanese Industrial Bureau	日华工业社
Sino-Japanese Law & Brand Office	
	日华联合法律商标特许事务局
Sino-Japanese Mining Co., Ltd.	中日矿业公司
Sino-Japanese Mutual Savings Society	中日共益贮蓄株式会社
Sino-Japanese Pharmacy	中东大药房
Sino-Japanese Society	中日联谊会
Sino-Java Import & Export Co.	中南贸易公司
Sino-Scandinavian Bank	华威银行
Sino-Spanish Trading Co.	恒利洋行
Sino-Swiss Co.	瑞华洋行
Sino-Swiss Commercial Co.	惠大洋行
Sino-Swiss Trading Co.	(上海广东路)中瑞贸易公司
Sino-Swiss Trading Co., Ltd.	瑞泰洋行

"Sinobel"	华比洋行
Sipa Macaroni Factory	西宝洋行
Sirius, Ltd.	德意志影片公司
Sirota, I. D.	西洛得(律师事务所)
Sirtore, Dr. Ing. L.	希尔克工程师(行)
Sisico Sino Silk Necktie Co.	丝丝扣(领带织造厂)
Sisters of Bon-Pasteur	善牧会
Sisters of Charity	仁爱会
Sisters of Charity & Orphans Asylum	(汉口)仁慈堂
Sisters of Charity Dispensaries	仁爱会施医院
Sisters of Charity of St. Francis (Luxemburg)	卢森保方济各第三仁爱会
Sisters of the Holy Cross	圣十字架修女会
Sisters of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of Munster	门斯德圣母始孕无玷修女会
Sisters of N. D. de Namur	奈缪圣母修女会
Sisters of Notre-Dame des Anges	勒奶维尔天神母后会
Sisters of Our Lady of Kaloksa	加罗萨圣母会
Sisters of St. Francis, Salano	巴伐利亚圣方济各沙拉诺修女会
Sisters of St. Joseph Pittsburg	美国毕资圣若瑟修女会
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rtres	沙德圣保禄女修会
Sjantoeng Import Co.	(天津)善成洋行;(上海、汉口、重庆)德昌洋行
Skappel, H.	斯格博化验五金矿师(行)
Skeggs & Co., C. J.	义昌洋行
S K F	钢珠轴领公司
Skidelsky, L. S.	谢结斯(木行)
Skidelsky's Successors, L. S.	谢结斯帐房
Skinner & Co., Thomas	时精商业咨询社

Skiotis & Co. , Panos D.	施记烟行;施记烟公司
Skiotis Bros. & Co.	施记烟公司
Skirtun Motor Car & Trading Co. , Stanley	斯丹礼汽车行
S K M	湘北瑞华信义会
Skoblin, S. F.	美和洋行;(1930年前)司郭布林洋行
Skoblin & Co. , J. I.	士国布林公司
Skoblin Co.	美和洋行
Skoblin Engineering Co. , J. S.	西林公司
Skoda Works	斯可达工厂
Skoda Works, Ltd.	斯可达工厂
Skodaworks	斯可达工厂
Skodaworks, Ltd.	斯可达工厂
Skoff, F.	施克孚工程公司
Skott & Co. , H.	新中和洋行
Skott & Co. , Ltd. , H.	新中和洋行
Skottowe, J. T.	永和洋行
Skottowe & Co. , J. T.	永和洋行
S K S Factory	新光化工厂
Skvirsky Studio, L.	上海美术照相馆
S. K. W. Syndicate	大通(辛迪加)
Slack, A. Milton	史兰格(销售代理行)
Slade, Marcus Warre	士列大状师(楼)
Slaughter House	(天津)义和公司
Sleeper Davis Hospital	妇婴医院
Sleeper Davis Hospital School of Nursing	美以美会妇婴医院护士学校
Sleeper Davis Memorial Hospital	妇婴医院
Slepak, I. V.	司立巴克大律师(事务所)
Slevogt & Co.	天福洋行

Sligh, J.	华茂洋行
Sligh & Co.	华茂洋行
Sligh & Co. , J.	(天津)华茂洋行;(北京别作)麓记洋行
Slingsby (Arthur) & Hirschel	大章有限公司
Sloane, W. & J.	士伦公司
Slovan & Co. , M. J.	广生洋行
Slovo Printing & Publishing Co.	斯罗佛俄文日报馆
Slovo Publishing Co.	斯罗佛俄文日报馆
Slowe & Co.	新顺发洋行
Slowe & Co. , Ltd.	顺发洋行;顺发有限公司
Sluyters & Co.	联合保险公司;喲喃保险公司
Small Investors, Ltd.	易成股票有限公司
Small Investors Share & Real Estate Co.	香港股份物业公司
Smalley & Co. , W. N. A.	士摩利洋行
Smallwood, H. St. Clair	司马武德洋行
Smallwood & Co. , H. St. Clair	司马武德洋行
Smart Lingerie Co.	华丽洋行;华丽公司
Smart Shop	晒爹卢夫人(服装店)
Smedley, J. D.	大经(建筑工程行)
Smedley, John	美昌(建筑工程行)
Smedley, Denham & Rose	美昌(建筑工程行)
S M F	南行道会;瑞典行道会;行道会
Smidt, C.	熙司蜜洋行
Smidth & Co. , F. L.	史密芝公司
Smidth & Co. , F. L. (A. S.)	史密芝公司
Smith, Crowther	施蔑士律师(楼)
Smith, Curt	师美洋行
Smith, E. M.	丽泉洋行
Smith, Frank W.	益德洋行

Smith, Geo.	老广和洋行
Smith, H.	源发(量度公证行)
Smith, Henry	宝昌(牙行)
Smith, Herbert	老和记洋行
Smith, J. Mackrill	广源洋行
Smith, J. Travor	德华施洋行
Smith, R. Lawrie	福顺洋行
Smith, W. A.	烟台普西洋行
Smith & Adams	四达汽车修理公司;四达汽车公司
Smith & Ballauf	宝昌(牙行)
Smith & Co.	①(烟台)士也洋行;②(广州)源安洋行
Smith & Co., Carl W.	裕兴泰洋行
Smith & Co., E. E.	士蔑洋行

黄光域辑

(责任编辑:丁如筠)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以美国汉学家的研究为中心——

FOREIGN HISTORIOGRAPHY ON MODERN CHINA 26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二十六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30 号

责任编辑：丁加筠

责任校对：劳 定

封面设计：毛国宣

版式设计：王智厚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Guowai Zhongguo Jindaishi Yanjiu

第二十六辑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编码 100720 电话 40415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科技情报信息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75 印张 2 插页 270 千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5004-1606-7/K·252 定价：11.00 元
